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CONTENTIOUS POLITICS

# 抗争政治

*Charles Tilly Sidney Tarrow*

[美国] 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著 李义中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抗争政治

CONTENTIOUS POLITICS

一位超越时间的旅行者，在动荡的1785年从英国出发、途经波士顿，在同样动荡的1848年折回欧洲并再度游历了北美，在更加动荡的20世纪前往南美、东欧、非洲、中东。此番行程旨在对社会运动的抗争事件进行考察。他所经历的，是一番怎样的奇幻之旅呢？这番奇幻的旅行，现在变成了一部名著《抗争政治》。

——美国读者

查尔斯·蒂利的生命形式，令人想起了夸父：“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中国读者

ISBN 978-7-5447-1208-8



9 787544 712088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28.00元

HUMANITIES AND SOCIETY



# 抗争政治

[美国] 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著 李义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争政治/(美)蒂利(Tilly, C.), (美)塔罗(Tarrow, S.) 著;李义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6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Contentious Politics  
ISBN 978-7-5447-1208-8

I. 抗… II. ①蒂… ②塔… ③李… III. 政治—研究—世界 IV. ①D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583号

Contentious Politics by Charles Tilly & Sidney Tarrow  
Copyright © 2007 by Paradigm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aradigm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64号

书 名 抗争政治  
作 者 [美国]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译 者 李义中  
责任编辑 黄颖  
原文出版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08-8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致道格，

我们默默的合作伙伴

#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提出要求	005
第二章 如何分析抗争	034
第三章 政权、剧目与机遇	056
第四章 抗争互动	086
第五章 动员与遣散	110
第六章 社会运动	136
第七章 致命性冲突	165
第八章 混合政权中的抗争	201
第九章 抗争的现在与未来	227
附录 A 概念与方法	247



附录 B 抗争之流、抗争片段、机制及过程	261
参考文献	269
索引	292
译后记	309

## 前 言

近年来，许多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生开始对本书的两个主题产生兴趣，这两个主题分别是：抗争政治与借助备细说明的机制与过程对重大政治事件加以解释（的方法）。如你们很快将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学者、新闻记者以及普通公民们一直在研究一种或另一种类型的抗争政治，然而，只是在最近，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专家们才努力设法在人类行为的通则（就人类行为的通则而言，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不过是一个特殊案例而已）与有关革命、内战、社会运动以及每一其他形式的抗争之个别概括间，找出一种中间立场。抗争政治方法着意寻求的是存在于大量政治斗争中之因果关系方面的相似性，而并不意图找寻统摄所有政治（行动）之通则。它通过辨识那些在殊为不同的冲突与合作中，以相似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与过程——例如，不久你将会碰到的居间联络机制和动员过程——来达到此一目的。本书则是将这两种方法的基本要素集合到了一起。

几年前，我们曾做出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初步尝试，但此一尝试仅获得部分成功。2001年，与作为世界著名的抗争政治分析大家之一，斯坦福大学的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联手合作，我们撰写了《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该书曾激起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甚至是那些对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深表同情的专家学者,也对该书提出了三点合理的异议。首先,该书述及12种机制与过程,却未曾对其加以细致的界定,也未能提供翔实的证明,遑论精确地显示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了。其次,该书对于从事抗争政治研究的学生及学者们可据以检测其解释之可靠性的方法与证据,依然不甚了了。第三,该书未能对其要义作直截了当的陈述,而是沉醉于复杂的情况,不着边际的铺陈与实际例证之中。

在这本新著中,我们力图克服这三点不足。我们对要加以探究的机制与过程在数量上做了限定,而且尽我们所能地对它们做出清晰而一以贯之的描述。而对于那些可以据之检测我们所作解释之可靠性的方法与证据,我们也做了强调,同时,将我们的要点在本书的两篇附录中作了概括和总结。最后,我们按部就班地推出抗争政治方法,先从基础性叙述开始起步,继而通过拓展延伸与具体应用继续推进。我们还先后两次对我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分别见第九章和附录。

不过,我们并未满足朋友及批评者的所有批评和反对意见,譬如,本书主旨在于辨识和阐明贯穿于文中的一些分析性要素,诸如抗争之流、事例(episode)、机制、过程以及结果。对它们逐一进行经验式的确证,则意味着要么另写一本书,要么便是让本书的篇幅呈指数式的扩展。我们也并不试图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抗争政治做均衡式的叙述,而更愿意将记述重点放在那些我们已对其做过研究以及熟知其语言的地区上。

第一次接触本书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出现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大量概念令人望而生畏,但大可不必为此而气馁:把这些概念当作工具而不是把它们看成规则即可。你们应当运用这些概念去理解据以阐明我们对有关抗争政治加以解释的具体叙述,而且,当你们研究抗争政治的事例时,这些概念也应该对你们有所助益。

让我们立即着手来清除一个经常出现的误解。我们两人所从事的

研究工作都属于被其他许多人简称为“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而我们俩也都认为社会运动的确存在,且具有其突出的特点,本书的第六章即直截了当地论及社会运动。我们甚至还撰写过有关社会运动的专著:塔罗(Sidney Tarrow)的《运动中的力量》(*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1998)以及蒂利(Charles Tilly)的《社会运动,1768—2004》(*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但是在本书中,我们的做法却不是将所有的民众动员一并纳入社会运动这一容器中,而是把社会运动置于种类更为繁多之民众斗争的背景下来加以研究,我们既表明了它们的共性也指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希望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学人们把本书与他们最喜欢的社会运动研究著作放在一起读,而在他们做这种对照阅读时,我们希望他们会认识到存在于社会运动与其他形式的抗争政治之间的相似、差异以及二者间的联系。

从以下这些人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可或缺的信息、建议、帮助、批评和鼓励,他们是:罗恩·阿明扎德(Ron Aminzade)、肯尼思·安德鲁斯(Kenneth Andrews)、卡伦·贝克威思(Karen Beckwith)、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迪安·伯肯坎普(Dean Birkenkamp)、查尔斯·布罗克特(Charles Brockett)、安杰拉·卡特(Angela Carter)、安妮·科斯坦(Anne Costain) xii、多纳特拉·德拉·波特(Donatella della Porta)、米凯尔·埃里克森(Mikael Eriksson)、列夫·格林伯格(Lev Grinberg)、克雷格·詹金斯(Craig Jenkins)、玛丽·卡赞斯坦(Mary Katzenstein)、安杰拉·金(Angela Kim)、伯特·克拉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卡利·科尔塞(Karrie Koesel)、汉斯彼得·克里斯(Hanspeter Kriesi)、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莉莲·马蒂厄(Lilian Mathieu)、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戴维·S. 迈耶(David S. Meyer)、玛丽简·奥萨(Maryjane Osa)、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萨拉·索尔(Sarah Soule)、萨拉·塔罗(Sarah Tarrow)、彼得·沃伦斯坦(Peter Wallensteen),以及愿意花费时间



来分析我们研究结果的学生们。我们最为感激的则是并未参与本书写作的我们默默(但也未必真的沉默无声)的伙伴道格·麦克亚当。道格因忙于“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事务而无法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特殊冒险,但他还是以拉拉队队长、批评家和朋友的不同身份给予我们这次行动以关注,同时他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他那众所周知的仁善。

## 第一章 提出要求

1

1785年,当一位名叫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英国神学专业的年轻学生,以一篇有关奴隶制的文章而赢得剑桥大学拉丁文优秀奖(Latin Prize)时,他和他的听众们都未曾想到这篇文章将施于英帝国范围内之奴隶制的影响。不过,当克拉克森在赶往伦敦就任新教牧师之职的途中,停下来坐在路边的他却思绪万千,假如他所揭示的有关奴隶制的恐怖景象是真的,“那现在就应该是有人着手去终结这些灾难的时候了”(Hochschild 2005:89)。

克拉克森最终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个人。与一小批提倡反奴隶制的同道一起,他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组织者。克拉克森撰写了数千封信件、组织请愿行动,并且帮助发起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跨国运动。这一运动终结了罪恶的奴隶贸易暴行,使奴隶制在环大西洋地区得以废止,此举也使英国的改革者们得以宣称其对于新获独立然而却保留了奴隶制的美国拥有道义上的优越性。反奴隶制运动历经许多阶段,在奉行压制政策的拿破仑战争时期一再遭受逆转,在美国则更是需要一场严酷的内战才使那里的奴隶制度得以终结。不过,在18世纪的英格兰,该运动却将宗教福音运动、天主教徒的政治解放以及议

会改革结合起来,造就了现代社会运动的模式。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当年那场由克拉克森和他的朋友们发起的运动不免显得有些温文尔雅甚至保守,然而,他们在提出要求时的做法却与当今时代的社会运动毫无二致。他们促成组建委员会,在报纸上做各类广告,发动请愿宣誓,收集证据并将其呈交下议院。尽管就“杯葛”(boycott)这个词而言要等到下一世纪才进入英语语汇,但当时的他们已然组织起一场针对由奴隶所生产的食糖采取实际上联合抵制的行动。不列颠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们还通过展示奴隶拥有者们折磨拷打奴隶时所使用的器具,让这个国家的民众受到良心上的巨大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与议会内及文学界的奴隶制反对者们诸如威廉·威尔伯福斯、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结成同盟;而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共和派宣称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人权”的一个短暂时期里,他们甚至还将克拉克森派往法国,以帮助那里的反奴隶制力量(Drescher 1991)。

不列颠的反奴隶制运动耗时近乎 20 年,才使大西洋奴隶贸易得以终结,而整个不列颠殖民地奴隶制的终结则还要再往后推迟 30 年。不过,就在克拉克森和他所在的委员会发起这场运动后不到一年,“不列颠的民众就在伦敦的各种辩论社团、一些地方小酒馆以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向奴隶制发起了挑战”(Hochschild 2005: 213)。而在新独立的美国,奴隶贸易的反对者们也将最终说服国会宣布这项贸易为非法,尽管它还需要发动一场内战才能终结南部的奴隶制。就这样,克拉克森、其盟友和敌人以及大西洋两岸的一些公共权力机关就一起介入到严肃的政治活动中了。

关于反奴隶制运动,我们可以做出许多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道德故事,说它所展示的是人们在面临困境时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所能达成的业绩;也可以将其视为一次开明价值观的应用、一种宗教热情的表达,抑或是英国的资产者们企图推进劳动力自由与贸易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我们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跨国社会运动的



早期实例,而今,它已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现象。欧洲和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的不同观察者们向我们讲述了所有这些故事以及其他更多的故事,在此,我们将其视为**抗争政治**的一个戏剧性的实例,一场围绕着何种政治方案终将占上风而在人们之间展开争斗之实例。

再来看另一个抗争政治的戏剧性事件,一场 2004 年急速降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抗争政治事件。广大民众才脱离苏联统治 10 年,乌克兰的统治者,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便施以腐败、选举欺诈以及政治犯罪,其政权代理人从反对党的手里窃取了大选成果,并且用二恶英(dioxin)对反对党候选人尤先科(Victor Yushchenko)下毒。为回应这一腐败选举结果,同时也由于得到外国观察员及邻国的支持,义愤填膺的市民们纷纷涌上了首都的街道,他们在 11 月的寒冬彻夜唱着、喊着,封锁住通向政府大楼的通道,发动了被称为“橙色革命”的行动。乌克兰的抗议活动与 2000 年发生在塞尔维亚与 2003 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事件类似,都属于针对选举欺诈的民众抗议潮,扩散至整个前苏联及其邻近地区。

3

不过,“橙色革命”却以失败告终。就在抗议者拥塞基辅的诸多街道之际,超过 1 万人的内务部军人也匆忙登上卡车,打算用武力对付这些抗议者。“当军队开始向基辅城中心开进时,”奇弗斯(C. J. Chivers)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基辅正趋于一场可怕的冲突,一场足以引发内战的苏联式的镇压。”(Chivers 2005)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出乎所有局外人的意料,尽管新闻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显而易见的街头抗议行动上,但这个冬月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却远不止如此:

- 一批军官“将信息透露给库奇马先生的对手,为反对派要人及反对派的示威行动提供安全保障,他们还明确表示其不愿遵守政府当局为镇压路线而精心设计的公开信号,并且与政府官员们展开激烈的心理较量,以减弱对抗议者的不利反应”(Chivers

2005)。

- 在整个危机期间，“由一小批乌克兰高层情报官员发动的内部斗争也在进行，他们决定不听从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政府的计划安排，将权力转交给……总统选定的继任者”(Chivers 2005)。
- 与此同时，“警官学校的学员们则公开鼓动人们支持尤先科，并号召防暴警察们改变立场……当1万名内务部军人在11月28日被动员起来去镇压发生在‘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时，乌克兰安全部(SBU,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则早已预先对反对派领导人发出了有关镇压行动的警示”(Chivers 2005)。
- 情报部门高级官员们被以非正式的形式告知正在发生的事态，他们发疯似的通过电话以劝说内务部撤回其军队。就在示威者们举行游行、反复呼喊(口号)、唱着歌曲以及为了御寒而搓着双手时，乌克兰安全部的一位密探也在示威人群中活动，提醒人们注意即将临近的镇压。

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在幕后，抗议者和支持他们的部队军官们得到了乌克兰社会许多部门及其成员，其中包括一些此前曾支持过库奇马腐败政权的狡猾“寡头政治集团成员”的赞许。

- 外部行动者们也参与其中：来自欧洲的选举监察员以及民主制的拥护者们支持反对派。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支持现政权一边，普京甚至在
- 4 有报告称乌克兰大选存在人为操纵和舞弊行为时，仍然宣布支持现政权支持的候选人。在“橙色革命”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发生在争取进步的社会运动与黑暗的反动势力之间的两极斗争，而是一场多面向的抗争事件。盟友与敌人、“好的”与“坏的”行动者，局内人与局外人、参与者与旁观者，都相互交织地出现在一个提出要求的过程中，我们称之为抗争政治。

## 抗争政治

发生在 18 世纪英格兰的反奴隶贸易运动与 2004 年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有何共同之处呢？尽管我们能够辨识出其不同之处，但这两场运动也在许多方面异曲同工。这两场运动都针对当局提出了自身的要求，在提出要求时都采用了公开行动的方式；两场运动不仅都利用了传统的集体行动[我们称为**抗争剧目**(*repertoires*)]形式，还创造出一些新的集体行动形式；它们还都分别与各自所在政治体内有影响的成员结成同盟，利用现政权内出现的机遇并制造一些新机遇，结合制度性与超制度性的(*extrainstitutional*)常规做法以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所从事的是**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包含着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抗争政治由此而将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生活的三个特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聚合到了一起。

**抗争**涉及的是提出对其他人之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抗争的范围变化囊括了从诸如今晚我们应看哪个电视节目之类的小事，到你的姐姐(或妹妹)休(Sue)是否应该嫁给正在和她约会的那位男士之类较大的问题。但抗争也会发生在足球比赛中、竞争性的商业广告活动中以及爱吵闹的病人与易怒的大夫之间。

在最简单形式的抗争中出现的情形是，一方针对另一方提出自己的要求。抗争中的双方常常是个人，但其中一方或另一方也可能是一个群体甚或是一个机构；你可能向你所在的学校提出你的要求，或者可能为获取失业救助而向政府提出要求。在这种最基本的抗争形式中，我们可以将一方视为主体(要求之提出者)，另一方视为客体(要求之接受



者),而所谓要求则总是包含着至少一个主体显而易见地对至少一个客体施加影响,(譬如说)你(主体)也许会请求你的一位朋友(客体)归还他昨天从你那儿借的钱。要求的范围变化涵盖了从战战兢兢提出的请求到意欲直接发动攻击时的尖锐要求,不过,前提是这些要求一旦实现,便会以某种方式而对客体的福祉及其利益产生影响。常常是三方或更多方被卷入其中,就像你要求你的朋友将借款归还给你,而他却打算把钱移交给另一位债主时所发生的情形。抗争总是将主体、客体与要求三者集合在一起。

**集体行动**意指为了共同利益或计划而做出的协同努力。足球队从事的是集体行动,同样,教会、志愿协会以及共同清除一块空地上的杂草的邻里们所从事的也是集体行动。当你去上学或是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时,你便进入了一个持续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之中。不过,大部分集体行动的发生,都并不伴随有重大的抗争,也没有政府的介入。集体行动多半发生在抗争政治的范围之外。

大多数的抗争也是在政治之外发生。我们只是在与政府的代理人发生互动时才进入到政治领域,这时候,我们要么直接与政府打交道,要么便是参与到那些影响政府权力、规章及利益的活动中。政治同样涵盖了从诸如申请驾驶执照之类相当常规的事务到诸如国家是否应该发动战争之类的重大问题,但政治多极少涉及抗争,甚至全然与抗争无涉。大多数时候,人们注册登记以获取救助、回答户口调查人员的提问、将政府支票兑换成现金或者向移民官员出示其护照而并不向他人提出重大要求。

政府在抗争中之出现或缺席很是紧要,这其中的缘由有以下三点:首先,那些掌控政府的人相对于那些并不掌控政府的人,拥有更多的优势。即便在那些政府力量软弱的地方,控制了政府也会赋予你征税、分配资源以及规定其他人行为的手段。因此政治抗争便意味着使那些当前享有政府权力者的优势置于危险之境了。



其次,政府总会制定支配抗争的法规,它决定着谁可以提出集体要求,提出什么样的集体要求,通过什么方式,具有什么样的结果。即便较为软弱的政府也能够对提出要求的主要形式施加某些影响,这些政府也会对企图在其疆域范围内建立一个竞争性权力中心的其他人进行抵制。

第三,政府控制着大量强制手段: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强制的有效性给极少出现在政治舞台之外的政治抗争以边界。在政治抗争中,大规模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如何的微弱。在某些方面,与政府联系在一起的抗争颇类似于发生在家庭、体育运动、教会和商业活动中的抗争。有时候我们会提请人们注意那些相似性,但我们只挑选出与政府相关联的抗争来,那是因为这一类抗争具备了以上三种独特的属性。 6

让我们立即着手来清除一些可能的误解。将抗争政治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关涉政府的要求,绝不意味着政府一定扮演着抗争要求之提出者或接受者的角色。相反,随着本著的展开,我们将会遇到所涉范围广泛的抗争,在其中,非政府的行动者们彼此竞争且针对宗教的、经济的、伦理的或其他非政府的权力拥有者而提出自己的要求。还记得作为本章开头的那个故事吗?在英格兰和美洲,反奴隶制积极分子先是对奴隶拥有者提出要求,然后才对政府提出要求,采取后一行动则是因为唯有政府才能够解决因奴隶制而起的法律冲突与武力冲突。

在你阅读本著的过程中,你将会读到许多有关这类冲突的接连不断的讨论:

- 发生在美国的奴隶制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第二章)
- 南非大学校园里反对种族隔离的激进主义(第二章)
- 法国里昂的妓女们试图改善其生活境遇的努力(第五章)
- 参加女权主义组织而带给美国妇女生活的改变(第六章)

·非裔美国激进主义者发起的在快餐馆占座以示抗议的行动(第九章)

所有这些冲突最终都将政府,无论地方政府或国家政府卷入行动之中,就像我们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场发生在英国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出现的那样。但这些冲突却都是以非政府的行动者们相互之间展开竞争作为其开端的。

让我们说得更明晰一些。我们并不否认那些更像是发生在抗争政治中的过程也会在非政治的背景下发生,而这实际上正是将集体行动和抗争与政治区分开来的关键点。我们也不否认某些形式的抗争,如宗教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内在变化,不过,即便是这些抗争仍经常与政府发生联系,比方说,当福音派基督徒试图将宗教价值纳入公立学校课程中时。最后,经营着一个企业生活区的公司、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那样的国际军事力量,或者像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国际机构,其行为有时候也颇类于一个政府。所有这些情形都非常接近于我们有关抗争政治的定义,故而也被包括在本书之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集体行动、抗争以及政治之交汇上,这是因为三者重叠之处拥有某些独特的且具潜在危险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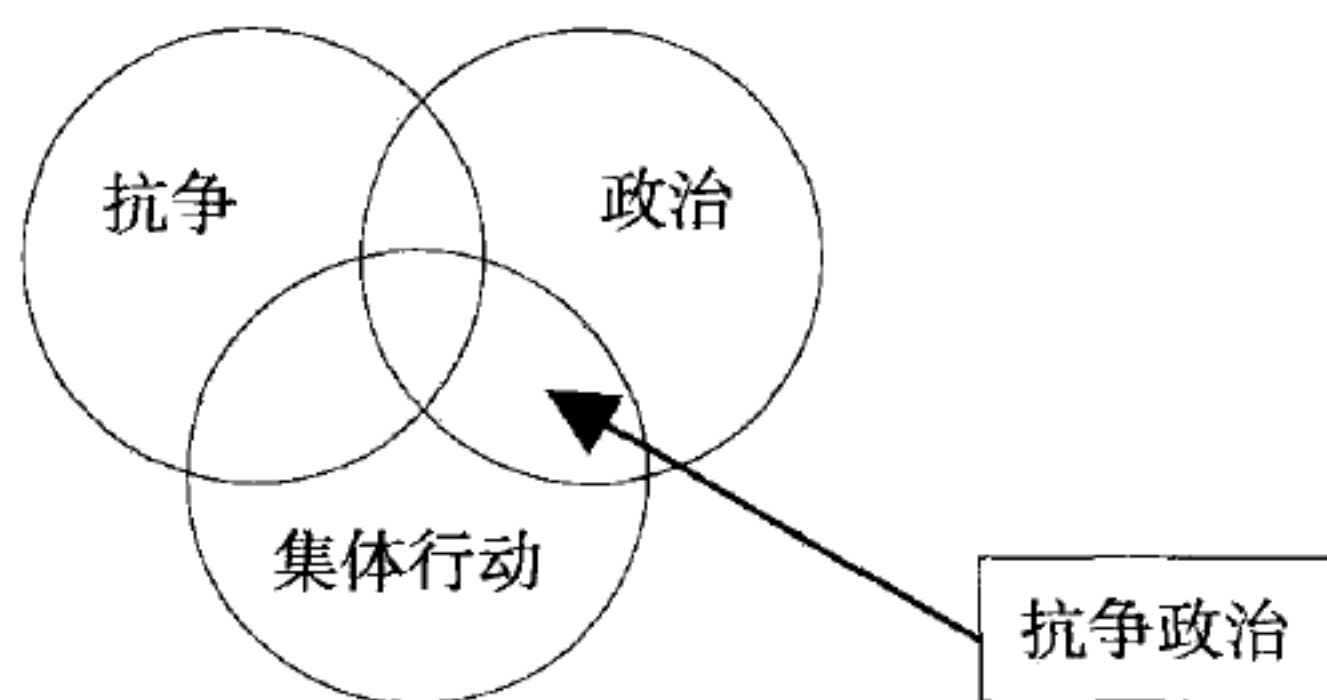


图 1.1 抗争政治的构成

图 1.1 显示了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是如何在抗争政治中交汇的。许多学者可能会划出诸多不同的界限：例如，一些人将集体行动视为基本过程，而依照这种观点，像反奴隶制运动及“橙色革命”一类的事件，就只能算是集体行动的特定事例了。另一些人则将政治界定为无论用何种方式以及无论在何地发生的争取权力的斗争，他们由此将所有的抗争政治囊括在内，且将发生在政府范围之外的一些斗争添加到抗争政治中，但同时却把日常政治事务视为某种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许多分析人士便将现实政治——我们的抗争政治及政治舞台之外发生的类似斗争——与公共管理区别开来。

8

研究这一课题的许多学人，使用**社会运动**这一术语来涵括大部分或所有存在于抗争与集体行动之间的重叠部分，而不管其发生在政治领域还是发生在其他某些领域。同样是这些分析者，他们还常常把**社会运动**这一术语扩展到我们称之为**社会运动基础**的一些东西上，即社会背景、组织资源以及抗争与集体行动的文化架构。本著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运动的例证，但我们还是建议抵制将社会运动这一术语扩展到涵盖大多数或所有抗争政治、抗争政治之社会基础及其文化背景的做法。对这一术语的如此扩展存在这样几个缺陷，首先，它将抗争集于同一标签下，妨碍了对不同类型的抗争进行系统的比较；其次，如若不同形式的抗争都被视为社会运动，则会使探讨其中的演变难以进行；第三，它遮蔽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社会运动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一个**普遍范畴**。

如我们所讲述的英国反奴隶制运动的故事所表明的，我们现在所知的社会运动早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前即已成形，只不过作为一种民众提出要求的方式，其在 20 世纪变得更为广泛可用罢了(Tilly 2004b)。它经由诸如反奴隶制运动之类的事件而开始显现，继而通过劳工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而在 19 世纪初开始起步，最终则成为整个 20 世纪发生在那些较少独裁色彩的政权中民众政治的主要形式。美国的民权



激进主义形成为一场社会运动，甘地领导的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亦如此。

何者可以称为一场社会运动？我们将**社会运动**界定为：提出要求的持续运动，该运动以维系这些活动的组织、网络、传统以及团结一致为基础。然而，大多数形式的抗争政治却并非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结合了以下几个方面：(1)提出要求的持续运动；(2)包括游行、集会、示威、创建特定的协会、举行公开会议、发表公开声明、请愿、写信以及开展院外游说活动在内的一连串公开行动；(3)通过采用诸如身着彩色服装、排着整齐的队列游行、炫耀性地佩戴着宣扬其事业的徽章、不断重复地呼喊口号、在公共建筑物前安营扎寨之类的方式，反复地公开展示其有价值、团结及其成员组成人数与奉献精神。他们还利用(4)维系这些活动的组织、网络、传统以及团结一致，亦即我们所谓的**社会运动基础**。一如西方国家的公民们已熟知的，此种运动、行动及各种展示活动的结合只是在数百年前方才成形，而其在当今世界的多数地区则仍属鲜见抑或根本不存在。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社会运动与其他形式的抗争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展示了以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行动如何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及美国的妇女运动中扮演角色，较之第七章所论及的三种形式的致命性冲突，即种族—宗教冲突、内战和革命而言，第六章中出现的这些将公开展示其重要性、其内部的团结统一及其成员组成人数与奉献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运动，其所引发的对抗，暴力色彩要远逊于前者。以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政治行动与致命性的冲突常常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且相互交织。第八章突出强调的便是发生在两个“混合体制”中的某些运动与致命性冲突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一是2005年发生的一场将犹太人定居者强行从加沙地带撤离的运动，另一则是发生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英国的人权运动参加者与侵犯人权者之间的冲突。

我们所提及的两个标志性事件——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与乌克兰



的“橙色革命”，也显示了抗争、政治与集体行动间的相互交织。尽管遭受了来自不同方向之反动势力与改良力量的打击，反奴隶制运动依然表现为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在长逾 30 多年的时间里，反奴隶制运动的参与者们既在英国政治体制之内、也针对英国的政治体制，持续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抗争政治运动。相反，尽管喧嚣程度超过了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且已摇摆于革命的边缘，但乌克兰的起义行动却只包含着一个短期的运动联盟，一个范围包括从街头群众到反对派领导人，再到国家镇压机关内部要人以及经济精英的运动联盟。一旦达到了运动的主要目标，即撤消一场舞弊的选举，这一联盟即告解体。

当抗争、政治与集体行动聚集在一起时，某种独特的事情就发生了：权力、共同利益以及政府政策开始发挥作用。此时，所提出的一些要求变成了集体性的，这意味着它们有赖于要求的人们之间达成某种协作；它们同时也变成了具有政治意味的要求：至少是通过把政府设定为集体性提出要求的监督者、担保人或调节者，而更直接地则是常常将政府假定为要求之主体或者客体。在如此这些情况下，我们将把不时提出要求的团体称作**政治行动者**，还将把一些他们自称的或其他人赋予他们的集体性称谓，如“那些工人”、“我们公民”、“我们女人”等等叫做他们的**政治身份**。

人们常常向政府机构提出集体要求，而政府机构则针对全体民众提出其要求，它们还亲自介入到政府外部的民众如何对彼此提出要求的问题上。立法者们制定法律以禁止某些形式的集会，警察会对一些不守规矩的示威者实施逮捕，法官们则以人们提出某些煽动性要求为由对其加以审判，而当某些官员的被保护人或其代理人置身于集体性的争斗时，这些官员们便会出面加以干预。抗争、政治与集体行动之相互交织包括了从局部的种族竞争到大规模革命等事件。 10

本著着力予上述交织情况以系统关注。它采用一套简单的工具以描述和解释各种形式的抗争政治，这些工具系由某些概念以及反映这

些概念的现象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组成。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将描述与解释做了一个大致的区分,所谓描述,是指对于抗争政治中出现的何种特性与变异应予以认真关注做出详尽说明;而解释则意味着向人们展示这些特性与变异是因何而起的。

描述与解释的区分难免仍显粗略,有时,可能会出现的情形是,抗争的某一特性或变化会有助于对其另一特性或变化做出解释。不过,当我们把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与发生在2004年至2005年间的其他一些反对独裁政权的动员行动加以比较时,我们就会通过对当局及其反对派之间的有关区别加以辨识而真正接近于做出解释。第二章是继续对一些解释性的概念作较为直接的处理,第三章则通过把不同形式的抗争置于不同形式的政体中并进而探究抗争在政权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将描述与解释结合到一起。不过,本章主要集中于一些概念上,它们描述抗争的值得解释的有趣特征。

那么,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概念呢?本章所述及的这些概念将揭示政治行动者是如何以他们的政治身份为名而提出要求的,辨识各种集体性的政治(表演)手法;同时还将描述具体的抗争行动如何汇集成抗争剧目,分析抗争剧目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后再将这些观念实际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发生的一些案例中。本著的其余部分会一再回到美国的话题,但同时,我们也利用一些来自欧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案例。随着本书内容的不断展开,我们所做的大量有关描述性的工作都将涉及到令这些概念彼此联系起来的问题。

如何使这些概念相互联系起来呢?本书将显示抗争剧目在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同时对发生于现行机构内、现行机构外,抑或意在反对现行机构的抗争有何不同影响做出解释;本书还将思考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如何影响到人们在抗争中选择何种政治身份的问题;描述社会运动是如何将体制内的与超越体制的行动结合起来的;它还将表明,尽管行动者们构筑起一整套广

泛的社会基础,但这些基础却并不足以解释抗争互动,抗争互动实则有赖于一组限定的机制与过程之引发。本书将展示一组相似的机制与过程,例如:居间联络、合法性确认、动员、遣散和规模转变,以其与革命、社会运动、种族冲突、民族主义、内战和其他不同形式的抗争政治所致之不同结果的不同结合方式,而一再重现的情形。在随后的一些章节中,我们将对所有这些因素加以详尽处置。

11

本书为抗争政治提供的是一种互动式的方法。如同道格·麦克亚当(1999)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一种关于个人的可行的(研究)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类存在之基本社会/相关性的本质”。(xiii)一些研究抗争的学人将其注意力主要投向抗争的社会基础,比方说,投向社会网络、组织、文化习性以及孕育了抗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传统上。然而,尽管我们同样给予了抗争的这些基础充足的空间,但我们首要关注的则是这样的一些机制与过程,它们使得挑战者、其挑战对象、公共权力机构以及像新闻界和公众之类的第三方,卷入一连串的互动之中。例如,当我们在第六章中转向社会运动问题时,我们便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那些使抗争的基础转化为一系列社会运动举措的机制与过程上的。

将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将有助于我们去解决存在于抗争政治中的一个根本悖论,那就是,抗争政治中一再重现的变异形式(variations)与常规形式(regularities)之结合。抗争政治因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而在其所针对的问题、其行动者、相互作用、要求及其发生的先后次序和结果诸方面,呈现出巨大变化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在其渐次展开的方式上显示出极具常规性的一面。我们将会看到,相似的机制与过程是如何仰赖其不同的结合方式、仰赖于它在其中活动的社会基础与政治背景,而产生出独特的政治轨迹和结果的。我们可以借助于两个相关的戏剧方面的比喻,以开始捕捉抗争政治之某些一再出现的、历史地嵌入其中的特点。



·**抗争表演**(*contentious performances*)指的是一些相对为人们所熟悉的、标准化的方式——运用这些方式,一群政治行动者向另一群政治行动者提出集体性要求。除其他的表演方式外,乌克兰“橙色革命”的参与者们还采用群众示威行动作为其可见而有效的表演方式。

·**抗争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s*)是指为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英格兰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们帮助发明了示威这一政治表演,但他们也吸收利用了请愿、游说、撰写新闻稿、举行公众集会以及其他许多表演。

## 提出要求:作为表演

一旦我们就近考察集体性提出要求,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在原有脚本基础上即兴表演的特殊事例。提交请愿书、获得人质或者发动一次示威即构成一次至少将两个行动者——要求提出者与要求所针对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表演**。创新性行动不断以小规模的形式出现,但切实有效的要求却有赖于这些要求与其所处场景之间存在一种可见的关系,有赖于要求提出者与要求所针对的对象双方的关系,同时还有赖于对先前提出要求形式之采行。

抗争表演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考虑一下克拉克森和他的同事们是如何利用请愿的方式而让诸多反奴隶制的要求充斥英国议会的。作为提出要求最为传统的形式之一,请愿最初系由个体请愿者用以追求自身利益,这些个体请愿者来到他们的领主面前,毕恭毕敬地要求后者免除其军事义务或者降低他们应缴纳的消费税。而英国的反奴隶制团体则将请愿变成一种用于群众性提出要求的工具——他们为请愿书征集到数千人的签名,为他人(而不是像最初的个体请愿者那样为着个人自身利益)的福祉而要求政府革除这一罪恶的制度。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发生在基辅街头反对 2004 年腐败选举的群众抗议集会。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当英国的宪章派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时,他们就采用了群众示威这一在当时尚属新形式的斗争手段(Thompson 1984)。19 世纪中期,在我们称之为 1848 年革命的斗争期间,示威行动横扫欧洲,成为工人、民族主义者、中产阶级改革者以及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们广泛采用的斗争方式。而到了 2004 年,乌克兰人对于如何组织起能够挑战现政权的统治、加强自身团结且能赢得国际力量支持的示威行动,自是更加了如指掌了。

所有形式的抗争都有赖于表演,但表演包含着从对他人的直接攻击到仅仅为着影响邻近或远处的观众而登台献艺(Tarrow 1998; Taylor 和 Van Dyke 2004: 271)。在 18 世纪,人们主要采取的是那些与他们的特殊要求相应的特定表演,诸如抢夺谷物、袭击地主的田地、在街上设置路障以及毁掉作恶者房屋之类的做法(Tilly 2005a)。想一想 1765 年波士顿的殖民地居民们对一名官员(负责征收为其痛恨的印花税)的房屋所发动的袭击,或者那些在 1775 年将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湾的人们。在这两次行动中,参与其事的人们所从事的是特殊表演,而到了 20 世纪,许多抗争表演则早已传遍世界各地,且已变成我们称之为模式化的(modular)东西,亦即那些可以被范围广泛的行动者们在一系列冲突中与不同的抗争发生地所采用或适应的表演。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那最为典型的现代表演:抗议示威,抗议示威源于——一开始是类似于——朝向某一崇拜地点行进的宗教队列,而当示威者们从某一集合地点出发向他们能够直接面对其要求对象的另一地点进发时,抗议示威就变成了抗争行动。后来,抗议示威成为(抗争)行动的主要形式,被常规化地用来在公众面前展示某一要求,而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示威者所面对的公众也从那些亲眼目击一场示威打自家窗户下面经过的邻人们,扩大到可以通过电视来观看示威行动的更大范围的民众了。迄至 20 世纪,抗议示威已然成为世界各地的提出要求者们所采用的主要的、传统

型的抗争形式了。

最近，通过互联网而与人们建立联系已成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动员手段，例如，“黑客行动”（“hactivism”），亦即进入某一跨国商号或某个政府的电脑以破坏其例行程序的做法，正变得越来越常见（Samuel 2004）。不过，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在抗争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则是（1）召集人们到某一地点参加示威行动，或是（2）协调在广泛地域内的许多地点发生的示威行动。以第一种方式运用互联网来达到动员目的的很好的例子之一，是1999年发生在西雅图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活动；以第二种方式运用互联网的重要实例，则是2003年在全球性的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诸多示威活动间的协调行动。而这两种方式则均未消除一系列经典的抗争政治表演手法的影响。

请愿、示威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出行动号召已成为**模式化的表演**，亦即一些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地方及社会环境的一般形式。模式化表演的好处在于其既具普遍性又有特异性，从一般性的角度看，模式化表演具有适合于多种环境的特征，且对于诸多不同的政治参与者和听众颇具价值。美国的学生们在大学校园里举行示威，法国的农场主们在省长官邸外示威，以色列的定居者们则在犹太人的哭墙边示威，中国的抗议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示威——所有这些示威采用的都是同一模式化表演的某种变体。而就特殊环境的角度看，一些示威行动给我们提供的则是与当地情形相连的方方面面，熟练的组织者们对一般性的形式加以调整使之适合于当地环境，将诸如示威这样的模式化形式深植于使他们在各不相同的当地环境中得以引人注目的诸语言、符号以及实践之中。这只是全著将要揭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这一二元性的一种特定形式而已。

当然，并非所有的抗争表演都像示威一样表现得有秩序、戏剧化且  
14 采取的是和平方式。20世纪60年代在西欧和美国爆发的对抗性抗争政治形式就是一例。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主导着20世纪50年代初的

这段时期,这一局面从总体上限制了抗议行动的发生,而对于对抗性质的抗议行动则限制尤甚。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非裔美国人的觉醒、60年代后期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展开、70年代妇女和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80年代的和平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共产主义在80年代末的垮台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兴起,则使各种抗议行动尤其是对抗性的、暴力的抗争得以广泛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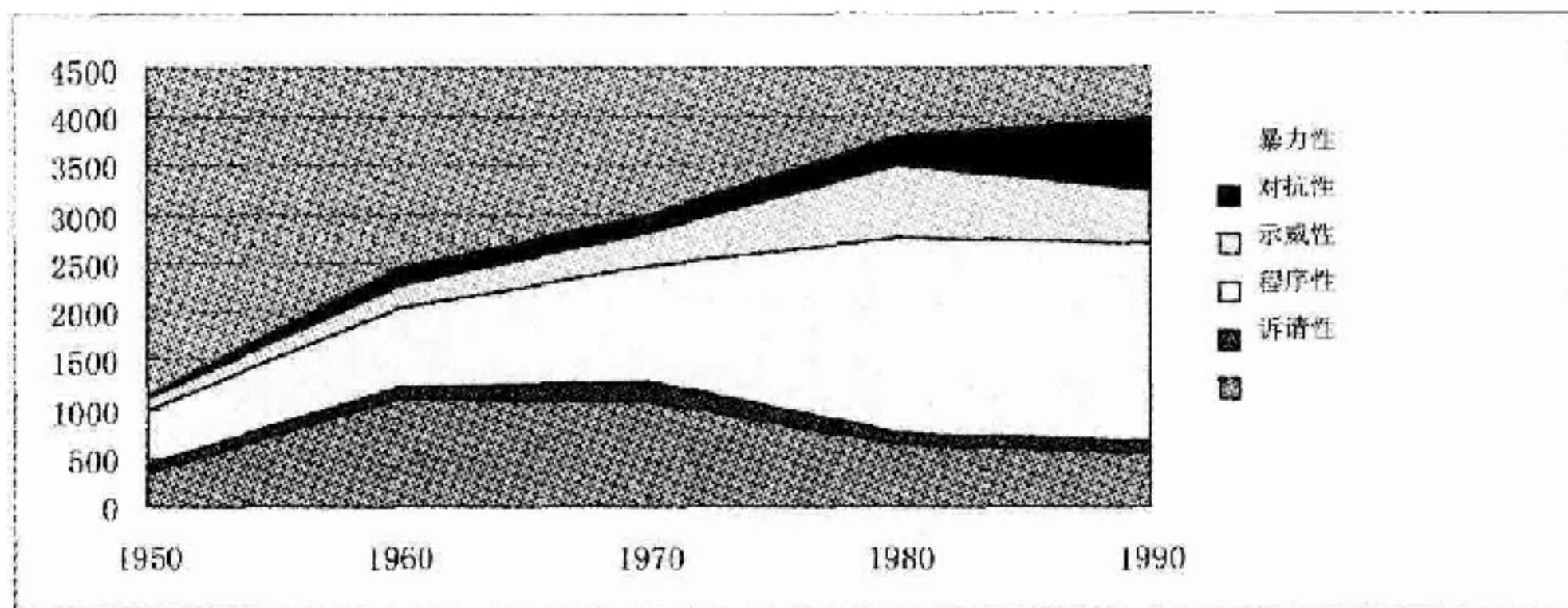
想一想居住在法国城郊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北非青年们,在2005年是如何通过焚烧数千辆汽车以发泄他们对于法国社会所给予其(不公正)待遇的愤怒的。他们采用了一种让人回想起1968年5月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表演,当时,数以千计的大学生们在巴黎及其他大城市四处横冲直撞(Tilly 1986:346),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抗议者们彼此毫无关联,但当抗议行动发展为暴力抗争,在由此而来的社会动乱期间,两代抗议者都表演了焚烧车辆,却成为法国传统的一个标准组成部分。

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连续性的生动描述:不同形式的抗争政治是如何在这一时期发生在德国这个典型的欧洲国家的。鲁赫特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研究主要报纸刊载的信息,仔细考察了1950年至1988年西德所发生的抗争,以及1988年之后的10年发生在德国东西两部分的抗争。鲁赫特的研究表明,抗议活动的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增长,而在随后的30年里,抗议活动的数量尽管还是有很大增长,但较之60年代增长幅度较小。抗议活动从20世纪50年代略高于1100次,上升到90年代的超过4000次,不仅如此,传统型行动、对抗性行动以及暴力行动这三种类型行动的不同组合,也在西德成立到20世纪末这一段时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尽管图中“示威性”抗议的部分并未显示出直线发展的趋势(在这一时期的开端和结尾大约都是50%),但鲁赫特称之为“程序性抗议”(procedural protests)和“诉请”(appeals)的那些日常的要求表达方式所占的百分比却出现了净下降。相反,鲁赫特的证据还表明,“对抗性”抗



议所占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暴力冲突”所占的比例在 90 年代都上升了。通常下降主要对应于和平运动的策略,而后者在暴力方面的上升则反映了右翼反移民团体的增长以及所接纳的东德人口的增加 (Rucht 2005)。图 1.2 概述了截至 1988 年西德的数据以及整个德国 15 1989 年至 1997 年间的的数据。



16 图 1.2 德国的重大抗议事件, 1950—1997

留意一下德国传统的“诉请”事件是如何反复出现起落升降的: 德国的“诉请”事件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了占总数 44.4% 的最高点, 而在该世纪的最后 10 年则下降到 14.7% 的低点。与之相反, 重大的暴力事件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白热化”(the “hot”) 时期一直处于适中的水平, 在 80 年代增长了一倍多, 而在 90 年代“光头党人”(“skinhead”) 发动针对入境移民的攻击行动中, 暴力事件则猛增至占该时期所发生事件总数的几乎 1/5。如同发生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的事件通常所表现出的那样, 在德国, 不同类型的表演拥有它们各自不同的节律 (参见 Kriesi 等 1995; Tarrow 1989)。随后几章将利用有限的、示威性的、对抗性的以及暴力形式的抗争概念, 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发生在拉丁美洲、意大利、前苏联, 当然还有美国的抗争。



## 抗争剧目

抗争表演有时簇集而成为常规性之提出要求的“剧目”，它们被用于同样一些“提出要求者—要求对象”配对组合(claimant-object pairs)：老板与工人、农民和地主、彼此对抗的民族主义宗派团体以及许多其他配对组合。例如，目前所有罢工、怠工、业主停工、契约谈判、冤情听证(grievance hearings)以及第三方的调停(third-party mediation)行动，全都属于提出要求的剧目而将老板和工人联系起来。这一戏剧化的比喻唤起我们注意到，在提出与接受彼此的要求时，人们间发生的互动具有聚集性的、后天的(learned)，然而却也是即兴表演式的特点。提出要求通常类似于爵士乐和街头剧(street theater)，而不像仪式性地阅读圣书。如同一支三人爵士乐组合或者一个即兴戏剧表演团体，参与抗争政治的人们通常保有几首他们能演奏的作品，其数目则相对有限(Sawyer 2001)。而他们所演奏的作品，则有如那些熟悉的爵士乐曲调，唤起并表达了特定的情感，让人们回想起从前的遭遇，且由此在政治行动者的过去与现在间确立起连续性来。

剧目因时、因地、因配对组合之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总体说来，当人们在提出集体性要求时，其行动方式上的创新则只能在由特定的抗争剧目——那些已然确立起来的、与他们所在的地点、时间及配对形式相对应的剧目——所设定的限度内进行。克拉克森和他的同事们采用的是请愿、报纸宣传、大量发行小册子以及求得精英阶层支持的做法。提出要求的大多数形式已经分别出现在18世纪的一些各不相同的冲突当中了，而主要的创新之处则是将其集中起来，以用于一场完整的社会运动行动中。与之类似的是，当今欧洲城市里的一些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们，也采取的是将公开集会、媒体声明、示威及请愿相结合的做法，但他们同时也避免以自杀式炸弹袭击、扣押人质以及自焚的方式行事，他们 17

所采用的抗争剧目吸取了此前发生的漫长斗争史的经验(Tilly 2004)。

人们在如何对抗争剧目加以吸收、利用方面确实存在很大区别。当某些独裁政权让位于半民主的或多元主义的政权时，我们便会看到一些“弱剧目”(weak repertoires)的影响。此种情形出现在前苏联公民从70年的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摆脱出来之际。在那儿，那种自苏联压制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制“地下出版物”(samizdat)以及从事日常抵抗的(斗争)传统(Scott 1985)，在后苏维埃时期半民主的新环境中则几乎没有什么用途。出于对前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所付高昂代价的深刻记忆，大多数公民对动员抱抵制态度，对各色领袖人物则心存疑虑，且不大愿意大规模地加入一些政党组织。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甚至在他们历经了10年相对开放的政治生活之后，那些组织持续性集体行动的常规做法，还依然不为他们所熟悉(Fish 1995; Mendelson 和 Gerber 2005)。

和弱剧目极为不同的是，“仪式性的政治剧目”(ritual political repertoires)时有发生(Kertzer 1998; Muir 1997)。这里，让我们想一想“五一”节这一国际劳工权利日吧。该节日始于1889年7月，亦即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之时，当时，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工联主义者大会提议，“应在同一天、在世界各地，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示威活动，以引起各国政府关注，将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减至8小时（的要求）”(Tartakowsky 2005)。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抗争性要求逐渐定型为一种固定不变的、仪式化的展示民众力量的示威活动，且传播到全球各地（美国除外），将数百万工人引向街头、公园和广场以庆祝这一仪式性的国际劳工节日。

不过，一旦人们在这类重大事件中另行提出一些集体性要求时，他们也就从仪式性剧目转向“强剧目”了(strong repertoires)。在欧洲，一些工人利用“五一”节发动罢工或将起义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地，在美国，学生抗议者们有时打断大学毕业典礼仪式，将其变成一场临时性的示威活动。在如此行事之际，他们通常采取的是反复呼喊口号、打出

标语牌、展示某些象征物以及采取其他一些人们在另一些场景中熟见的行动方式。就本书所研讨的有关时间和地点而言,强剧目通常占了多数。这并不是说强剧目从不发生变化,而是说,变化常常是通过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创新而发生的。不过,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充溢其间的则是一些新的表演和一些旧表演之新变种。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55年至2005年这半个世纪里美国的抗争剧目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18

### 1955年至2005年美国的剧目变化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美国的抗争剧目并未显示出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景。冷战、美国国内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民众)对消费社会的满足,转移了人们对于抗争政治的注意力。当抗争剧目上的一些创新出现时,它们却出人意料地来自于一个新的群体:黑人中产阶级。非洲裔美国人并非突然地进入抗争政治,抑或采用了任何统一形式的集体行动。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悄然开始的民权运动,却导致抗争剧目在美国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因城市化、向美国北方移民以及成为中产阶层许多受过教育的非裔美国人部分地从对南方黑人的种族歧视(Jim Crow)压迫中解脱,对于生活在当时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之下日益感到不满。而联邦政府则在这方面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出于对美国在国外为自由而战与其在国内助长种族歧视这一矛盾做法的顾虑,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美国政府迟疑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反对种族隔离。美国黑人还从美国人所具有的最为制度化的抗争形式,即提起诉讼中得到鼓励,“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及其他若干具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例最终导致了一些混合的结果。不过,这些结果却促使一些黑人父母在此前专属白人的公立学



校里为他们的孩子们登记注册，同时也促使一些黑人大学生力争在此前只招收白人的大学里注册入学。传统的法律斗争由此为即将到来的更具对抗性的抗争政治提供了激励因素。

三类主要的发展标志着抗争表演上的一种转变，这一转变在 60 年代初期出现的主要抗议周期中达到顶峰。首先是按照事先精心部署的计划采取“向华盛顿进军”的做法，此类示威行动以林肯纪念碑前的群众集会为高潮。其次便是选定一个时间段，通常是夏季，以发动一场特定运动。再次则是让静坐、堵塞交通以及占领(行政)大楼这些破坏性做法得以广泛传播：先是在快餐馆，继而在公交车站，最后则是任何公开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地方。

20 世纪 60 年代之进军华盛顿的做法源于美国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一些抗争形式。除其他一些先例外，这一做法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退伍老兵们的进军行动，以及 1941 年美国正在为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进行动员之际，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扬言要组织发动的争取民权的进军行动。密西西比的“自由夏季”(Freedom Summer) 19 则是选择一个有限的时段以集中斗争力量争取达到一个特定目标的最著名实例。就“自由夏季”而言，其特定目标是让美国黑人登记成为选民 (McAdam 1988)。而诸如“越南夏季”与“劳工夏季”之类的其他运动则随后而至。

第三种创新——静坐——则类似于 20 世纪 30 年代占领工厂的做法 (Piven 和 Cloward 1977)，不过静坐却从公众生活中出现的新行动者——电视——那里获取了新的能量。倘若公众亲眼目睹了一些暴徒凶残地对待那些平静地在快餐馆就座的衣着体面的黑人青年们，或者目睹警察用水龙管向和平的示威者们喷射，那就很难再无视美国之声称自由与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了。(对此，)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写道：“整个世界都在看着。”(1980)(第九章将就一个重要的静坐事件加以探究)



经过精心部署的强有力的游行进军与破坏性的静坐行动吸引了大量的支持,同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两种提出要求的形式从民权运动传播到大学校园里的反叛风潮中,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行动中。而它们自身的一些变化形式也很是有趣。美国黑人们在行动时选择占领的地点,主要限于那些黑人和白人因肤色不同而不能平等享用的公共服务设施,大学里的学生积极分子们则选择在他们的行政大楼前静坐,而反战抗议者们却选择在能够干扰日常事务并能引起媒体关注的任何地方进行静坐。民权运动之“向华盛顿进军”始终保持在可控的限度内,且可预见地结束于林肯纪念碑前。但反战抗议者们却越过波托马克河向五角大楼进军,在那儿,他们以模拟升空的形式将五角大楼包围起来。而美国黑人则选择在纽约三区大桥(Triborough Bridge)上静坐,以阻止1964年世界博览会的开幕。

在随后的20年里,美国的抗议游行(进军)变得更为有限而可控,但它们的规模却变得更大,并具备了“与电视相配合”的特点。最终,组织者们甚至为那些因人数太多或距离太远而无法看到演讲者的示威群众提供移动电视监控器,组织者还为示威人群搭建起一些带厕所的移动板房,而国家公园的警察们则就如何组织一场有秩序的示威为组织者们提供讲解(McCarthy, McPhail 和 Smith 1996)。随着“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常规化,原本以破坏性表演行动而开始的抗议进军,尽管依然保留着抗争的某些外部标志:旗帜、反复呼喊口号、面对强力而列队行进,但最终还是变成了常规行动。

静坐也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开来。静坐示威始自民权运动,继而扩展到那些为了其所支持的事业而占据公共场所的各种团体中间。从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们占据行政大楼,发展到70年代为反对使用核武器者而设置路障,以及80年代的“棚户区”抗议,其间的过渡轻而易举(参见第二章);而从大学生占据行政大楼到80年代和90年代“反对堕胎珍爱生命的路边守望”,这期间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变化很大,但两

者的内在逻辑却依然相同：占领公共场所以干扰日常活动、引起媒体关注。

其他两种趋势也较为显著地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方面，许多社会运动组织将它们自身变成公共利益团体，而将其主要的动员形式从街头和校园转向直接寄送邮件、(开展)教育运动以及“重金激进主义”(checkbook activism)。与此同时，宗教团体则日益增多地卷入抗争政治中。在针对流产问题而引发的那场不断升级、充满仇恨且显然是难以止息的斗争中，这些趋势集合到了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彼此间产生了冲突。它使得大多由公共利益团体组织起来、利用直接发送邮件发出其吁请的一批“精选的”支持者，与那些采用更为有效的做法，挨家挨户地劝说人们支持其为了“生命”而反对流产的天主教和新教福音派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Ginsburg 1989; McCarthy 1987)。这两种趋势恰好在 2004 年的美国大选中同时出现，当时的情况是，支持民主党竞选运动的小额捐助大量涌入，但终究无法与共和党在动员宗教信仰徒以支持乔治·W. 布什竞选总统时的能力相匹敌。

在美国步入新世纪之际，很清楚的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可能正在改变着抗争政治的本质。为支持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州长而发起的“2004 moveon.com”运动表明，借助于对电子媒体的熟练运用，如今已有可能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将成千上万的人动员起来，即便只为在短时间内采取行动。这就意味着，以前为诸多运动组织重要示威而精心设计的动员结构，也许有一天会成为过时之物(Bennett 2005)。互联网还使得一度属于地方性的美国行动主义分子与其在国外的同仁建立起更大范围的联系，例如，在为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同步举行的抗议行动。

作为一种副产品，暴力行动常常出现在常规性抗争与对抗性抗争之中。当民权运动的主流转变为制度化的政治以及“新左派”淡出之际，一些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出于对其团体内部较为温和的成员对他们所

持价值观的“背叛”行为的义愤,组成了一些诸如“黑豹党”或者(多半由白人组成的)“地下气候”之类的军事团体或地下组织。较之他们意欲取而代之的更为温和的团体,这些少数派团体在规模上要远为逊色,它们运用暴力的手法以吸引媒体的关注,为抗争政治增添了一种恐怖气氛。(大多数美国人,直到今天仍然把20世纪60年代视为“骚乱”时期。)由于少数派团体的暴力方式为政治精英们提供了以国家暴力应对抗争的合理性,这些人的绝望之举招致了意外的不利结果。而20世纪90年代更激烈的伊斯兰主义运动(the Islamist movements)也因此为更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合理性证明。这两种趋势在2001年9月11日针对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的袭击事件以及随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该法案公然剥夺了美国人的民事自由权——中,达到了极致。 21

## 剧目变化之源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引起抗争剧目变化的诸因素上来了。我们可以区分出抗争剧目变化方面的两类主要过程:急速政治变动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日渐变化的结构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前者更富戏剧性,且有时会导致持续性的变化,但在当局重新获得对抗争的控制时,则更易于被常规化或被当局所镇压。而渐进的变化则较少戏剧性,且仰赖的是一些进展较为缓慢的因素,它却可能更为持久。

就急速政治变动时期而言,在主要的抗争周期内,人们对于其所熟悉的提出要求之常规做法的正常偏好,会由于突然迸发的创新行动而消失。美国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们不只是采用中规中矩的老式社会运动形式,而是有意地造成对现行常规的干扰破坏。急速政治变动时期导致在抗争剧目上的一连串创新,而连续不断的创新则大体上说明了某一运动中具体行动之起落变化的原因(Kriesi等,1995; McAdam 1983)。



在此类急速政治变动发生期间，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经常性的创新之举，也可以看到常常出现于参与抗争各方之间的误会。当任何新一轮的提出要求开始威胁到那些此前一直静观不动的政治行动者的利益（抑或为他们提供新的机遇）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不断上升的抗争行动了。社会运动引发了与之相对的反向运动，而挑战者的盟友则时而出现、时而退出。最初因新形式的抗争而失去平衡的国家政权，最终做出了回应，且在有些情况下转而对抗争采取镇压措施。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转向对此类“抗争周期”的讨论。极端的情形出现在某种具有革命性的形势之下，即在掌控强制手段方面存在深刻分歧。在某种革命性形势出现期间，每一行动者的利益都处于危险之境，许多行动者则因此而动员起来准备采取行动。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到这一转变出现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而当我们在第七章中转向对致命性冲突的探讨时，我们会再次看到这种转变的发生。

近期出现的一种重要变化是全球化：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行星上日益增长的经济一体化。我们并不预言全球化将消除各民族在抗争政治方面存在的差别，或者它将会把国内抗争吸纳到“全球性的社会运动”之中去。如我们将据理力争的那样，对于抗争政治来说，其主要的限制与诱因在于“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而大多数的政治机遇结构则具有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特点。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超越民族国家以考察诸如某些种类的抗争转向国际机构，将地方性问题建构为全球性问题的后果，以及跨国网络和跨国运动联盟的形成之类的过程，很是重要。在第八章中，我们将从占据了本书大部分篇幅的地方性以及民族性抗争类型，转向跨国的传播与动员。

与急速政治变动时期产生的结果形成对照的是抗争剧目上的渐进变化戏剧色彩较少，最终却更具决定性。渐进变化的主要原因分为如下三大类：



·**提出要求与日常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例如,一群母亲因自己的孩子失去面包而聚集在其主人被怀疑有囤积面粉之嫌的谷仓周围;一些认为地主夺去了他们土地的农民有时采取的占地行动;工人们发动罢工以阻止雇主成功地追求利润,其有效工具是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工厂里的生产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

·**由抗争本身累积性造成的一种信号系统。**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法国的要求提出者们吸收利用了其丰厚的抗争经验。三次重大的革命、一个革命公社、一百多年来的诸多罢工、构筑街垒、游行、示威,所有这些全都被置于当今法国发生的抗争行动的表层之下,以供其按各种变化方式加以吸收利用、创新发展或重演(Tartakowsky 1997, 2005; Tilly 1986)。

·**政府当局采取的行动。**政府当局把抗争表演划分为由政府规定的、为政府所容许的以及政府禁止的三类,对于那些闯入禁区的提出要求者则施以威胁和惩罚。当克拉克森和他的同事们将请愿改进为一种群众动员的工具时,他们是在英国的议会制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已承认请愿为集体行动之合法形式的背景下行事的。但当法国的激进主义和拿破仑的军队威胁到英国之际,改革者们则遭受监禁以及更糟的惩罚。第三章将详细讨论政治体制与抗争形式之间的关系。

23

抗争剧目利用了各种认同、社会关系以及形成日常社会生活的诸组织形式。从这些认同、社会关系以及组织形式中,既产生出人们所提出的一些集体性要求,也产生了他们用以提出要求的方式方法。在参与斗争或目睹他人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人们了解到那些具有政治重要性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在当地所具有的共同意义。日常社会组织不断变化着的互动,累积而成的抗争经验以及政府当局的干预,导致了抗争剧目的渐进变化。不过,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此类互动却促使“提出要求”聚焦于一些有限的、已为人们所熟悉的(抗争)表演和剧目之中。

## 接下来又会是什么呢？

本章对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与乌克兰反对腐败政府运动的比较，使我们得以穿越一片崎岖不平的地带而迈上了一条新路。我们已经看到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是如何交互重叠于**抗争政治**——互动性、集体性地提出那些影响他人之利益的要求，且使政府作为要求者、要求的对象或第三方卷进来——之中的。社会运动被视为一种形式的抗争，而革命、内战以及本书所涉及的各种其他斗争也同样被视为抗争。在所有这些形式的抗争中，诸多与众不同的提出要求的表演以及剧目，因其所处的场景和政治体制不同而各不相同。在这些抗争表演中，有一些是模式化的表演，与街头示威一样，它们很容易地从一种场景或政治体制移植到另一种场景或政治体制中。它们构成了属于特定场景或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

例如，1955年以来在美国发生的变动不居的抗争政治，常常将诸如街头示威之类的某些广为人知的表演包括在内。但参与者、要求、要求的对象以及要求的形式，则全都产生于不断变化的美国政治体制的独有特征。为要解释抗争剧目上的变化与差异，我们就必须就近考察当前政治体制上发生变化的步伐，必须辨明政治体制之社会结构方面的渐进变化，继而还须解决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影响到日常的社会组织，影响到人们所累积的有关抗争的经验以及政府当局目前所采取的行动。在对这些因素做出适当处置后，我们开始大胆地就抗争政治在其形式、参与者、问题、目标及结果方面的变革与变化进行解释。

接下来的又是什么呢？首先是提示一下**本书未做的事情**。尽管本书充分利用了革命、社会运动、军事政变以及其他形式的抗争政治以阐明<sup>24</sup>其论点，但它并未对这些形式一个一个地编目，也没有就每种形式的抗

争政治提供一整套各不相同的概括。相反,我们的目的是去辨识在显然不同的抗争形式中起作用的相似方式,并展示存在于这些方式间的区别是如何因彼此对比鲜明的政治体制环境中诸多不同机制的不同结合方式及不同的发生序列所致。甚至本书随后的一些有关社会运动及大规模致命性冲突的章节,也主要是用来展示在殊为不同的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相似原因和结果。

下一章将要述及的是我们打算如何去研究抗争,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对那些想要分析抗争的学人们的忠告。第三章(“政权、剧目与机遇”)则将抗争与不同类型的政权及其所提供的机遇和威胁联系起来,并将政权、机遇和威胁与民主化及去民主化关联起来。第四章(“抗争互动”)研究的是政治行动者如何形成、变化、提出要求以及彼此互动。尔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到对政治行动者之动员与遣散的探讨,这构成了第五章的内容;而对于社会运动与致命性冲突的分析,则分别构成了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内容。

第八章(“混合政权中的抗争”)则回到了政权与抗争之间的互动上,它首先聚焦的是发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类复合国中的抗争。接着,我们再由此转向跨国抗争,在这方面,我们以针对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而采取的跨国追捕作为主要的实例。第九章(“抗争的现在与未来”)先是回到对美国民权运动的讨论上,其后则是就本书所提供的主要经验教训做扼要的重述,同时展示我们所提供的策略是如何有助于揭示存在于诸多形式的抗争中的相似与差异。为了读者方便参照,本书最后的两个附录编制了一份目录,有关本书采用的诸概念、机制、过程、案例以及方法。

## 第二章

# 如何分析抗争

抗争政治关涉集体行动的诸多不同形式和组合方式。它展示的是复杂的社会过程。治安人员的暴力行为、军事政变、工人造反以及社会运动都内含着种类殊为不同的抗争，但所有这些抗争都需要经由复杂的互动而得以展现。对任何复杂的社会过程（抗争性的或非抗争性的）加以解释均包括如下三个步骤：（1）对过程的描述，（2）将过程分解为一些基本的原因，以及（3）将这些原因集合为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更一般的叙述。

然而，任何出色的描述都绝不会是从零开始。鉴于抗争政治具有的复杂性，任何想要解释抗争的观察者在描述时都需要一份可靠的指南。指南的作用在于辨识我们要找寻的那些显然属于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解释的抗争特征。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展示的概念，如政治行动者、政治认同、抗争表演以及抗争剧目，构成了对我们打算予以解释的那些过程做出描述所需的基本指南。不过，我们还需要其他一些用于解释的概念，本章提供了四个有关的概念：出现在抗争之流中的**事件**（events）与**片段**（episodes），以及构成抗争之流的**机制**（mechanisms）与**过程**（processes）。随着本章的展开，我们将对所有这四个概念加以界定和说明。



利用诸多不同的实例,我们将抗争定位于不同的发生地点,并对抗争发生地的环境做出简单描述。我们挑选出一连串的抗争,并为抗争的某些显而易见的结果加上标签以供解释之用。我们将借助于由系列事件构成的片段对抗争过程加以描述,且在重新将机制集合为对有关过程的更一般性叙述之前,将这些事件分解为原因机制。机制与过程有时也会在各自的内部发挥作用,但抗争政治之核心机制则是互动性。从危地马拉破坏性的内战发生之前及进行之时,出现在农民抵抗力量与国家暴力之间的互动中,我们就可以一睹这些机制的踪影。 28

### 危地马拉的群众抗争与国家暴力

“这些年出现在中美洲的群众抗争与国家暴力中最为可怕的情形,是针对非武装平民施行的许多次大屠杀,”查尔斯·布罗克特(Charles Brockett)写道(2005)。这种情形在危地马拉尤为真实,那儿,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1978年5月29日发生在土著人居住的潘佐斯城(Panzós)……当时,有53名非武装的奎克奇玛雅人(Q'eqchi Maya)被开枪打死,另有47人受伤”(3—4)。发生在潘佐斯的这场大屠杀令国际与危地马拉国内舆论都为之震惊,但它并非一桩孤立的事件。该事件可以帮助分析我们将在本书中遇到的诸多形式的抗争政治。

布罗克特首先列举了导致潘佐斯集体屠杀事件发生且与该事件相伴的一系列事件。从一开始1970年发生于当地的农民要求土地的一连串示威行动,到在国民议会宣读请愿书,举行集会以谴责市长与地主同谋,再到针对农民被强行赶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而展开的抵制行动,布罗克特为我们展示了潘佐斯河谷的居民们是如何加入到一系列的抗争表演之中的(2005: 4—5)。与此同时,类似的示威行动与谴责集会在邻近地区的市镇也日益增多。而代表国家的行动者则以逐步升级的暴力

镇压作为回应。总之,当这些重大事件使得危地马拉全国的劳工组织、农民联盟以及一些政党开始介入一场不断扩大的“抗议周期”以反对国家及其所支持的地主阶级时,它们也就让抗争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了。

我们刚刚勾勒了布罗克特的著作,对此类叙述,我们又如何能对其特点做出最佳描述呢?我们可以满足于像一个擅长叙事的历史学家那样按部就班地重述这一故事;也可以像那些精明的理性选择分析家们那样,将叙述变成对于行动者之动机及其算计成败得失的分析;或者我们还可以像那些敏感的具有文化论倾向的学者们所做的那样,让叙述主要针对人们对于土地所有权的习惯性欲求。尽管这些方法在描述农民抵抗行动时可能颇为有用,但所有这些方法都无一例外地缺少抗争动力学这一环。而我们则能够通过对于驱动抗争的机制与过程的探寻,达到对抗争动力学的把握。

## 机制与过程

本书探究并阐明那些抗争政治经由其而发挥作用的机制与过程。我们所谓的机制,意指一组被明确限定的事件,在各种不同环境中,以相同或颇为类似的方式,使一系列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变。诸机制的组合则形成为过程。机制导致了特定要素发生相似(通常也是更为复杂、更具偶然性的)的变化,而机制的有规则的组合方式与发生序列便是过程。各机制间交互产生一些结果,而不同的过程又内含着这类机制的不同序列与组合。某些机制与过程会经常性地反复出现在本书中,而另一些则仅在极少数情况下露面。本节将概述机制—过程方法的基本原理,展示某些出现在殊为不同的抗争政治中的关键机制与过程,并通过一些发生在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案例,而对这些关键机制与过程加以阐述。

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法模仿了物理学或工程学的简化法。他们会问到，诸如暴力的不同程度这类输出变量如何与种族分裂这类输入变量发生共变的，而对于那些存在于输入与输出间的原因链则无意多说。机制—过程解释就其内在精神及论证方式而言，与生物学更相似。在生物学中，一些机制串联成繁殖之类小规模的过程或进化之类的长期过程。尽管这些过程的结果本身是可加以测度的，但常常是经验上不可见的，你看不到进化是如何发生的。不过，生物学家们能够通过使输出与输入相互关联而在辨识一些关键过程方面取得进展。至于详尽的解释，他们的做法便是很快转入到探究构成这些过程的诸机制上。

让我们拿某一物种的繁殖过程来做类比。物种的繁殖是一个集体性过程，依赖于个体间发生的诸多具有互动性质的机制，诸如求爱、性交、怀孕、生产以及某些物种对婴幼儿的喂养。生物学家当然无法直接观察物种的繁殖过程，但他们可以研究其机制。首先，他们可以将繁殖分解为构成繁殖过程的组成机制，以此更好地理解其动态。其次，可以将发生于某一物种身上的繁殖过程与其他物种的繁殖过程加以比较，以发现同样的一些机制是否全都出现了。第三，他们可以探究有哪些机制经常同时出现，从而构成了一个健全的过程。

30

在探究抗争的动态时，我们可以依循生物学家们的机制—过程程序：

- 为弄明白是什么使某一特定过程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将我们所熟悉的诸如动员之类的某一过程分解为构成该过程的诸组成机制。
-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此类过程如何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中起作用，而理解某一特殊机制的出现或缺席具有何种影响。
- 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一些特殊的机制是否经常与某些类似的结果相一致，而最终构成了一个健全的过程。



·诸如民主化或民族主义动员之类的较大过程,也可以通过机制—过程法来探究(Tilly 2004a)。

在抗争政治中,类似的推理方法适用于表演与剧目。人们将诸如示威之类的抗争表演,以几乎同样的形式从一个抗争片段传到下一个。不过,抗争表演还是有一些小的创新,这与导致生物适应性调整的变化的一些细微形态变异非常相似。像在某些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一样,有些创新最终走入了死胡同,这要么是因为它们不能激起人们的情感,要么则是由于它们太易于被外力所压服(Margadant 1979: 267)。另一些创新则因为其产生出某些意想不到的成功,或因其被一些颇有声望的领袖人物所接纳,还可能由于一些居间联络者将它们从一种场景移植到另一场景而得以存续下来。

比如,以伦敦港的海员们突然下帆以抗议低薪而拉开序幕的罢工行动就是一例(Linebaugh 和 Rediker 1990)。当海员们的怠工策略与大规模生产形式一同广为扩散时,最初的斗争形式发生了改变,一些新的因素加入其中(例如,支持罢工者的全社会的“怠工”行动),而当此次罢工在失去其某些方面(特点)的同时,它的其他方面则得以保留或更趋精巧。经由选择、传输及保持等机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之非基因性进化过程,抗争表演和剧目发生了改变。

我们的叙述会一再重复地揭示那些同时显现于抗争政治之不同场  
31 景与环境中的机制。最常见的三种机制是居间联络、传播及协同行动:

- 居间联络**: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点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
- 传播**:使一种抗争的形式、一个问题或一种建构该问题的方式从一个地点扩散至另一个地点。
- 协同行动**:两个或更多的行动者相互发出信号或对同一对象同时提出要求。

在抗争政治中，任何复杂的结果都绝非来自于某个单一的原因机制。居间联络，即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点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会引起抗争发生重要变化；但一种新联系的产生，则是通过激活诸如传播之类更多的机制而对抗争政治产生影响的。经由这种新的联系，一些观念、实践和资源得以四处流动，由此影响这些因素的来源地及其传播目的地提出的要求。这些新的观念、实践和资源常常会使不同地点间的相互协作变得方便。例如，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以个体积极分子及调停组织形式出现的居间联络者，在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全球金融机构而采取国际行动的日程协调方面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观念、实践和资源之从某一行动发生地向另一地点的传播与扩散，使得此一协作行动成为可能。

在居间联络与传播之外，让我们再加上第三种机制：协同行动。在该机制中，两个或更多的行动者相互发出有关其行动意向的信号或参与针对同一对象同时提出要求。想象一下两个邻里协会同时发出反对在其所在地区之间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的信号时的情形。来自邻里地区 A 的一位领导人与来自邻里地区 B 的一些领头人举行会谈，劝说人们在同一天发出反对修建高速公路的信号，并为这些信号提供合适的反对性的语言。

机制的组合便形成了过程。当我们在居间联络与传播之外再加上协作时，我们得到的便是协同行动，并且也有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协作”的过程。（参见图 2.1）

协同行动产生出更多的结果，这其中，也许包括了一些跨越邻里界限的新同盟的建立，市政当局试图驳回反对修建高速路的信号，甚至来自受影响的邻里地区的市政委员会成员对于该问题的重新考量。协同行动有时会导致更高层次的协作，就像当不同的邻里团体联合起来，以游说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或采取“向华盛顿进军”的方式时所发生的

32 情形那样。我们称该过程为“规模上移”，对此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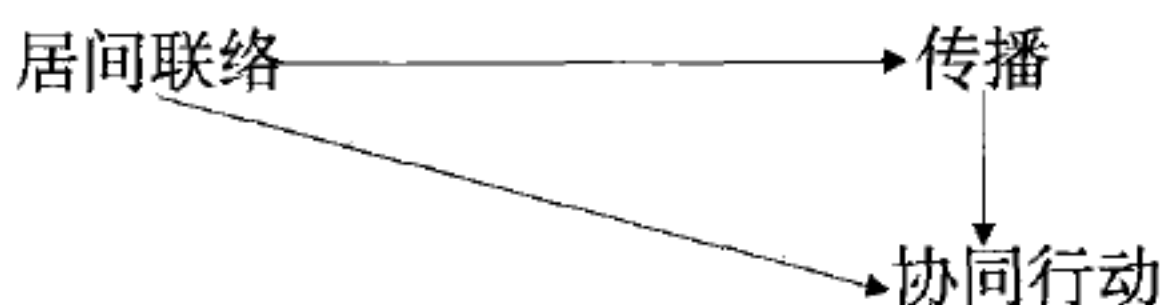


图 2.1 新协作

### 新协作的各发生地

我们通过新协作的若干不同发生地而认识了其基本过程，其中包括 1785 年的英格兰与 2005 年的乌克兰。不过，我们还可以将此一关于新协作之机制—过程分析用作他途。有时，我们会想到要将新协作用于解释一连串特殊的抗争。例如，英国反奴隶制运动参与者在精英阶层中寻求盟友的努力。当然，在这一案例中，我们也还必须将某些初始条件，诸如请愿组织以及作为交流工具的自由媒体之日益增长的作用等因素一并考虑进来。

相反，在另一些时候，我们想要做的则是聚焦于新协作本身，我们要问在各种殊为不同的地点，新协作是否起到了近乎同样的作用；新协作产生出极为不同的结果是否取决于其所在的发生地点（不同）。

最后，我们也许会通过对不同类型政治体制（例如，强能力的非民主政权与强能力的民主政权）之比较，以确定新协作是否更经常性地出现在此一或彼一地点；以及倘若情形真的如此，原因又何在。机制—过程分析的用处不止一个。我们可以列示出许多方式，随着欧洲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反对选举欺诈的抗议活动不断传播，新协作能经由这些方



式发挥效用。

在东欧一些前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出现的反对选举欺诈的抗议活动不断蔓延中,居间联络与传播在广泛空间内的结合,导致了新协作的产生。1996年,当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试图窃取塞尔维亚地方选举果实时,反对这一企图的行动四处蔓延,但多半仍处于缺少协作的状态。这一年到2000年间,当米洛舍维奇试图窃取全国大选的成果时,反对派力量已经准备就绪。受一场由学生领导的全国性运动“抵抗”<sup>①</sup>的激励,一些富有战斗精神的人用各种表演来反对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政府。“抵抗运动”发展出一种针对米洛舍维奇的复杂精致的策略,即采取喜剧性方法和戏剧方法而不采用警察可能会打击的群众示威法。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示威者们游行、唱歌、吹口哨、听讲演,交替地运用向警察发出诘问或向他们表示亲善的做法,向法庭提出起诉以不断对米洛舍维奇施加压力。“抵抗运动”作为居间联络者,通过将这些策略传播到全国各地而使得一位独裁者倒台。 33

2000年至2004年间,“抵抗运动”模式从塞尔维亚传入格鲁吉亚。2003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总统通过操纵议会选举,为支持他本人的一些党派带来了确定性的胜利。谢瓦尔德纳泽绝非米洛舍维奇可比,然而,像塞尔维亚的那位独裁者一样,谢瓦尔德纳泽企图阻挠选举过程的做法,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为期三周的和平街头抗议活动在“愤怒的选举人进军”行动中达到了顶点,而领导此次进军行动的则是反对派联盟的领导人,继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职后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的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学生团体“科马拉”(Kmara)领导的一批激进分子们墙壁上涂鸦、散发传单、张贴海报以反对腐败、反对警察暴行,支持大学改革、支持媒体自由。这绝不是一场自发性的示威行动,而是一项数万计的公民借助公共汽车、轿车、卡车等交通工具汇聚在首都第比利斯协同制定的

<sup>①</sup> Otpor, 塞尔维亚语作“抵抗”解。——译注

计划。

反对派是从哪儿学到这些策略的呢？在选举前的几个月里，萨卡什维利就利用旅行的机会去了塞尔维亚，与那里的反米洛舍维奇运动的前组织者们建立了联系。他从塞尔维亚带回了一项近乎完全模仿“抵抗运动”成功做法的非暴力行动计划。随后，前“抵抗运动”积极分子们则来到格鲁吉亚，为那里的改革派人士提供培训。而这些格鲁吉亚人接着又培训了一批草根激进分子。居间联络通过电子通讯媒介而与传播结合起来。

在格鲁吉亚发生的这场运动中，反对派利用了一个重要工具，一部由美国拍摄的关于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该纪录片得到了基地在华盛顿的“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资助。“最重要的就是这部电影了，”领导这次反抗运动的“民族运动党”总书记马拉比什维利（Ivane Merabishvili）说道，“所有的示威者都将贝尔格莱德的那场革命所运用的策略熟记于心，因为他们播放了……这部有关革命的电影。每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这场运动是贝尔格莱德那场革命的翻版，只不过它叫得更响亮些。”（《华盛顿邮报》，2005年11月25日，A22）在格鲁吉亚，就像大多数新的运动广泛扩散一样，通过媒体造成的传播与通过中间人而展开的居间联络，相互结合以导致新协作产生（Tarrow 和 McAdam 2005）。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研讨过的针对选举欺诈而在整个苏联及其邻近地区蔓延的民众抗议运动向乌克兰扩散，遵循的便是与之相似的传播与居间联络的路径。

34

## 其他机制

倘若抗争政治仅仅是由传播、居间联络、协同行动构成，那我们就只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抗争，却几乎看不到抗争的连续性。事实上，诸多

抗争片段确实因为它们几乎得不到社会支持，或者因为它们提出最初要求之后几乎得不到对它们的继续支持，而慢慢消失或突然中止。想一想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一些城市所发生的骚乱：这些动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且招致警察出面以阻止其复发，但这些骚乱在参与者散去之后，几乎未给人们留下什么影响。

不过，在我们所论及的许多抗争片段中，还有另一些机制与过程将要出现：

- **社会利用**(Social appropriation)：通过利用组织性和制度性的基础发起运动，某些非政治性的团体转变为政治行动者。例如，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一些此前较为保守的黑人教会，变成了南部民权运动之社会利用的发生地(McAdam 1999; Morris 1984)。
- **界限激活**(Boundary activation)：一道新的界限在提出挑战的团体与其挑战对象间产生，抑或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原有界限明确化。例如，经由将公民界定为某一特殊种族或族群的成员，有关的人口普查行动就起到了激活界限的作用(Williams 2006)。
- **(合法性)确认**(Certification)：某一外部权威发出信号，预备承认并支持某一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及其所提的要求。例如，当以色列于 1948 年宣称正式建国时，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都通过在联合国投票承认其建国行动而承认以色列政府(合法性)。
- **认同改变**(Identity shift)：发动挑战的团体内部形成新的认同，这些挑战者团体之间的协调行动不仅让他们聚拢到一起，同时也展示出他们相互间具有的共性。例如，1956 年，小马丁·路德·金将蒙哥马利城展开的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定位为转向他所谓的“新黑人”认同的源头(Tarrow, McAdam 和 Tilly 2001:319)。

这四种机制全都出现在 19 世纪美国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在那儿，



像克拉克森所在的英格兰一样，宗教和教育机构的社会利用也出现在废奴主义者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而当美国国会于1820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所有西部领地在其获准建州进入联邦之前，都将标明其属于“奴隶州”或“自由州”时，我们又看到了激活界限现身其中(Weingast 1998)。就在联邦高等法院通过批准《逃亡奴隶法案》而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之际，北部和中西部的选民之间建立的一个新联盟，则通过选举亚伯拉罕·林肯为总统而撤销了这种承认。

认同改变在美国走向内战的全过程中显示出其重要性。南方人早就抱持着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崇尚的是一种基于安逸和优雅的生活方式(Genovese 1969)。随着北方经济的扩张，北方人则培育出一种基于努力工作与自由劳动两种美德之上的认同，他们还指控南方白人说，这些人的优雅是建立在剥削奴隶的基础上的。作为回应，南方的辩护士们则开始将北方人建构为兼备残忍和物质主义特性的角色。对于北方和南方二者而言，认同改变充当了两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在文化与心理上的对应物。

与传播、居间联络以及协同行动一起，上述这些机制使一场曾经是孤立无援且主要是和平性质的社会运动、废奴主义运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为致命性的冲突，即美国内战。

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传统的历史叙述聚焦于奴隶制的非正义性以及废奴主义者的贡献。修正学派历史学家们的叙述则强调的是奴隶制在棉花经济中的结构性基础、北部经济的扩张动力，以及主张“自由土壤”的农场主们力求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竞争对手排除在西部地区之外的经济动机。而制度学派学者们又为我们加上了平衡规则在美国国会中失效一说，根据平衡规则，自1820年起，任何新建奴隶州加入联邦，都要求相应地有一个自由州加入联邦(Weingast 1998)。而当这一规则失效时，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我们并不质疑以上传统历史学、修正学派或者制度学派有关美国内战发生之解释所具有的一些优

点,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要聚焦于抗争政治的动态结构,聚焦于诸如传播、居间联络、协作、社会利用、激活界限、认同改变以及合法性确认之类的特定机制,是如何在政治过程中汇聚到一起的。

在我们的分析中,有两个过程一再出现:动员与遣散。我们所谓的**动员**,说的是那些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并未提出其抗争要求的人们是如何开始提出要求的;而我们所谓的**遣散**,则追问有关那些正在提出其要求的人们又是如何中止其行动的。动员的过程增加了集体性提出要求的行动的可用资源,遣散的过程则使得这些资源减少。在此,使用我们所提出的机制—过程分析方法,其将从以下三方面对我们有所助益:

36

- 通过将动员分解为其构成机制,我们可以看出该过程是如何被引发的,以及某一特殊机制对于该过程的完成又是如何至关重要。
- 通过对诸如社会运动和内战之类不同类型抗争的比较,我们可以准确定位哪些机制对于抗争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起关键作用。
- 通过仔细研究特定机制的同时出现,我们可以看出在哪些环境下,这些机制累积而成为一些较大或可能较少被了解的过程。

抗争过程中出现的由连续性互动构成的片段将成为我们的主要分析单位,而构成这些连续性事件的具体事件则是我们主要的考察单位。

## 片段与事件

我们把抗争片段界定为连续性互动的确定序列,它通常是由于某位调查者为了系统地观察、比较和解释抗争,而将较长的抗争之流人为

地分割成片断而产生的。这些片段的范围变化涵盖了从法国里昂的一群妓女占领一座教堂之类较为简单(第六章将对此加以研究),到一系列重大的抗争、革命以及内战在内的片段。

那么,我们又如何能从诸如美国内战之类较大的抗争片段中抓住其复杂性及诸多变化(permutation)呢?我们当然可以从那些参与内战的行动主义分子们所说的或者所写的有关其活动的资料中,了解很多东西。然而,记忆总是倾向于有所选择。绝不会有任何一位行动主义分子——尽管他所处的位置极佳——参与了某一抗争片段的所有活动。经由对行动主义分子在主要的抗争片段发生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仔细地研究,我们将会了解得更多。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而做到这一点,这其中,有些方法较为复杂,但大多数方法则是通过报纸上的有关记录、档案以及在线新闻播报而很容易地被加以利用的。

最容易接近的——由于官方收集之故——是那些有关工人罢工的记录。通过对此类原始资料的研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74)仔细考察了1830年至1968年法国所发生的罢工行动的形式、规模及其持续时间。大约在这同时,西摩·斯皮勒曼(Seymour Spilerman 1970)和查尔斯·佩鲁(Charles Perrow 1979)以及他的研究小组,对20世纪60年代期间发生的城市骚乱与抗议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在研究抗争片段时所采取的方法,则为下一代学人提供了现成的模式。例如,20世纪80年代,道格·麦克亚当与克雷格·金肯斯(Craig Jenkins 1986)分别研究了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农场工人运动。同样地,迪特尔·鲁赫特(2005)则对我们在第一章中论及的德国抗议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意大利,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 1989)和他的研究小组系统地阅读了1966年至1973年这一时期的报纸。而20世纪90年代初,苏珊·奥尔扎克(Susan Olzak)则推出了有关种族冲突的一套复杂模式。所有这些学者都在探寻任何根据一整套标准的定义而可以被视为“重大冲突事件”的抗争片段。



有关暴力的数据资料——由于官员们最为担心这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也成为易于利用的对象。尤其是紧随“911”事件爆发之后，一项关于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与恐怖主义的整体性的专门研究得以发展起来（Berman 和 Laitin 2005; Sageman 2004）。尽管随着各类不同的学者和新闻记者的介入，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原来的定义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偏离，但这项研究的拓展，仍然激起了学者们从研究统计性偶发的暴力事件及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扩展到研究暴力与非暴力抗争及其仪式，以及非暴力抗争的表演（Alexander 2004; Collins 2004; Sambanis 和 Zinn 2003）。

一些有关抗争“浪潮”、“周期”以及特殊的抗争之流的研究，同时也显示出对罢工、抗议示威、静坐、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乃至像公民投票之类的制度性参与形式的关注。在研究法国、德国、荷兰以及瑞士这些国家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时，汉斯彼得·克里斯（Hanspeter Kriesi）与他的合作者们（1995）利用每个国家的一份主要报纸，以探究抗争事件的数量、参与规模的大小、有关的抗争表演的类型（示威性的、对抗性的或者暴力性的抗争表演）、让参与者和他们的盟友得以组织起来的不同组织形式以及片断的动态。在为期 15 年的研究时间里，他们通过对核能、同性恋行动主义以及他们所研究的那些运动的跨国传播及结果进行特定问题分析，而对他们所做的范围广泛的比较予以补足。在克里斯与他的合作者所做的调查中，抗争之流分解为抗争片段起到了三种不同的分析作用，而这三种作用全都很重要：

- 克里斯等人的做法从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复杂事件中，抽取了一组较狭义且较易处理的公开互动——这些互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复杂整体的总体发展方向。他们由此而能够对每个国家所发生的抗争之基本轮廓，与它们在制度结构上以及行动者们所采行的主要政治策略上的区别加以比较，以此对某些种类的抗争何以在一

- 些国家比在另一些国家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做出尝试性的解释。
- 克里斯等人的做法便于对不同种类的抗争中所表现出的趋势及其涨落起伏进行比较。在他们的研究结果中，“示威性”事件无疑是所有 4 个国家中最为经常发生的事件，而这些国家在“对抗性”事件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率方面却显示出明显的区别。
- 通过区分“新的”和“老的”行动者——主要是针对工人阶级而言——克里斯与他的合作者们能够就变化的方向及其动态做出推测。

不妨假定你想做有关抗争政治方面的研究好了。你不必模仿克里斯及其合作者们的做法，像他们那样去读 4 种不同语言的报纸。任何用相对统一的方式定期记录抗争政治的资料，都会提供一份让你对它做出系统分析的目录。在下一节里，我们将列示出对其在发生系统性变化之规模上彼此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运用此类重大事件目录的两种方式。首先，与萨拉·索尔(Sarah Soule)一道，我们将探究一次地方性的表演——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校园中出现的“棚屋”抗议行动——的动力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其次，以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所做的研究为基础，探究导致苏联解体的抗争动力。

### 搭建棚屋以反对种族隔离

1985 年初，有关的一些最新报道描述了南非政府授意暴力系统殴打、枪杀反对该国种族隔离制度的和平抗议者的暴行。作为南非政府实施政治暴力的结果，该国已发生了超过了 5000 次的屠杀行动。迄至种族隔离制度终结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又有数千起屠杀事件发生。作为萨拉·索尔(1995)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做的研究选题，她详

尽研究了美国的大学生们一波三折的抗议浪潮，以反对其所在大学在南非投资。索尔对她所研究的抗议行动的兴趣，来自于她对她本人所在大学校园发生的抗议活动的观察。她接着对康奈尔大学的抗议活动与其他许多大学校园内发生的要求从南非撤回投资的抗议行动进行了比较。索尔对其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动态及其结果，既进行了定性分析，也做了定量分析(Soule 1997)。

棚屋这种表演，而不是指棚屋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1985年4月间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早期抗议行动中。在那里，大学生们封锁了汉密尔顿大厅(Hamilton Hall)，而此处正是1967年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反越战静坐示威行动的发生地。为占住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从附近的一栋宿舍里搬来扶手椅和沙发，而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又临时用柏油帆布搭起帐篷并弄来毯子。当杰西·杰克逊牧师(Reverend Jesse Jackson)前来发表演说时，参与这场抗议活动的人数增加到5000多人。39 杰克逊的出现，大学校园里活跃着的大量美国黑人示威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曾帮助发起的1967年至1968年抗议浪潮这一事实，得到了全国性媒体的关注，并且对支持美国大学从南非撤资的兴情推波助澜(Hirsch 1990; Soule 1997:857)。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者搭建油布帐篷、搬来毯子和家具的做法，很快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和标签在全美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圣克鲁兹，类似行动的参加者们将其称为“露营”(camp-out)，在哈佛，则称之为“露宿”(sleep-in)，在衣阿华，学生们将学校行政大楼以被谋害的南非学生领袖比科的名字重新命名为“比科大厅”(Biko Hall)。其他许多学生团体则举行了他们称之为“室外静坐”(sit-outs)的抗议行动。就在这一年的春末，当伊萨卡(Ithaca)的冰雪开始消融时，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们收集来一些碎木料、焦油纸以及塑料制品，以开始在大学行政大楼前建造一种简陋的小木屋。索尔指出，这种简陋的小木屋是后来以“棚屋”——“最终扩散蔓延到全国类似机构的



一种抗争表演和一个名称”——而闻名的那种建造物的最初形式(Soule 1997:858; 也可参见 Soule 1999)。

总之,索尔对发生在 1985 年,也就是美国大学生发起反对在南非投资的运动开始的那一年,与该运动结束的 1990 年间,共计 46 次棚屋抗议行动做了确认。所有这些事件都采用了大致相似的表演,那就是学生积极分子们搭建起临时凑合的建筑物,以反对其在大学投资于那些与南非有关的公司。尽管有些人提出了更宽泛的要求,但所有人都一致明确声称校方或相关公司从南非撤出投资的必要性。图 2.2 追踪考察了索尔从她的数据库里发现的在这 16 年里所发生的棚屋抗议活动的轨迹。

留意一下索尔所利用的程序中的几个阶段。通过观察,索尔目睹了一个重要事件,即康奈尔大学对棚屋表演的“命名”。这种经历让她产生了更深入了解的兴趣。不过,她并未采取对某一个案研究加以详细描写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夸大她自己所在的康奈尔大学校园抗议活动的重要性——而是转向一种更为系统的资料:存有数百种报纸的“专用数据库”(NEXIS)档案(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大学图书馆里找到它)。NEXIS 为索尔提供了一种搜索功能,这种功能使她无须像她的许多前辈——包括本书的几位作者——所做的那样,要用眼睛去盯着数以百计的报刊文章看(Soule 1997:864)。

NEXIS 也使得为棚屋抗议活动确立一条时间线索(用索尔的话说,是一部“重大事件史”)且使之与其他变量关联起来成为可能。例如,索尔问道,哪一种性质的校园倾向于产生棚屋抗议行动,可能出现在规模较大的私立大学,或者那些多半系黑人学生的学院或文科学院呢,还是  
40 更可能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州立院校呢? 她可以研究是否存在一种从哥伦比亚大学向它所处的东北地区邻近校园扩散的地理模式,或者是否该运动只是通过媒体传播而与其发生地点无关。她还可以探究棚屋抗议的影响:较之未曾出现抗议行动的大学,发生棚屋抗议的大学更有

可能从南非撤出投资吗？

(抗议事件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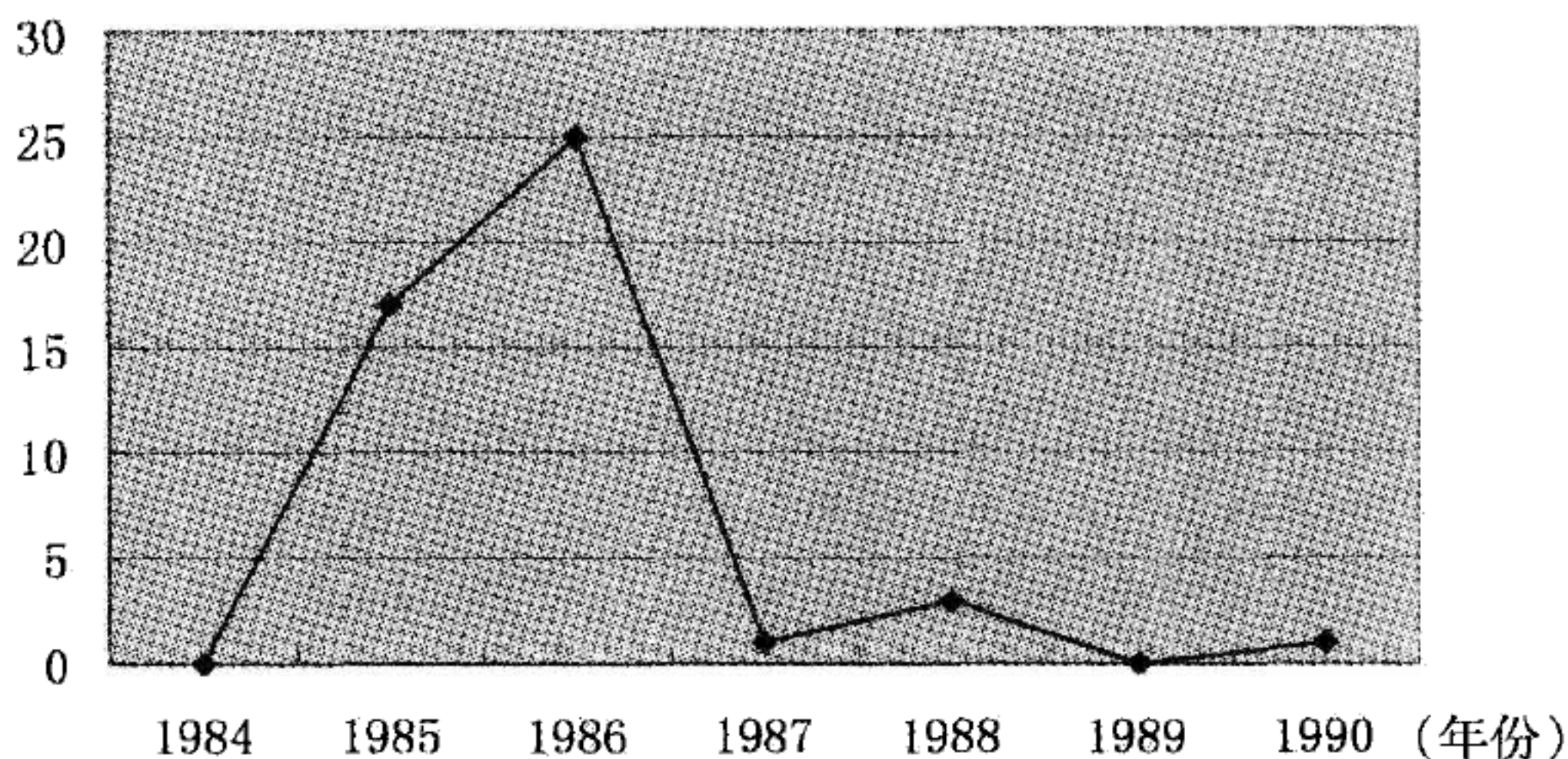


图 2.2 1984—1990 年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棚屋抗议”

资料来源：数据由萨拉·索尔提供。

从索尔的研究程序中产生出两种结果。一方面，通过仔细研究她所掌握的资料，索尔发现，由哥伦比亚大学所“发明”的创新之举，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是随着它的广泛扩散，才逐渐发展为一种标准的认同。的确，只是在康奈尔大学诸事件发生之后，要求校方从南非撤资的学生抗议者们才为它们的表演赋予了一种名称，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这种行动方式。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此一创新行动其实不过是静坐这种斗争形式的充满象征意义的变种，带有一种与南非黑人生活处境相关联的特别的象征意义。

鉴于这种原因，此种抗争表演在要求从南非撤出投资的抗议运动结束之后，便逐渐消失了。而它与其他形式的要求也不存在任何象征性的关系。由此而来的结果则是，与静坐或示威不同，这种抗争表演并未

成为抗争的基本常用手法之一。如今,它多半是被当成一次失败的创新  
41 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Soule 1999)。反对投资南非的棚屋抗议行动的失败还表现在另一方面。索尔在对棚屋抗议行动与相关大学的投资政策是否同时出现进行分析时,她发现,棚屋抗议行动在迫使校方撤资方面并未奏效。索尔的结论是:“在从南非撤资的问题上,那些发生了棚屋抗议行动的学院和大学,实际上比那些未曾发生抗议行动的院校,进展速度更慢。”(Soule 1999:121; 也见 Soule 1995)

索尔对于棚屋抗议行动的传播所做的研究,作用超出了对于一次“失败的创新”的追踪考察。首先,该项研究为那些从事抗争研究的学生们,在他们拥有易于获取的数据资料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对抗争之流、抗争地点以及抗争传播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简易的模式。其次,它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抗争表演如何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它不是像某种传染病那样随意地在一群人当中传播,而是在那些彼此类似的社会行动者当中传播。第三,如果我们对抗争诸机制和过程感兴趣,那么,索尔有关某一特殊的抗争表演“经历”的研究,就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某一抗争表演所采取的特殊传播路径,是如何对其自身的寿命产生影响的。它会逐渐消失,会引发一场持续性的社会运动,还是会导致革命的爆发呢?例如,棚屋抗议行动主要是通过媒体来传播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大学校园里参与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们彼此并不熟悉,其行动也缺乏相互协调,而且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用我们的话来说,棚屋抗议这种抗争表演尽管得到了广泛传播,却并未导致要求撤出投资的运动出现一种规模上的转变。

## 苏联的瓦解

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像索尔所从事的这类研究,为抗



争片段的系统数据资料提供了最为现成的来源，但是那些机敏而有创造力的学者们，也可以对独裁政权进行类似研究。通过运用与索尔非常类似的一些方法，马克·贝辛格(2002)为我们勾画了1987年至1992年间前苏联爆发的他称之为抗争“潮流”(tide)的基本轮廓。在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行动中(该研究从本章所概述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汲取了灵感)，贝辛格利用一组相似的抗争片段以澄清苏联解体之谜。如他所说：“该项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抗争事件。抗争事件分析方法尽管并非解析抗争的唯一方法，但它作为研究动员浪潮的一种工具，却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本质上，它是依据时间来追踪考察特殊类型的事件之兴衰涨落以及某些与之相连的特征的一种方式。”(2002: 42)

42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苏联政治分析家，贝辛格想要对1986年之后苏联大量兴起的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现象做出解释。前苏联诸共和国成功地获得独立，最终使这个一度由若干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在1991年瓦解。

贝辛格本来可能会写出一部关于整个过程的解释性历史。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将他的分析集中在1987年初到1991年8月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两个较大系列的抗争片段上。其一是至少有一百人参与的为数5067次的抗议示威；还有2173次小型事件，这些小型事件指的是那些至少有15人参与发动的对人身和财产的攻击行为。贝辛格也曾为1987年之前诸多罢工和示威行动编定过细目，但他最终还是让他的分析集中在以上两大列事件上。在准备编定这两组抗争片段的目录时，贝辛格和他的合作者们参考了150种不同的资料来源，其中包括俄文报纸、通讯社、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汇编、因政治因素而流亡国外者发行的出版物，以及外国监控机构的有关报告(第四章和第五章将论及贝辛格的有关研究成果)。

将所编定的抗争事件目录置于他本人对苏联政治了解的基础上，贝辛格因此能够为我们展示出苏联内部改革的最初要求是如何最终让

位于地方自治与独立之要求(这些要求绝非全都取得了成功)的。在与塔罗(1989)有关意大利的抗争研究所发现的情形相类似的一个过程中,诸如爱沙尼亚、立陶宛等的独立要求初步取得成功,便激励了一大批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提出其要求,与此同时,当一些不成功的要求提出者们在面临竞争与镇压时,则导致了日益增长的暴力行动。

### 其他各种证据及分析

将抗争片段收集分类,从两个方面对分析抗争政治大有助益。首先,这种做法澄清了你必须加以解释的是什么,同时也因此澄清了可以对其做出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其次,这种做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抗争过程本身,而不是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事件的前因后果上。不过,还是有一些调查对前因后果做出了适当强调。比如,有时候我们想了解立法机关的某些行动是否会经常导致抗争性的反应,或者想了解在何种情况下,军事政变会改变军队之外的权力分配。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一种下,抗争事件都在相关的个例中留下了痕迹,但将其编成大的目录的做法或许比严格的案例比较带给我们的帮助更小。而在另一些场合,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何者构成了某一特殊的运动或事件的社会基础或组织基础。就此而言,则对运动网络的研究就会比对具体事件的研究更适于达到这一目的了(Diani 1995; Diani 和 McAdam 2003; Osa 2003a, 2003b)。

机制—过程叙述更有利于对抗争事件之外的情形加以解释。这里,让我们再回想一下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以及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好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适合于抗争片段目录,但出于其他诸多目的考虑,采用另外一些方法将更为适合。在分析英国反奴隶制运动时,我们可以通过追溯置身于抗争事件之中或之外的抗争积极分子们之间的联系,而对抗争了解更多。我们也可以通过搜集许许多多的抗争积极分子

的生平历史,以了解他们的社会出身、宗教归属、职业以及政治成员身份在 1785 年至 1835 年间是如何多样化以及如何发生改变的。对那些与反奴隶制运动有关的议会辩论、小册子以及新闻报道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即有关这些问题在公众生活中出现而导致的分裂与转变的信息。

本章所得出的总体性的教益还需要加以实际应用。通过详尽说明抗争的地点,描述与这些抗争地点的有关情形,辨识相关的抗争之流,指出其最重要的后果,探寻其关键的机制,将这些机制组合为过程,以及运用类比或通过与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过程进行直接比较而将环境、机制与过程结合为对于结果的解释,你会因此而做出更好的解释。接下来的几章会经常严格依照这一模式行事:切近地考察抗争事件的内在运作方式,而不是为了比较的需要人为将它们切割成抗争片段。

随着我们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我们会一再地回到第一章所概述的那些基本的描述性概念:政治行动者、政府、政治认同、抗争表演以及抗争剧目、社会运动,等等。本章所述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机制、过程、抗争事件以及抗争片段,为处理诸如政治行动者是如何形成的,政治认同是如何改变的,以及抗争之流有时是如何固化为持续的社会运动之类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灵活的解释框架。我们会回到本章所强调的某些机制和过程,尤其会回到居间联络、传播和协同行动这些机制以及动员、遣散这些过程上来。当我们进一步切近探究诸抗争过程时,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会对我们大有裨益。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将政治行动者及其抗争形式置于他们所处的政治背景中。我们还需要对政治体制加以探究,对政治体制给抗争政治带来或隐瞒的机遇和威胁的不同组合进行探究。



## 第三章

# 政权、剧目与机遇

抗争政治的多样化和变化与政治权力的转移密切相关，它既在抗争事件的制度性发生地点之内也在其之外开展组织活动。在本章中，我们将探究不同政治体制是如何构成的，它们又是如何受到抗争政治影响的。政治体制是由存在于政府、合法的政治行动者、挑战者以及包括其他政府在内的外部政治行动者之间的经常性关系而构成的。我们将利用委内瑞拉的案例来说明这些关系，描绘政治体制的轮廓。我们的分析将展示出，同时存在于独裁政体与稳定的民主体制之中，且不仅出现在这两种政体的动荡时期也出现在更具常规性质的政治活动中的抗争、政治权力以及各种制度/机构间的关系。而我们将利用**政治机遇结构**这一关键概念，作为我们了解这种变化的指南。我们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利以及诸政治机构的结构形式是如何与抗争政治的特征相互作用的？我们将以委内瑞拉动荡的抗争史作为我们叙述的开端。

### 委内瑞拉的抗争政治

委内瑞拉有过抗争政治的经历。这个拥有 2500 万人口、石油储量

丰富的国家位于哥伦比亚、巴西和圭亚那三国之间。受这些动荡不安的邻国影响,委内瑞拉本身也曾经历过动荡时期。当初那个于1819年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Gran Columbia),1830年分裂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三个国家。自此之后,如它的许多邻国一样,委内瑞拉长期处于军阀争夺与军事统治的交替中。不过,1959年,这个国家终于进入文职政府统治时期,其后的委内瑞拉便只是偶有来自军事干预的威胁了。两个由精英阶层组成的政党,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与另一个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自此开始共享全国政权。 46

这种部分的民主化并未使委内瑞拉的公共政治得到安宁。英国的政治年鉴杂志《年度纪事》在其有关1989年的报告中指出:

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更多的贷款,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政府于当年的2月16日推出了一项新的经济紧缩方案。由此而来的基础服务(旨在减少国家对石油的依赖)价格急剧上涨导致首都加拉加斯爆发了为期3天的自发性骚乱。在那里,被动员前去恢复秩序的9个营的军队采取行动,骚乱群众有300人被打死,另有2000人受伤。类似的骚乱也出现在首都之外的其他一些省区。(75)

在竞选总统时,佩雷斯曾经提出过一项有关市政工程及价格控制的方案,但在当选后,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金融界的压力,佩雷斯迅速改变了策略方向。

1989年2月至3月间在加拉加斯发生的暴力行动,起始于那些承担着价格上涨负担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长期乘客与司机之间的冲突。暴力行动很快就扩大到对市区商店的劫掠。在3月的头两个星期里,有16个城市爆发了类似的事件。这些冲突被称为“加拉加斯事件”(El Caracazo, the Events of Caracas)或“冲击”(El Sacudón, the Shock)。它们

开启了一场为期 10 年的斗争与政体变化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在第二章中仔细考察过的那种过程(新协作),提供了一个上佳实例。居间联络让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得以相互建立联系,并直接推动了新协作在加拉加斯所辖的其他若干城市及发生地点建立起来。由各种团体所开展的居间联络,还导致各种观念和实践从一个发生地点传播到另一个,而这又进一步为新协作提供了便利。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 1989 年之后,而在这一年的公众反抗行动期间所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则为此后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协作行动提供了基础。

抗争并非仅仅只来自于社会下层。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群民族主义立场的陆军军官组织了一个被称为“革命的玻利瓦尔运动”(西蒙·玻利瓦尔系 19 世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英雄)的秘密网络。伞兵部队上校军官查韦斯成为他们的领袖。1992 年,玻利瓦尔运动成员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几乎夺取了政权,但政变最终失败,将查韦斯送进了监狱。当该组织于同年 11 月试图再次发动政变时,查韦斯仍被关押在狱中。这一次,他们占领了一家电视台,并且通过电视播放了一段查韦斯宣布现政府当局垮台的录像。由于这一新的政变企图,查韦斯又在狱中待了两年。

1993 年,正当查韦斯在狱中备受折磨之际,委内瑞拉国会以腐败之名对总统佩雷斯提出弹劾,并最终将佩雷斯赶下台。但继任的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总统很快便面临国家银行崩溃、暴力犯罪猛增、新军事政变的传言以及针对他本人的腐败行为而提出指控的局面。当查韦斯获释出狱重新进入政界时,民众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声浪正日益高涨。到 1998 年总统选举时,唯一对查韦斯这位前政变领袖构成严重威胁的竞争对手,是一位前选美大赛的皇后。当查韦斯的竞选活动得到广泛支持时,她便主动退出了竞选。

通过广泛宣传自己是一位平民主义者,查韦斯赢得了大多数的选票。翌年(1994 年),民主监督组织“自由之家”的报告称:



雨果·查韦斯，这位由当初发动政变的伞兵转变而来的政治家，1998年12月以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当选总统，这位新当选总统把1999年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去除委内瑞拉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政府机关彼此间相互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体制上，表面上的理由是以此摧毁声名不佳的两党制度。在该制度实际运作的40年里，经历了数次石油价格暴涨的机遇，却让4/5的委内瑞拉人陷于贫困之中。这一年的年初，国会权力遭到破坏，司法机构也被置于行政部门的监护之下，而查韦斯在军队里的那些同事们则被赋予较之此前大得多的对于国家日常管理活动的决定权。一个由查韦斯的追随者组成的立宪会议，起草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将使新闻检查易于实施，还加强了行政首脑的权力，甚至包括解散国会的权力，并且可能让查韦斯将他的总统权力一直保持到2013年。（新宪法得到当年12月15日举行的公民投票的批准）而就在委内瑞拉国民于当年12月15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批准新宪法之后，国会和高等法院也被解散了(Karatnycky 2000: 522)。

当查韦斯于1999年开始掌权之际，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街头对抗也在不断增加。新总统于当年晚些时候称将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官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使他打算从总体上改造其政府及其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的计划，变得颇具戏剧性色彩。查韦斯还复苏了一项对圭亚那西部一大块土地提出已久且颇受大众欢迎的领土要求。委内瑞拉由此转入了围绕这个国家的未来展开斗争的新阶段。

诸如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些历史事实使本章的若干要点变得显而易见了：抗争政治的多样化和变化与政治权力的转移密切相关。它既在抗争事件的制度性发生地点之内也在之外组织起来。即便这些要点在委内瑞拉这一案例中是不言而喻的，但鉴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原因，它

48 们仍值得人们予以关注。

首先,存在于抗争、政治权力以及诸制度/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出现在如委内瑞拉的充满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也出现在独裁政体与稳定民主制国家中那些看上去更为常规的政治生活中。

其次,这些联系的存在否定了两种彼此相对却同样常见的关于民众抗争政治的设想:其中的一种设想认为,抗争主要是由明确表现其意图、易于冲动的行为所构成,目的在于发泄郁积的情感。而另一种设想则认为,抗争源于个人对其自身利益的短期追求,权力结构只是有利于或妨碍这些利益的实现。

第三,一旦我们追问起如何的问题来,亦即问到政治权力结构、业已确定的制度和抗争政治的特点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便立即随之出现了。本章将展示某些简单的工具以提出并解答这一问题。

## 政权内部的抗争

在委内瑞拉的案例中,一旦我们追溯该国的产油史,我们就能逐渐明白民众斗争的要害所在。作为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与输出国,委内瑞拉促成“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于1960年建立。委内瑞拉在该组织成立15年后才对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不过,尽管其间不时会有某些平民主义者或军官企图获取对于石油工业巨大收益的控制权,但委内瑞拉还是逐渐使该国的石油工业获得了很高的政治自治地位。最近一些年来,石油收入已占到委内瑞拉国民收入的大约1/3及其出口收入的80%。

查韦斯试图使石油工业从属于政治并将石油工业的收入用于民生计划部分地取得成功,打击了委内瑞拉国内外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委内

瑞拉政体的变化情况为我们清晰勾勒了 1989 年的“加拉加斯事件”以及 1999 年的冲突。当我们随后转向比较分析时,我们将会发现各种不同的政体变化形式。

在做进一步探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制度问题,它们指的是:某些业已确立的、有组织的且得到广泛认可的常规、联系以及组织的各种形式,这些常规、联系以及组织的各种形式一再用于引发任何特定政权内的集体行动。

某些制度已经出现在我们所叙述的有关委内瑞拉的故事当中了,它们是政党、竞选运动、政治开支计划以及在一些退役和现役军官当中形成的广泛网络。如果我们做一番切近的观察,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相对自由的新闻界、一种活跃的非官方经济、拥有充满政治活力的学生团体的学校与大学以及一种石油工业管理人员向政治家行贿的体制。这些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包括总统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内的主要政治行动者的行为。当我们在本章的随后部分转向对其他一些政权的考察时,我们将会看到不同形式的制度——各种立法机构、司法和行政部门甚至还有地方政府——是如何形成并参与抗争政治的。 49

在此,通过回想我们在第一章仔细考察的“抗争剧目”,我们也会对之有更清晰的了解,所谓“抗争剧目”指的是一大批为某些政治行动者所熟知且可为其所用的抗争表演。

数 10 年间,委内瑞拉人见识了一种被称为军事政变的表演且屡受此种表演之苦。在一场军事政变中,一群军官纠集起他们所统领的部队,夺取政府大楼,将现任领导人赶下台,在发表爱国主义宣言与承诺恢复秩序的同时接管政府。如同 1989 年的“加拉加斯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城市居民们也从先前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通过对那些从新的价格计划中受益的司机和商人们发动攻击,以示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之抗议。尽管迄今我们已看到的有关新闻报道并未向我们表明这一点,但实际上,这些城市居民同样知道如何去领导各种竞选集会、举行街头示威以



及罢工。当半民主的政权形式在 1958 年之后的委内瑞拉占优势时,这些为人们所熟悉的抗争表演全都变得更普通和常见了;与此同时,一种新委内瑞拉式抗争剧目也出现了。其中的某些因素一再地出现于各种不同的政体中,不过,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有些因素只出现在特定的政体中且随着此类政体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除政治体制、制度以及抗争剧目之外,我们还将运用一个描述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政治机遇结构。政治机遇结构指的是各种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之集体行动的政权和制度的特征(例如,精英阶层的分裂),以及这些特征之种种变化。政治机遇结构强调不仅包括了机遇,同时也将委内瑞拉政府对 1992 年密谋政变者实行镇压之类的威胁包括在内。它同时还引导我们关注处于变化之中的机遇和威胁。当以上这些因素累积且相互结合起来时,它们便导致了民主化与去民主化之类政治体制方面变化的发生。

很显然,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委内瑞拉的政治机遇结构使得各种不同的政治行动者们可以直接干预国家政治,这一点与常常伴随着较早出现的军事政权而来的赤裸裸的镇压时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随后将更净尽地描述机遇结构的诸种因素,但是,把政治机遇结构看成是这样一种架构无疑将会是有所裨益的:在其中,人们决定是否进行动员,且做出有关用于实际斗争中的抗争表演之最佳组合形式的决策,而他们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之成败也系于这一架构。

本章的计划是要对政权、制度、政治机遇结构以及剧目之间的相互作用作系统考察,同时也特别关注那些我们称之为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变化的重要形式。而重新回到委内瑞拉的抗争政治话题,将会对我们的研究起很好的促进作用。

## 委内瑞拉的抗争, 1983—1999

委内瑞拉历史学家洛佩兹梅耶(Margarita López Maya)及其合作者们已为我们的研究做了颇有价值的贡献。他们自觉地采用了与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查尔斯·布罗克特、汉斯彼得·克里斯、萨拉·索尔、马克·贝辛格分别用于中美洲、西欧、美国以及苏联之抗争事件研究相同的方法。通过研读 1983 年至 1999 年委内瑞拉的“国民报”(El Nacional), 该研究小组对其中有关民众公开表达其不满的各种抗议行动的报道做了摘录。详细说来, 他们从中看到了如下这些类型的抗争事件:

合法的事件: 集会、结伴旅行、通信交流、集合、罢工、游行示威、举行会议、征集签名

非法但得到许可的事件: 饥饿罢工、乌龟行动<sup>①</sup>、市民罢工、全国性罢工

非法而只在某些环境中得到许可的事件: 封锁道路、占领行政大楼、占据地盘、袭击政府机构

遭到镇压的事件: 投石块、骚乱、纵火、抢劫、绑架

新的事件: 熄灭灯火、敲盘子、人链、手拉手抗议、吹口哨、裸体

与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述及的迪特尔·鲁赫特的德国研究以及第二章中述及的西德尼·塔罗的意大利研究颇为类似的是, 这群委内瑞拉抗争研究者们将他们所收集的有关单个事件的大量报道重新组合为三个类别: 传统、对抗性, 以及暴力事件。以下是这群研究人员所界定的有关这三类事件的区别所在:

---

<sup>①</sup> operación morrocoy, 即进行怠工, 或把商品藏起来, 以造成市场恐慌。——编注

传统事件：它们指的是那些已广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的抗议事件，这类事件不会激起当局或公众的惧怕或产生任何威胁感，例如，各种集会或经授权的示威。

对抗性事件：指的是新的或非法形式的抗议，它并不以暴力为特征，而是通过利用某些资源以期引起人们对其行为感到震惊，由此而导致在当局和公众中产生紧张或对抗感。例如采取封锁街道或占领行政大楼的行动。

暴力事件：包括物质毁坏或人身伤害，例如洗劫商店或向官员们投掷杂物(López Maya 2002: 203; López Maya 等 2002: 17—19)。

总之，根据他们的统计，1983年至1999年的17年里，这三类事件分别为：传统事件1219起，对抗性事件1108起，暴力事件708起。三类事件相加，总数为3035起，每年178起或每周3到4起。比事件总数本身更具启发性的则是这些事件在发生年份上出现的波动。图3.1描述了这些波动的轮廓。

委内瑞拉的抗争事件不像婚礼或交通事故之类的大众现象，后者的发生数通常是上一年与下一年相比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而委内瑞拉的抗争则是以波段的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像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意大利与80年代的苏联一样，这些波段与国家政治危机的出现彼此对应。1984年至198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涉及普遍的失业、物价上涨以及有组织工人的大范围罢工活动。（这些罢工活动有助于就“对抗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做出说明。）1989年出现的第二个高峰包括“加拉加斯事件”(Caracazo-Sacudón)在内。图3.1显示了自1992年失败政变后出现的抗争事件上升与1997年至1998年出现的下降情形。该图还显



示出,1999年的情形是,暴力事件尤其是对抗性事件的惊人上升,结合着传统事件的微弱下降。

为便于查看和了解,我们已将委内瑞拉的有关数据在图 3.1 中做了累积式描述。该图顶部的几个线条显示的是抗争事件的总数,线条之间的间隔则表明的是每一不同类别的抗争事件数。在 1983 年至 1999 年的这一较长时间段里,传统事件不仅在其绝对发生数上而且在其占整个抗争事件的比例上,都大大下降了。它们从这段时期开始时每年发生 150 起至 200 起,下降到这段时期结束时每年仅有 50 起或 75 起。暴力事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不仅在其绝对发生数而且在其占抗争事件总数的比例上都引人注目地变得更为常见,随后则在 1998 年的竞选运动中近乎消失,不料却又在 1999 年再次卷土重来。在每一次危机当中,对抗性事件都会在其绝对发生数及其占抗争事件总数的比例上出现明显上升。在这段为期 17 年的时间里,它们变得更频繁发生了。

(事件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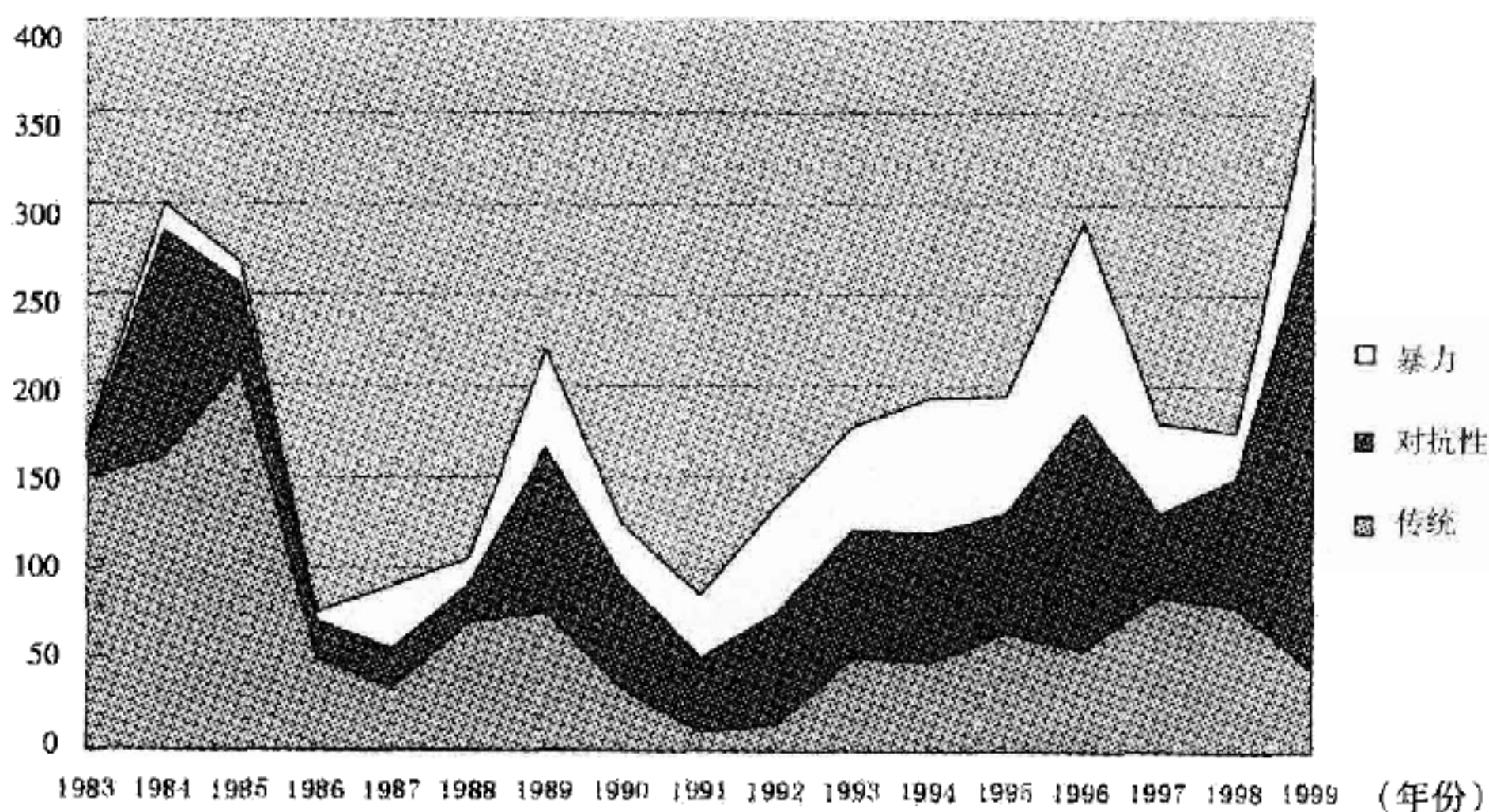


图 3.1 委内瑞拉的抗议事件, 1983—1999

资料来源:洛佩兹·梅耶等(2002)。

52 还有另一种思考这段时期委内瑞拉抗争的方式：某些在 1983 年曾  
53 经属于对抗性的行动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则日益变成传统行动；而  
其他一些在 1983 年时曾属于对抗性的行动则被暴力行动所取代，暴力  
行动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将结束时出现了惊人的上升。委内瑞拉  
之抗争周期的此一方面与波特（Donatella della Porta）和西德尼·塔罗  
（1986）在他们所研究的那一段时期结束时的意大利抗争颇为相似。在  
我们所探讨的该时期委内瑞拉抗争的动态中，我们正在关注着的是抗  
争剧目的变化。

洛佩兹·梅耶以及她的合作者们将他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最后一年即 1999 年加以放大处理。他们对当年发生在加拉加斯大城区的街头政治行动做了切近的研究。他们在现场亲身观察抗争政治，访问抗争参与者及其他抗争事件的旁观者，并且对五种在抗争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团体做了特别的调查，这五种团体分别是：邻里组织、养老金（或抚恤金）领取者和退休人员、法庭成员、大学生以及街头小贩。此举使他们得以超越图 3.1 所做的宽泛的数字统计，转而对不同的政治行动者所采用的特定抗争表演予以关注。

比如，乍看起来，我们可能会对加拉加斯的一些小商贩们的占地盘行为感到惊奇，不过，一旦我们了解到具体的情形是：当地政府的长官特兰（Abdón Vivas Terán）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曾将加拉加斯的拉赫亚达（La Hoyada）市场划给小商贩们作为经营场所，而市政当局则在 1998 年以承诺小商贩们就近安置新的经营场所为条件，将小商贩们从这个市场强行赶出，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市政当局未能信守承诺；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占地行动有什么令人不解之处了。小贩们随后占据了市场当中的部分场地，以此向市政当局提出恢复其权利的具体要求。如同洛佩兹·梅耶研究小组曾会见过的那些小贩们所说，市政当局使他们失去工作而不予补偿，这就让他们整个家庭的生计受到威胁了（López Maya 等，2002：174—176），小商贩们为他们的家庭得到公正对待而采取

了行动，而他们所采用的却是委内瑞拉政治生活中已有先例的那种抗争形式。

委内瑞拉的证据向我们表明，提出要求的表演其常规组合形式亦即抗争剧目，会因应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1983年至1999年间，委内瑞拉的政权变动包括：一度非常牢固的由该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与石油工业界及军队联手组织起来的统治者之间的同盟关系瓦解，一些军官为控制政府权力而一再发动军事政变，以及由一名前伞兵部队上校所领导的一个平民主义联盟执掌国家权力。这些变化的发生，令美国政府及北美洲主要的石油进口商深感震惊。

2002年，当查韦斯的反对者们发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时，委内瑞拉陆军中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们进行了一次政变尝试，宣称政变取得成功，并且几乎立即就得到了布什政府的承认。不过，当忠于查韦斯的部队重新控制政变者所占领的街道，并且让查韦斯重掌政权时，美国又匆忙转变立场。翌年，当石油管理人员、石油工人工会以及零售商发动一场大范围的反政府罢工时，委内瑞拉几乎走到了内战的边缘。查韦斯的支持者们则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动员。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内的一些外部行动者介入其中，以帮助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解。2004年8月，委内瑞拉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这次投票的结果不仅重新确认了查韦斯作为总统的有效性，同时还有助于查韦斯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对付日益分裂的反对派。

委内瑞拉的历史一再向我们展示存在于抗争剧目、制度、政治机遇以及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短期的政体变化不仅动员了现有的抗争剧目，而且引起提出要求的形式上创新。但动员和创新又反过来最终使政权本身发生改变。委内瑞拉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这段经历，为我们展示了存在于政府变动、政体、制度、政治机遇结构以及抗争剧目间互为因果的关系。



## 抗争剧目与政体

政体的变化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像在委内瑞拉——出现,也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少国家在政体方面的变化表现得相当微妙。想一想美国与加拿大在政治制度上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好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具有以下这些特征:两国都实行联邦制(分别为州和省)、都有全国性与地方性的立法机构、都有形式上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及诸多形式的普通法。但美国拥有的是通过选举而当选的总统,而加拿大的行政首脑则是由议会中优势的政党总理担任。美国政府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可以行使优先(控制)权,而加拿大却将自然资源的广泛控制权让与其治下的各省。两国政体方面的这些微妙区别,事实上已导致两国在抗争政治上的重要区别,例如,与加拿大拥有一种更有力的社会民主传统相对,美国左翼(the American Left)则带有更具中间立场的“自由主义”色彩。

一些国家内部的政体变化同样也事关紧要。加拿大有一个以讲英语为主的重要的省份——魁北克,那里,法语是主要的官方语言;它还有一块很大的领地叫努那乌(Nunavut),形式上则是由土著居民管理的。加拿大的政体对不同的文化群体进行政治再分(political subdivisions)。

55 尽管美国各地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像加拿大那样的一些得到宪法支持、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大单位,在美国则是不存在的。不过,种族歧视却让美国在1890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一种分裂的政体。如同这些实例所表明的,即便是那些具有广泛民主的政体,也会在一些重要方面存有内在区别。而这些区别则常常形塑着抗争政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在针对煤炭和石油的生产、分配及收入,或者对土著居民实行动员而展开的各种斗争中。存在于政权内部的一些变化,有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构成了混合政权(composite regimes)。

我们将在第八章转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世界各地不同政体之间的两大区别对抗争政治影响最为重大,这两大区别是政府的能力以及民主的程度(或民主的缺失)。能力(capacity)指的是政府行为影响其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居民、(人们的)活动以及各种资源之特性及其分配的程度。当一个拥有强能力的(high-capacity)政府对其治下的全体居民、人们的活动以及各种资源进行干预时,其作用会很大;这个政府行使着征税、分配各种福利、管理交通、控制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处理其他更多事项的权力。而弱能力(low-capacity)的政府也会设法做同样的事情,但它们的努力则几乎没有有什么成效。

民主则指的是隶属于某一特定政府当局的民众,在拥有广泛、平等的政治权利,对政府职员及国家政策施加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比如,通过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以及得到保护以免受警察、法官和公共部门官员之类的政府代理人专断行为之害方面所达到的程度。一个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民主的:其国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是狭小有限的和/或不平等的,政府极少向公民征求意见,并且对公民的保护软弱无力。

很显然,民主和能力都是相对的。依照上面这些标准,那种纯粹、广泛、平等、充分征求民意且具有保护性的民主,根本就没有在一国范围内存在过。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甚至包括那些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的政府,对其领土内的全体居民、人们的活动以及各种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不过,对于民主和能力所做的这些区别却让我们得以对诸多不同类型的政体做出如图 3.2 所示的重要区分。

就 21 世纪初的情况而言,图 3.2 的政体分类图列出了分成四块的不同政体的例子:

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体：伊朗、摩洛哥

弱能力而不民主的政体：尼泊尔、索马里、苏丹

强能力的民主政体：澳大利亚、日本、挪威

弱能力的民主政体：比利时、塞浦路斯、牙买加

56

(政府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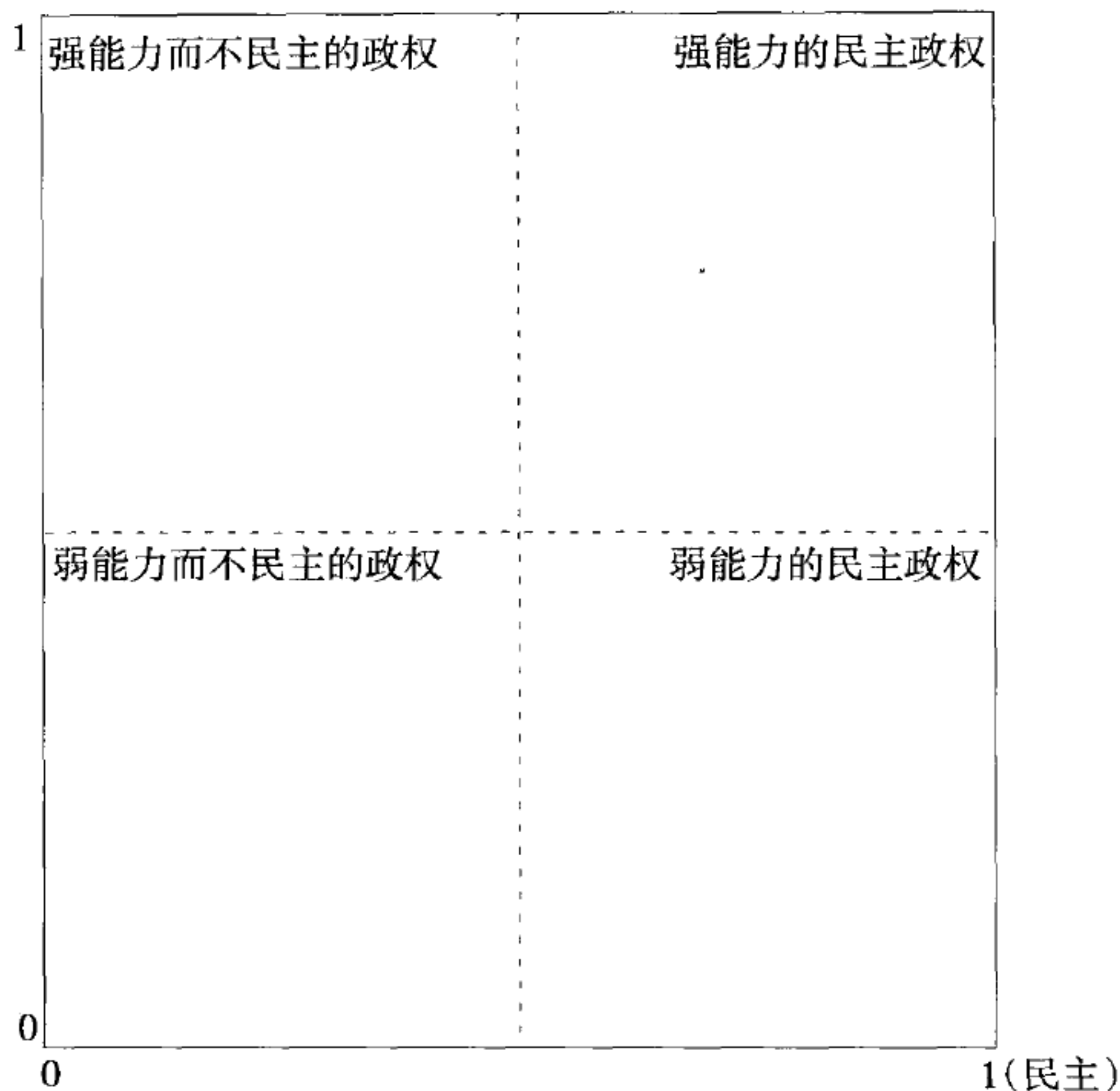


图 3.2 粗略的政权类型

根据定义，政权仅只存在于那些政府能够起作用的最大局域。因



此,政权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已经存在了大约 7000 年之久。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政权的四种类型分布极不均衡。历史上的大量政权都归入弱能力而不民主的,不过,许多最大的政体与最强有力的政体,则属于强能力而不民主的分区内。强能力的民主政体一直鲜见且多半是近期出现的,而弱能力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少有且出现在年代久远的过去。

一般说来,形式非常不同的抗争主要出现在该政体类型图的四个角上。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体制以秘密反对派和短暂的对抗(通常遭到镇压而告终)为其特色;弱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则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内战的承受者(Fearon 和 Laitin 2003)。弱能力的民主政权集中了超乎其应承担的军事政变以及各种发生在诸语言、宗教或种族群体之间的斗争。强能力的民主政权则造就了世界上的大部分社会运动。不同政体环境中潜在的提出要求者面对着形式大相径庭的威胁和机遇,这导致了上述种种区别。

### 政治机遇结构

抗争剧目为何在一种政体与另一种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呢?这其中的某些区别是因历史的累积而成。持续时间较长的政体倾向于具有较高的能力——这也就是它们之所以会持续较长时间的原因。在其持续存在的较长历史时期中,这些政权累积了各种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即那些强有力的领导人之间相互借用并相互帮衬着实际运用的方式。例如中国尽管在 20 世纪历经过多次革命,但它拥有许多个世纪的中央集权统治的经历,而且,在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这些世纪里,它与东亚的一些近邻朝鲜、日本和蒙古交互发生影响。

不过,抗争中的系统性差异的一个重要部分,则直接由图 3.2 四个方块中不同政体的属性产生。一个政权的总体特征影响着任何潜在的

要求提出者所面对的威胁和机遇，而这些特征的种种变化则导致了抗争性质的变化。我们可以将政权的若干关键特征概括为政治机遇结构，而政治机遇结构则包括了某一政权所具有的如下六方面的属性：

1. 该政权内部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2. 该政权对于新行动者的开放性
3. 现行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
4. 挑战者获得有影响的盟友或支持者的有效性
5. 该政权压制或推进集体性提出要求的程度
6. 第 1 至第 5 条所列各项属性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从政权的整体角度看，结盟的不稳定性与盟友的可获得性(第 3 条和第 4 条)实际上是一回事。稳定的结盟关系通常意味着许多政治行动者根本不具备任何处于当权地位的潜在政治盟友。不过，照此定义，则政治机遇结构会在某一政治行动者与另一政治行动者之间发生某些变化；与此同时，当某一政治行动者拥有许多可利用的盟友时，另一政治行动者则几乎没有可利用的盟友。

威胁也会在不同的政治机遇结构中发生变化，而大多数被动员起来的人则通过动员以对付所面临的威胁或风险 (Goldstone 和 Tilly 2001)。美国的珍爱生命运动看到的是流产的合法化对于基督教价值构成的威胁，而带有仇外倾向的法国“民族阵线”则把自身看成是反对以北非移民为代表的外来移民对法国民族完整性之威胁的斗争。甚至“基地组织”(Al Qaeda)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们也是要回应西方势力对他们所在国家实行占领的威胁(Pape 2004)。在民主与非民主的政体中，投身于抗争政治的大多数人都把他们自己的行动，看成是针对他们的利益、价值观或者认同受到威胁而做出的回应。

但威胁是和机遇同时出现的，而大多数从事抗争政治的人总是会

将对威胁的反应与抓住机遇结合起来。例如,在处于美军占领体制下的伊拉克,逊尼派教徒将新宪法的制定看成是对其权力的一种威胁。而就在联邦制给予什叶派教徒与库尔德人所在地区以控制伊朗石油收入的权力——一种对逊尼派教徒真正的威胁——时,它也为不同的地域群体提供了制度性自治的可能。这种自治开启了新的机遇。威胁和机遇二者都会因权力的分割或集中,因政体的开放性、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盟友可获得性方面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迅速改变的威胁和机遇通常使得当权者转向呆板僵硬的刚性抗争剧目,而让挑战者转向更具灵活性的剧目。当权者固守已有的抗争表演,其中包括对挑战者进行镇压的方式。与此同时,挑战者们则努力寻求采取新的方式以战胜当局和竞争者。当权者间的竞争常常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挑战者结成同盟,而这就限制了当权者转向刚性剧目,以及挑战者转向具有灵活性的剧目。由于某些剧目使挑战者与当权者发生关联,故迅速变化的威胁和机遇便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引到提出要求者与要求对象之间的关系中来。计划、认同以及政治立场全都因此而更迅速地发生了变化了。

迄至我们在本书中已遇到过的许多抗争片段,机遇结构都起到了形塑抗争的作用。这里我们只就其中的一些事件作些回顾:

- 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参与者们,利用议会接受有关公民团体请愿这一做法作为推动运动发展的指南,而由于未能阻止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帝国,英国统治精英内部出现分歧,反奴隶制运动参与者们的请愿也得以轻易地进入议会之中。
- 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熟练地利用了该国安全部门的内部分歧,并且利用了此前发生在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反对选举欺诈抗议运动的发展势头。
- 美国的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们利用了来自美国南部的大规模人口



迁移、黑人选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冷战的爆发(参见第九章),以发动对种族隔离政策更具决定性的攻击。

- 作为对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权向黑人示威者采取日益增长的暴力行动的反应,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们利用美国大学校园拥有的开放的机遇结构,以迫使学校行政部门从其所投资的南非股票中撤出资金。
- 在贝辛格所研究的苏联,一些少数民族团体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化政策所提供的有利时机,将民族主义要求提上日程。
- 克里斯与他的合作者们详尽研究西欧的一些“新社会运动”,这是对法国、西德、荷兰以及瑞士这些国家中不同的联盟结构和冲突做出的反应,其结果是导致传统型抗争、示威性抗争以及暴力抗争以不同结合形式出现。
- 在1980年至2000年的委内瑞拉,一种由精英阶层控制的结合相对紧密且具有压迫性的制度被打破。

不过,威胁也就处在机遇的另一面:

- 在布罗克特所做的研究中,潘佐斯山谷的土著人团体面对军队(曾经显示出其屠杀非武装农民的意愿)时,不得不在退却与展开武装斗争之间做出选择。
- 当苏联发生内爆(imploded),境内各共和国的一些占优势的族群团体开始宣称其支配权,而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对此的回应,则时而是暴力行动,时而向他们可能会成为优势民族的地区迁移,时而又学习新优势民族的语言。
- 在一种较小的规模上,由于加拉加斯市政府拒绝给予小商贩在空闲的地方出售商品的权利而威胁到当地街头小贩们的生计。

机遇和威胁的性质在不同的政权体制之间区别极大。正是这一点将我们引入对不同形式的政体以及限制和制约抗争政治之各种制度建制的讨论上。

60

## 政权与机构

总体上说,政权及其机构是一起逐步形成且相互适应的。例如,在那些由亲属关系组成的团体来组织大部分社会生活的地方,这些团体通常都会与政府紧密地缠结在一起,甚或直接控制政府。与之相反,在那些资本性质的公司、工会、学校、政党以及私人协会占优势的地方,这些机构就会将政体塑造成符合它们需要的那种类型。某特定的公司、工会、学校、政党以及协会也许会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但总体上,这些机构以及其他类似它们的机构,都有赖于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的宽容和支持。而从另一方面说,任何对现有的机构滥施淫威的政府都不可能持续太久。

不过,各种政权也确实影响着其治下的公共机构。它们以三种相互补足的方式对各种公共机构的实际运作实施有影响的掌控:通过指定人们加入某些公共机构(例如,要求人们加入一些群众性协会或政党)的方式;通过容许其他一些公共机构存在(例如,容许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组织聚会,只要这些团体不参与公众政治)的方式;以及通过禁止另一些公共机构存在(例如,明令禁止拥有私人武装)的方式。一些政权还以类似的方式,指定、容许和禁止各种不同的提出要求的表演——也许它们会规定人们要举行集体性的忠诚宣誓、容许人们举行宗教游行,却禁止除政府自身拥有的军事力量之外的其他武装。

大体上说,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针对范围特别广泛的各种机构和行动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些政权只容许范围很小的各种机构和行

动,同时对许多机构和行动加以禁止。与之相对,弱能力的民主政权则以广泛宽容各种机构和行动为其特征,但这类政权对许许多多的机构和行动既不做出规定也不加以禁止。这里,不妨想一想摩洛哥(目前仍属于一个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与牙买加(目前是一个弱能力却相对民主的政权)之间的区别好了。

不同类型的政权之间的这种变化对抗争发生地点产生了有趣的影响。我们对有节制的抗争与逾越界限的抗争做了一个大致的区分。所谓**有节制的抗争**,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抗争:即便力求推进其界限——就像公众集会的参与者们开始呼喊煽动性口号时所发生的情形——但它还是在政权所规定或容许的提出要求的形式中。而**逾越界限的抗争**则指的是那种越过了制度性的界限而进入到被禁止的或未知地带的抗争。这类抗争要么是违犯了标准的安排,要么是采取了一些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形式。在民主政权中,我们发现大量的抗争发生,但其中的大多数则被以前专门设立以处理和冲突的机构所遏制。而在独裁政权中,尽管只有较少的公开性抗争,所发生的抗争却大多采取的是逾越界限的形式,这是因为独裁政权将许许多多的表达形式视为危险之物的缘故。在混合型的政权中,逾越界限的抗争与有节制的抗争则共存于一种令人不安的综合体中,就像我们在第八章中转向讨论以色列/巴勒斯坦政府时看到的那样。

英国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和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都时有逾越界限之举,像反奴隶制积极分子们在英国组织发动空前的联合抵制行动,以及乌克兰人利用反对党所采用的“橙色革命”而联合发动群众示威即是如此。如这些例子所暗示的,有节制的抗争与逾越界限的抗争互相影响且时有交叉的情形。但其间的区别也很重要:逾越界限的抗争会在突然之间构成对于现政权及其机构和法律的挑战。

存在于有节制的抗争与逾越界限的抗争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不过,二者间的这一界限还是包含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



- 每个政权都就其可以接受的提出要求的形式设定了界限。
- 界限迁用的场所和有效性存在着显著区别。
- 这些界限确立了三个不同的区段：提出要求的指定形式、可容许形式以及禁止形式。
- 逾越界限的政治行动发生在许可行为与禁止行为的边界地带，它有时会将禁止形式转变为可容许形式。

出现在有节制的抗争与逾越界限的抗争之间的这些交叉情形并非偶然或不重要。但由于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不依赖于政治机构研究，抗争研究者们便常常忘记了抗争有助于塑造各种机构，且反之亦然。例如，西方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的发展与制度性机构的发展同时出现，既导致在机构内部产生运动型的提出要求，也导致产生反对各种机构的运动型的提出要求；并且在使一些运动、运动参加者以及各种组织制度化化的同时，导致另一些激端化。

## 民主化与去民主化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民主化与去民主化，我们可以从纽约的民主监督组织“自由之家”那里借用一点材料。自1972年以来，“自由之家”一直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招募一些专家从两方面对世界上所有独立政权进行民主程度的等级鉴定，这两个方面分别是：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尽管我们从未亲自去做这项工作，但我们的一些同事和我们从前的一些学生常常作为专家或顾问参与鉴定工作。）鉴定者就他们所研究的每一政权填写两份问卷，其中，政治权利问卷包括了诸如以下这样一些条目：

国家首脑和 / 或政府及其他主要权力机构的首脑是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的吗? 该国的人民拥有根据自己的意愿组织不同政党或其他竞争性团体的权利吗? 该国的政治体制对于这些竞争性政党或团体的兴衰更替是开放的吗?

而有关公民自由权的问卷则问道:

有集会、示威以及进行开放的公开讨论的自由吗? 财产权有保障吗? 公民有建立私人企业的权利吗? 私人企业的活动受政府官员、安全部队或有组织犯罪的过度影响吗? (Karatnycky 2000: 584—85)

一个精心设计的评分体系将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分成 7 个等级的两组: 从低度政治权利到高度政治权利, 从低度的公民自由权到高度的公民自由权。

大致说来, “自由之家”的政治权利等级包括了我们曾论及的关于民主的几个方面: 广泛性、平等性以及协商性, 而它有关公民自由权的等级划分则就保护性的程度<sup>①</sup>做了鉴定。这两个等级表实际上也夹杂着对政府能力的某些评价: 就政治权利的较高等级而言, 这其中的假定是政府实际上能够实施这些权利, 而较高等级的保护性则假定政府实际上提供了其所承诺的保护。如若没有这些隐含的对政府能力的判断, 则整个等级鉴定过程将归于无效, 这是因为, 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都从纸面上宣称其自身是民主的。而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判定, “自由之家”所做

---

<sup>①</sup> 此处参见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李义中、屈平译, 译林出版社, 2006年9月版)一著的第九章, 第336页。——译注

的这些等次划分就方便了人们对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民主进行观察。

“自由之家”对 8 个政府在 2003 年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权的情况做了分类,图 3.3 将其置于相应区间内。带点的斜线标示出民主政权与不民主政权之间的大致区分,而委内瑞拉则正在努力成为民主区间内的一员。在该图的左下角,我们看到的是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两方面都处于最低等级的古巴。同样处于左下角(但没有出现在该图中) 63 的其他一些政府则是缅甸、朝鲜、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以及土库曼斯坦。所有这些政权显然都属于不民主的政权;其中的大多数则属于强能力的政权。在 2003 年的时候,现已为我们所熟悉的委内瑞拉非常靠近该图的中间位置,位于政治权利的第 3 级和公民自由权的第 4 级。

(政治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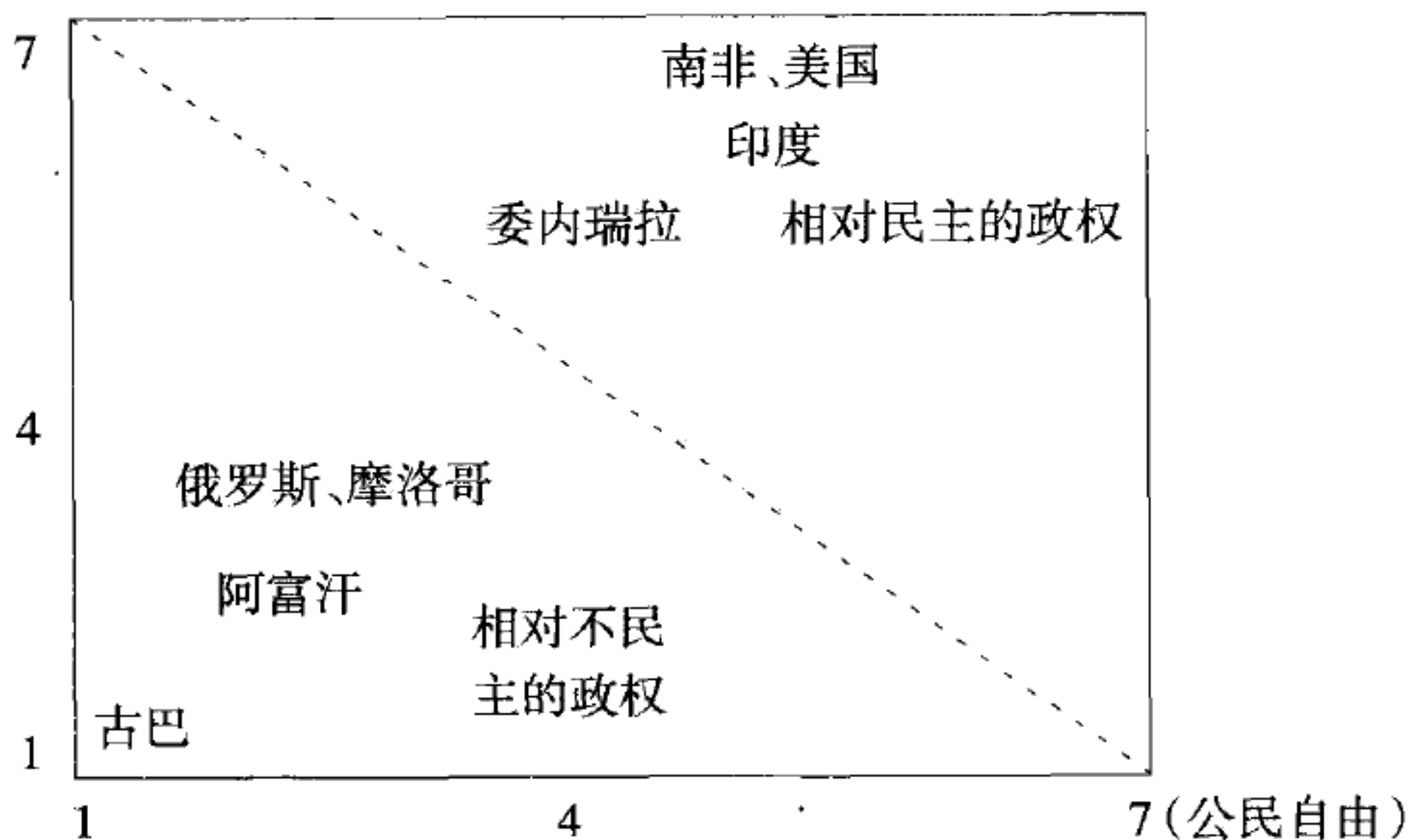


图 3.3 “自由之家”对各国的民主程度所做的等级鉴定,2003 年

注:我们将“自由之家”所做的等级鉴定颠倒过来,他们的实际做法是从 1(高)到 7(低)。

资料来源:Piano 和 Puddington(2004:720—21)。



美国以其在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权两方面的最高等次而居于该图的右上角,在右下角的还有许多其他政权,它们是: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时、加拿大、佛得角、智利、塞浦路斯、丹麦、多米尼加、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基里巴斯(Kiribati)、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荷兰、新西兰、挪威、帕劳群岛、葡萄牙、圣马蒂诺、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图瓦卢<sup>①</sup>、(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以及乌拉圭。

在后面这一组里,出现了一种能力非常强的民主政权(如德国和冰岛)与某些能力相对较弱的民主政权(如巴巴多斯和塞浦路斯)混合的情形。尽管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去民主化,但我们还是认为强能力与弱能力的民主政权在去民主化的做法上彼此有所不同。在强能力的民主国家中,一次对政府能力的大冲击、一场军事征服、抑或对于现存政府机构的无情内部接管,就可能使之去民主化。而在弱能力的民主国家中,由犯罪活动所造成的对现政权的损害、得到外部力量支持的颠覆活动、军事政变、抑或团体间的相互冲突,则更有可能导致去民主化。

许多混合政权在图中所处的位置颇似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南非:在政治权利方面处于较高的等次,但由于对全体公民的不同部分采取极不平等的保护(措施)而在公民自由权方面多少受到损害。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之类后社会主义政权,全都处于和南非一样的位置。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一个从社会主义时代存续下来的少数民族遭受着某种法律上的障碍之苦。不过,对于此类情形的思考则提醒我们,民主其实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尽管美国所处的等级很高,但它仍然不能为其境内的所

---

<sup>①</sup> 西太平洋岛国,旧称埃利斯群岛。——译注

有族群团体和种族团体提供平等的保护。生活在上述位于 7+7 地带的其他国家的许多公民,也不乏对于权利、协商与保护方面存在着的不平等的合理抱怨。“自由之家”的等级划分只是告诉我们,总体上说,印度政府未曾向它的公民提供比方说像芬兰和乌拉圭一样多的民主罢了。

该图的一个醒目的特点是,从 1+1(古巴)到 7+7(美国)的各个政权沿着那条点状斜线而聚集到一起。那些在政治权利方面被评定为高等级的政权,同时也趋向于在公民自由权方面居于高等级,而那些在这两方面都处于低等级的政权则类聚在一起。这其中的某些相关性或许来自于参与鉴定者所具有的“光圈效应”,亦即,倘若某一政权在公民自由权方面表现不错,则鉴定者们便极有可能在政治权利方面对其做出有利的评价。不过,总体而言,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权也确是彼此相配、结伴而行的。它们彼此加强。当一个政权实施去民主化时,其在拒绝给予某些特定的少数群体以保护的同时,也会损害对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协商的广泛性与平等性。

最后再来看一下委内瑞拉的历史,图 3.4 描绘了“自由之家”对该国自 1972 年到 2000 年这段时期的政体所做的民主等级鉴定。这段时期后几年则包括了此前我们已做过探究的委内瑞拉政权转变的一些情况。依照“自由之家”所遴选的鉴定专家们的看法,委内瑞拉从未进入到在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权方面属于图中最高等级的 7+7 这一角。但实际上,它还是前进了一大步。根据“自由之家”的等级划分,1972 年至 1976 年间,委内瑞拉的政治权利得到扩大,由该国精英所组成的两党持续运作,与之相伴的则是政治机遇结构方面出现的某种有利条件。在这一时期,佩雷斯政府受益于由欧佩克支持的(石油)价格上涨的同时,还 65 采取了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措施,并着手制定大型公共建设工程方案,对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团体做出重大让步。由此而带来了民主化的小幅进展。

(政治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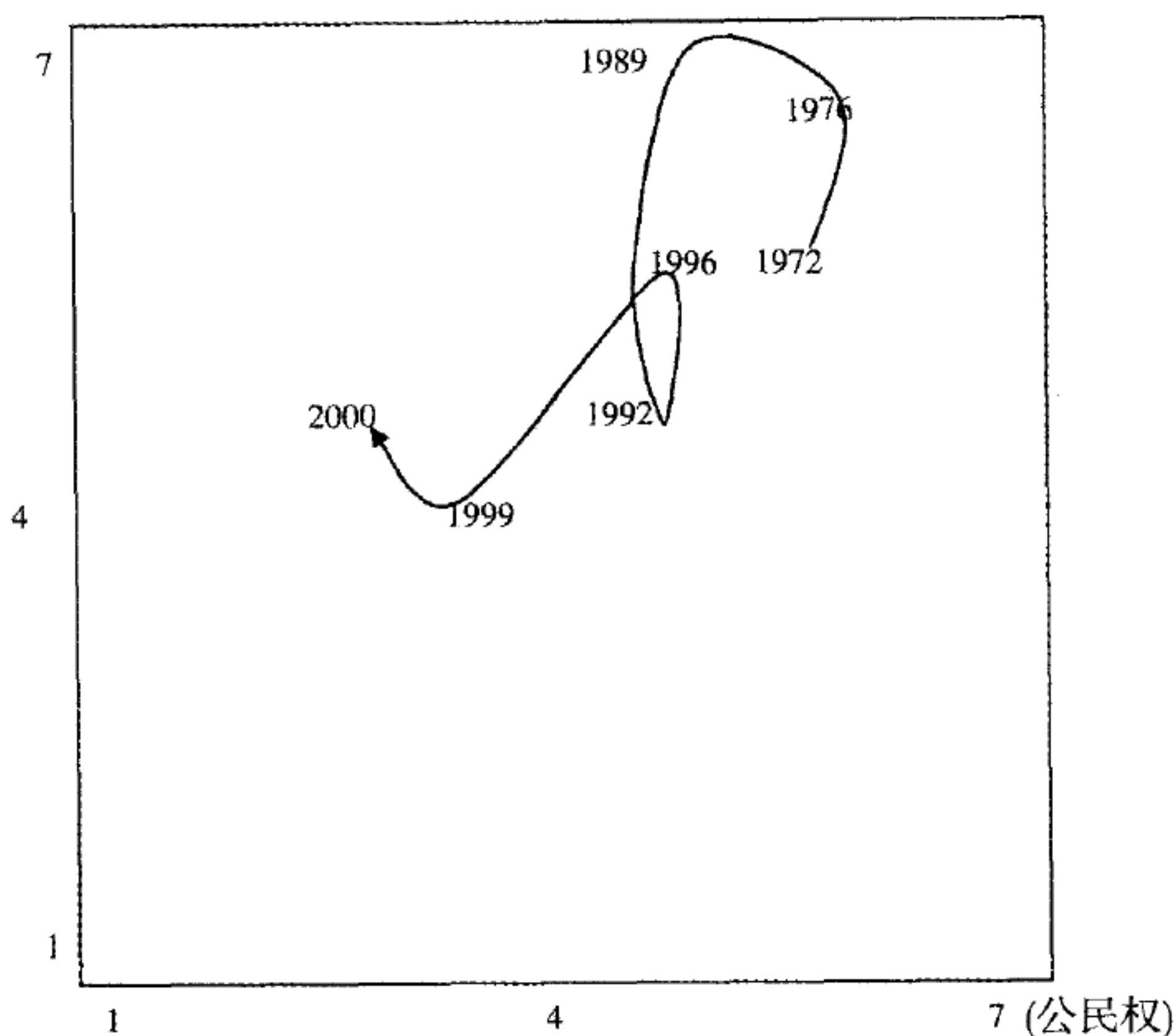


图 3.4 “自由之家”对委内瑞拉政体所做的民主等级鉴定,1972—2000

注:我们将“自由之家”所做的等级鉴定颠倒过来,他们的实际做法是从 1(高)到 7(低)。

资料来源:“自由之家”(2000)。

“自由之家”的鉴定专家们把 1976 年至 1988 年这一较长时期委内瑞拉的民主等级置于图中 7+6 的位置,这里的 7+6 指的是:公民具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但这种权利同时受到其在公民自由权方面之不均衡的损害。依照这种观点,以出现在 1984 年至 1985 年间的物价—就业危机



为标志的委内瑞拉抗争政治顶点，就像是一场针对政府行动迟缓而做出的民主反应，而不是一场针对民主制本身的威胁了。总体上说，将这一时期的委内瑞拉置于民主等级的高端，与我们关于民众抗争的叙述是一致的。

接下来便是 1989 年的那场冲击。“自由之家”的鉴定专家们对之后委内瑞拉在公民自由权方面的情形，做出了严厉的抨击。图 3.4 还对 1989 年至 1992 年（这一年也是查韦斯发动政变失败的一年）间，委内瑞拉在政治权利方面出现的一个急速下降时期做了明确的认定。政治权利（但不包括公民自由权）的微弱回复则出现在 1992 年至 1996 年间，66 这种回复持续到 1997 年和作为大选年的 1998 年。此后，备受冲突困扰的 1999 年，则标志着委内瑞拉民主政治达到了 2000 年恢复之前的一个低点。根据“自由之家”的看法，1999 年，尽管当年委内瑞拉在政治权利方面小幅攀升到 5，但它在公民自由权方面则下降到创纪录的低点 3（“自由之家”对 2001 年至 2004 年委内瑞拉的民主等级所做的鉴定，其结果分别是 5+3, 5+4, 5+4 和 5+4，这一鉴定结果表明，一旦查韦斯战胜其反对派，委内瑞拉的公民自由权就出现了一种适度改善的情形）。

## 政权与抗争

对于抗争政治而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如同我们在第六章将看到的那样，社会运动成为更经常地与民主化相伴而生并趋于集中发生在民主制度下的东西。何以会如此呢？这里，让我们再次回想一下民主的一些要素：范围广泛且相对平等的政治参与，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在有关政府机构全体成员、资源以及政策方面与政治参与者开展有约束力的协商，外加保护政治参与者免受政府代理人专断行为之害。广泛而平等的政治参与并不意味着其本质上就是民主的，毕竟，诸如 20 世

纪 30 年代欧洲的一些法西斯政权以及 80 年代之前的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之类的强能力的独裁政权,通常都将广泛、平等乃至强制性政治参与制度化。

不过,当广泛性和平等性与协商相结合,以选举、公民投票、民意测验、媒体讨论以及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时,它就不仅成为促使公民们组织起来以提出要求、陈述冤情的诱因,也为他们提供了如此行事的手段。有效的广泛性、平等性以及协商,还有赖于对公民免受政府专断行为之害——尤其当这种专断行为针对少数群体时——的保护。当广泛性、平等性、协商以及保护结合在同一政权中时,它们就会为社会运动的开展提供一种有利的环境。总体而言,它们所保障的是一种比相反的情形更具开放性的政治机遇结构。

广泛性、平等性、协商以及保护的全面提升即被视为民主化。大体上,弱能力的政权面临着迈向民主化的各种严重障碍。在那些政权中,政治机遇结构的开放则为军阀之类无情的机会主义者们夺取政府控制权,并使政府活动有利于其自身,提供了太多的可乘之机。强能力的政权常常会抵制去民主化,这是因为,去民主化就意味着谁现在掌控着政府,谁就必定是政治权力的享有者,而同时也必定冒着完全失去这种权力的风险。不过,一个推行民主化强能力的政权,则至少拥有提供保护以及落实有约束力的协商成果的某些手段。

当一个政权出现以下变化:政治参与的范围较为狭窄、较不平等、较少具备有约束力的协商和保护,去民主化便发生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保各种民主性质的机构会永远保持不变。那些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败绩而失去能力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在去民主化发生时变得尤为脆弱。由于在战争中落败,一些训练有素的政治强人得以夺取政府机构,甚至可以通过把他们自己与那些声名狼藉的前任相比较而赢得普遍的感召力。在走向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治统治的过程中,欧洲的许多法西斯主义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推翻了具较广泛民主性的机

构,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全都是政治强人推行去民主化的实例。

国家能力的增强会打破那些基本上是民主性的政权原有的平衡,而向混合政权发展,当战争、恐怖主义的威胁或者自然灾害为国家创造了扩大其能力的条件时,即便那些已确立的民主政权,也可能会通过扩大国家能力而使诸多针对保护性协商的保障条件被侵蚀。想一想“911”事件之后通过的允许美国政府侵犯民众隐私的有关立法,抑或英国政府在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将其权力扩大到采取措施以剥夺人们言论自由权的情形好了。去民主化可能因致命性的政变而起,像委内瑞拉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也可能是国家能力增量上升的结果。与去民主化相伴而行的,则是政治机遇结构通常会变得狭小,而抗争的整体水平则通常会在新政权克服了针对其统治而采取的抵制行动后出现下降。

以下便是我们所得出的最具概括性的要点:政权中的关系、机构、机遇、威胁以及抗争剧目,相互结合在一起而形塑着该政权之内的民众抗争形式。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深层过程则影响着该政权中的关系、机构、机遇、威胁以及抗争剧目。抗争也反作用于并重塑这一切,因此对民主化与去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唯有对抗争政治的动态分析,才会牢牢把握这种种联系。



## 第四章 抗争互动

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指出的，本书采取一种互动性的方法以展开对抗争政治的研究。我们并不仅仅只研究“抗议”、“集体行动”或者“社会运动”，而是把抗争政治当作在挑战者、其对手、利害相关的第三方、媒体以及其他更多因素之间的互动来加以分析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关注了人们在集体行动中采用的诸多形式（抗争表演和抗争剧目）、人们采取行动时所处的背景（各种不同的政权）以及那些鼓励或制约人们行动的机遇结构。我们也对一些关键的机制，包括将挑战者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居间联络、传播以及协作机制做了介绍。但我们迄今尚未成功兑现将挑战者与其他行动者联系起来的承诺，本章将着手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将从那已为许多人发现是抗争政治之中心地带的巴黎开始我们的探讨。

### 巴黎人的抗争互动

奥利弗·费里尔(Olivier Fillieule)写道，巴黎人会在任何年份里，针对几乎所有的事情：从战争、公民权和种族主义到工资、就业和工作条

件,直至邻近地区的面包师所生产的棍式面包的重量,举行抗议活动。尽管巴黎人所采用的抗争剧目来源广泛且由来已久,但街头示威(法语为 la manifestation)则是备受他们喜爱的手段。巴黎人常常(不过最常见的还是在周末)在诸如火车站前面的广场这类习成的老地点举行集会。在负责维持秩序的游行指挥者的组织下,人们在显示其组织名称或其行动目标的鲜艳旗帜引领下列队行进。游行人群常常是不断呼喊口号,穿过一条宽阔的大街而行进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目的地,那儿会有一些享有声望的演说者们要对他们发表鼓动性的演说。

70

那些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代表着某些政党、利益集团以及特定区域利益的游行者们,在参与示威的人群当中显得并不孤单。尽管大多数示威行动都是围绕着某一核心要求来组织发动的,但它们也常常引来一些示威同情者、持有同类要求者、好奇的旁观者、暂时的反对者以及其他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关注。从这些人围绕参与示威的热情与示威者内部团结而展开的互动中,一个统一的“我们”或许也就此出现了。

互动并不仅仅只发生在那些示威参与者之间。在示威活动的一旁,出现了一些同情、敌视或冷漠的旁观者。对于示威者们而言重要的是去把同情者转变为参与者、让反对者保持中立、将那些冷漠的旁观者转变成示威的同情者。警察们身着便服站在一旁,谨慎地与示威人群保持一定距离;报界和电视台的记者们则忙着拍照和采访。在游行队伍中,打头的是一些知名人士、地方官员以及政党领袖,而殿后的则是那些鲜绿色的垃圾车,它们受派来清扫那些由示威者和旁观者们留下的小册子、传单和快餐食品包装物。负责当地公共秩序的官员以及示威者针对其提出要求的政府官员则一直不曾露面,却始终知晓示威的进展。

费弗尔(Pierre Favre)(1990)的论著《示威》(*La Manifestation*),以示威活动为主题。该书描述了示威的一种互动性,其中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了示威者,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加入到示威者当中的人、示威反对者以及示威旁观者们。图 4.1 复制的是费弗尔针对一次典型的示威活动中出现

的行动者而绘制的示意图。该图将站在示威者一边的人（例如一些组织、普通的示威参与者），与那些反对示威者（比如抗议活动所针对的对象、维持秩序的军队）以及第三方（例如一些不相隶属的团体、新闻界）区分开来。对于费弗尔来说，重点在于，示威不只是一种行动，并且是一种发生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集体性互动。一般而言，这一点对于抗争政治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而这即是本章的主题。

如同在示威中出现的情形一样，其他各种抗争事件也常常将起初彼此了解很少或者一无所知的行动者聚拢到一起，而他们有时则会在其实际参与示威行动的过程中成为统一行动者：具有一种认同和一些将他们自身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并且带着一整套针对重要对象而提出的统一的要求。在如此行事之际，他们变成了集体的政治行动者（McAdam 等 2001：第十一章）。集体行动者的这一建构过程是抗争政

71 治最显著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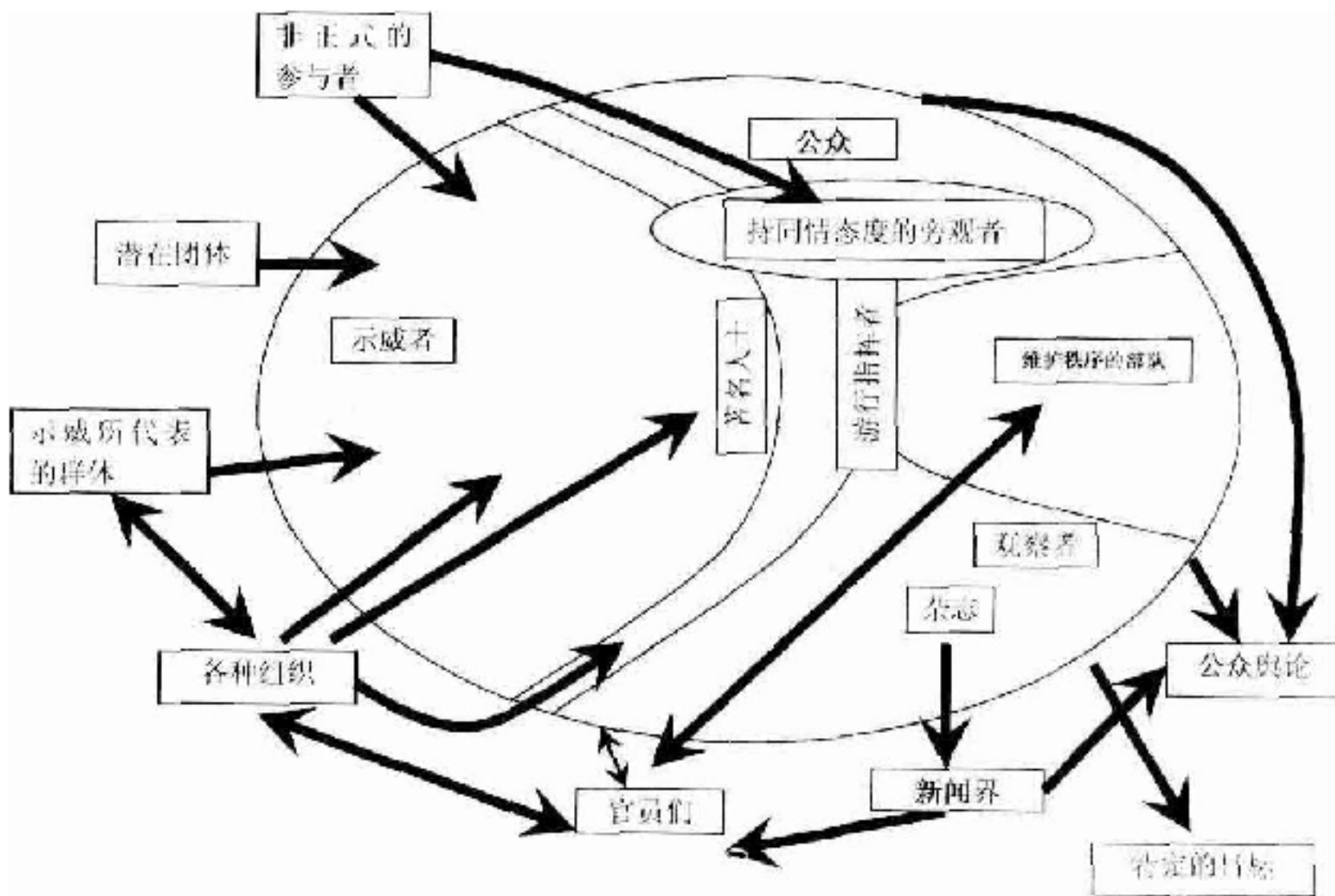


图 4.1 一次示威活动中的典型行动者

资料来源：Favre(1990:19)。



此类情形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将这个显得太大的问题分成五个较小且更易处理的问题来加以解释： 72

- 政治行动者是如何形成、变化和消失的？
- 他们是如何获取并改变其集体认同的？
- 他们与包括掌权者在内的其他政治行动者是如何进行互动的？
- 现存的制度/机构是如何推进、阻止抑或形塑所有这些过程的？
- 集体要求产生了何种结果，又是如何产生的？

本章将逐一回答这五个问题。

### 恰帕斯的政治行动者构建

1994年元旦，一个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团体因宣布了一项针对墨西哥土著人的解放计划，而使整个墨西哥为之震惊。不久，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注意力投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西班牙语缩写为EZLN)。在一位自称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的蒙面人领导下，该团体夺取了设在恰帕斯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óbal)的政府官邸。从政府官邸的阳台上，他们宣读了一份语言生动的致墨西哥人民的宣言。该宣言称，一个长期遭受苦难的民族已经经受了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剥夺，但今天我们终于要说，我们已经受够了(hoy decimos basta)！在该宣言的各不同部分中，宣言的作者们一再使用以下术语来明确他们自己的身份：

- 500年斗争(史)的产物
- 像我们一样的穷苦人

- 被当作炮灰的人
- 我们这个民族之真正缔造者的继承人
- 数百万被剥夺者
- 如墨西哥国民宪法第 39 条所描述的“人民”
-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 负责的、自由的男人和女人
- 爱国者

他们否认他们是“毒品贩子、贩毒游击队、土匪或我们的敌人可能会用来诋毁我们的任何称谓”。他们同时还明确地表示出他们对于以下

73 这些集团的反对：

- 独裁统治
- 政治警察
- 代表最为保守与反民族团体利益的一小撮叛国者
- 墨西哥联邦部队
- 以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作为其非法的最高领袖,掌握着联邦行政机构的执政党(PRI)(萨利纳斯是当时在任的墨西哥总统)

他们宣布要发动的是一场代表墨西哥穷人、被剥夺者与土著居民利益的革命,与此同时,他们号召“我们”起而反对“他们”。

这样的一场革命并未真的发生,但萨帕塔主义者很快便对墨西哥政治产生了影响。在恰帕斯州境内,他们击退了由政府军发动的威胁性镇压,并迫使国民政府开始就农民的财产权问题展开谈判。而在全国范围内,他们则发起了一场为土著人争取权利的更为普遍的运动。2001 年春,他们又发动了一场从恰帕斯这一位于墨西哥最南端的州向首都墨

西哥城进军的行动。此次进军公开要求实施地方自治法,在国际积极分子支持下的多个土著人组织的共同压力下,该法在墨西哥立法机构获得通过。

萨帕塔主义者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名声与支持者。主要由该运动在国外的支持者们经营的一些电子网站和电子邮件名录,将有关萨帕塔主义者的信息面向北美和欧洲播报。经由电子媒体的宣传联络,恰帕斯得到了远在西欧的一些积极分子、资金以及一些充满热情的团结声明的支持(Hallman 1999)。许多局外人将萨帕塔主义者的动员看成是对最近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一种抵制形式,惟其如此,他们同时也将该运动视为对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可喜的补充。1996年,萨帕塔主义者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们前来参加在萨帕塔丛林举行的“支持仁爱、反对新自由主义第一次国际会晤”。一位观察者指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墨西哥境外所引起的兴趣和产生的吸引力,是后冷战时期其他任何运动无法比拟的。”(Olesen 2005: 12)

萨帕塔主义者的认同构建并不出人意料,它建立在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社会基础之上。在像墨西哥这样有着几百个土著团体的国家里,土著人的认同几乎就不是什么新鲜观念。墨西哥的许多政治和军事英雄都出自土著人。由土著人发动的1905年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场土著农民确认其土地所有权的斗争,而恰帕斯起义的领导人以1905年革命的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来为他们的组织命名,也就毫不意外了(Womack 1971)。尽管萨帕塔的背景错综复杂,但他还是成为最著名的土著农民代表。

然而,一种认同的动员却并非自动地由其所对应的社会基础的存在而必然产生,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整个拉丁美洲就会常常发生土著人的起义了。而此类起义只是偶尔发生且常常是昙花一现的事实,则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其社会基础转向其行动者的构建上。

早在1994年,支持墨西哥土著民众的萨帕塔主义者(迄今民众仍



未实现要求)就曾要求过解放,不过,他们却也因此而从当初的近乎湮没无闻被推到了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突出地位上。他们已成为民族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成为一种得到国际认可的政治动员模式,并且成了抗争互动的经常性参与者。他们已在地方、国家以及国际舞台上创造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则将我们带到了我们所提五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上:政治行动者是如何形成、变化以及消失的?

## 政治行动者的形成、变化及消失

记住我们在第一章是如何描述政治行动者的:那些开展政府直接或间接介入其中的集体行动、提出和/或接受抗争要求且可以清晰辨认出其所属群体的人们。政治行动者包括了政府以及总统和警察这样的政府代理人,但他们同时也包括了大量非政府的行动者——从邻里小组到一些世界性组织。他们取得政治行动者的资格是经由提出要求、接受要求抑或同时兼备二者而达成的,政治行动者常常处于形成、改变与消失的状态之中。那么,这一情形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就这一问题所做的最一般性的回答相当简单:政治行动者通过动员,亦即通过增加集体性提出要求的可用资源而得以形成。他们通过参与抗争而改变,经由与动员相对的遣散而消失。当然,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此出现了,即动员、参与和遣散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的。

在第二章里,我们曾就新协作的简单过程做了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居间联络机制激活了传播机制,而这两个机制随后又共同导致了协  
75 同行动的产生。由萨帕塔运动成员充当居间联络人,将一个由土著人共同体、宗教积极分子、城市激进分子以及游击队战士集合而成的混杂联

盟,联结成一个宣称自己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统一协同行动的大规模行动者。该组织的语言、符号(象征物)及其实际做法随后在反对当时的墨西哥政府的人们当中广泛传播开来,而这个新行动者接着则在墨西哥的其他地方将其同盟者集中起来,以图更大规模地提出集体性要求。1994年以及后来的萨帕塔主义者将居间联络与传播结合起来,最终造就了一个由该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组成的,层次远远高于恰帕斯丛林的联盟(Olesen 2005; Tarrow 2005: 第七章)。

萨帕塔主义者受益于我们在第二章中简要提及的一个机制:合法性确认。合法性确认出现在某一公认的外部权威发出其准备承认并支持某一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及其所提要求的信号之时。倘若该权威具有国际影响及重要性,则其所发出的信号便传达出该权威可能会在新行动者将来提出要求时予以支持的信息。合法性确认由此而不仅改变了新行动者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改变了它与其他可能成为压制者、对手或盟友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的撤销合法性确认过程,则收回了对行动者的承认以及将来支持该行动者的承诺,与此同时,还常常威胁要采取镇压措施。)萨帕塔主义者既从墨西哥国内由来已久的土著(indigenista)传统中得到支持,也从诸多外部组织所给予的普遍的合法性确认——一些非政府组织、国外媒体甚至外国政府强烈要求墨西哥政府避免采取大屠杀行动——中赢得支持。这些外部组织能够而且的确对当时的墨西哥政府施加了压力,以迫使政府承认萨帕塔主义者且与之展开谈判。

这里还有看待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三章所提及的政治机遇结构的构成:(1)该政体内部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2)对于新行动者的开放性,(3)现行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4)挑战者获得有影响的盟友或支持者的有效性,(5)该政权压制或推进集体性提出要求的程度,(6)第1至第5条所列各项属性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政治机遇结构的种种变化,决定着动员的难易,决定着集体性

提出要求的得失，同时也决定着各种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取自可用的抗争剧目中的不同表演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以所有这些方式，政治机遇结构的种种变化影响着不同集体行动策略的吸引力。

76 机遇和威胁的种种变化形式，强烈而直接地影响着诸如萨帕塔主义者这样的行动主义团体。激进主义团体的兴起、衰落及改变，既取决于政治机遇结构，也取决于这些团体所制定方案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它们在获取来自于赞助人、盟友以及社会基础方面支持的有效性。由此而来的结果便是，政治行动者将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其他事情上，而不是在提出集体要求方面。通过持续性地开展各种活动，他们在依托现有各种资源的同时，忙于积累一些新资源，他们维系内部团结，处理内部争端，招募吸收新的追随者，为其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如此等等。即便是那些非常激进的团体，也同样毫不例外地将大量精力用于创建、维系及修复其组织上。

提出集体要求总是会在短期内耗尽可用的资源，即便从长期看它可以吸引到一些新的资源。惟其如此，政治组织者有必要在彼此时有冲突的两种行动之间加以权衡：一方面是提出集体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建立起他们投身于其中的组织，并确立该组织得以维持其存在的各种资源的途径。一些激进主义者之间的争斗常常正是围绕着行动分工的问题出现的，他们会问：我们的领导人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为他们自己敛财，把太少的时间花在推进我们的利益上了吗？与之相对的疑问则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提出要求而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招募新成员与争取财力支持上，他们已经毁了我们的激进主义团体吗？2005年发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AFL-CIO）内部的分裂，正是由这一问题引发的。

经由确认各种不同的政治行动者，你便能够对复杂的抗争事件加以澄清。你可以发现行动者介入或离开抗争行动，探查他们在提出要求方面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找寻存在于他们当中的联盟关系与裂隙，并且



看出他们从断续参与运动的行动者到既得利益集团，再到激进主义团体这一连续统一体中所处的位置，是得到了提升还是有所下降。你甚至还能够理解何以在某时间点上显得无关紧要的团体，在另一个时间点上似乎成为不可阻挡之物，而到了第三个时间点上则收缩为一个仅由其核心成员组成的小组了。政治机遇结构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常常使一些断续参与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重新回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上去，使一些既得利益集团踌躇不前，同时又使激进主义分子变成一个好战的小宗派。一种最简单的做法是，你可以将第一时间点上的主要政治行动者的名单列出，对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分歧作简单描述，再在第二个时间点上作同样的事情，然后，再试着去解释两个时间点之间所发生的一些在场、消失与重新组合的情形。

这里有一个取材于马克·贝辛格(2002)有关前苏联民族激进主义著作的简化实例。1987年至1991年间，苏联各地出现的许多按地区组织起来的民族，开始提出自治或独立的集体要求。到1992年时，其中的15个已经设法从苏联脱离出去，并且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上获得合法性确认。贝辛格在借助分析抗争事件列表以帮助对苏联解体做出解释时所做的许多事情之一，便是以图表的方式对苏联国内不同的民族成员自1987年至1991年间举行抗议示威的频率加以说明(84)。对于最积极活跃的那些民族地区而言，以下这些月份是其示威活动达到最高峰的时期：

亚美尼亚人	1988年5月
爱沙尼亚人	1988年11月
摩尔多瓦人	1989年2月
俄罗斯人	1990年1月
克里米亚鞑靼人	1990年4月
乌克兰人	1990年11月

拉脱维亚人	1990年12月
立陶宛人	1990年12月
阿塞拜疆人	1990年12月
格鲁吉亚人	1991年9月

苏联曾经将这些民族地区的类别及边界都纳入到其统治结构当中。例如,把乌克兰和立陶宛当成在语言和文化表达方面具有某种程度自治的不同统治单位来看待。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所有这些民族地区都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存在于苏联体制内。而它们也很容易地造就一些宣称其作为所有乌克兰人、所有立陶宛人以及表中所列各民族之代言人的激进主义团体。居间联络将某一特定民族内部不同的集团聚集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暂时统一的行动者。

其他的政治行动者也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俄罗斯领导人(后来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一些新兴的工业巨头、国家安全部门以及其他。不过,这一简单的时间列表本身就是对有关各民族地区脱离苏联所做的重要说明。处于苏联边缘地区的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得到其强大邻国的支持,较早且成功地采取了行动,并很快从外部获得对其要求成为独立国家的支持。随后,脱离苏联的热潮便开始了,这股热潮在1990年底达到了顶点。除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它最终被并入乌克兰)之外,主要的行动者最终都赢得了独立。

如若我们作更细致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对不同的行动者做出区分,并且开始认识出现在他们之间具有重大意义的重新结盟关系。例如,在爱沙尼亚境内,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群担心并阻止爱沙尼亚独立的俄罗斯人存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多重的结盟与分裂的情形。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独立前夕,自1987年开始,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就因卡拉巴赫(Karabakh)——地处阿塞拜疆境内但人口中亚美尼亚人占了大约

3/4——这块有争议的领土而处于暴力冲突之中（Beissinger 2002: 64—69; 342—47; 375）。1992年，新独立的亚美尼亚人入侵其边境与卡拉巴赫之间的地区，1994年的停火协议则让亚美尼亚事实上得以控制这块新占领的地区，但它的这一要求和主张却并未获得国际上的合法性确认。这就将我们带到了我们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上：行动者是如何获取并改变其集体认同的？

## 政治认同

一旦我们将视野放大到足以看到单个的抗争片段，我们就开始注意到诸如“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类的粗略类分，并没有把握住行动者的自我表达或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仅就卡拉巴赫而言，属于亚美尼亚人的激进主义者并不仅仅将自己等同于亚美尼亚人，而是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为要应对这一复杂情形，我们就需要对政治认同及其赖以建立的界限有更好的理解或认识。“我们—他们”之种种界限在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界限本身通常是一种复杂而重要的过程的结果在抗争政治之外形成，该过程我们相应地称为**界限形成**。不过，一旦有了这些界限，政治行动者们便常常将它们当成抗争政治的一部分加以利用。于是，界限激活与界限钝化机制便开始发挥作用了。

你每天都会碰到各种社会界限，你会观察到或亲身涉入那些将报贩与买报人、学生与教师、业主与雇员、病人与医生或护士区分开来的界限中。其中的每一个都确认了一种你无需费力就可以认出，如有必要的话你还可以与它进行谈判协商的社会关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种与其内部或外部的各种关系相结合的界限，总是会在界限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产生出某种有关界限的意义的共同感。工人与老板也许不会对他们之间界限的意义达成一致看法，但他们可以就共同承认的界限存



在及重要性问题进行协商。

一旦被激活,则界限的结合、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理解,就构建起了一种社会认同。从界限的一侧或另一侧看,它提供的是关于“我是谁?”“我们是谁?”“你(们)是谁?”以及“他们是谁?”这样一些问题的不同答案。我们此处所关注的政治认同,总是与一些复数形式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和“他们”相关。

认同一词的内涵可以非常隐秘,也能相当外在。在隐秘内在性的极端情形中,我们发现你把你自己看成是某个独特、复杂、隐秘而不全然为其他任何人所知的个体。而在其外在性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发现数据库里的身份资料,以及盗用他人的身份资料的实例,而陌生人需要的不过是用来确认你的一个名字和数字而已。在抗争政治中,大多数起作用的社会认同却都是处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赖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并且赋予这种关系以意义。政治认同包括各种界限、超越界限的各种关系、内在于我们与内在于他们的各种关系,以及赋予特定的界限与关系的累积意义。

各种认同以界限为中心,将我们与他们分开。在界限的一侧,人们维系着彼此的关系:X内部的各种关系与Y内部的各种关系。他们也会继续保持与界限之外的人的种种关系:一些将X与Y联系起来的关系。最后,他们还造就出关于界限、X内部与Y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X与Y之间关系的集体性理解。对这些方面的理解,处于界限一侧的人与另一侧的人通常有所不同,而它们之间也常常会相互影响。界限、超越界限的关系、界限之内的关系以及共同的理解,合起来形成了集体认同。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发生了改变,而无论是如何发生的,都会对所有其他因素产生影响。而且,集体认同的存在,例如,为我们这些“好的”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提供样板,以及将我们与那些“坏的”卡拉巴赫阿塞拜疆人区分开来——还具有塑造个人经历的作用。

认同因此而具有四个构成因素:(1)将我与你或我们与他们区分开

来的界限,(2)界限之内的一系列关系,(3)超出界限的一系列关系,(4)关于此种界限以及界限内外诸多关系的共同理解。纵观苏联历史,尽管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与卡拉巴赫阿塞拜疆人有时居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并通婚,他们却始终维持着诸多不同的日常认同。而一旦苏联解体,他们各自的认同也就被政治化了。到1992年时,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与卡拉巴赫阿塞拜疆人各自都具备了广泛的内部关系,双方都越过其间的界限而展开互相攻击,并且提出了关于其所在地区的历史以及历史所暗示的领土归属权的对立解释。

当政府参与其中时,认同就变成了政治认同。在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政府与阿塞拜疆政府都分别支持那些宣称是其同胞的民众,而否认与之相对的要求或主张。它们操纵并控制着对于这些问题,如“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可容许答案。

80

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只出现在苏联的一些偏远角落。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便激活了那道已经存在但如今则变得更为突出的界限。“我们—他们”界限将爱国者与恐怖分子及其同情者区分开来,美国政府成为界限的一方,这时美国人作为爱国者或者颠覆破坏者的身份也就变得更具政治意味了。欧洲人也围绕着相同的问题进行策划,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要做出是否与美国的军事政策保持密切合作的决定,而且涉及到就土耳其人是否属于欧洲人做出决定,对穆斯林是否总体上是处于“我们—他们”界限的相反一侧做出决定。2005年11月,一些北非穆斯林出身的年轻人在法国发起的骚乱浪潮,则进一步加深了这道界限。反恐战争、欧盟扩张以及大规模的移民入境,在激活了一些新界限的同时,也使另一些界限被钝化了。

界限发生变化与一些新界限的形成,多半是由于外在于抗争政治的一些过程——如工作的重组以及人口组成中主要部分的迁徙——一起作用的结果。大多数抗争并未制造与激活新的界限,与之相反,大多数抗争政治则激活或钝化了已有的一些界限。在认同政治中,我们随处可

以发现我们曾在第二章中介绍过的界限激活机制,在其中,一条既有的界限作为集体要求之参照点而变得更加突出。

社会阶级、族群团体、宗教信仰、邻里组织与其他类似群体之间的界限已然存在,而正是这些界限组织起了某些日常的社会生活。不过,抗争却在典型地激活了这些界限之一的同时,钝化了其他一些可能一直与抗争参与者们相关的界限。萨帕塔起义便是在激活了广泛的土著认同界限的同时,钝化了那些不安地共处于恰帕斯省内的不同族群团体间的界限(Hellman 1999)。但这种界限激活随即又令族群性开始发挥作用,并将性别、居住地点、阶级、职业之类的种种区别推到了背景的位置上。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族群之间的冲突几乎肯定会接踵而至。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在当政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所发生的惨烈战争表明,当族群性 X 与族群性 Y 开始彼此攻击,非族群性则通常会“靠边站”了。

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具有类似的效果。只要独裁者和他领导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当权,伊拉克社会内部的宗教和族群冲突基本上仍能得以控制。而一旦联合军事行动摧毁了牢牢束缚伊拉克的压迫性政权,并且启动了制宪过程,则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的认同,便不仅在制度性政治中,同时也通过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而被激活。

许多人把有关认同的一些要求主要看成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表达,甚至某种形式的自我放纵(当一些人对严肃政治感到太轻松、太迷惑又或是太压抑便会这样干)。与之相反,有关认同的要求以及与之相伴的故事,却构成了严肃政治的事务。在美国历史的各个关键点上,对于把奴隶制、禁酒运动成员、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同性恋者、越战老兵、“911”事件的幸存者、孩子患癌症的家庭以及土著人的反对者与支持者确立为政治行动者,社会运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他们被有效地动员起来并且成功地提出要求时,他们便会得到来自政府当局以及其他政



治行动者的合法性确认。通观整个美国历史,向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主义团体的转变,都对总体性的、间接的以及模式化的提出要求行动起到促进作用。

政治分析家们常常将各种认同描述得仿佛它们就是个人的本质属性,有一些学者则拒绝这种本质主义的看法。他们把认同看作是无限可塑的东西。而我们也认为认同是会改变的,就像迄至现在已经变得显而易见的情形那样。然而,有些个人却不能够像穿上一套新衣或者换个发型那样采取一种新认同;认同是经由互动而出现和动员起来的。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问题上:政治行动者是如何与包括掌权者在内的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的?

## 抗争互动

政治认同从抗争互动中获取意义;我们对政治认同提出要求。他们(不管“他们”是谁)常常会以反要求来回应:我们要求我们的权利,但政府方面却答复说,我们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权利,政府方面甚至认为,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得到认可的认同。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声称,他们拥有政治自治权,甚至具有与亚美尼亚实现合并的权利,但阿塞拜疆领导人给他们的答复是,卡拉巴赫及其全部人口属于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后来,亚美尼亚军队通过占领位于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之间的阿塞拜疆部分地区而进一步抬高要求。目前,双方仍处于1994年所达成的停火协议有关条款规定的框架下,与此同时,两国都声称对有争议的边界地带以及卡拉巴赫地区的所有权。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边境,抗争互动仍在继续。

集体要求分为三类:认同、地位与计划。如同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认同要求一般宣称有一个行动者存在,其也许在抗争事件开始之前就已

- 82 作为一个公认的行动者而存在着(比方说,土著团体便是墨西哥政治中的一个传统的类别),或者它可能是在抗争事件的进程中被构建起来的。行动者构建是抗争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McAdam 等,2001: 315—21)。

地位要求指的是行动者属于体制内一个业已确立的类别,它因此而理应享有其成员应有的一些特定的权利与尊重。萨帕塔主义者提出了许多有关其地位方面的要求,但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求则是关于他们能够作为恰帕斯地区土著人合法代表的要求(实际上,恰帕斯当地的某些土著人领袖后来对他们的这一要求提出了异议)。他们还经由否认他们是“毒品贩子、贩毒游击队、土匪或我们的敌人可能会用来攻击我们的任何称谓”,而在其地位要求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强调。

计划要求则是要求对象按一定方式采取行动。萨帕塔主义者要求墨西哥政府不仅要承认他们的身份及其作为土著居民合法代表的地位,而且要改变对土著人的政策,保护土著人的土地,保护他们免受贪婪的外来者的侵害。在其他各类抗争政治中,计划(方面的要求)所涉范围包括了如下在内的各种不同要求:

- 推翻现政府
- 支持我们的候选人参选市政委员会
- 不要修建那条经过我们邻近地区的公路
- 为我们当中的饥饿人群提供食物
- 让我们的老板付给我们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
- 消灭我们的敌人

每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一些标题都显示了一大批计划要求。比方说,2005年的新闻报道就包括了:伊拉克的一些反叛组织就反对当年1月份的议会选举投票而发出的警告;以色列定居者们针对他们被赶出

在加沙地带的定居点而发出的抗议；哥伦比亚游击队因为与右翼民兵合作而发动的对哥伦比亚农民的进攻；印度海啸受害者对一位未向他们发放食品和饮用水的官员发动的袭击；法国外来移民因为火灾毁坏了4处移民接待站而举行的抗议；一位美国伊战阵亡士兵的母亲在布什总统所在的得克萨斯州庄园外要求会见总统之举。

尽管政治行动者常常强调某种类型的要求超乎其他要求之上，但我们还是极少看到认同政治、地位政治抑或计划政治的“纯粹的”情形。萨帕塔主义者最初是通过提出简单的生存要求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事实上，在1994年元旦提出的那份精心设计的宣言中，他们就说过，“予我们以关注，因为我们是一个新行动者，我们是当真的，而存在于我们与你们之间的界限也至关重要”。不久，他们又提出了有关地位与计划方面的要求。当然，他们是通过具体地且常常是否定性地评说墨西哥的各种机构而提出其所有要求的。要求与反要求并不是随意产生的，他们是在周围的各种政权、文化及机构中形成的，它们是对政权中的机遇、威胁以及约束所做出的回应。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四个重要问题：现存的一些制度/机构如何推进、阻碍抑或形塑行动者构建、认同激活以及抗争互动的过程呢？

83

## 制度与抗争

每个政权有三种方式限制那些可能提出的要求。首先，政治机遇结构影响着何种要求是可能的。政府通过决定业已确立的政治行动者是否可能成为如萨帕塔主义者之类新政治行动者的盟友而做到这一点。倘若某个政权内部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这意味着政治机遇结构在这方面更为开放），则至少有一个权力中心会支持或确认一系列认同、地位或计划要求的机会便增多了。若政治联盟关系发生快速变化，



则某一要求之提出者就会拥有更多的机遇以加入各种联盟或逃避镇压。

其次,每个政权都把已知的一些提出要求的方式区分为法定的、得到许可的与遭到禁止的三类。某一政权的政府及其他权力当局会厉行那些法定的方式,为那些得到许可的提出要求的方式提供便利或至少不加阻止,而对那些遭禁止的方式则采取行动以实施镇压。得到控制的抗争发生在由法定的或得到许可的方式所规定的限度之内,而逾越界限的抗争则突破了这些制度界限而进入到遭禁止的或此前不为人知的地带。与墨西哥一样,几乎任何一个具有中等能力或强能力的国家,都禁止在其国内形成军阀与游击队之类拥有独立军事力量的行动者。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存在的大多数政权中,任何一个决定运用武力以提出其独立要求的团体,都很快面临着有力的镇压。在利用法定方式让人们表达要求之际,政府也引发各种(新的)要求。例如,任何让其公民组织爱国集会的政府,都可能遭遇一些鲁莽之士呼喊煽动性口号或袭击一位政治领导人以破坏集会。由于各种政权在它们容许与禁止何种形式的要求方面存在着很大区别,因此,自上而下地引发要求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第三,自下而上看,那些可用的抗争剧目强有力地限制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政权内能提出要求的种类。在社会运动成为抗争政治的标准形式之前,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去发动一场街头示威行动。尽管时下新闻媒体已经让示威变成了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熟悉的形式,但自杀式炸弹袭击,即便到了今天也还仅仅属于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恐怖主义者组成的非常小的圈子所使用的斗争手法。像示威行动一样,自杀式炸弹袭击有赖于对一整套复杂的关系和常规的共识。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出现的其他表演与剧目,甚至包括今天的车臣和哥伦比亚出现的绑架、炸弹爆炸与游击战。车臣和哥伦比亚抗争行动的参与者们了解绑架、炸弹爆炸和游击战这些常规做法,但

他们至少目前还并不了解街头示威与自杀式炸弹袭击。每套抗争剧目在任何地方都排除了绝大部分提出要求的形式，这些形式在特定背景下，从技术上说具有可操作性。抗争互动则发生在由政治机遇结构、政府控制力以及可用的抗争剧目所规定的界限之内。

政治战略家们自己并不按照政治机遇结构、政府控制力以及可用的抗争剧目来进行思考，但他们通常确实将现存的各种制度考虑进来。在任一特定的政权中，制度都包括了业已确立的、有组织的、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些常规做法、各种关系以及被反复用来引发集体行动的各种形式的组织。如果你在法国和日本这样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着手进行一场政治性的抗争互动，几乎肯定你必须要把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个立法机关、一个行政部门与一个司法机构考虑在内，而且你还要考虑到你提出要求与各政党、工会、志愿协会、经济组织、宗教群体以及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到你提出要求与竞选运动、全国性的假日、电视节目以及重大赛事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会为你所提出的抗争要求确立起某种类型的观众、机遇抑或威胁。

相反，在一个像伊朗这样的由宗教控制的政权中，潜在的提出要求者们面对的则是一种相当不同的制度环境。那儿，他们的行动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将重点放在针对复杂的宗教等级制与宗教派别分化上，而给予各种志愿者协会和工会以较少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制度/机构，它们在科威特这样的盛产石油的酋长国，前缅甸这样的军事政权以及索马里这样的四分五裂的军阀政权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起到引发抗争的作用。在对某一政权内所发生的抗争政治进行探讨时，无论是内部的抗争参与者还是置身局外的分析家们都需要具有对该政权有关制度的全盘了解。

85

认同、地位与计划要求以及对它们的合法性确认，在一个或另一个政权内部占优势的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伊朗，巴哈教徒(Baha'is)曾构建起一个相当可观的宗教少数派，1979年革

命的胜利者屠杀了一些人,将另一些人放逐,余下的人则被逼而转入地下活动。而今,伊朗的一些巴哈教徒仍然存在并且私下联络。然而,在什叶派穆斯林控制的政权体制下,由巴哈教徒积极分子组成的团体的独特认同就绝无任何机会得到承认,更不要说有机会在该政权中去确立稳固的地位或者去推进宗教改革方面的一些计划了。

在美国,认同、地位以及计划要求的制度背景显得相当不同。女权运动与民权运动支持者(部分地)取得成功,并主张制度化地承认那些被剥夺了同等对待权的被排斥人群。这一模式为那些代表着男女同性恋者的权利、印第安人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以及尚未出生的孩子们的权利之人提出认同与地位方面的要求提供了便利。它同时也推进了为改善少数民族权利而提出采取行动的计划要求。诚然,在美国,主张权利的各种计划从未完全获取成功,且常常以失败告终,而有时则会引发激烈的反要求。直到现在,有关流产权与生命权的要求仍经常处于相互冲突之中。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那些政权自动地答应某些类型的认同、地位和计划要求,而是相反,何种类型的认同、地位和计划要求成为可能,在不同政权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政权的制度背景存在着巨大区别。现在,我们可以转向第五个问题:集体要求产生了何种影响?又是如何产生的?

### 要求如何产生影响?

认同、地位以及计划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而产生其影响。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在直接影响与长期影响之间加以区别。

认同要求宣称:存在着一道界限、内在于这道界限的一系列关系、超出这条界限的一系列关系,外加某些归因于这些关系及界限的意义。抗争互动常常引发改变这些界限的企图。美国民权运动并不仅仅导致



了一波政治变化的产生，它同时还引发了黑人共同体重新评估其认同的过程。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抵制行动之后，小马丁·路德·金宣称，有关蒙哥马利市“黑人”的一种新的认同出现了。“在蒙哥马利城，我们正行进在一条新路上，我们将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Burns 1997: 244)马丁·路德·金如此说。这不过是以下的宽泛过程的第一步：主张在黑人与白人之间确立新的界限，同时创造非洲裔美国人的新认同，不同于白人所强加的旧模式。

这里的含义显而易见：民权运动不止是一场推动美国政府改变有关公交车按种族就座的法律，确立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或改善美国黑人受教育权利的努力；它同时也是美国南部黑人中形成的一种新认同的表达，是认同改变作为抗争互动后果的明显且具有重大影响的实例。

地位要求通常只对那些握有一定的合法性确认权的少量行动者产生影响。普通大众也许对某行动者要求加入某政治团体成员有想法，而个体政治家则可能会反对或支持这些要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那些属于法院、立法机构、委员会或组织的非常有限的成员，才具有给予合法性确认的有效权力，宣布 X 有要求成为 Y 的合法权利，并且宣布我们(亦即拥有合法性确认权的当局)将采取支持该要求的行动。

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数以千计自命为不同民族代言人的人，不断提出有关承认他们所代表的民族作为应享有政治自治的独特民族的要求。但其中仅有 100 个左右的民族真正得到了联合国承认其为独立国家的合法性确认。如同对国家的认可所表明的那样，成功的地位要求能够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包括在创建军队与缔结国际贷款条约之类重要问题上获得授权。

计划要求则采取了非常不同的形式。惟其如此，探寻其所产生的后果便把我们带到了从总体上对抗争政治加以分析的核心地带(Giugni, McAdam, 和 Tilly 1998, 1999; Meyer 等, 2005)。计划要求的有效性部分

地依赖于此前的认同要求与地位要求具有的有效性：它是一个有权提出此类要求的可承认的、可信的行动者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斗争便已开始了。计划要求所针对的对象能够并且愿意真正做出抗争行动者所要求的改变，抑或将抗争行动者所要求的资源让与他们吗？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方将如何对这些要求做出反应呢？这些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抗争谈判最活跃的地方。

87 请留意一下本章一直在进行的探讨。它更详尽地阐述了你们最初在第一章中遇到的有关政治行动者以及政治认同的基本描述性概念。与此同时，它也利用了所有其他一些描述性概念：政府、抗争表演、抗争剧目、社会运动、制度以及政治机遇结构。在本著的一些基本的解释性概念中，本章的论述特别利用了其中合法性确认与动员之类的机制和过程。但也让这些概念与以下这些因素联系起来：

- 抗争地点——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
- 各种条件——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与处于解体中的苏联之间的关系；
- 抗争之流——如 1994 年至 2001 年间发生在萨帕塔主义者、其国内盟友、其国际支持者以及墨西哥政府之间的互动；
- 结果——如萨帕塔主义者成功地使此前遭禁止的一种组织形式得以维持下来；
- 抗争片段——如亚美尼亚军队占领西阿塞拜疆。

本章还开始尝试性地采用机制—过程方法的若干基本步骤以解释抗争：借助那些主要的描述性概念以描述抗争地点、出现在这些地点的各种条件，辨识那些需要加以解释的抗争之流，详细说明那些值得关注的抗争之流所产生的结果，将抗争之流区分为抗争片段，抗争片段寻求那些关键的机制，重建内含这些机制的一些过程，以及（运用类比或与

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过程比较)将各种条件、机制与过程结合起来,对各种具体明细的结果进行解释。对巴黎的示威者、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处于解体中的苏联民族主义动员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围绕卡拉巴赫地区而发生的争端所做的简单概述,不过是随后一些章节将出现的更大范围的解释性工作的预演而已,但这些概述至少还是起到了让人回想起我们基本的解释性做法的作用。

两个相反的过程,动员与遣散一再显现于本章所做的分析之中。它们对于抗争政治至关重要,以至于值得对它们进行特殊的讨论,而这便是我们下一章的使命。 88



## 第五章

# 动员与遣散

我们以一段鲜为人知的抗争——一群不断遭到警察纠缠的愤怒的妓女占领了法国里昂的一座教堂——来开始本章的叙述。我们将利用这一抗争片段来描述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动员。做法是把这一过程加以拆解,以便对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机制进行探究。随后,我们将转而关注动员的机制,尤其致力于对那些将挑战者与其竞争对手、第三方以及公众联系起来的互动性机制进行探究。接着,我们会转而探讨一些更为复杂的抗争片段: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发生在意大利和危地马拉的系列抗议活动,其后关注的则是1989年之后苏联爆发的革命高潮。其间,我们将关注一个关键的过程——规模转变,正是该过程将上述这些重大的抗争事件与发生在里昂的妓女抗议行动之类的局部事件区别开来。最后,我们将探讨动员的对应物——遣散,以此来结束本章的讨论。在本章中,我们再次发现,抗争在其规模、影响力及后果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的存在,我们还是在(1)像法国里昂的抗议活动之类的简单抗争片段中,(2)像在意大利和危地马拉发生的系列抗争中,以及(3)像导致苏联倾覆那样重要的抗争浪潮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共同机制。

## 发生在里昂的一次失败的占领行动

妓女似乎是一个不可能指望通过动员而令她们卷入抗争政治的群体。从事非法营生但同时却得到一些皮条客的“保护”，她们与警察及公共权力当局由此维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而公众中的大多数则有意识地避开她们。事实上，即使妓女为着自己的要求而组织起来，她们在面 90  
对镇压和内部成员的背叛以及最终被遣散时也会显得较为脆弱。在对里昂妓女占领教堂事件进行分析时，马蒂厄(Lilian Mathieu, 2001)强调的是妓女抗议行动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性质，但他的分析同时也揭示了我们已在其他地方发现的抗争轨迹的常见模式。

1972年8月，喧闹一时的警察卷入里昂卖淫业的腐败情形曝光，法国警方遂一步步加强了对妓女的压制，关闭了妓女接客的场所——其中有些便是腐败的警官们所有的。作为回应，一小群妓女组织起一场示威游行以反对警方的这些处罚措施——对于这些措施，警方声称，它们更多地与清洗警察队伍内部的腐败有关，而不光是为着保护公共道德。依照在里昂一直受到推崇的传统做法，示威游行应当以抵达省长官邸为终点。但这群天真的妇女，在一小队显出友好的警察带领下，却被带到了警察局。随之而来的则是遭到驱散、反责以及借助媒体而加之于她们的羞辱(Mathieu 2001:110)。

由于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里昂妓女自身难以为举行公众抗议活动做好准备。首先，像其他许多不熟练的行动者们一样，她们同样遭受了经济学家曼柯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说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困扰。奥尔森认为，除了一些小群体外，大多数有自身要求的人，都更愿意让那些与要求有更大利害关系者来充当他们的代表。这种现象导致出现了一种似非而是的情形：由于缺少使人们对这些要求感到

满意所必需的动员行动，许多得到了强有力支持的要求也会一直不能实现。普通人要克服他们所遭遇的集体行动问题，就需要有强大的组织 (McCarthy and Zald 1978)、坚定的领导抑或新的机遇和威胁出现。而所有这些条件在里昂的妓女那里却是一样也不具备。

其次，许多社会行动者在投身于公众政治时，都面临着一些文化、经济与社会方面的障碍。这里，让我们想一想 1991 年海湾战争后，沙特阿拉伯的妇女们试图通过亲自驾车的方式以争取妇女驾车权而最终却未能如愿的情景好了。警察将这些妇女遣送回家，并且警告她们的丈夫，对其妻子施以更严密的控制。而妓女在法律的强烈影响下营生，她们所从事的行当常常是背着家庭和朋友进行的，而她们的生活则受到皮条客的严密控制。参与到一场公开游行或示威行动中，会让她们暴露在媒体的嘲笑、政府当局的谴责以及可能遭遇的来自妓院老板的惩罚之下。

91

不过，抗议行动失败后，当警方对里昂的性交易行当施加更大的压力时，一小群妓女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团体。她们得到了一个被约翰·麦卡锡 (John McCarthy) 和迈耶·扎德 (Mayer Zald) (1978) 称为“良心选民” (conscience constituents) 的激进天主教团体“勒尼德” (Le Nid) 的支持。约翰·麦卡锡和迈耶·扎德所谓的“良心选民”，意指那些并非要从某一团体的要求得以实现中获益，而是出于同情、团结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责任感的缘故，支持另一团体或某一事业的人们。该团体为妓女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为她们争取其行业的合法地位、为宣传其业提供帮助。受两位杰出女性不久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官员的鼓舞，她们还寻求刚刚起步的法国女权主义运动支持。由于有这些同盟力量的支持，以及受较为有利的宣传效应的刺激，里昂的妓女们开始从有节制的抗争转向逾越界限的抗争。

这一转变是逐步发生的。像许多提出要求者一样，妓女们先是通过写信的方式接近政府当局。但罗讷省长官断然拒绝了她们的请求。当她



们当中的一些人被捕入狱时,一小批妓女决定放弃制度性的斗争手段,而选择一种更具违法倾向的抗争手法——占领一座教堂(Mathieu 2001: 115)。对于一个受到鄙视却又具有竞争力的团体的成员来说,占领一座被关闭了的教堂有两个方面的好处。首先,被占的教堂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建立其内部团结关系的“自由空间”(Evans 和 Boyte 1992)。其次,使她们能表明要求而同时又不暴露身份。此一抗争表演在几年前非法移民们用来提出要求时曾在法国获得过成功。(该方式以后也许会成为法国抗争剧目的一个标准组成部分。)

不过,占领圣伊泽尔(Saint-Nizier)教堂的行动还是归于失败了。这一次,警方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先例,他们在未得到当地主教事先许可的情况下就冲进教堂,将占领者们请出教堂。一旦离开了教堂所提供的“自由空间”,遣散便急速而严酷地继之而来了。尽管她们努力隐瞒自己的身份,但还是有许多被公开了,她们与妓院老板的紧张关系加剧,而此次行动的领导人中的几位则利用她们新近获得的名声,趁机脱离了这一行当。这一抗争片段也导致羽翼未丰的女权运动出现分歧:该运动中的一些人意欲捍卫一切被剥削妇女的权利而不论她们是谁,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将卖淫视为对妇女的剥削。不久,曾经对这场占领行动起支撑和指导作用的盟友们撤下了这些占领者,转而支持更为传统的事业,而大多数妓女则重新回复到流落街头的状态。如同许多抗争片段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以热情和团结为开端的抗争行动,终以幻灭与反责而告结束(Mathieu 2001:129; Zolberg 1972)。

92

然而,占领圣伊泽尔教堂的行动却也并非全然失败。首先,该运动传播到了其他城市。随后,一次有关性交易行当从业者的权利的全国性会议,在巴黎的一家著名的会议大厅举行,妓女们得以与一位政府授命其撰写有关妓女权利问题报告的官员会晤。而真正的新奇之处则是妓女们新获得的能力,以将她们定位成被剥削者而不是社会寄生虫。妓女们由此得以稍稍改变将她们与社会其他成员分隔开来的界限。而其后

由法国及其他地方的妓女们发动的抗议行动，则都将会把她们的抗议行动构建为代表工人权利而提出要求的行动了(Jenness 1993)。

## 动员及其机制

我们以妓女抗议行动作为本章的开头，为的是强调贯穿于本著中的这样一些基本信息：抗争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周围；这些抗争事件涉及提出要求者、其盟友及其对手、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之间所发生的抗争互动；而这些抗争事件之兴起与衰落，则描绘出一条行动者之间互动相关的动员与遣散的轨迹。这样一些范围广泛的过程又分成许多构成性的机制，其中有些机制我们已经见识过。所有这些机制则有助于我们解释动员的出现，它如何转变为遣散，它如何有时又上升为重要的系列抗争，甚至革命。

占领圣伊泽尔教堂是一起简单的事件。相反，系列抗争则由许多此类事件组成，其中有些事件互相交叉，但许多事件则是就机遇和威胁出现相同变化而做出的反应。在大多数此类系列抗争中，抗争行动都以温和的方式开始，且与一些公共机构保持着互动关系。随后，抗争则导致冲突升级以及社会体系内部出现更强烈的互动；它还迅速地从动员程度较高的地区传播到动员程度较低的地区；导致在抗争形式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创新；因一些新行动者介入冲突而扩展其所关注的问题的范围；它还能够在大批行动者通过抗争互动过程而结合在一起时创造出新的认同来（Brockett 2005; Klandermans 1991; Koopmans 2004; Kriesi 等，1995; Mueller 1999; Tarrow 1989）。

迄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随着南方国家廉价劳动力供应的枯竭，意大利战后时代形成的政治—经济模式内部正日益崩塌（McAdam 等，93 2001: 第二章; Tarrow 1989）。当冷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世俗

化又使天主教的政治优势被侵蚀之际，意大利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便开始加剧了。60年代初期迅猛爆发的一股工业冲突浪潮提醒意大利政治领袖们：必须做出一些变革。通过让一些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而令其共产主义盟友们孤立地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意大利的政界领袖在一个短时期里暂时获得解脱(Ginsborg 1990: 第八章)。一些改革措施也随之而来，但每项预想的改革举措要么是招致一番保守的对抗性反应(像电力部门国有化所引发的反冲情形)，要么便是打开了朝向更大范围抗争发展的闸门(像现代工业关系法通过后所引发的抗争情形)。

当抗争终于在60年代末到来时，它让那些本来就对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心存恐惧的人深感震惊。最初的动员来自于共产党传统亚文化影响之外的社会行动者：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在校大学生中出现一些新认同颇具重要意义，因为正是这些新认同的产生，才使得最早一批抗争行动爆发，既出现在以世俗教育为主的都灵大学与比萨大学，也同样发生在作为天主教学术中心的米兰和特兰托。意识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亚文化依然力量强大，反抗者们便采用工人们所习惯的术语来建构他们的要求，但实际上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仍然不够牢固。当许多在校大学生返回家乡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那些比他们更加年轻的弟弟妹妹时，由大学生们发起的这一波抗争浪潮便扩散到了一些中学。不过，到1969年，以大学为基础的反抗行动主力已然衰落了(Tarrow 1989)。

第二波抗争浪潮甚至在第一波抗争浪潮尚未退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受学生榜样的鼓舞，同时受新的工业关系法以及因越南战争而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刺激，抗争行动扩展到了一些工厂中(Franzosi 1995)。由工人们的反抗行动酝酿而成的“火热的秋天”首先集中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大工厂。随后，抗争在一大批20世纪50年代经济奇迹时期进入工厂工作的半熟练工人中，变成了特别具有暴力性质的行动。曾经享有高



薪待遇的熟练工人和白领工人,则要求维持原有的工资差异,以此对普通工人所取得的成功做出反应。一些好战的工人采用了各种新形式的抗争,而这些新抗争形式则是各种工会从来不敢使用的。工会因急于避免被工人们的抗争行动超越,便迅速掌握了工人阶级反抗行动的控制权,并且使参与反抗行动的工人在其要求及其意识形态方面急剧转向左翼。

在意大利的系列抗争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在里昂妓女占领教堂行动中以较小规模出现的动员机制:挑战者们觉察到并抓住某些政治机遇,利用了一些组织和社会网络,并且对传统的抗争剧目进行了创新。94 他们还跨越世俗和宗教的分界线而组成一些同盟,使某些界限得以改变,同时又令一些新的集体认同得以形成。诸如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与不懈斗争党(Lotta Continua)之类新出现的组织,则试图在工人们的抗争行动与学生抗争行动之间牵线搭桥,使二者建立起相互联系。占领大学办公楼的举动模仿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类似做法,但此举同时也是对占领工厂这一意大利人传统做法的复兴。当大学生们于1968年暑假期间回到家乡时,他们便将自己提出要求的信息传达给其他人,包括那些比他们更为年轻、还在初中读书的弟弟妹妹们,而这些中学生则在随后的1969年发起他们自己的抗议行动来。

当然,学生和工人们曾以不同的方式在政治机遇结构内部展开互动。对于双方来说,精英集团中出现的分裂为抗争的发动创造了机遇。而出现在政府内部及外部的同盟力量则有助于使这两个群体确信提出的要求很可能被官方接受。置身于政府当中的社会主义政党限制了警察的镇压行动,与此同时,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则试图通过将改革建议提上议事日程而从抗争行动所导致的新形势中获益。对于学生们来说,越南战争以及围绕有关教育改革问题而展开的辩论,开启了许多机遇;而对于工人们来说,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则令他们的影响力

得以扩大。

然而，单是这些因素却并不能解释何以意大利的抗争会上升至全国性抗争，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例如，抗争何以不像里昂的占领教堂行动一样，一直停留在地方性的层面上？这里，我们所谓的“规模转变”，将有助于我们去看清存在于一起简单的抗争事件（例如，占领圣伊泽尔教堂的行动）与更具重要性的系列抗争（例如，意大利的系列抗争以及导致苏联解体的族群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差异。

## 规模转变

大多数的抗争事件都始于地方性事件。倘若某些过程未将抗争不断推进更高层次，则根本不会有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抗争浪潮出现。规模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跨越空间或社会部门去传播抗争，而且在一种比发端时期更高或更低的水平上为新的协作创造情景。向下规模转变(downward scale shift)指的是集体行动中出现的协作关系处于较其最初发生时更具地方性的水平。美国高等法院通过在密西西比州进行黑人选民登记从而在国家层面上挫败种族歧视，一些民权运动团体对此做出反应时所出现的情形(McAdam 1988)，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95

与之相反，向上规模转变(upward scale shift)则指的是集体行动中出现的协作关系较最初发生时处于一种更高的层次上（不论其是处于地方性的、全国性的还是国际性的层次）。因一场引人注目的或者成功的地方性罢工行动而引发一次总罢工，即是向上规模转变的一个常见例子。另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则是出现在中东地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行动，从黎巴嫩反叛者所采用的一种隐蔽的战术，到伊斯兰好战分子所采用的基本武器(Pedahzur 和 Perliger 2006)。而当数以千计来自地方的请愿书被呈交英国议会时，我们还可以从当年发生在英国的反奴隶制运

动中看到向上规模转变的情形。

向上规模转变是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之一。它推动抗争超越其发源地,触及一些新行动者的利益与价值观,涉及将斗争地点转移到多少有成功可能的其他地方,并且能够对其他行动者或整个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在法国 1968 年 5 月,逮捕一小批来自南特大学的学生积极分子的做法,引爆了一场重大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行动,威胁到整个法兰西共和国的稳定。第八章将为我们展示,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被一位西班牙法官指控为犯有侵犯人权罪并且有一段时间被监禁在英国,这便是规模转变从国家层次向国际层次发展的情形。

图 5.1 描述了两条主要的路径,通过这两条路径,向上规模转变能够发挥作用:一条是**直接传播路径**,它通过一些个人和团体而形成,这些个人与团体此前已有的相互联系或彼此间的相似性构成了动员的基础。另一条则是**中介传播路径**,这是一条通过中间人将那些此前也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联系起来的传播路径。我们可以在委内瑞拉看到第一条路径的例子,它出现在一群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陆军军官组织起一个秘密网络并且试图夺取政权的时候。而当克拉克森将英格兰一些地方性反奴隶制团体联系起来从而使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时,我们所看到的便是第二条路径的例子。这两个规模转变的例子都以地方性行动作为开端,而两者也都以形成更高政治层次的协作而告终(Tarrow 和 McAdam 2005)。

规模转变包含着我们在前面已碰到过的许多机制:当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发生的抗争事件时所出现的机制,即传播;以及当一些从事抗争运动宣传工作的人或者机会主义的政治家,让那些原本处于彼此孤立状态的团体形成相互联系时所出现的机制,即居间联络。还包括了仿效机制,该机制的出现是在人们模仿早期的起义者时发明的斗争方法;规模转变还可以在那些此前互不相识或彼此视若陌路的人之间造成一种相似性属性。换言之,系列抗争与革命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认同来。



向上规模转变对于抗争很重要。它可以导致新的协作关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出现。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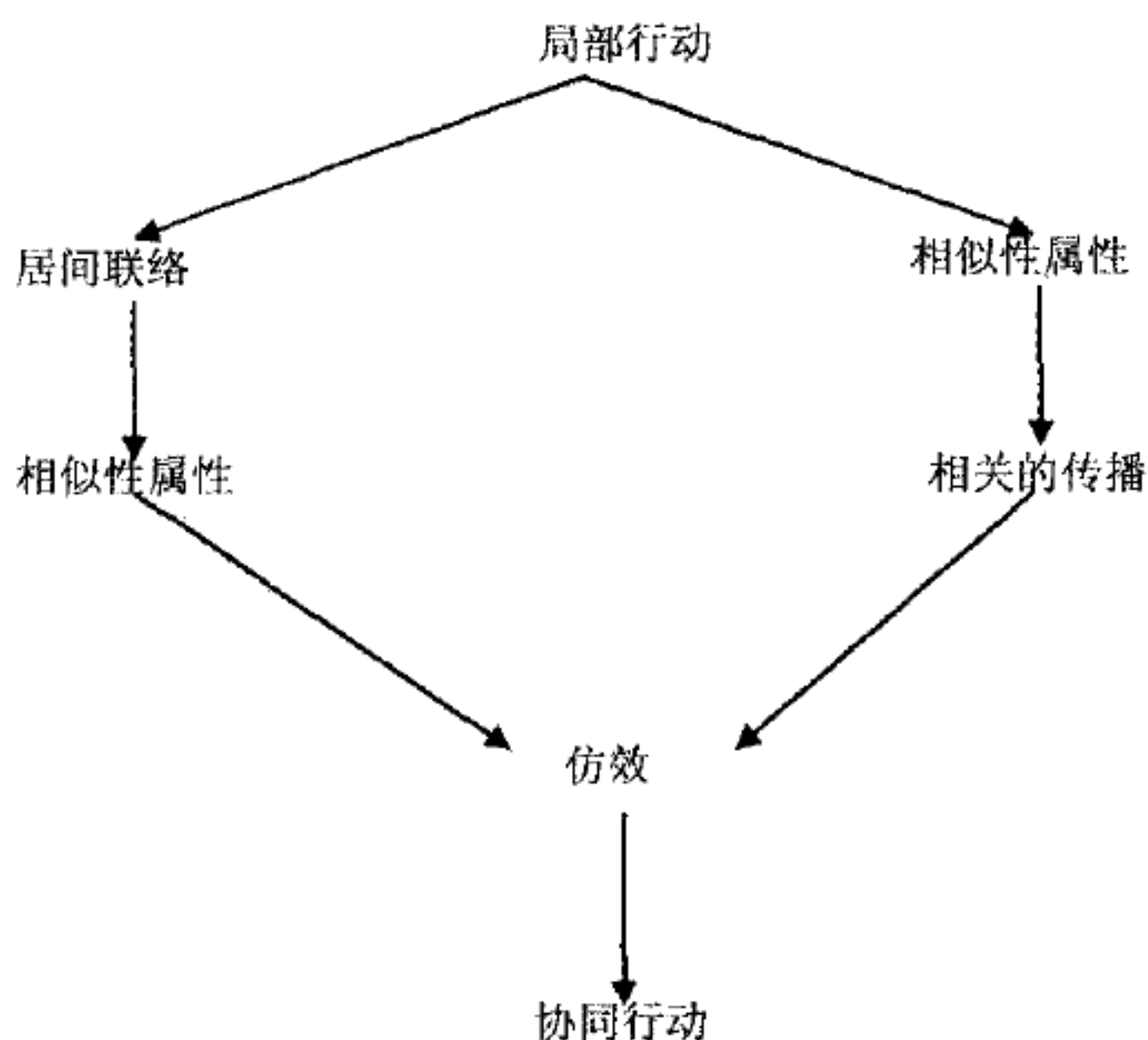


图 5.1 向上规模转变的路径选择

资料来源: Tarrow 和 McAdam (2005: 128)。

在如占领圣伊泽尔教堂之类的单个动员事件与 20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爆发的系列动员事件之间, 我们看到了一种重要区别。参与抗争的行动者们常常有意识地“四处寻找集合地点”(“venue shop”), 旨在从一个对他们更为有利的层次上寻求协作。此类做法正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简称 NAACP) 将发生在学校里的种族歧视带到高等法院时所采取的策略。在意大利, 当自发的罢工从北方的一些大工厂扩散到中部和南部意大利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工厂时, 协作便向上转变为在整个部门内以及在全国层次上的集中谈判。而当学生们的占领行动从

97 位于北部意大利的一些主要大学扩散至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一些中学时，那些参与执政的政党与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政党则拼凑出了一项新的教育改革措施来。随着警察与示威者在许多城市发生冲突，抗议者们采用了一种已在美国的类似运动中出现过的新做法，即在举行抗议示威时设置纠察以维持秩序。

发生在抗争规模上的这许多转变，使抗争得以制度化。甚至那些出现在 1967 年至 1969 年间的，具有创新性的抗争形式——占领工厂、在大学校园里静坐、在工作地点举行集会——最终都变成了常规做法。然而，某些产生于 1967 年至 1969 年抗争时期的运动组织内的发展趋势，则提升了抗争的规模并且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为了理解制度化与暴力行动之间相互混合的情形，我们这就把话题转向遣散的机制。

### 遣散的机制

纵观几十年来对社会运动所做的研究，我们对动员的条件和动力知之甚多，对抗争行动者们是如何被遣散的则知之甚少。他们是在提出要求后就散去了吗，是出于满意还是出于幻灭感呢？政府对他们采取了镇压措施还是通过拉拢手段而使之归于平静呢？抗争行动者的内部分歧导致了派系分裂与两极分化吗？遣散是如何不可避免？当斗争热情消退或者当政治机遇消失时，提出要求者们就无可避免地要放弃吗？或者，当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他们便会转向更为制度化的参与形式吗？（Piven 和 Cloward 1977）

大多数的动员过程最终都会使其本身逆转。如何使其逆转，则取决于动员的初始条件、精英阶层以及政府当局在对挑战者的要求做出回应时所选取的策略，此外，动员过程为维持团结而自带着持久性结构，

逆转还取决于它的程度如何。还记得在圣伊泽尔教堂的那些占领者们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吗？在动员她们起来的最初激情过去之后，一些人灰心丧气，回到了街头；另一些人则利用她们的经验离开了性交易行当；政府以里昂警察的形式出现，以强力驱散了这次占领行动。

在这一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导致遣散的诸多机制与过程：

- 竞争**，它出现在来源不同的支持力量——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天主教会的社会行动主义者——之间，以及主要行动者及其支持者有各不相同的目标；
- 背叛**，当某些领导人利用她们的经历作为其离开性交易行当的手段时；
- 幻灭**，当其他人——包括领导人和追随者们——对她们参与集体行动的经历感到怨恨时；
- 镇压**，既包括警察将占领者们从教堂里赶出来这样的直接镇压行动，也包括政府当局对被捕的妓女们处以罚款以求取消卖淫活动这样的间接镇压行动；
- 适度的制度化**，当政府邀请她们与负责调查有关妓女权利问题的官员会晤时。

98

我们将会看到，竞争、背叛、幻灭以及制度化在诸多抗争政治事件中，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遣散。意大利的系列抗争在20世纪70年代曾实现很高程度的规模转变，这个案例有力地阐释了上述观点。



## 意大利的遣散

有关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动员的三个事实,对于遣散至关重要,尤其与法国的“五月事件”(French Events of May)相比较时:

- 较之法国的“五月事件”,意大利五月发动得比较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导致了更大的混乱,以及更多的人员伤亡与破坏。
- 法国的“五月事件”具有这样一些间接效果:它侵蚀了法兰西共和国严密的中央集权体制,并且宣告了执政的戴高乐主义政党倒台;由意大利五月所引发的更为多变、持续时间更长的混乱无序状态,则让基督教民主党继续留在台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巨大政治变动才使得该党最终失去执政地位。
-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抗争事件最初阶段所表现出的热情、团结与乌托邦主义已所剩无几。

这一持续时间较长而政治影响较小的情形说明了什么?当塔罗将意大利的系列抗争分解为一些不同的抗争表演时,他从1966年至1974年间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抗争表演中发现了某些惊人的区别。他所揭示的大部分事件都属于**传统型**事件,它们包括了请愿、会见、罢工、游行以及示威这样一些常规性的斗争手段,其中,示威则常常采取精心设计以吸引媒体关注的方式进行(Tarrow 1989)。然而,对一段持续数年时间的意大利抗争事件的系统分析也表明,绝大多数的稀缺性事件(the large minorities of the events)是一些具有对抗性的事件,如为了限制或扰乱攻

击的目标、对象以及第三方正常生活而采取的直接行动。另一类型的稀缺性抗争事件则带有蓄意的暴力性质,如那些针对财产、要求者的反对者、政府行动者,或者第三方而发动的攻击。

(事件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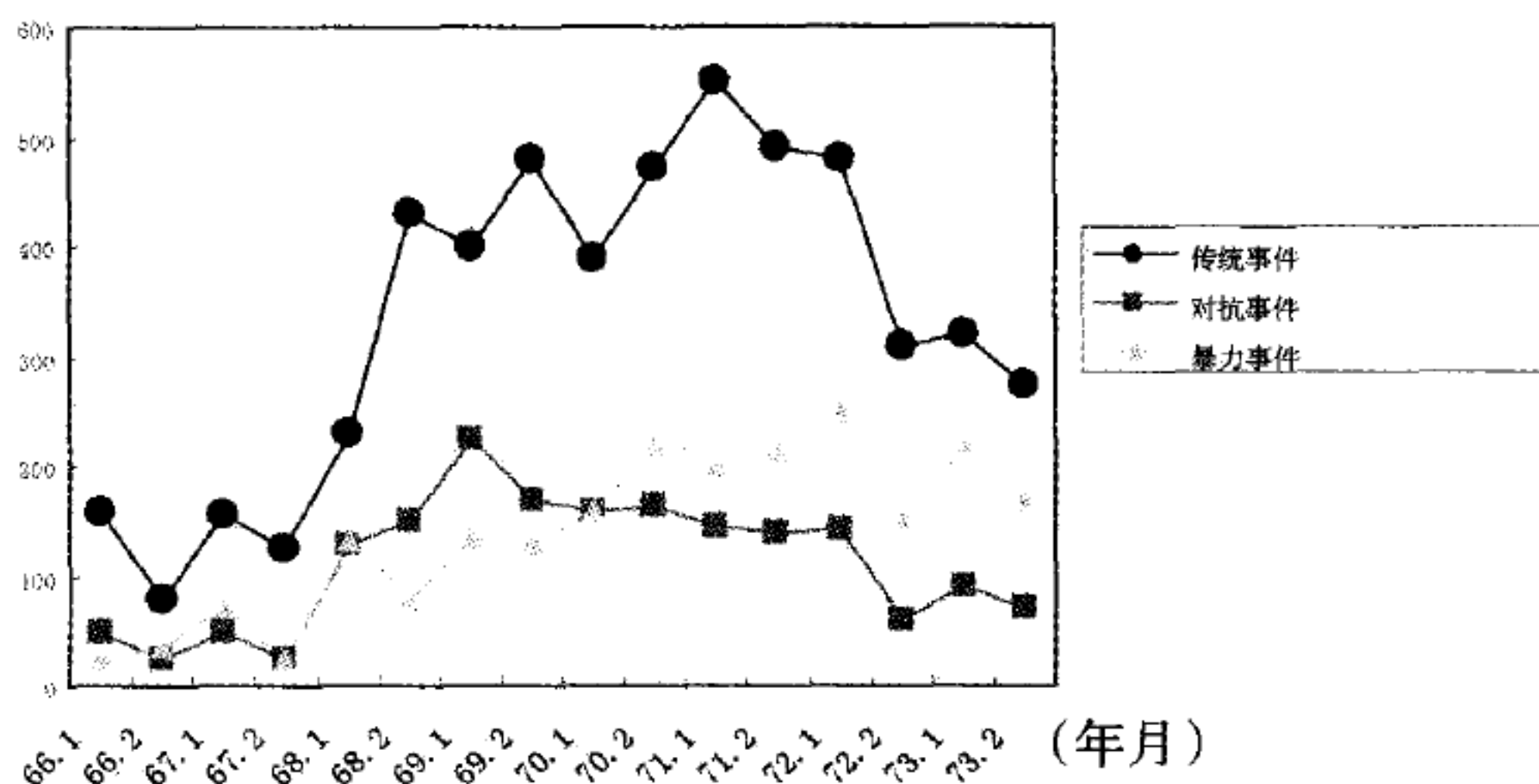


图 5.2. 意大利的抗争, 1966—1973

资料来源: Tarrow(1989: 70)。

图 5.2 描绘了在意大利出现“延展五月”(“stretched-out May”)的那些年里,三种不同形式的抗争轨迹。该图展示了所有形式的抗争的有关数据,这些数据是根据 1966 年至 1973 年间意大利一家主要报纸《晚邮报》(*the Corriere della Sera*)的报道而来的。留意一下当意大利的系列抗议活动在 1968 年至 1969 年兴起之际,是如何包括了(contained)占相对多数的破坏性事件——它们是一些具有创意的、“当着你的面”(“in your face”)的抗争表演,旨在吸引抗议者的注意,提升他们的团结意识,并以此而赢得新的追随者。典型的破坏性抗议活动是大学生们占领院系或者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这正是我们在 1975 年的里昂看到的惹眼

100 的抗争表演。在这一时期中,学生和工人们试图去构建一些新认同,组成一些松散结合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并且通过提出一些难以轻易达成协议且又不能忽视的要求,以此向政府当局发出挑战(Pizzorno 1978)。

系列抗议中的破坏性部分很快便让位于一波更传统的事件,让位于1968年出现的创新性抗争表演的常规化。传统事件在1971年的上半年达到了高峰,总计超过500次,只是在其后的两年间才急剧下降。许多这类事件都有1967年至1968年运动的后代参与其中,但他们却更加有组织、更为常规化,其目标则是要实现那些特定的、预先计划好的要求。这却激怒了此前所发生的学生运动中之更为极端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引导70年代参加运动的新成员们去组成一些超议会团体,以与制度化的左翼政党展开竞争。它同时也使右翼团体深感恼怒,这些右翼团体开始秘密组织起来,以反对他们视之为左翼的威胁。双方都激进化导致了极端左翼团体与极端右翼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

这类暴力事件的发展速度初时进展缓慢,但到1970年时,则每年都超过400次。暴力行动先是出现在与警察发生的冲突中,出现在左翼学生团体与右翼学生团体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展开的争斗中。由来自左翼的议会外团体所组织的、旨在使游行参加者遵守纪律同时抵抗反对派攻击的超议会“秩序维护服务队”(“services of order”),在左翼团体中培植了一批长于暴力行动的好战分子。由此而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以及诸如“红色旅”(the Red Brigade)之类的军事化组织(della Porta 1995)。一旦警察开始追捕他们,他们唯一可能采取的行动便是“以行动来宣传他们自己”(“the propaganda of the deed”)。到1973年,暴力事件的数量已经降下来了,却变得更具毁灭性——它们已从敌对的左右翼帮派之间的街头争斗转向了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就在极端主义团体通过使用暴力攻击和对抗以相互叫板,从而让



人们产生出公共秩序已完全瘫痪的印象之际，大多数的事件事实上却是属于传统事件：它们是那些很快便得以制度化的正常的罢工行动、集会以及示威活动。系列抗议活动的动态正在于此：满是热情的学生和工人们以具有创意却是非暴力的破坏性行动而拉开系列抗议的序幕；传统的集体行动很快便在发生频率上超越了这些破坏性行动，并且持续了更长时间。竞争、镇压以及逐步升级将运动引向了暴力对抗与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面对如此众多的暴力斗争，意大利的这一轮系列抗议行动又是如何终止的呢？答案取决于制度化斗争与暴力活动之间的互动。作为对这一难题的回应，德拉·波特(della Porta)和塔罗(1986)通过两个彼此矛盾又相互依赖的过程：**逐步升级(escalation)**与**制度化**对从动员到遣散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描述。通过把塔罗所收集的有关抗议事件的数据集与德拉·波特有关有组织暴力活动的数据结合起来，他们做出了下述解释： 101

大批突然冲上街头或冲出工厂的普通民众，不久便由于厌倦、被镇压以及对于过上一种常规生活的向往（这一点最终对大多数抗议者都会产生影响），而感到气馁。其领导者们对这种需求和热情方面的衰退情形，采取了以下两种相对的方式之一来做出回应：

- 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以有组织政治的常规做法来代替街头生活的混乱无序，辅之以群众组织和有目的的刺激手段。
- 通过逐步升级的方式：用更为极端的目标与更强劲有力的策略，来替代较为温和的目标和策略，为的是维系其支持者们的兴趣并以此吸引新的支持者。

镇压加剧了这两个过程并且使二者相互联系。镇压也加速了那些

介入不深之人的遣散，并且使那些最热情地卷入到斗争中的人陷于孤立，从而转入到一个秘密世界——那儿，暴力成了他们唯一的表达方式。

这两条彼此相对的路径相互交叉：日常政治事务不能满足一些有公共政治兴趣的人，制度化使他们感到沮丧，导致他们远离政治或者投向极端阵营。而逐步升级则吓跑了那些胆小鬼，促使他们转入制度化政治或者进入那种相对安全的个人生活状态。其结果则是**两极分化**，表现为：一度统一的运动团体其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隔阂不断加深，运动领导人之间发生分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恐怖主义。意大利的系列抗议运动终结于一阵突然发作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同时也终结于抗争的常规化。在意大利，因官方的镇压行动而导致的逐步升级与制度化，构成了遣散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除了带来幻灭与背叛，系列抗争难道就什么也没有留下吗？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批评家们，喜欢讲述有关那些后来变成政府当局支柱的前运动积极分子们的故事。然而，一些重要的系列抗争并不总是以幻灭与背叛而告终。首先，许多从这些系列抗争的“高风险激进主义”中得到鼓励的人们，后来步入更为传统的激进主义生涯中，比如像麦克亚当曾做过研究(1988)的“密西西比自由夏季”，该运动中的老手们就是如此。当麦克亚当在20世纪80年代找到他们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从民权运动转向从事妇女运动、和平激进主义以及环保主义运动了。

其次，系列抗争的主题常常给后来的运动积极分子们在其日常做法中以深刻烙印，一度属于创新性的表演变成抗争剧目之一部分即是如此。戴维·斯诺(David Snow)与罗伯特·本福德(Robert Benford)(1992)描述了诸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系列抗争中的这类“主导框架”。他们发现，这些主导框架既涵盖了现有的一些框架(比如，美国人所采用的传统的“权利框架”)，同时也给未来的运动留下了一笔遗产。因此，在美国，非裔美国人据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动员起来的权利框

架,最终则在土著美国人运动、妇女运动、男女同性恋者运动乃至为动物和未出生者争取权利的运动中重现。

### 其他的系列抗争,不同的结果

美国的系列抗争在其起始阶段与意大利的情形非常相似,都发端于体制内的冲突:如法官对非裔美国人在教育方面的要求所做的处理,或者因否决其在国会中的投票权而引发的冲突。这一次的系列抗争同样也扩展为较大范围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如若不经过重大的冲突与改革,便不能在美国当时的体制内得到处置。而且,像意大利的系列抗争一样,美国的系列抗争也以逐步升级与制度化的结合而告终。

想一想反对越南战争时期,正当其他抗争积极分子们忙于组建一些公众利益团体或者加入民主党时,“支持民主党学生协会”(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简称 SDS) 却将自身改换为“地下气象”(the Weather Underground)。再考虑一下,当以前的民权运动领导人正忙于参加美国国会议员竞选时,具有非暴力性质的民权运动的一些激进分支如何产生了“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s)与“共生解放军”(the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这样的激进组织。这里,美国的情形也与意大利相似,一些成功的挑战者们在现政权中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与此同时,运动中的一些新来者和一些任性的提出要求者则遭受了镇压。

并非所有的系列斗争都像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大利和美国的情形一样,停留在现政权之内,要么填补现有的合适位置,要么遭受镇压。在某些情况下,以系列动员作为开端的抗争,随后却不断升级而成为内战,以此来回应软弱的政府当局对抗争行动不加区别地滥施镇压(Sambanis 和 Zinn 2003)。查尔斯·布罗克特(2005)有关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抗争的研究生动地揭示了这一过程。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1974 年至 1981 年间,危地马拉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运动最终以一场较大的



农民起义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与反政府力量之间展开有组织的暴力对抗而达到顶点。图 5.3 展示了那些年发生在危地马拉的抗争的轨迹。

104 图 5.3 结合了布罗克特有关抗争的四大类型方面的数据，这四大类型分别是：罢工与学生罢课、和平示威、占领行动等非法行为以及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注意：布罗克特关于有组织暴力活动方面的记录在 1980 年这一年出现了中断，原因是，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 年间，危地马拉内战的形势使得哪怕是要搜集一些大概的数据都是不可能的。）布罗克特的数据表明，在某些条件下，那种类似于系列动员的抗争可能逐步升级为一场内战。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当一些新出现的政治认同或复活的政治认同在抗争过程中得以发展，从而导致相互结合以摧毁现政权的抗争浪潮时，甚至这些界限也会被打破。我们称这些较大的抗争浪潮为革命。而这便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发生在苏联的情景。

(行动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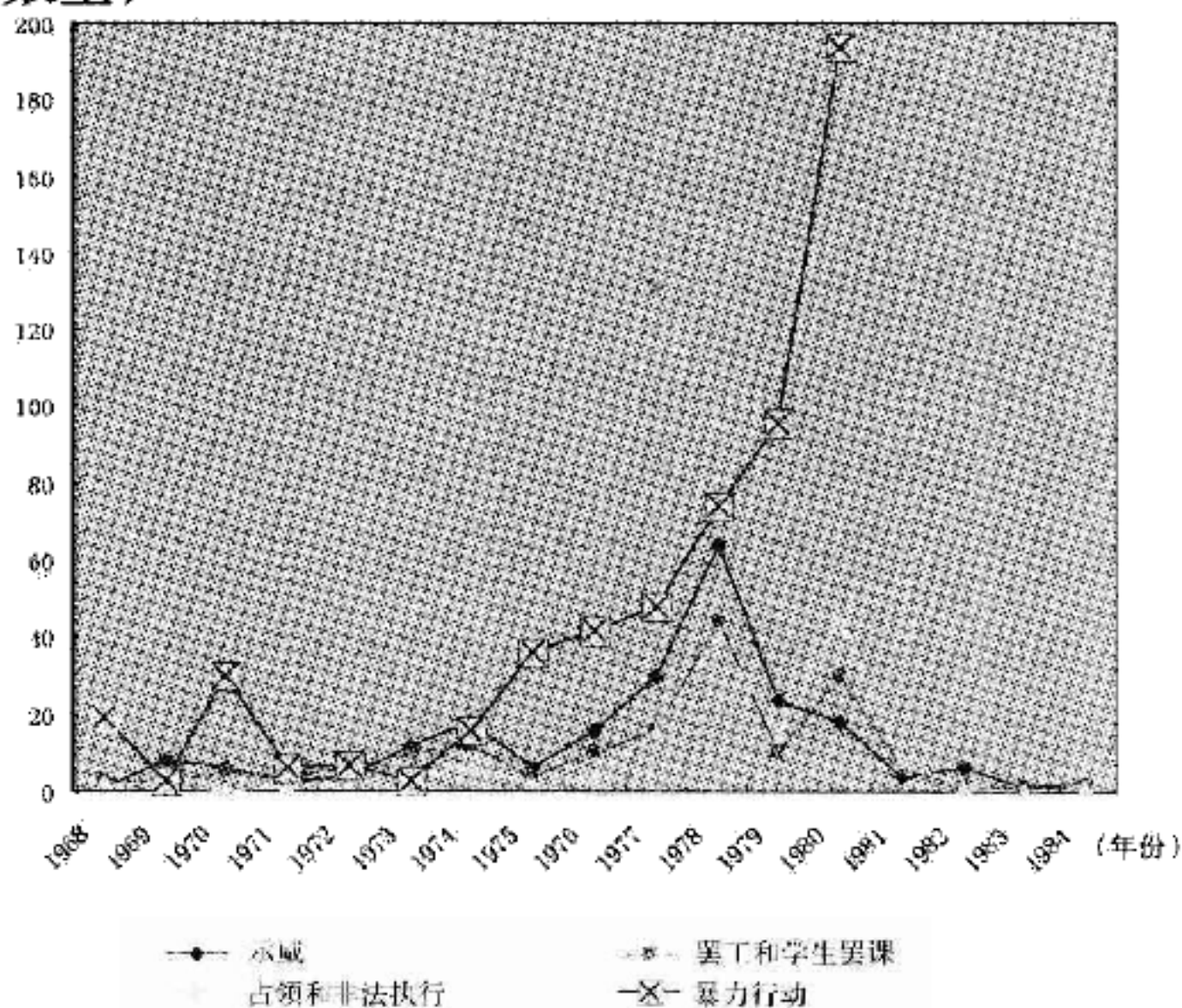


图 5.3 按年标示的不同形式的抗争政治，危地马拉，1968—1984  
资料来源：布罗克特(2005:176—83)。

## 苏联的动员与遣散

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计划,更确切地说,是两种相互竞争的政治计划。自上而下言之,统治者们坚持认为,由于他们管理着这个国家,他们便有权去决定何种民族文化将占有优势,谁来界定民族利益,以及民族利益何时应超越狭隘的地方性利益。与之相对,自下而上言之,一些特定的族群或以前曾为独立国家的领袖们则声称,因为他们构成了独特的民族,他们便理当享有政治自治甚或应当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外扩张中,俄罗斯帝国征服、吞并了许多此前独立的民族,例如,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为数众多的西伯利亚人。随着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开始,许多地方领导人都试图摆脱俄罗斯的控制。比如,芬兰就是在经历了一场内战之后而脱离俄罗斯确立起不稳定的独立国家的。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列宁和托洛茨基就已经在设法收复大部分流失的疆土了。从那时起,自上而下的苏维埃民族主义就获得了压倒优势。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巨大转变以及苏联在二战期间所付出的惊人的军事努力提供了支撑。

不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在占有压倒优势的同时,却也还存有一种有趣的差异。大致说来,苏联为每一个非俄罗斯地区指定了一个有名分的民族<sup>①</sup>。例如,在哈萨克共和国,尽管该地区的大部分人口都是非哈萨克民族,哈萨克族还是成了这儿的“共和国民族”。莫斯科的当权者们让俄语成为整个苏联的主导性语言,但他们也容许甚至推动在当地教授“共和国民族”的语言,举办有关“共和国民族”历史文化的庆典,并且将“共和国民族”中的一些有才干的成员吸收到苏联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精英队伍中。(生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就使用双语:俄语和格 105

<sup>①</sup> titular nationality, 以下译作共和国民族。——译注

鲁吉亚语,他讲俄语时带有一种格鲁吉亚口音。)地方政府与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通常都属于“共和国民族”的成员,这些人已通过他们在莫斯科的经历而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和忠诚。

苏联的民族宽容有它自身的限度。比方说,犹太人曾是最初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1917年革命之后获得了语言及文化权利,然而,作为一个“共和国民族”,他们却发现自己被放逐到了一个靠近中国边境、小而穷的共和国:比罗贝基安去了。更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犹太人看到他们的犹太教会被关闭,二战结束后甚至遭受更大的镇压。然而,遭受镇压之苦的并非仅只是犹太人。二战期间,斯大林将车臣共和国的几乎全部人口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原因是他怀疑车臣人对苏联不忠。不过,总体上说,苏维埃统治者通常是借助指定的民族认同以实现俄罗斯以外地区的统治(Garcelon 2001; Kaiser 1994; Khazanov 1995; Laitin 1998, 1999; Martin 2001; Olcott 2002; Suny 1993; Tishkov 1997, 1999, 2004)。当苏联的中央控制削弱时,这种安排便强烈地影响到当时事态的发展。

改革派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1985),开启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提出要求的运动——不只是群众示威,还包括组织具有特定目的的协会、罢工、新闻舆论界运动以及呼吁国际支持的行动。尽管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早期所提的要求主要聚焦于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但民族主义的要求很快便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俄罗斯人有时也会要求在苏联内部得到特别的认可,叶利钦最初即是作为一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掌握苏联大权的。不过,大多数的要求则集中于由苏联治下的那些带有族群标签如爱沙尼亚、亚美尼亚以及车臣之类的民族所提出的,有关承认、自治或独立的要求。

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马克·贝辛格(2002)收集了大量有关苏联自1987年至1992年间提出要求的证据。依据来源不同的各种资料,贝辛格列示出了两类事件:一类是有100人或更多人参与的公众示



威；另一类则是“群体暴力事件”，其中，15 人或更多人聚集在一起以从事人身和财产攻击(462—65)。贝辛格指出，示威与人身和财产攻击的行动在戈尔巴乔夫开始其改革计划之前的确偶尔在苏联发生过。例如，1965 年 4 月，10 万人聚集在亚美尼亚首都耶烈万，以纪念 50 年前在奥斯曼土耳其驱逐、屠杀亚美尼亚人事件中的遇难者(71)。

不过，在推行压制性政策的政权体制下，由政府当局之外的任何人发起的示威与集体暴力行动，都仍然是非常罕见的。1985 年之后的情形则全然不同了。当如爱沙尼亚和亚美尼亚这样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外支持下开始逐渐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全苏联境内诸“共和国民族”的领导人便纷纷提出自治或独立的要求。图 5.4 按月份描述了 1987 年至 1992 年发生在苏联境内的诸多变化。 106

那些以一种多半是和平性质的过程开端的抗争行动不久便变得激进化或者逐步升级了。原则上说，有可能会发生一场直截了当的系列斗争，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出现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情形那样：一个实现了地方分权的苏联可能给予一定数量的“共和国民族”部分自治，将它们归并到苏联的统治结构中，同时对那些较难驾驭、也更具威胁性的提出要求者实施镇压，由此而回复到一个修正版本的苏维埃常规中去。有一个时期，戈尔巴乔夫的确试图这样做，但他失败了。相反，15 个民族赢得了完全独立，而其他一些共和国也获得了它们当初在苏联政权统治下从未享有过的一些权利。贝辛格所谓的“民族主义浪潮”出现了。在这一过程中，当年那个以苏联闻名的政治体消失了。

贝辛格将这一事件序列解释成由一个修正的系列政治事件所带来的后果。通常，早期的起义者要么得到了某些好处，要么便是被和平地遣散了。但那些不顾先前的失败仍坚持斗争或那些迟到的参与者们，则遭遇日益增长的抵抗，并且越来越多地提出那些激起或带来暴力对抗的要求。而倘若这些迟到者们的计划集中于政治自治或政治独立，则双方就会更经常地发生暴力对抗。因此，贝辛格所谓的“潮流”——这股

“潮流”通过我们在前面遇到过的同样的一些动员机制已然开始涌动了——产生出了一个得到重大修正的关于抗争动态的新版本，而这种抗争动态是我们在更为有节制的系列抗争中看到过的。

贝辛格所提供的证据止于 1992 年底。到那时，遣散的情形已出现在那些得到了其所寻求的自治的早期起义者中间。不过，就苏联境内发生的动员与遣散的整个故事而言，我们还必须对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爱沙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之类新独立的国家分别加以讲述才行。如我们在第一、第二章中所看到的，这些政权中的大多数在后苏联时期都开始了新的动员与遣散浪潮。发生在前“共和国民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未随着苏联的垮台而结束。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席卷苏联的巨大的动员浪潮，为后苏联大多数地区更新要求提供了模本。

107

(事件累积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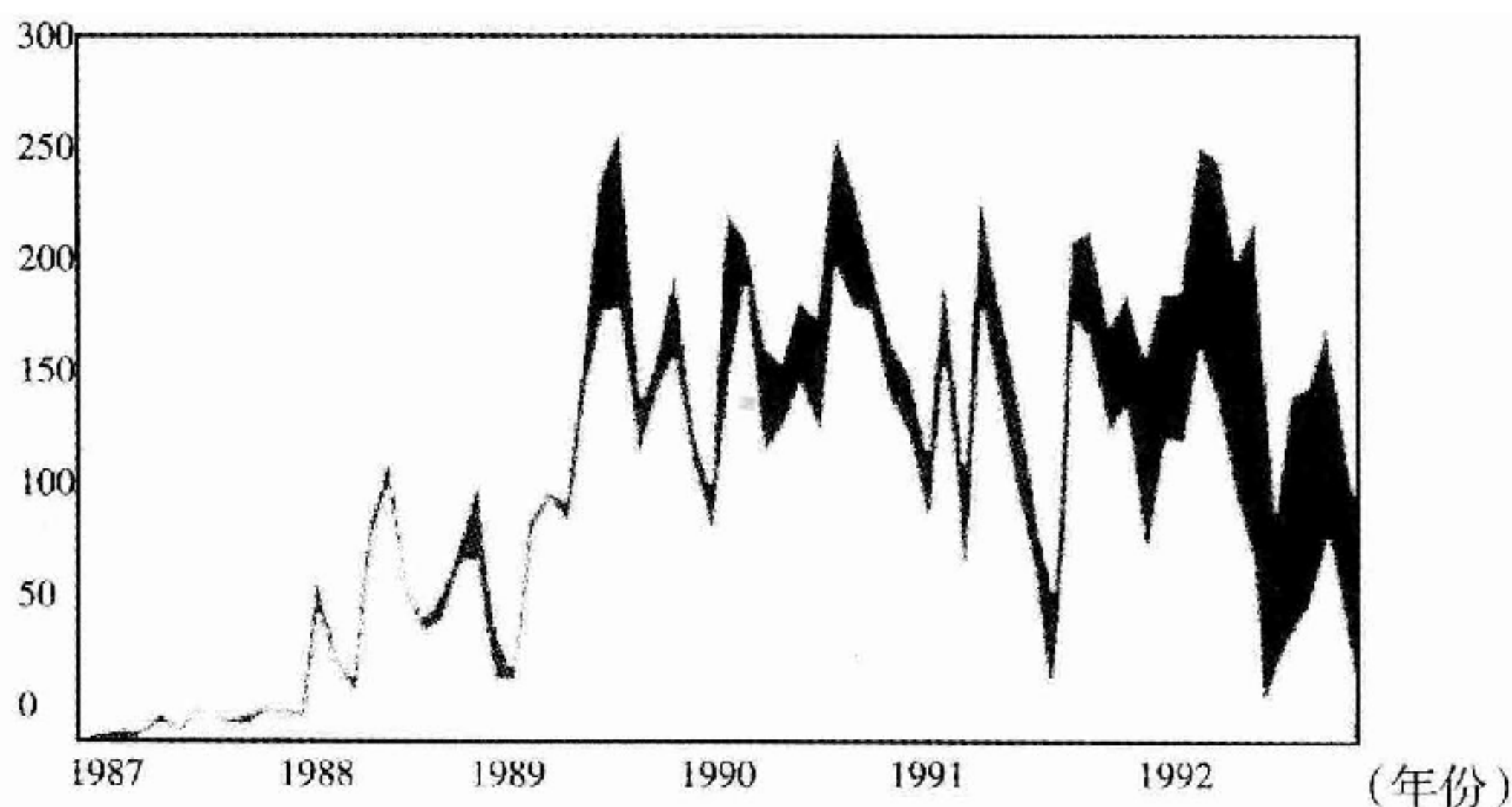


图 5.4. 发生在苏联及其后继国家中的示威与暴力事件, 1987—1992

资料来源:数据系由马克·贝辛格提供。

## 结 论

108

让我们暂时停顿一下，以便对我们在本章涉及范围广泛的案例与诸多机制作一番总结。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许多相同的机制出现在范围不断扩大、重要性不断增加的抗争事件中。诸如占领圣伊泽尔教堂之类的小事件，意大利的抗议浪潮这样的重大事件，以及苏联垮台之类的社会大变动，彼此在许多方面却颇为相似。在所有这三类事件中，人们都通过利用此前已有的网络以及发展新的网络，表达他们的要求、建立内部团结、向对手发起挑战。在所有三类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传播、居间联络以及新协作的确立。我们同样还看到了遣散与逐步升级、制度化、变节、幻灭以及镇压的结合。

不过，不要误解我们所传达的信息：实际上，它们是一些殊为不同的抗争现象。各地的精英们对于占领里昂的一座教堂，发生在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的系列抗议活动以及苏联的民族主义潮流做出了极为不同的反应。各种要求本质上存在极大差异：从里昂的性交易从业者要求不被打扰，到意大利的大多数学生和工人所提的更为宽泛但仍可协商解决的要求，再到现如今已拥有自己国家的许多前苏联民族脱离苏联的诉求。

不过，在所有这三类事件中，人们都察觉出并且抓住了各种机遇，确定并建构出自己的要求，经由动员而达成了相互间的共识，同时还建立起各种联盟关系，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在所有这三类事件中，各地的精英们以不同方式将镇压与助长结合起来以对事件做出反应。如果说这些事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终结——里昂妓女们的失败、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人们的重新整合、苏联的革命——那是因为他们各自提出要求的行动与殊为不同的政体之间发生互动的缘故。



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一发现所具有的含义。它意味着抗争轨迹中的规律性并不存在于那些标准的事件序列中——不论是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行事的事件与系列抗议，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事件；而是存在于别处。抗争轨迹中的规律性存在于那些吸纳新的行动者、清除老的行动者、改变同盟关系并让那些危险的行动者改变其行动策略的机制之中。经由确认何种机制与过程引发一个抗争事件以及它们将其带往何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某些事件转瞬即逝，而另一些事件却延时很久并最终导致一些旧政权的崩塌与新政权的建立。

109 在我们所述及的案例中，一个关键的机制组合便是那个我们称之为“向上规模转变”的过程。该过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动者从最初的抗争事件中去制造更大范围社会运动的相对能力。即便是那些简单的事件有时也会得到广泛传播，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法国其他城市的妓女很快如法炮制占领圣伊泽尔教堂的行动就行了。而我们所说的系列抗争则传播得更广。在意大利的情形中，抗争从一些主要的大学与一些大型工厂，扩散到那些地方性大学和一些中学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中较小的公司商号。

在席卷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抗争在其规模上发生了最大范围的转变：从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诸国到乌克兰和中亚地区，最后，当苏共军队中的正统分子们试图通过在首都发动政变以阻止苏维埃政权的解体时，抗争规模已扩展到了国家层面。处于苏联体制下的每个民族举行的抗议和示威活动，都威胁到其他民族的地位，由此则引发一些竞争性的、最终导致整个体系崩塌的要求。

并非所有的抗争事件都会引起如此这般的规模转变，不仅如此，在那些能够引起此种规模转变的事件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够持续到系列抗争结束之后。而那些最有可能持续下去的抗争事件，则是由于其利用了先前即已存在的各种网络或者创设一些自立自足的组织。这些网络和组织支撑着他们的要求并为他们招募到新的支持者。当这些要求包

括了一些持续进行的运动、一致的认同展示以及诸如示威和公众集会之类的手段时,它们便被说成是社会运动。第六章将对社会运动作切近而直接的考察。

110

## 第六章 社会运动

并非所有的抗争事件都构成社会运动，而所有的社会运动也并非都能够持久进行。想一想我们在第一章中对**社会运动**的定义：一场运用不断重复的行动以宣传其要求，且以维系这些活动的组织、网络、传统以及团结一致为基础的提出要求的连续运动。我们在本章中探讨的第一个事件——波兰 1956 年事件——表明，抗争能广泛传播并且对政府构成威胁，但它却不能历经镇压与组织破坏而延续下去。第二个事件——1980 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通过提出在社会运动基础与社会运动活动(social movement campaigns)之间的区别，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制度和政权的形式总是会对运动产生影响。我们的第三个事件表明，美国的妇女运动是如何与美国的一些制度/机构发生互动的。最后，我们将评述主要的运动计划结束之后社会运动中又会发生什么。

### 波兰 1956 年事件

对于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然控制着中东欧的苏联来说，1956 年这一年是一个坏年头。1953 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因这位长期把持苏



联政权的统治者离世而出现的权力真空，则由苏联共产党头目中一个不稳定的“三驾马车”填补，赫鲁晓夫是其中的一员。当赫鲁晓夫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便试图通过向斯大林主义发起攻击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对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们所做的一场引人注目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历数了斯大林的诸多罪状。为强调自己的统治会是如何不同于斯大林的做法，赫鲁晓夫倡导在苏共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推行更具多元色彩的政策。

112

在一次有非苏联的共产主义精英出席的会议上宣布斯大林所犯的“罪行”，实际上是一种向上规模转变的策略。此举所传达出的信息倘若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感受到，在苏联内部赫鲁晓夫的斯大林主义对手们，便更加难以隐匿实情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成员党，对此做出了极为不同的反应：从中共的拒绝接受与法共不安地保持沉默，到意大利共产党对多元主义所表现出的热忱，再到匈牙利所发生的一场直截了当的起义，各自态度不一。更有甚者，赫鲁晓夫的报告导致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内部出现分歧。而这种情形为中东欧国家那些软弱且处于分裂状态的反对派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提供了新的、更广泛的机遇，与此同时，也威胁到了统治这些国家的各党所具有的专制传统。

机遇和威胁结合推动着抗争政治在社会主义集团内部那些不满的人们中间迸发。悲剧性的1956年匈牙利革命引起了西方的极大关注。匈牙利是中东欧最具“自由”色彩的共产主义国家，该国一些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把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的举动当成是一次机遇，借此小心翼翼地推动匈牙利朝向更加多元化的政府体制发展。但即便是这一谨慎的举动，也被苏联视为太过而不能容忍，随即把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市中心，扑灭了改革的火花。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也加剧了波兰共产党内部改革派与斯大林主义者之间已然存在的内部冲突。而当较具自由倾向的华沙党委将斯大林的讲话不仅在波兰而且向西方散布时，党内的这种分裂不和就愈深

了(Osa 2003b: 29)。随着党内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地位发生动摇,改革派人士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扩大议会的权力,替换斯大林主义的官员,并且让改革派共产党人哥穆尔卡(Wladislaw Gomulka)恢复了原职。哥穆尔卡不久便出现在党书记的位置上。波兰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为不同政见者团体提供了契机——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机遇来临的案例。奥萨(Maryjane Osa)总结道(2003b):“简言之,波兰的去斯大林化为政治动员创造了一个契机。”(29—30)。

局部地区的抗争行动在当年的6月爆发。一群来自波兹南市赛格尔斯基(Cygielski)工厂的工人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华沙,就他们的工作条件向当局提出抗议。当代表团在华沙遭遇官方的搪塞,而警察则在他们返回时对他们施以拘留时,愤怒的工友们组织了一场向波兹南市中心的游行进军。随着其他的工人、学生以及当地的市民加入到他们的游行队伍中,继之而起的便是与政府当局的冲突。当一些示威者偷偷弄来武器并且发动了对波兹南市共产党总部的突然袭击时,当局即派出军队。波兰1956年的抗议事件并未取得比匈牙利起义更大的成功。113 面对着政府当局的镇压,兼又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支撑,波兰的这次斗争行动在迅速兴起后又迅速归于失败。尽管它唤起了波兰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一些希望,但它缺少持续性社会运动的基础。

奥萨关于波兰反对派网络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在对紧靠1956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所做的考察中,她仅能确认3个组织在她所谓的“反对派范围”中出现过(2003b: 45—47)。1956年,受赫鲁晓夫提倡多元主义以及波兰共产党内部发生分歧的激励,天主教徒、知识分子、激进的年轻人以及世俗的左翼改革派们开始组织起来。1956年至1957年的诸多事件使波兰一些独立团体的活动范围扩大了5倍,不仅如此,这些事件使积极开展活动的组织在数量上得以增加的同时,也让它们相互建立起新的联系。但处于冷战形势下的波兰,如此严密的组织网络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遣散很快便开始了。

作为对 1956 年至 1957 年间反对派团体蓬勃发展的反应，共产党当局采取了镇压与改革相结合的应对办法：一方面对波兹南的工人实行镇压；另一方面则在党内进行改革(Osa 2003b: 38—39)。到 1960 年时，波兰人已经回复到那种对苏联不友善同时却又保持沉默的反对派立场——这一状态正是 1956 年之前的突出特点(Osa 2003b: 55)。如同民间幽默所言：“我们假装去工作，而他们则假装付给我们工资。”迨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多数随 1956 年事件而创设的组织都已经从奥萨所描绘的网络图中消失了。没有任何持续性社会运动作为对 1956 年事件的反应最终得以形成。

### 社会运动基础与社会运动活动

本章专门探讨社会运动，那么为何我们以回顾一场未能引发持续性运动的抗议浪潮开头呢？有关波兰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做出反应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首先，它表明，在专制政府中，即便斗争得到了广泛传播，社会运动依然难以形成。这种情形在该政权被削弱以及斗争出现了新基础时，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它还表明了，甚至在专制体制中，政治机遇是如何从抗争政治与制度性政治间的互动中产生的。居统治地位的政党内部出现的冲突及推行改革的做法，既导致了抗争的发生，也引出了诸多新形式的组织，而这些反过来又导致该政权在内部做出勉强改革，同时对其敌人施以镇压。

第三，尽管有其独特的性质，1956 年的波兰事件还是展示出许多我们在第五章中曾经目睹其发挥作用的动员与遣散机制：对机遇到来做出反应，对不同的抗争手法进行创新，以及动员过程中的激进化。但这 114



一机制的组合尚不足以催生社会运动。

为何不足以催生社会运动呢？在本章中，我们将回到第一章曾引介过的一个区分，它会帮助我们理解不仅发生在波兰，而且出现在任何地方的社会运动的动态，那便是存在于社会运动基础与社会运动活动间的区别。

- **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展。
- **社会运动活动**则是针对当权者的持续挑战。这一挑战行动是以当权者治下民众的名义，借助共同公开展示其价值所在、其团结一致、其人数及其献身于抗争的决心，采用诸如公众集会、示威、请愿及新闻发布之类手段而展开的。

一些学者用**社会运动**这一术语来涵括存在于抗争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大多数或所有交叉的部分，而不问其是发生在政治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在日常用法中，它常常被用来描述所有出现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变化，包括那些发生在科学、思想与文化方面的运动（Frickel 和 Gross 2005）。但为达到解释的目的，将**社会运动**这一术语扩大到包括大多数或所有的抗争政治，则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如此宽泛的定义使得系统比较各种不同类型的抗争变得难以操作。为对抗争政治做出恰当的描述和解释，我们就必须在发现革命、军事政变、农民起义、工业冲突以及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之前，对它们各自的特殊性质加以辨识和确认。

其次，如此宽泛的定义，使得研究不同形式的抗争之间的转换与过渡难以进行。如果我们把“社会运动”这个总括性的标签笼统地加于一次孤立的抗议活动与一场社会运动，则不可能对导致二者的各种条件



加以确定了。相反,只有从对各种运动的概念所划定的清晰界限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像 1956 年波兰事件这样的一些抗争事件何以不能产生持久的运动。

第三,如此宽泛的定义遮蔽了存在于抗争政治赖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与发动抗争政治的实际行动之间的区别。尽管在社会运动基础的形成与一场实际运动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持续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总体上的相关性,但从社会运动基础过渡到社会运动活动却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以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各种机制与过程的触发和启动作为前提条件。 115

还记得作为本书开头的英国反奴隶制运动吗?那场运动建立的基础,范围变化涉及从主张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贵格会教徒,到为反奴隶制事业进行宣传的地方性报纸,再到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制造业城镇以及一些有影响的精英人士与议会成员。但该运动也有赖于克拉克森所写的那篇关于奴隶制的文章,有赖于他献身于废除奴隶制的决定,以及他与贵格会信徒之间建立起的密切联系。它还有赖于运动参与者、其所针对的对象以及有影响的第三方的互动。

当社会运动基础告诉我们一场社会运动何时可能发生时,社会运动活动则意味着提出要求的行动得以具体地展开。我们就社会运动基础与社会运动活动之间所做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对形成社会运动或引发社会运动活动的各种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传统加以分类;它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何以 1980 年的波兰斗争——不像 1956 年的斗争——能引发成功的社会运动。

### 从波兹南到团结工会

1980 年夏,位于波罗的海地区格但斯克港的列宁造船厂爆发了一

次罢工。像历次发生的罢工行动一样,这次罢工主要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与其他斗争事件类似,这次罢工也逐步升级为一场有关工人们组织独立工会权利的冲突(Laba 1991)。它还引起了我们所熟悉的镇压与妥协相结合的应对策略,自1956年以来,波兰政府当局一直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结合着镇压与妥协的做法,以和工人对峙以及分化、镇压工人。不过,与那些多半是地方性的事件不同,这次罢工行动迅速地蔓延到全国各地,罢工还使得政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致使政府承认工人们的自由组织工会权,并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中东欧的终结。

1980年的团结工会罢工与此前发生在波兰的一些抗争事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不同之处。首先,它得到了该国最据权威性的机构——天主教会——给予的合法性确认。罢工领袖们在波兰民族的/天主教的遗产与工人们的具体要求之间建立起一种清晰而明确的联系。罢工组织者不仅让波兰出身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适时造访波兰,还自觉地将天主教的信条与有关工人权利方面的要求糅合在一起  
116 (Kubik 1994)。

其次,罢工行动迅速传播使得提出要求的行动从格但斯克向外发展,随之出现了一种全国性层次的向上规模转变。列宁造船厂的这次罢工不仅扩散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一些工厂,还蔓延至全国各地的一些工业中心,并被传播到该国为数众多的农民中间。事实上,当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投票赞成接受工厂管理方案时,那些来自该厂以外的厂际委员会的代表们则说服工人们要坚持自己的要求。快速的传播与以罢工中心为核心的罢工参与者之间团结网络的形成,迅速地将冲突规模提升到全国性斗争的层次。

第三,当局对1980年罢工的镇压较之1956年的更为有节制。波兰当局采取了常见的妥协做法与典型的分化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策略。然而,令波兰在苏联的那些“兄弟”盟友们大为失望的是,波兰领导人只是采取了有限的镇压措施。这不仅是因为罢工行动使得波兰社会的许

多不同部门包括一些国家机构顿时陷于瘫痪，同时也因为波兰与西方银行家之间日益增加的紧密联系。政府当局担心，派坦克去镇压罢工者可能会导致政府在西方人那里失去信用。

而尤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团结工会的成功源于 1956 年之后的一些年里反对派的范围，亦即其社会运动基础的扩大。自 1956 年事件之后，反对派的范围已变得更加紧密、更为多样，也更加集中——独立的团体更广泛地分布，其中有一些关键的“节点”位于中心地带。这些团体并未发动格但斯克罢工，也没有将这次罢工传播到其他工业中心。它们当中的许多团体都打着“建立公民社会”的旗号，明确否认其存有攻击政府的意愿(Ost 1990)，而此举则有助于保护它们免受当局的镇压。不过，到了 1980 年，这些团体却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传播罢工消息、给予罢工行动以合法性确认并使罢工规模上升到全国层面，以回应格但斯克的罢工。图 6.1 复制了奥萨(2003a)的研究成果，用图示的方式展示了 1980 年团结工会罢工时期波兰所存在的范围广泛的反对派网络。

请不要试图记住出现在图 6.1 当中的这些团体，而是要利用该图去看看，即便仍处于专制政权统治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但到 1980 年时，波兰的许多反对派团体及其所建立的网络已经变得多么紧密了。奥萨所绘制的一份始自 1956 年的相应图表(此处没有予以复制)显示，这些团体在当时只有很少的关系网络，其紧密程度也远逊于 1980 年时的情形。而她所绘制的 1980 年的示意图则表明，当“团结工会”运动于 1980 年正式登场时，它却能够与一个由各种团体和组织形成的紧密社会网络建立起相互的联系。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社会网络在引发集体行动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 (Diani 1995; Diani 和 McAdam 2003; 117 McAdam 2003)。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像法国巴黎 1848 年革命(Gould 1995)、20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的环境运动(Diani 1995)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美国(McAdam 1988, 1999)，社会网络已被证明是社会运动的



至关重要的构成因素 (building blocks)。如果说, 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罢工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那么, 这多半是因为在其间的一些年里, 一个由诸多反对派团体组成的范围广泛的网络, 为罢工领袖们提供了一个罢工行动赖以建立的社会运动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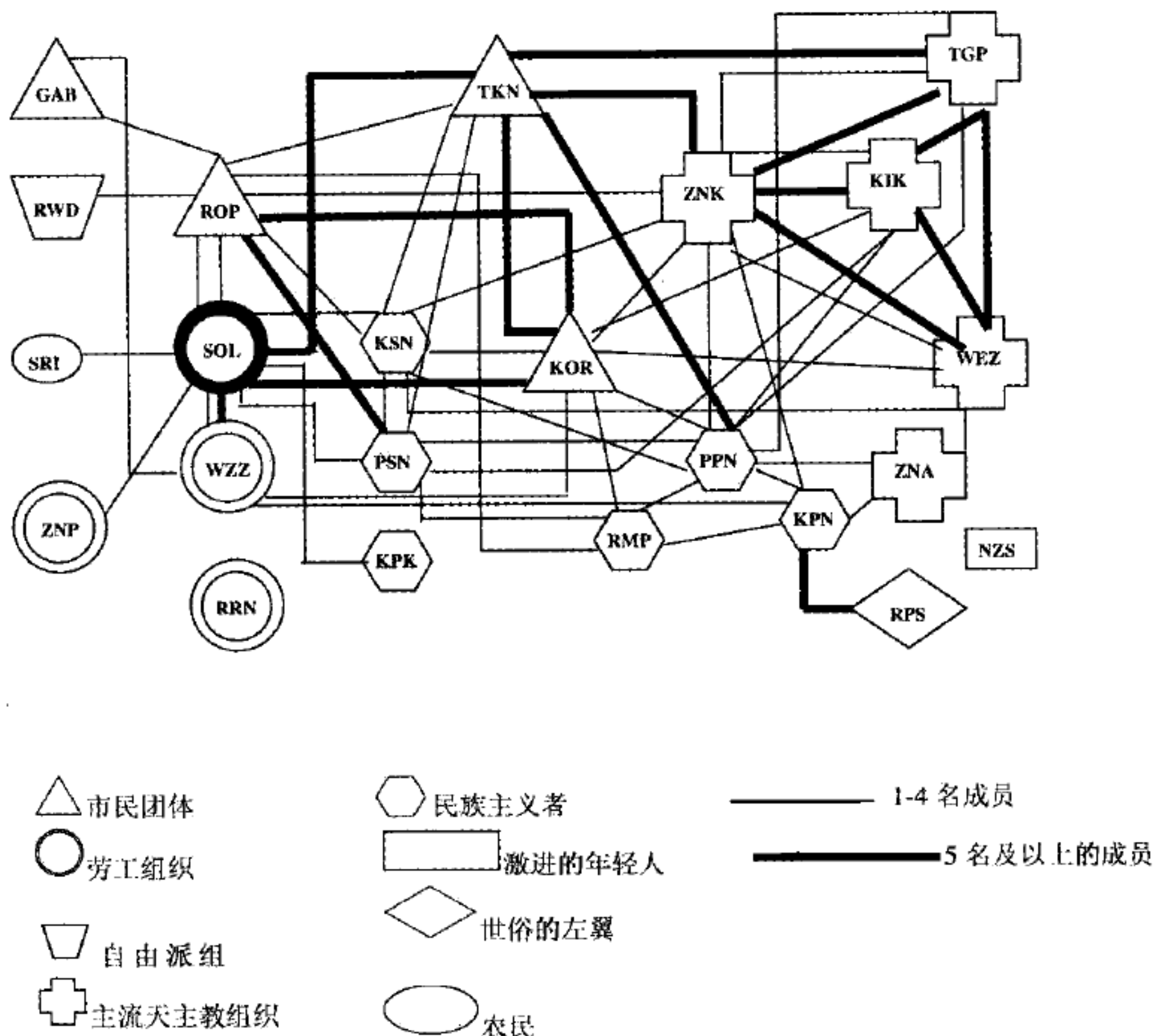


图 6.1. 1980 年时波兰的反对派网络

资料来源: 奥萨 (2003a: 99)。

些工人团体和农民团体已归属于反对派网络。这就让反对派在生产战线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从而对共产党所掌握的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主要部门构成了威胁。其次，一个名为“工人保卫委员会”(KOR)的市民团体在该网络中占有核心地位，该团体通过居间联络而与其他一些市民团体、工人、民族主义者以及主流的天主教派建立了密切联系(Bernhard 1993)。第三，自 1956 年以来的一些年里，尤其是继 60 年代天主教会在波兰举行“大祷告”(Great Novena)仪式之后(Osa 2003b: 第二章)，一个紧密的天主教组织网络已形成，我们可以从图 6.1 的右上边看到该网络的组成情况。在具有浓厚天主教色彩的波兰，这些教会团体的出现，有助于在存在众多保守成分的波兰社会中赋予反对派以合法性确认。

当政府当局于 1981 年宣布实施戒严法并逮捕团结工会领导人时，1980 年爆发的这场罢工运动所具有的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基础已变得清晰可见了。与 1956 年之后的情形不同，反对派团体被迫转入地下，却并未消失。甚至在遭到严厉镇压后，处于地下斗争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们，仍然能够利用邮政系统来传播他们的信息。不仅如此，反对派网络还在不断扩大(Osa 2003b: 163—65)。到 1989 年，团结工会已经强大到足以发动一场新的罢工浪潮，并在一次全国大选中挫败执政党，从而使波兰步入后共产党时代。

一场社会运动活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波兰发生了，这场斗争集中了许多我们所熟悉的机制与过程：

- 社会利用(Social appropriation)：“团结工会”是以波兰最具合法性且最为强有力的机构——天主教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 罢工组织者通过与天主教信条保持一致以及采用纪念过去斗争事件中殉难者的方式，而赋予他们所组织的斗争运动以合法性确认。
- 随着其他一些自 1956 年至 1957 年斗争失败之后成长起来的组

织开始参与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局部冲突中时,他们所组织的运动得到了传播并且实现了向上规模转变。

但这些机制同样也出现在许多我们此前已研究过的抗争事件中,而这些事件我们却认为它们并不属于社会运动。是什么使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变成了一次社会运动活动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社会运动活动是如何发动的。

## 社会运动活动

社会运动是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抗争政治。当它在 1750 年之后的西方逐步形成之际,是由三个因素具有创造性的、因果相继的合成而来,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具体的活动、各种形式的协会与行动以及公开的自我表现。在我们转向社会运动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范例——美国的新妇女运动——之前,让我们通过波兰团结工会的例子,先就一些术语的特定含义作明确界定并结合实例加以说明。

### 社会运动活动

**社会运动活动**是一种公开努力,针对政府当局持续性的、有组织的提出要求。与从前的请愿、发表宣言或者举行群众集会不同,社会运动活动范围超出了任何一次单独的事件——尽管社会运动常常也涉及请愿、发表宣言或者举行群众集会。一场社会运动活动总是将至少三方,即一群自我指定的要求者、某些被要求的对象以及某种特定的人群联系起来。这些要求可能针对的是政府官员,而作为当事方的“政府当局”则可能还包括了财产拥有者、宗教界的官员,以及其他一些其行动(或



不作为)对许多人的福祉产生重要影响者在内。

尽管一些狂热者日夜献身于社会运动,但大部分参与者却不断活跃在公开提出要求与如维系社会运动活动之类的日常组织工作之间。团结工会试图为波兰工人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是一场社会运动活动,其核心是格但斯克的罢工委员会,但它同时也与全国各地的罢工行动展开了协作;它还试图通过“工人保卫委员会”及其他一些团体去影响舆论,并且利用了天主教会这一巨大的文化势力。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利用。

### 公开的自我表现

120

运动参与者们代表他们自己和/或其支持者,就其所具有的价值、其内部的团结一致、其成员数及其献身于斗争事业的决心,作一致的公开表现。例如:

- 价值**:庄重的举止;整洁的服饰;教士、显要人物以及带着孩子的母亲们的在场,抑或通过身着军队制服或扛着某一职业所使用的工具以展示其战斗性标志。
- 团结一致**:相同的徽章、头饰、旗帜或节日服装;列队游行;歌唱与不断地呼喊口号;以及利用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色彩以作为团结的象征。
- 人数**:点名、在请愿书上签名、来自于支持者方面的消息、布满许多街道的人群。
- 献身精神**:勇敢面对恶劣天气;老年人和残疾人参与其中;抵抗来自当局的镇压;夸耀式的牺牲行动、捐赠和/或布施慈善。

在波兰团结工会罢工者的自我表达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因素是他

们对以前遭到镇压的罢工中“殉难工人”的认同。团结工会运动的象征——一群彼此支撑、举着一面旗帜的人们的剪影——反映了工人们一致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与广大民众的密切联系。通过与天主教信仰的联系而得到合法性确认,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占领工厂的行动甫一开始,当地的主教们便立即通过与当地的党组织书记进行谈判而达成了一项协议:牧师们可以在工厂大门外做弥撒,而基督教信仰的一些象征物则持续出现在媒体可以录下的地方。

### 协会的与行动的剧目

社会运动利用了下列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动组合:创建具有特定目的的协会和同盟,公开集会,庄严的列队游行,警戒,群众集会,示威,有组织的请愿活动,向大众传媒发表声明或在大众传媒上发表声明,出版小册子。我们将这一系列总体数目并不确定的抗争表演称之为**社会运动剧目**。

社会运动剧目源自于一般性的抗争剧目。但它在**表演模式**方面,与我们以前曾遇到过的大多数形式的集体行动不同,即由各种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围绕着极为不同的目标,利用相同形式的集体行动以反对同样的行动者。随着运动围绕范围广泛的各种要求而得以展开,他们便精心设计出各种形式的行动来,这些行动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被用来反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反对任何一类雇主的罢工行动;代表各种不同要求的请愿行动;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 (Favre 1990; Fillieule 1997; Grimsted 1998; Kinealy 2003; Pigenet 和 Tartakowsky 2003; Tartakowsky 121 1997, 2004)。

团结工会运动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利用了工人阶级起义中诸如罢工和占领工厂之类的传统斗争工具。但他们也发起了游行、示威、宗教性的列队游行以及许多起支持作用的活动,如让罢工者的家庭成员和朋

友为工厂送来食物等。罢工委员会、党的官员以及工厂管理人员围坐在列宁造船厂的一张桌子前举行会谈,最终达成了两件事:工会得到了合法性确认;而这就标志着工会、工厂管理层以及来自官方的行动者具有平等的地位。尽管前后相隔有8年时间,但1980年的会谈却预示着1988年至1989年那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圆桌”谈判的出现——正是这些谈判活动,最终使团结工会得以上台执政。圆桌会议的形式随之传遍整个中东欧。1989年,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一个接一个地通过谈判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活动、公开的自我表现以及各种协会或政治行动中所采用的抗争剧目,在不同的社会运动中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各种社会运动还是与这三个特点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来看一下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废奴主义者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形式多样的反对奴隶主、反对公共权力当局的运动。他们从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福音派宗教复兴运动中汲取斗争经验,利用各种形式的协会及公众行动展现他们投身其中的反奴隶制运动具有的正义性、统一性、坚定性及其数量众多的特点(Young 2006)。该运动与制度性政治之间时有间歇性的互动。迄至19世纪50年代,许多具有废奴倾向的运动参加者已纷纷加入到主流政党之中,并成为国会议员。随后,其中的一个支派则汇入到了“自由土壤”运动中。与一些出身于老辉格党以及脱党的民主党人一起,组成了共和党。1860年,由共和党推举的一位不太出名的改革派人士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波兰,我们同样看到了从一场运动转变成一个政党的类似情形。就在戒严法于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持续实施之际,团结工会领导人(其中许多人仍被关在狱中)即已开始重塑自己的角色,从产业工人的代表转换为政党领袖。当政者被迫于1989年举行多次意义重大的选举时,团结工会便作为在议会两院同时拥有多数的政党出现在波兰议会中。这一转变使团结工会运动由此而与各种机构形成了密切联系。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是一场导致了专制政权向民主化政权转变的社会运动。政权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对运动本身具有瓦解性的作用,导致运动积极分子当中的工联主义者与政治家的分裂。而且,这一政权变化,也导致了政治家群体内部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天主教平民论者之间的分裂。很可能最终会有一些新的运动取而代之,并由此表明存在于民主体制与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共生关系。下一节我们将转向美国的“新”妇女运动,以此探究在一个民主政权中,社会运动基础、政治机构以及抗争政治之间出现的互动。

## 美国新妇女运动

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妇女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许多变化,不过,并非所有变化都构成了“妇女运动”的一部分。例如:

- 就业方面的变化让更多的妇女成为职工总数中的一员。
- 公众在有关妇女地位上的态度逐步取得进展。
- 立法机关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妇女的法律,这部分是因为国会议员们希望得到妇女们的选票。
- 各种女权主义哲学与女权主义学派得到了发展,构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之一。
- 一种妇女社会运动组织的网络逐步形成。

我们的社会运动概念承认这些变化的发生,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些变化与新妇女运动的形成尤其与其基础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不过,如同我们刚刚作过研究的波兰案例一样,我们必须将妇女政治行动在基础方面的变化,与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发展起来的重要的社



会运动活动区分开来。

尽管最初的妇女运动早在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中即已出现 (Banaszak 1996), 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里以及二战后初期, 妇女运动却一直基本处于休眠状态 (Rupp Taylor 1987)。20 世纪 60 年代为妇女运动在可用资源和机遇方面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该基础部分是源于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们带来的“外溢效果”(Evans 1979; McAdam 1988; Meyer 和 Whittier 1994), 部分来自一些独立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当然, 这场新运动也从自由主义女权运动以及激进的女权运动观念中汲取营养 (Freeman 1975), 并且利用了妇女从业人数增加以及美国政治机构中出现的机遇这些有利因素。这些都构成了这场运动的部分基础。但这场新运动最终却是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活动而发动起来的, 正是这些活动将新妇女运动置于同其他群体和政府当局的斗争互动中, 它实际上还促成了一个反向运动, 即反对流产运动, 并处于与之相对立的位置上。

123

新妇女运动为我们所简述的社会运动的所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活动各种形式的协会与行动以及公开的自我表现, 提供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答案:

- 这场新运动是由诸如“平等权修正案”(ERA) 运动一类的活动组成的, 这些活动占据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初期大多数妇女的精力 (Costain 1992: 第四章; Mansbridge 1986)。
- 新运动当中的一些部分, 通过使妇女在其装束、语言、行为举止以及集体活动方面做出改变, 以寻求一种新的自我表现形式。尽管只是作为新运动当中一个分支的代表, 提高意识运动却是妇女发展新自我表现形式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工具。此类草根活动培育起“姐妹之情”, 它让那些此前一直谦恭矜持、离群索居的妇女们, 学会了为自己辩护, 而一种新的意义框架也由此产生了。

·在协会的和政治的抗争剧目方面，这场新妇女运动同样有所创新。尽管诸如“全国妇女组织”(NOW)之类的全国性团体，采取的是日趋常见的公众利益团体的形式，但像“地狱来的妇女国际恐怖主义阴谋”(WITCH)一类的团体，却将妇女们在行动中采取的常用手法拓展为一些戏剧性的行动，与此同时，一些在诸如教会或军队中就职的女权主义者，则悄无声息地组织起来，以提升妇女在其所在机构中的地位(Katzenstein 1998)。

并非所有这些创新都持续存在到新的世纪。其中的一些创新行动，逐渐融入到因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系列抗议活动而引起的抗争剧目的总体变化之中，并且随着系列抗议活动的结束而衰落了。另一些(比方说，对那些主张不戴乳罩的女权主义者作讽刺性的滑稽模仿)则从未被人们所接受。事实上，与女权运动相对的反运动正是利用了女权主义者们的剧目，来削弱女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的(Meyer 和 Staggenborg 1996)。

这场运动所导致的一个颇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是，它所取得的成就对传统主义者固化有关妇女角色的观点起到了促进作用。而这一后果则又促成了“平等权修正案”社会运动的重要实例：运动的失败，并且促成了一次强有力的反流产运动的出现(McCarthy 1987)。它还促成了存在于里根政府与第二任布什政府中的一种新形式的保守共和主义的胜利。最终，这些反向运动则促成了美国政府采取一种针对妇女、儿童与贫困人口福利的紧缩计划，从而令这场运动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大打折扣(Banaszak, Beckwith, 和 Rucht 2003)。

124 像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美国的新妇女运动提供了一个以当权者治下全体民众的名义，借助于共同公开展示其价值所在、其团结一致、其人数及其献身于抗争的决心，采用诸如公众集会、示威、请愿及新闻发布之类手段展开针对当权者的持续性挑战。不过，与波兰的“团

结工会”运动不同——那场运动在其大部分初期历史中不得不展开反对权力当局的斗争——美国的新妇女运动则是在与各种机构密切互动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 运动与制度 / 机构

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三章里所提及的制度/机构的含义好了,它们指的是:某些合法确立的、有组织的且得到广泛认可的常规、联系以及各种形式的组织,这些常规、联系以及各种形式的组织一再被用于引起任一特定政权内集体行动的发生。某些制度/机构(例如武装部队)是完全独立于抗争政治的;另一些制度/机构(例如政党以及选举活动)则对于抗争政治保持高度敏感;此外,还有一些机构(例如立法机关、法院、行政部门)则是那些既塑造抗争又对抗争做出反应的机构。

在思考社会运动的方式上,我们否认在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之间存在任何严格的界限。我们看到,抗争政治将制度/机构和社会运动包括在内。社会运动的基础既在各种制度/机构之内也在之外逐步形成。社会运动活动则在制度/机构之内或之外展开,或是针对这些制度/机构而采取对抗行动。而这些行动能够促成一些新机构的出现。更有甚者,不同的制度/机构则保护、反对或促进了社会运动活动的形成。

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之间的界限难以精确划定。就拿 20 世纪 80 年代围绕挫败里根总统的核武器政策而形成的运动联盟的例子来说吧。该联盟使一些体制性团体与体制外的一些抗议者建立起相互联系。一些诸如“冻结核武器情报交流中心”(NWFC)之类新形成的运动组织,一方面与一些合法成立的和平组织,另一方面则与国会中的一些民主党议员结成一个联盟,劝说政府通过启动一项武器控制程序而先发制人地阻止社会运动的发生(Meyer 1990)。只消看一看制度化政治与

非制度化政治之间那道形式上的界限的两侧，同时再看一看发生在界限两侧之间的互动，我们就能够理解抗争政治事件的动态了。

当然，政治机构的大部分工作，是处于抗争政治的界限之外的。比如，行政长官签署法令、出席开幕式、迎接外国显要、在白宫的草坪上点亮圣诞树；立法者们宣布纪念日的开始、发表一些用意仅在于取悦当地选民的演说以及迎接到访的童子军。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常规性的与非抗争性的。

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们也只是在部分时间里从事抗争活动。为了建立起他们的基础，在任何行动动员开始之前，一些运动组织常常忙于“共识动员”(Klandermans 1988)。为取悦于他们的成员，他们会组织一些庆祝活动和一些仪式；而为了赢得更广泛的追随者，他们还会投身于一些教育方面的活动；他们也注意与媒体交朋友，意在通过媒体宣传他们是谁、宣传他们所提要求的本质所在。图 6.2 描绘了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基础、制度/机构以及抗争政治相互交叉的情形。

不要把图 6.2 看成是我们关于抗争动态的论点的载体，相反，应当把它看成是一份通向我们所提出的那些关键术语间互动的一幅静态路线图。任何此类工具都必须让这些概念(术语)开始起作用，并提出如下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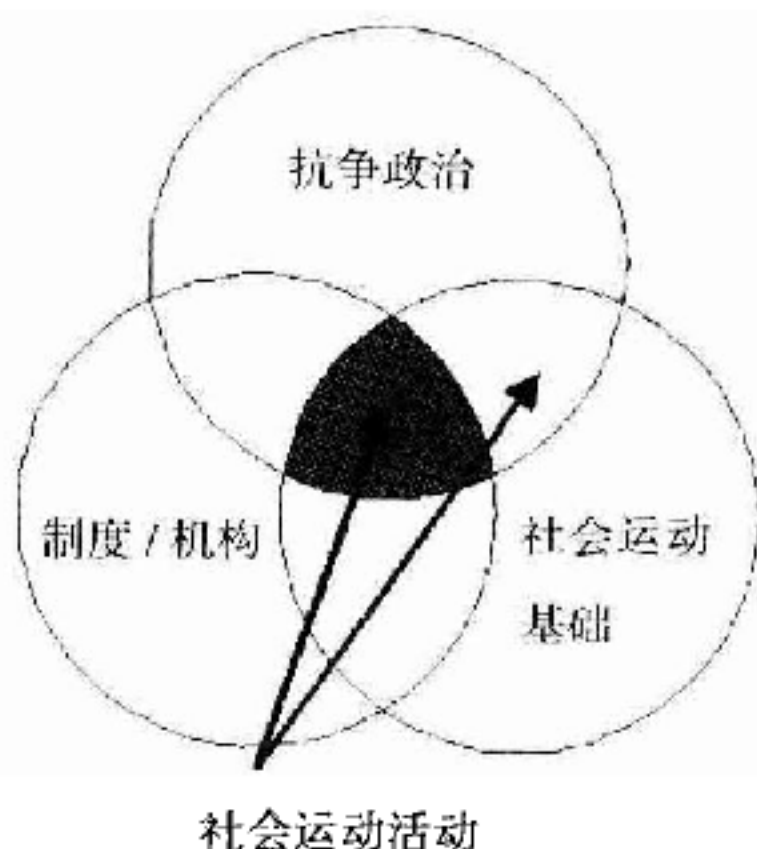


图 6.2. 抗争政治、社会运动活动、社会运动基础以及制度/机构



- 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社会运动活动因社会运动基础而产生?何种制度框架为它们提供了机遇,哪些制度框架阻止它们出现?
- 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机构行动者们通过反应、改变或分化导致或促进了社会运动活动的产生?
- 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社会运动活动引发了诸如内战、民族主义事件或革命之类对制度/机构构成威胁、形式更为多样的抗争政治?
- 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社会运动活动造就一些新的制度/机构和新社会运动基础?

从社会运动政治发端时起,政治机构就不仅为运动的发展提供机遇,或寻求对运动实行镇压的方式方法;也对运动所提的要求加以处理。还记得英国议会及其接受请愿书的做法是如何对英国反奴隶制运动起到促进作用的,乌克兰反对选举欺诈(腐败)的斗争又是如何为“橙色革命”提供聚焦点的吗?还有,美国国会有一权决定任何一个加入联邦的新州是成为奴隶州还是成为自由州,但它又是如何因为这一解决方案而实际上导致了美国内战发生的?各种制度/机构起到了为社会运动提供掩护,为社会运动活动提供聚焦点,以及充当社会运动后果之主要发生源的作用。美国的新妇女运动则以实例为我们阐明了这几点。

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将运动本身置于制度/机构之内(Katzenstein和 Mueller 1987)。最初的转折点是随着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成立“妇女地位委员会”,并将妇女权利纳入《1964年公民权法案》的做法而来的(Beckwith 2003: 193)。随后则是发布了一些行政命令,将监督工资平等与雇用时的区别对待的任务交由一些政府部门去落实;而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有利于妇女的立法活动也有了明显增加(Katzenstein 2003: 205—7)。图6.3清楚地标示出安·科斯坦(Ann Costain 1992)在其

所著《招致妇女反抗》(*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一书中关于一些立法活动的时间线索,以及与之相伴的诸如“全国妇女组织”之类主要妇女组织的活动情况。该图也表明新妇女运动与国会有关妇女问题的立法活动,大致同时出现。

(有关妇女的法案在所在法案中的百分比)

(事件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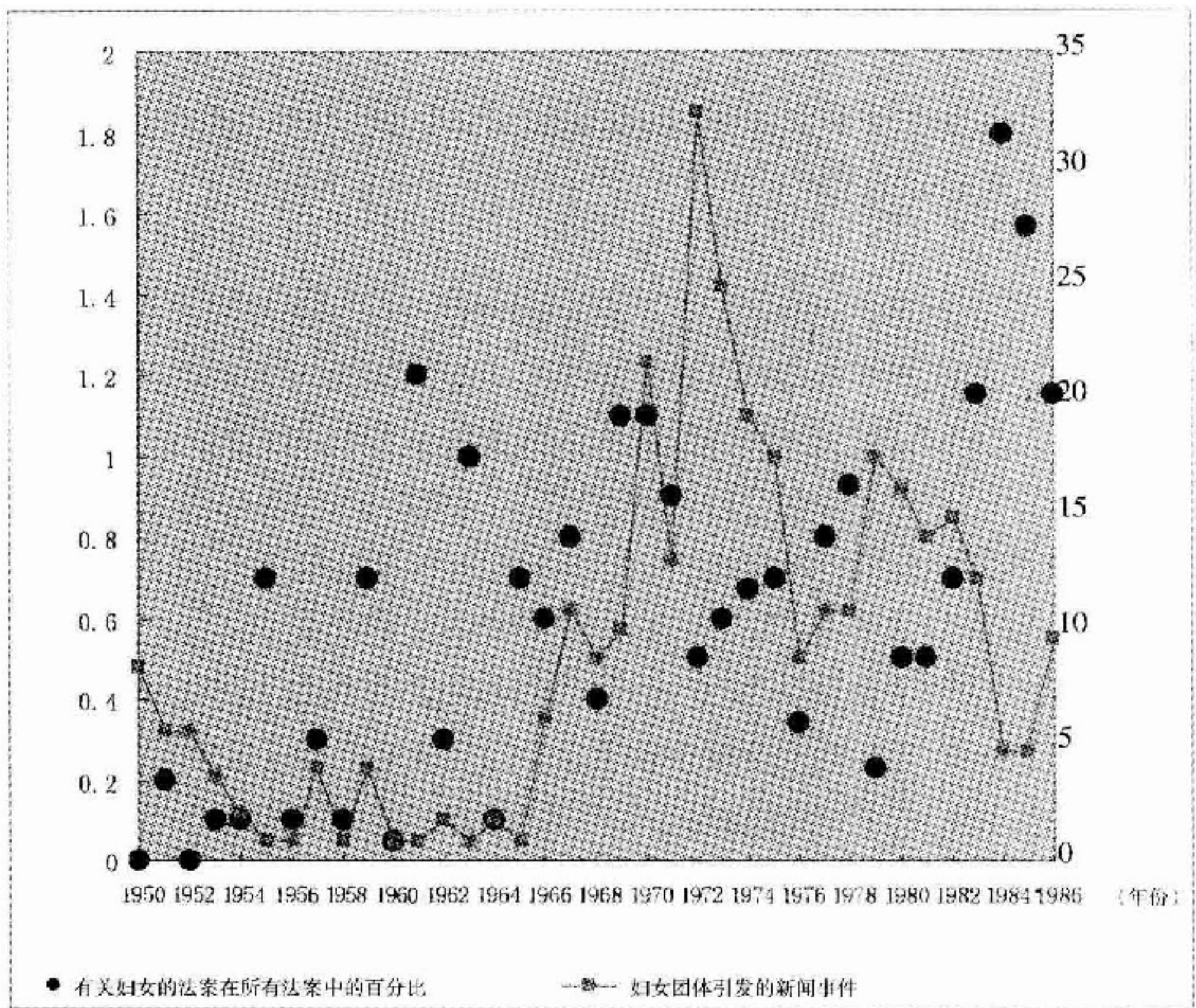


图 6.3 妇女团体引发的新闻事件以及关于妇女的法案在美国国会提出的所有法案中所占的百分比,1950—1986

资料来源:科斯坦(1992: 108, 113)。



对图 6.3 的一种解读方法可能会让人们从中看到这样的证据：国会在对特定运动的压力做出反应，即一场社会运动活动所带来的直接政策效应。但另外两种解读方法也是可能的：其一，国会或其中的大多数议员，是带着选举的动机而对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妇女运动的公众舆论做出反应的；其二，国会议员们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同时也独立地致力于他们所提出的政策目标。我们无法以图 6.3 的时间线条为基础在这 3 种不同的解读方法之间做决定。不过，“全国妇女组织”所做努力与国会立法活动之间仅有部分平行的情况表明，该运动的政策效果至少是间接性的，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的。

128

## 运动的影响

社会运动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单单随政策变化而终结。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出三种影响，且都可以从美国的妇女运动中看到：(1)社会运动活动对公共政策的直接影响；(2)参与提出要求的运动对于运动积极分子的生活造成种种影响；以及(3)在运动之外，牵涉社会运动基础之对政治抗争产生的总体影响。

如科斯坦的分析间接表明的，第一种类型——各种活动的直接影响——难以被估定。如今，大多数学者认为，政策影响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政治环境的中介作用而促成的(Meyer, Jenness, 和 Ingram 2005)，而另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观点甚至更为谨慎。皮文(Piven)和克洛沃德(Cloward)(1977)在集中针对 20 世纪 30 年代和 60 年代的 4 例抗争政治事件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社会运动很少能够获得成功，而就算它们得以成功，失败也常常随之而来。其他一些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包括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及其合作者的看法甚至更悲观。在提及美国的各种例证时，他们发现，由社会运动组织发起的集体行动，在

影响公共政策方面常常是无效的（Burstein 和 Linton 2002; Burstein 和 Sausner 2005）。

政策方面的变化对于社会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例如，税法方面的一些简单改变就能够让某个运动团体失去其所享有的免税地位。从更大范围来说，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所推行的紧缩福利开支的做法，已经给妇女们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但同时也是更具约束力的机遇结构（Banaszak 等 2003）。而这种情形反过来又令妇女们有必要重新考虑那些在前一时代为她们赢得利益的机制，如价值、团结统一、成员人数以及对运动的献身精神之类。

至于第二种类型的影响，参与运动对于运动积极分子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妇女运动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似乎一直是较为确定的。南希·惠蒂尔（Nancy Whittier 1995）对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的一些激进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所做的研究表明，尽管完全置身于公开提出要求的活动之外，但那些与运动有牵连的妇女却能够互相支持，能保持彼此之间的忠诚与责任。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社会运动处于暂停状态的那些年里，一位接受惠蒂尔访谈的妇女宣称：

既然我们可以只用一两句话来重提一下过去的某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些，我已经认识很久了。我和她们之间的交往，只能是与某个已经认识很长时间的人才有的，因此我们真的不用对其进行讨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并且，我们还拥有一种好感，是那种对那些你曾经与她们一起经历过许许多多而且你们已经相识很久的人才有的好感。

129

(112)

对于她以及像她这样的妇女来说，致力于建立社会运动基础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了。



关于第三种类型的影响,社会运动对于政治抗争未来模式的影响,美国妇女运动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确乎是有些含混。一方面,妇女运动的支持,在产生诸如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以及民主党众议院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之类杰出女性政治领导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之类“具有威胁性”的女性在政界取得成功,以及妇女运动对于流产之类有争议问题的支持,则促使美国政治走向两极化。

那种反向的运动首先是围绕着反对“平等修正案”而出现的,该修正案于80年代被挫败(Mansbridge 1986);接着则持续攻击高等法院通过判决“罗诉韦德”案使流产得以合法化。就在我们写作本书之际,2006年年初,“赞成出生权”(“prolife”)的小布什总统调整了高等法院的成员构成,又威胁到了妇女运动这一标志性成就。

## 动员之后

在社会运动活动结束后,社会运动基础又会怎样呢?以对于像美国妇女运动这样的“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为基础(Kriesi 等 1995),汉斯彼得·克里斯建构出一种有关社会运动动态的基本布局,它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图 6.4 复制的便是克里斯有关社会运动动态的基本布局分析。克里斯及其合作者所研究的 4 个群体都是自 1968 年才开始出现的;它们全都依靠一些积极分子组成的松散网络,而不是仰赖坚固的官僚政治基础。所有 4 个团体都将它们的活动集中于围绕一些明确的要求而非集中于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上。而它们也全都循着那种如我们在第五章的意大利抗争事件中所描述的周期性轨迹运行(Koopmans 2004; Kriesi 等 1995)。不过,尽管它们在起源、结构、焦点问题以及轨迹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这些社会运动组织(SMOs)却是以殊为不同的方式来

结束其抗争行动活跃时期的。

从社会运动组织的理想类型——一个利用某一政治目标以动员其支持者参与集体行动的正式组织——出发(Kriesi 1996: 153), 克里斯推演出 4 种变化过程来。

130 首先, 他把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制度化看成是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形, 这一过程我们曾在意大利的抗争事件中碰到过(参见第五章)。该过程结合了某一社会运动组织内部结构的定形、目标的温和适中、采行更为传统的行动手法以及融入到政府的既定体系当中这样一些具体环节。图 6.4 中提出的一种看法是, 制度化涉及到一种从运动支持者的直接参与向委托职业组织者来进行组织的转变。这一看法与人们所熟悉的由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962)在一个世纪前以及西奥多·洛维(Theodore Lowi 1971)在美国上一轮抗议行动后所发现的目标替换模式颇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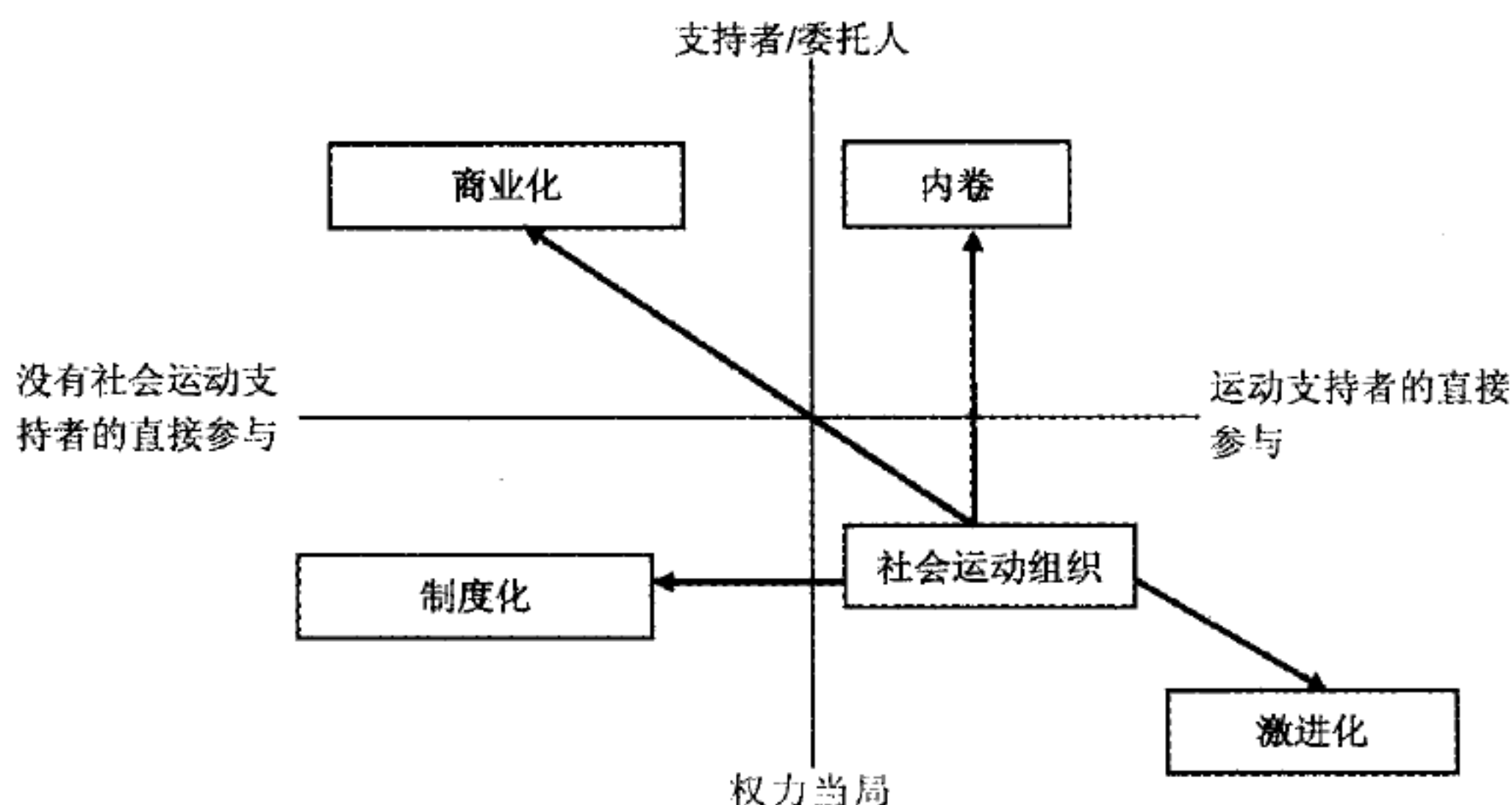


图 6.4 社会运动组织在目标选择与行动手法方面发生改变的情形  
资料来源: 克里斯(1996: 157)。

其次，克里斯看到了**商业化**亦即某一运动组织向服务性组织转变的可能。在这方面，德国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一些独立的商号与合作团体是典型代表，而当美国的一个消费者团体“消费者研究”从支持消费者的团体变成一个产品检测与产品认证的商行时，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看到这种商业化的情形(Rao 1998)。

第三，克里斯还看到了**内卷**(involution)亦即一条通向专一强调社会动机之路的可能性。那些经历了内卷的社会运动组织，变成了自助团体、志愿协会或俱乐部。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斗争中产生的许多公社，都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到重视发展个人与宗教方面教养的内卷过程。

131

克里斯所提到的第四个变量是“激进化”，或曰“重新恢复生机的动员”。这一过程，我们在 1968 年之后意大利集体性暴力活动的逐步升级，以及美国“支持民主党学生协会”变成“气象预报员”的例子中已有所见。

克里斯的布局分析，对于美国妇女运动基础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达到顶峰后所发生的变化，起到了一个粗略指南的作用。在那些多半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团体中，制度化是一个始自动员阶段的主要过程。而其主要的表现则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产生的大量公众利益团体(Schlozman 1990)。这些团体中的大多数团体，诸如“全国妇女组织”和“全国流产与生育权行动联盟”(NARAL)，都成为在华盛顿地区积极展开院外游说活动与教育工作的团体，结果则是导致一系列公众利益院外活动集团的形成。尽管这些院外集团依然保持着对妇女运动的强烈献身精神，但其在行动策略及与其他团体的互动方面，与那些传统的商业及职业性的院外活动集团没有什么两样。

较之 20 世纪 60 年代后欧洲的那些独立商行与合作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商业化现象，商业化的过程发生在美国的妇女团体中则相对较少。美国的一些妇女团体在 60 年代后仍然保持着女权主义的立场，而另一



些团体则靠着化妆品公司和服装公司的广告，转到了与日常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些行业中。女性书店曾一度有所发展，但很快就因一些巨型书店的扩张而消失了。而诸如“计划性父母身份”之类的妇女健康服务团体，尽管其团体成员中有一些曾是当年新妇女运动的老战士，所从事的活动却几乎不能称为“商业”活动。

我们可以在妇女自助团体——例如，在那些为妇女流产提建议、为遭到强暴的妇女和那些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妇女提供帮助而成立的团体——的发展中，发现内卷的过程(Taylor 和 Van Willigen 1996)。乳腺癌同盟尤其体现了由新妇女运动而产生的关于性别的新概念，同时也体现了其不愿将治疗乳腺癌方面的权威让与(主要为男性的)医疗等级体系的想法(Parthasarathy 2003)。

通过相互竞争的女权主义哲学之间的内部斗争，激进化令整个运动受到巨大震动。由女同性恋者加入“正统”女权主义共同体的准入问题而起的冲突，使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初露端倪的裂痕变得更为复杂了。另一个相互竞争的中心问题则使得有色人妇女组成的团体与主流的女权运动区分开来(Roth 2004)。不过，由于大多数激进团体尤其是一些大学团体也倾向于内卷过程，故，较之于具有压倒性的制度化过程，激进化对于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学者们时有发现，一些社会运动无可动摇地转向了利益集团或融入到机构当中了。克里斯的布局分析表明，各不同时期的高度动员是如何引起社会运动采取各种不同的退场形式(它在运动处于退潮时期维系着某一运动基础的存在)(Rupp 和 Taylor 1987)。通过加入自助团体、为妇女服务组织工作以及为公众利益团体尽义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一直保持着与以前的一些老战友的联系，而当危难与机遇出现之际(例如，2005年，当高等法院的两次新任命威胁到从法律上保护妇女选择流产的权利时)，她们则依然是乐于接受动

员的力量,始终保持着积极投身于未来战斗的热情。

## 结 论

本章的主要观点总结起来很容易。首先,我们认为,并非所有的抗争政治事件都是社会运动。波兰 1956 年的事件属于抗争事件,有时还带有暴力性质,而且,像我们已研究过的许多事件一样,这些事件也同样是对政治机遇的反应。然而,就我们所使用的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含义而言,抑或当我们把这些事件与 1980 年发生在该国的斗争相比较时,这些事件却并未构成一场社会运动。

两相对照,像许多社会运动一样,“团结工会”运动也是由地方性事件而引发的;而且,如我们在本书中已探究过的诸多事件一样,它经历了居间联络、合法性确认、传播以及规模转变的过程。它具备被称为社会运动的资格,是因为它动员起了一个自 1956 年之后成长起来,但直到当时都一直处于消极状态的社会运动基础,同时也因为它逐步显示出价值、团结一致、成员人数以及对斗争的献身精神等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之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同样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许多对妇女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开始发生:妇女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更多的女性出现在一些学院和大学讲坛上以及女性日益增加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并非所有这些变化都属于或源自于社会运动活动。公众舆论方面的变化、寻求选票的国会议员、支持权利平等的法官以及那些重要的女性立法者,都影响着美国的公众政治。这里,做出区别很是要紧:唯有通过将社会运动活动从其他的斗争形式中遴选出来,我们才能看出存在于社会运动活动与其他招致变化的原因之间的关系。若没有这一区别,我们便不能对各种社会运动与其他形式的抗争间的相互转化进行研究了。

其三,各种社会运动经常构成对各种制度/机构的挑战。“团结工会”运动与美国的妇女运动都对各自所在国家的制度/机构形成了挑战。但社会运动也在制度/机构内部发挥作用。如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的妇女运动那样,它们常常与制度性政治中出现的类似变化保持吻合。社会运动有时则变成了制度性行动者,一如1989年“团结工会”强迫波兰政府举行竞争性选举时发生的情形。而当制度性逻辑接受了抗争政治的逻辑时,则社会运动有时也会被其取得的成功击败。

各种社会运动常常会引发反向运动形成。在那场支持“平等权修正案”的失败活动中以及针对流产权而展开的斗争中,美国的妇女运动就曾引起反向运动。制度性政治所做的让步,常常反映了一种发生在追求变化的各种社会运动与那些企图回到一种更为传统社会的反向运动之间,为争夺最高权力而采取的较为文明的斗争形式。这便是在各种民主政治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的原因所在:各种范围广泛的、致力于建立同盟关系同时也致力于建立共识的社会运动取得成功,则会令民主政治的范围扩大。

倘若社会运动只与民主政治以及正在迈向民主化的政治相伴而生,那么,其他类型的政体又如何呢?如果说,一种共生关系主要出现在民主政治与社会运动之间,那么,类似的共生关系会出现在其他斗争形式与其他类型的政体之间吗?下一章我们将转向更具暴力形式的抗争政治,切近地考察它们与民主制及非民主制之间的关系。



## 第七章 致命性冲突

大规模致命性冲突大多经常发生在那些政府能力居于中等或政府能力低下,包括达维·莱廷(David Laitin)和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 2004)称之为“中央权威软弱或不存在”(anocracies)的那些具有不稳定的中等政府能力的政权中。我们还将会在第八章所探讨的“混合政权”当中见到这些致命性冲突。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从第六章所述及的那些具有相对非暴力性质的社会运动,转向这样一些政权,在其中,政府代理人、民众挑战者以及其他一些旨在获取政治权力的竞争者们,经常使用武力以支持其所提出的斗争要求。三种形式的致命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实例:暴力性质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内战以及革命。要了解这三种形式的致命冲突是如何发生互动与重合的,就让我们先来看看苏丹的情况好了。

### 发生在苏丹的致命冲突

独立的苏丹国位于埃及的正南面,历史上曾长时间处于埃及人的统治之下。苏丹是非洲各国中占有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在苏丹与埃及

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以及东北部的红海沿岸地区，人口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宗教上的穆斯林与自我认同上的阿拉伯人。而在该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居民则越来越多地操各种亚撒哈拉非洲语言、认同各种黑非洲部落、信奉基督教或各种非洲当地宗教。主要以穆斯林教徒及说阿拉伯语的喀土穆(Khartoum)为基础的苏丹中央政府，尽管牢牢掌握着对喀土穆大城区及苏丹东北部地区的控制权，但对该国其他地区则难以实行控制。迄今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公路延伸到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和西部贫困地区。

136 苏丹有一些政治上动荡不安的邻国，这其中不仅有埃及，还包括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利比亚以及乌干达。自1956年宣布独立到饱受冲突折磨的2005年，苏丹在其摆脱殖民统治后的50年中遭受了40年的内战之苦。其中有许多场都曾蔓延到邻国境内，要么便是由那些邻国的各种冲突所引起。在独立后半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军官们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权，不过他们却无法将其控制权延伸到这个国家的全部领土上。

苏丹的统治者们周期性地将其政权称作穆斯林政权，并曾试图将伊斯兰教的原则确立为国家法律。他们还垄断着来自于石油出口与红海商业区的大量收益。苏丹南方人与西部居民则一再采取武力斗争以抵制官方的上述两种做法。尽管独立后的苏丹南部地区有不同程度地与其他地区实现统一的情形，但由军阀所统领的军队却常常有效地控制着独立后的苏丹南部地区。受邻国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压力，中央政府一直摇摆于给予南方地区广泛的自治权与消灭或拉拢南方反叛者的努力之间。

## 大规模致命冲突的特殊与非特殊之处

发生在苏丹的种种斗争突出展示了一种类型的抗争政治，而这一类型的抗争政治我们在前几章中都只是顺便提及，即大规模致命冲突——在这些冲突当中，暴力活动主要不是非暴力性质的提出要求活动的副产品，而是成为了提出要求的核心原则之一部分。我们将在本章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中，政府以及其他政治行动者常常在他们提出要求时，利用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各种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包括地方上的土匪、受过专门训练的国家正规部队、昙花一现的民兵组织、准军事组织以及雇佣军。有时，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属于那种非常单边性的强力集团，比如，某些军队发动对示威者的攻击，或某些准军事组织追捕劳工组织者。但至少有两个武装组织彼此发生战斗时，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就变得尤其致命了。

致命冲突具有一些与其他形式的抗争政治相区别的特征。其中，有两个特征尤其重要：提出要求存在高风险与武装力量的维持问题。杀人、致残以及破坏行动影响着冲突参与者在直接斗争结束后的生存。这些暴力行为造成许多家庭与共同体的解体，摧毁了可资利用的劳动力，并毁灭了各种资料。由于高风险的存在，一些潜在的暴力冲突参与者通常都选择逃避，除非是作为参与者他们有可能获胜或是有可能安然无恙地成功脱逃。而一旦开始进入战斗状态，则只要他们所属的组织仍然完整无损，他们便难以脱身了。 137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大规模致命冲突的第二个特征上。大规模致命冲突包括国间战争、内战、种族屠杀以及一个超越宗教、种族、语言及地区界限的重要的斗争子集合。与招募人们参与示威或公共集会不同，创建与维持一支武装力量需要广泛的资源。有些军事组织（例如，由危地马拉农民组成的民兵）依靠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为生，从他们自己所



在的共同体中获取支持。即便如此,他们也还需要武器、弹药、信息、通讯手段以及用于补充他们人员损失的人力资源。

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偶尔也在不使用高性能武器的情况下发生。例如,在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中,大多数参与屠杀行动者使用棍棒、大砍刀以及其他一些常用工具以屠杀受害者。不过,甚至在这一极端情形中,这场屠杀行动的开始也是由一支受过训练的总统卫队与一伙由执政党组织起来的民兵发起的(Dallaire 2003; Des Forges 等 1999; Jones 1995; Mamdani 2001; Prunier 1995, 2001; Taylor 1999)。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事组织有赖于广泛的居间联络活动以及内部的协调行动。所有各种形式的大规模致命冲突,都包含着很高的风险以及一些经过训练的军事组织。

这些就是大规模致命冲突与其他形式的抗争政治的不同之处。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在大规模致命冲突之中看到一些我们熟悉的机制与过程。而为了看清它们,我们就必须避免通常会模糊人们理解此类冲突的两种谬见。

有关动机的谬见(the motivational fallacy)认为,只有我们理解了杀人者的心理——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感觉到了什么,我们才会了解大规模暴力行动的真实与根本的原因。事实上,即便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心理倾向,我们也会很快发现: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大规模暴力行动的参与者们所需与所感觉到的则是许多大为不同的东西;而大规模暴力行动是否会发生以及以何种形式发生,则有赖于一些非动机性因素,如是否能够得到武器、是否有现成的受害对象以及杀人者之间是否以前就有联系等;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大规模暴力行动并非一种单独展开的行动,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

有关普遍法则的谬见(the general law fallacy)则认为,每一种类型的大规模致命冲突都有自身的独有特点,因此也便会遵循它自己的普遍法则。依照这种看法,种族屠杀、内战、革命、致命的种族或宗教冲突

以及采取暴力形式的民族主义,彼此之间就会存在极大的区别,并且各自都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的必要条件和充足条件。与之相反,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的,这些形式不同的抗争不仅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重合与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且,它们还都是由相似的机制与过程产生的,这些机制与过程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不同的发生序列以及不同的初始条件而出现。诚然,机制与过程确乎与总体法则存在一致之处,例如,居间联络就是以基本同样的方式在各种极为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的。然而,这些法则却并不涉及诸如革命或内战之类的所有种类的抗争事件。

在我们对大规模致命冲突进行考察之际,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第四章的诸认同机制和过程。我们看到,政治行动者们往往通过动员、居间联络、传播、合法性确认以及界限激活等的混合,宣称他们自己是革命者或某一真正宗教的捍卫者。我们还发现,现存的政治机遇结构常常与既有的抗争剧目产生互动,以决定何种类型以及何种程度的大规模暴力行动能够在—一个既定政权内发生。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一个政权的总体特征(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及民主程度),强烈影响着大规模致命冲突的发生地点及其真正发生的可能性。

中央政府通常控制着某一既定政权内部最大量集中起来的强制手段。而集中性的强制手段则意味着某个组织已被确认为—个国家或某种类似于国家的东西。鉴于这一事实,大规模致命冲突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之一或兼取两种方式——作为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和/或作为权力受到冲突威胁的第三方——而令国家卷入其中。强能力的国家通过使境内的任何人都难以形成与之对立的集中性强制手段而减少威胁的出现,但(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也并不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弱能力的国家则更经常地面临着这种威胁——某些对立的行动者将会建立起大量集中的强制手段并利用这一手段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

为争夺对集中性强制资源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中央集权国家在数千年前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了。只是随着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

的成长,这些斗争才开始更为直接地将宗教的、族群的、种族的以及文化方面的认同包括进来。18世纪后期的美国革命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法国的革命者们则以法国民族的名义打倒了旧制度之后,继而却以民族自由的名义去征服其他民族。革命时代确立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民族主义。统治者们自上而下地说道:“我们统治着这个国家,我们有权确定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族群性、宗教、种族以及文化。”而那些拥有其独特的宗教、族群、种族与文化空间的人们则自下而上地回答道:“我们是一个独立民族;我们有权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大量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政权内部的大规模致命冲突,都是围绕着这两种原则而展开彼此争斗的。

较之社会运动活动,大规模致命冲突有两种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显得更为突出,这两种可能性是:政权分裂与权力转移。前者指的是,整个政权将发生分裂,因此至少有两个不同群体的政治行动者,包括政府代理人在内,已终止了他们相互间的联盟关系与日常的互动关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两个相互敌对的政府或政府部门会彼此展开竞争,就像一支反叛的军队在远离首都的地区确立起自己的控制权并且像政府一样在那个地区行使统治权时所出现的情形那样。当然,这里有一个程度的问题。例如,在美国,一些反对征税的造反者、一些持自由意志论观点的民兵以及一些印第安人部落,有时会宣称他们脱离美国政府而独立,并从当地人那里吸收追随者,却未给国家政权造成很大震动。然而,美国内战却令美国这一完整的政治体真正发生了分裂。

小的权力转移始终会出现在每个政权当中。某个政治行动者获得更多进入政府的机会,另一个却失去了进入政府的机会,而第三者则与刚刚崭露头角的行动者结成了新的联盟。竞争性选举总是包含着某种较重要的重新结盟的可能性。但根本性的权力转移则更经常地伴随着本章分析的各种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出现。我们再次涉及到一个程度的问题:从一些次要的、逐步增加的权力转移到那些推翻现存政权结构的



重大的、快速的颠覆活动。图 7.1 大致勾勒出这种种可能性的范围。

图 7.1 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首先,政变、自上而下的夺取政权、造反、内战、致命性族群—宗教冲突以及重大的革命行动,所有这些全都是彼此相似之物。它们都结合着不同程度的政权分裂与权力转移。图中相互交叉的圆环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其次,一次重大的革命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形——一次范围非常大的分裂,继之以重大的权力转移。事实上,如该图所示,倘若一场内战或一次反叛行动导致了一种根本性的权力转移,则这场内战或反叛行动就可能变成一场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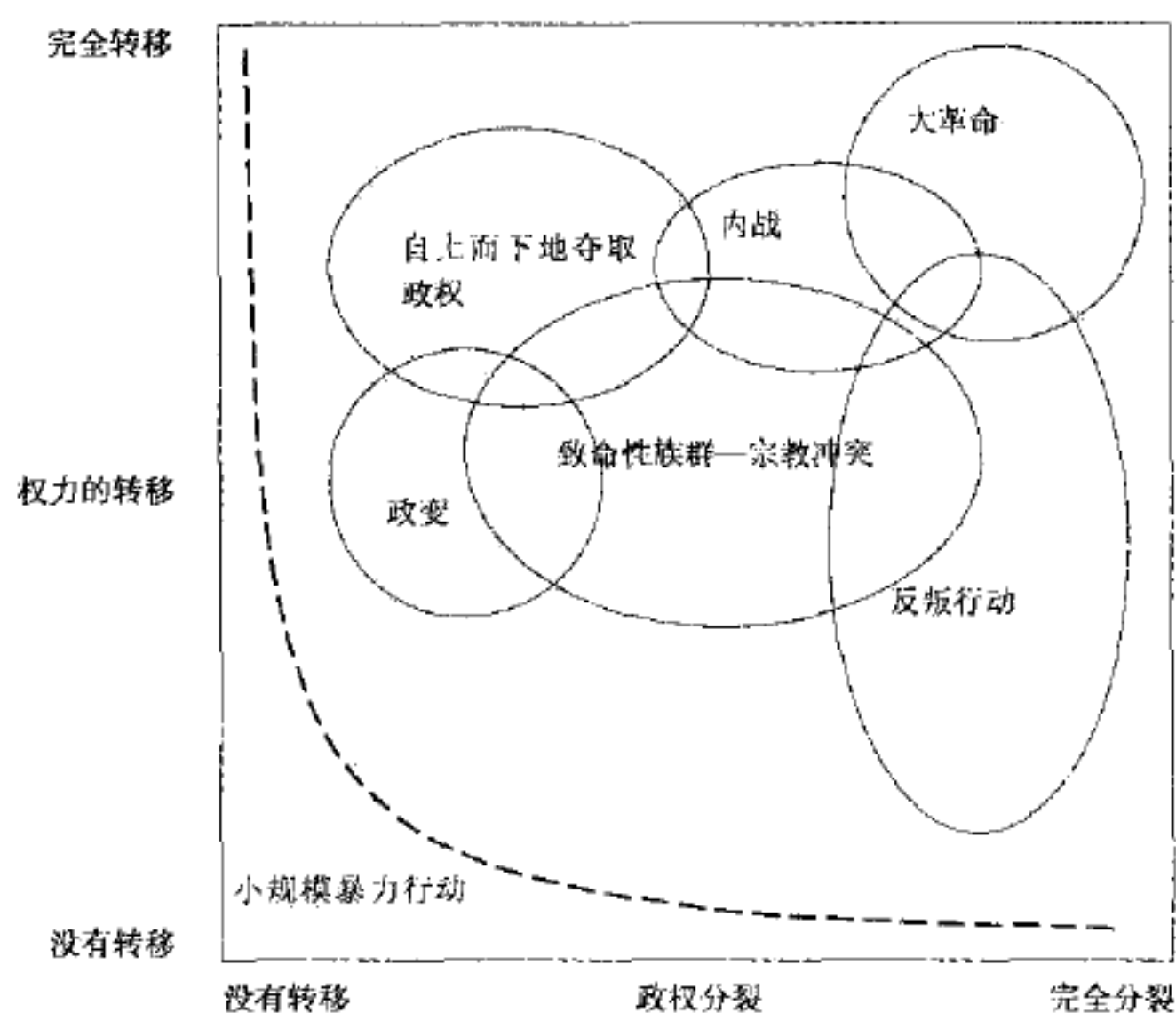


图 7.1. 各种形式的毁灭性冲突

在处于不稳定的民主化进程中的委内瑞拉、处于解体过程中的苏联以及在意大利和德国政治抗争的某些阶段,我们已经见识过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形。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最为接近的、以类似于发生在苏丹的那些冲突所具有的激烈程度而展开的持久致命冲突,则出现在查尔斯·布罗克特(2005)对危地马拉政治所做的分析中。在危地马拉,我们



140 不仅看到了一个弱能力的非民主政权,同时也看到了一场十足的内战。他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做过研究,当他对此进行总结并以比较性的视角对其加以表述时,布罗克特认为,集体性暴力行为的程度和发生地点,是由民众动员与政府镇压行动之间互动而产生的结果:

假如动员的程度不高,则镇压通常会成功地扼杀抗争。不过,倘若政府所采取的暴力措施,在一次抗议周期顺利展开后有所增加,那么,这种镇压行动便更有可能激起更高层次的挑战——既有非暴力的也有暴力性质的挑战,而不可能阻止抗争。这种激起更高层次挑战的情形,在政府暴力政策出现前后不一的矛盾现象时则尤其可能发生。但诸如1979年尼加拉瓜事件之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王权的情形则属于罕见的事例。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是那种较为平常的结果的极端例子:当一些国家的政府乐于把镇压当成是必要之举并且有能力去实施镇压时,它们通常会成功地消灭对政府以及常常对他们自己的统治构成一种威胁的民众抗争。(327)

141

让我们回到苏丹,去看看布罗克特所谓存在于民众动员与政府镇压之间的联系是如何起作用的。

## 回到苏丹

1989年,陆军上校奥马尔·哈桑·贝希尔(Omar Hassan al-Bashir)领导着一个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夺取了苏丹最高权力。这群新统治者将他们的新政权称作“民族拯救革命指挥委员会”(the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for National Salvation)。至少这个小集团(junta)本身把他们的掌权称作是一次革命。在最初的10年时间里,贝希尔借助一个

得到穆斯林高级教士支持的军事—文官政府来实行统治。不过,到 1999 年,针对教士们提出要求限制总统权力的方案,贝希尔做出了如下反应:解散议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解除一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主要教士的职务以及号召举行大选以使其统治合法化。随后于 2000 年举行的一场充满舞弊行为且遭受广泛抵制的总统选举,使贝希尔在与 4 个名义上的竞争者展开的竞选中赢得了 86.5% 的选票。

到 2005 年时,贝希尔(当时的头衔是总统兼陆军元帅)已极大地巩固了他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不过,贝希尔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却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一场内战。他的对手是一支自称为“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 的可怕的南方军队,其领导人是约翰·加兰(John Garang,一位出生于苏丹的美国经济学博士)。而就在政府于 2003 年开始朝着与“苏丹人民解放军”达成和解的方向发展之际,一批新的反叛团体又在位于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发动了武装反抗。政府则派出军队到达尔富尔实行镇压,同时动用武装,并支持当地的一伙民兵亦即臭名昭著的“詹贾韦德”(Janjaweed)——这伙人以专擅对那些被认为支持反叛者的平民实施烧杀而闻名——的做法。美国政府称这些攻击行动为种族灭绝,而这就暗示苏丹政府卷入的是一场种族或宗教冲突。迄至 2005 年,苏丹内战已导致该国境内及其邻近地区出现了 400 万至 600 万的难民(苏丹总人口大约为 3800 万),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2004 年底,受来自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美国方面日益增加的压力所迫,贝希尔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军”签署了一项所谓的“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答应给予苏丹南部以广泛的自治并允诺将于 2009 年举行全国大选,2011 年举行一次可能会导致苏丹南部地区获得完全独立的全民公决。2005 年 7 月,加兰出任苏丹首任副总统,同时担任新成立的“南苏丹政府”的总统。

当月晚些时候,加兰前往乌干达南部城市恩德培(Entebbe),与他昔

日的支持者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Yoweri Museveni)举行商谈,当加兰从恩德培返回苏丹时,他乘坐的由乌干达提供的直升飞机失事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

……当被反叛领导人约翰·加兰之死弄得心烦意乱的南方人与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力求恢复秩序由政府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时,骚乱以及彼此针锋相对的杀戮行为便持续出现于苏丹首都喀土穆。据当地政府和一些救助机构的报道,在喀土穆市及郊区发生动乱的3天时间里,有近100人在动乱中丧生。一些报道称,大街上到处是一帮一帮的人,其中有些人拿着棍棒、刀具和枪械,在街头四处劫掠,甚至当政府实行彻夜宵禁之后仍然如此。

来自联合国方面的报道说,位于喀土穆市外一座清真寺里的伊玛目遇害身亡。目击者称,北方的穆斯林,用阿拉伯语高喊“主是伟大的”,对南方的非洲黑人发起了猛攻。这一幕幕丑陋不堪的场景表现了人们在副总统加兰因星期六晚间的直升飞机失事而遇难之后的极度担心和忧虑。对于加兰乘坐的直升飞机失事坠毁一事,政府当局坚持认为,那是一场因恶劣天气而引起的意外事故,而不是像一些南方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一次阴谋破坏行为。(Lacey 2005: 1)

类似这样的报道是在给我们讲故事。故事通常会很快地从讲述认同及政治行动者被推定的动机转到叙述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去,而不会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各种政治过程上。然而,作为如今已是研究抗争政治的学人,你们却理应能够从苏丹的这些流血斗争中发现一些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熟悉的政治机制和过程。

首先,在诸如骚乱、劫掠以及动荡不安之类模糊字眼的背后,我们能够发现由三个不同群体的成员——南方人、北方人以及一些得到政



府支持的武装力量——所发动的对敌方的有组织的攻击。在苏丹占主导地位的要求的剧目，与我们一直在加以分析的西方社会运动活动所采用的剧目不太相像。由于致命武器普遍易于到手并且一些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者常常将这些武器投入实际使用，于是，发生在苏丹的这些冲突就有了属于它自己的暴力斗争的地方逻辑了。苏丹冲突的参与者们称他们的组织为军队，而把他们的行动称作战争。

其次，我们目睹了一个变化不定的政治机遇结构因以下这些因素而起作用：

- 苏丹政府内部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 易受新行动者的攻击（尤其是那些可以独立掌握武器的行动者们）；
- 现行政治联盟关系的不稳定；
- 挑战者们易于获得有影响力的盟友和支持者（不仅从国内而且从国外）；
- 政府对于集体性提出要求的行动采取了时而镇压时而助长的矛盾做法；
- 发生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的日常变化。

143

总之，这些情形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多变的、开放的政治机遇结构。它们为政府挑战者一方提供了动员所需的巨大的机遇和激励因素。

如果我们再对苏丹的日常斗争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看到4组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过程——动员—遣散、界限激活—钝化、新协作关系的建立以及两极化——在这些斗争中一再发挥作用。以一种令人炫目的速度，政治行动者们通过利用传播和居间联络之类的机制，而实施动员与解除动员。像联合国这类外部行动者，则通过给予苏丹国内的某些行动者以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对其他一些行动者的合法性确认而介入

到这些过程之中。而当穆斯林占压倒优势的北方政府的一些代理人,寻求将他们对苏丹民族的定义强加于南方非穆斯林人头上,并由此而导致正常情况下处于分裂状态的南方人达成内部的暂时统一时,“我们—他们”之界限激活也一再出现。

不过,当一些宗派小集团为获得在界限一侧或另一侧处于优先地位而展开争夺时,同一些“我们—他们”界限则常常迅速钝化。在北方与南方、穆斯林与基督徒抑或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不存在任何可以划定斗争中之各种阵线的永久分界线。经由居间联络与传播的结合运用,界限两侧的行动者们都在忙于建立一些新形式的协作关系,包括由“詹贾韦德”制造的那种可怕的毁灭行动。最后,界限两侧之间的两极化则一再将他们双方之间持妥协立场的中间派彻底加以排除,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约翰·加兰之死令自2005年1月和平协议的达成而开始形成的几股脆弱的合作之绳被突然折断之时。

在这些过程的背后,请留意这样的一些提示:我们正在论及的是一个弱能力且不民主的政府。苏丹政府与一个军事组织有关联,而这个军事组织虽然控制着中央政府,却不曾对其所掌握的中心区域之外的地区实行稳定而有效的统治,在这一点上,苏丹比迄今为止我们已做过细致考察的任何其他政府都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有过一次总统竞选的象征性动作,但决定苏丹抗争政治的却绝不是任何类似于民主做法与社会运动之类的东西。如我们在第三章所指出的,内战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发生在那些弱能力且不民主的政权当中。在这方面,苏丹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它同时还遭受着暴力性质的族群及宗教斗争之苦。

## 致命的种族及宗教冲突

如同内战一样，大规模致命性的种族及宗教冲突也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发生在那些弱能力且不民主的政权当中。其所以集中于这些政权当中是由于许多相同的原因：这既因为无论谁掌握了相对软弱的政府，通常都会将他从其统治中获取的利益分配给他自己所属的族群和宗教网络的成员们；也因为这些彼此相同的弱能力且不民主的政府，不能阻止那些遭到排斥的党派去积聚属于他们自己的军事手段；还因为这些非正式的统治制度常常是建立在现存的亲属关系与宗教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弱能力的民主政权在面对致命性种族与宗教冲突时，也出于相同的原因而存在着某些类似的弱点。来看一下圭亚那的情况，那儿，约有半数人口声称他们是印度人的后裔，非洲人后裔略超过 1/3，剩下的人口中约半数为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后裔。在圭亚那，政治运动经常是按种族来划分界限的，而种族之间的争斗也常常发生。圭亚那作为拉丁美洲生产的可卡因被输送到美国境内的一条通道，为一些帮派团体及政治组织者提供了资金支持。

自 1966 年圭亚那独立直至 1992 年，来自非洲裔圭亚那人政治组织“全国人民大会”(PNC)的政治家们一直掌控着政府。不过，政治天平在 1992 年时开始转而偏向于占优势的印度裔圭亚那人政治组织“人民进步党”(PPP)及其盟友“公民党”(the Civic Party)。这两个组织的成员称他们的政治联盟为 PPP/C(“人民进步党—公民党”联盟)。而“全国人民大会”(PNC)则与“改革党”(the Reform Party)组成了一个反对派联盟，这一联盟相应获得了“全国人民大会—改革党”联盟(PNC/R)的称号。这两个联盟的形成，强化了圭亚那公共政治内部的种族分化。“2002 年的 2 月至 9 月间”，弗里敦·豪斯(Freedom House)报道说：



差不多 12 名警官与 50 多位市民在一场突然发生的暴力犯罪中遇害，这次暴力事件使得两个主要的种族之间原本就已不安的关系更加恶化了。9 月份，“人民进步党—公民党”联盟占支配地位的议会通过了 4 项反犯罪的提案。不过，那些抵制本次立法会议的“全国人民大会—改革党”联盟的议会代表声称，这些措施不会让圭亚那的犯罪问题得以解决，相反却意味着“以独裁政治的种种严酷权力来武装政府”。（Piano 和 Puddington 2004: 243）

从各自完全不同的角度，大赦国际和世界银行都确认圭亚那出现了政府危机。种族分歧使圭亚那政治发生了分裂。然而，如同在大多数其他民主政权中一样，像那种盛行于苏丹的各种层次的军事装备及武装冲突之类的情形，则根本不曾在圭亚那出现。大体上，以选举、工会以及社会运动形式而展开的抗争政治，还是为集体性要求之提出提供了较为安全也更具吸引力的诸多方式。

甚至那些强能力的民主政权也常常依照种族和宗教划分来组织很大一部分的公共政治生活。在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具有较强能力的民主国家里，就一再地发生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致命性冲突。而在美国，种族及族群分歧则持续出现在地方、州以及全国性政治等不同层次上。19 世纪 60 年代期间，围绕美国黑人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之一——南北战争。那种常常出现白人针对黑人而施以私刑的现象，只是到了 20 世纪晚期才得以消失。而且，随着它发动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入侵，美国当局才突然发现自己已在这些地方激起了大规模的致命性种族及宗教冲突。

如果说，种族及宗教冲突常常集中于那些弱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当中，那也并不是由于强能力的民主国家完全不存在种族及宗教分歧。

只不过强能力的民主国家常常设法降低或减少其国内种族和宗教冲突的规模及其武器装备的数量，将这些冲突引导到主要采取非暴力形式的抗争上去，并且由此而降低因抗争而直接带来的死亡、损失及破坏程度。他们的政治机遇结构及其所采用的占优势的抗争剧目，使他们得以朝着社会运动的方向发展。

要想了解种族及宗教冲突实现和解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历史努力，我们可以看一看爱尔兰的情况，在那里，政治斗争在长达 5 个世纪的时间里，是被不列颠人—爱尔兰人以及新教—天主教之间的分歧所主导。在爱尔兰，这些分歧常常导致形成一些致命的种族和宗教冲突，有时甚至达到革命与内战的程度。事实上，爱尔兰曾经经历过一系列以革命性权力转移而告终的内战。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列颠人—爱尔兰人以及新教—天主教之间的冲突，已然被限制在爱尔兰境内一个仍然归属联合王国的地区了；到 2005 年时，看上去这些冲突已经很大程度上得以平息了。大事年表 7.1 提供了爱尔兰在过去 5 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冲突的粗略的年份。

在与早期的盎格鲁—诺曼征服者及殖民者实现同化之后，爱尔兰进入了历时几个世纪的内部斗争——由当地的一些部族首领和国王之间展开竞争——时期。不过，自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开始，由都铎王朝所发动的对爱尔兰的入侵，则导致爱尔兰人发起了新一轮的武装抵抗行动。由此而为随后的近乎 5 个世纪开了一个头，在这 5 个世纪中，有些爱尔兰的当权者始终与英国站在一起，而另一些当权者则总是站在与英国敌对的立场上。在 17 世纪 90 年代至 18 世纪 80 年代的这段时间里，甚至有财产的天主教徒也失去了任何参与爱尔兰公共政治的权利。而在 18 世纪 80 年代至 19 世纪 20 年代的这几十年间，他们还仍旧遭受严重的政治歧视，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自 16 世纪以来，爱尔兰就几乎一直没有多少远离恶性暴力对抗的时候。这座小岛一再突然地陷入到内战之中。

大事年表 7.1 爱尔兰新教—天主教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期

- 1520—1602 都铎王朝的入侵,大农场的建立,起义,内战,爱尔兰新教教会的建立。
- 1610—1640 斯图亚特王朝的剥夺,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的殖民,尤其是在阿尔斯特地区。
- 1641—1650 英格兰和爱尔兰发生起义和内战,最终以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残暴征服而告终。
- 1689—1691 英格兰的“光荣革命”,爱尔兰内战,威廉三世对爱尔兰的再征服,天主教徒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急剧减少,持续到1703年的对天主教徒所拥有财产的大规模强占。
- 1782—1783 部分恢复爱尔兰的政治自治以及天主教徒获得土地与从教的权利(但爱尔兰议会仍然完全是由清一色新教徒组成的议会)。
- 1791—1795 “联合爱尔兰人”(其成员系爱尔兰自治论者,且越来越多地系天主教徒出身)与“奥兰治兄弟会”(保王派、新教徒)形成。
- 1798 “联合爱尔兰人”起义,内战,大屠杀,法国入侵,血腥镇压。
- 1801 联合王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的建立,爱尔兰议会被取消,将100名爱尔兰新教徒出身的议员并入联合王国议会中。
- 1813—1829 英格兰与爱尔兰一再发生争取《天主教解放法》的运动,爱尔兰为争取解放而实行群众动员,英格兰反对天主教解放的群众动员,最终通过的议会法案扩大了(但并不完全平等)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提高了爱尔兰人拥有选举

- 权的财产要求,并解散了丹尼尔·奥康内尔领导的“天主教联合会”。
- 1830s—1890s 大量反对地主与反什一税的行动,爱尔兰“地方自治”骚动的失败。
- 1845—1850 导致大规模向外移民的马铃薯饥荒。
- 1843— 主要的新教—天主教徒暴力冲突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尤其是在 1843,1857,1864,1872,1886 和 1893 年。
- 1848 发生在芒斯特的“青年爱尔兰”起义。
- 1858 “爱尔兰共和国兄弟会”(芬尼党人)在都柏林和纽约成立。
- 1867 芬尼党人在爱尔兰举行起义,“盖尔部族”(Clan na Gael)在纽约成立。
- 1869 “爱尔兰国教会”(安理甘宗)被废除。
- 1884 《选举法案》大大地增加了乡村(以及几乎全部天主教徒)选民的人数。
- 1916 得到德国支持的复活节起义。
- 1919—1923 内战,爱尔兰北方和南方第一次产生各自分立的政府和议会(1921),随后则是将北爱尔兰排除在外的“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1922)。
- 1923—2004 北爱尔兰间断发生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争斗,英国军队经常卷入,北爱尔兰政府接连被暂停行使职权与重新恢复行使职权。
- 1949 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宣布成立,但北爱尔兰仍被排除在外。

147

整个 19 世纪,爱尔兰人要求自治或独立的呼声日渐增强。1801 年,主要是出于对 1798 年爱尔兰人起义及其对英国反法战争构成的威胁



所做出的反应,大不列颠(英格兰、苏格兰及威尔士)与爱尔兰实现合并,成立了一个联合王国。此举使原有的爱尔兰议会解散,该议会虽然由清一色的新教徒成员组成,不过它至少还是能对天主教徒们的利益做出迅速反应,并通过亲属关系以及各种商业与职业关系而与天主教徒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爱尔兰议会的一百名新教徒议员加入到英国议会下院当中,成为位于与爱尔兰相隔遥远的伦敦城的英国议会的新成员。随着《天主教解放法》(1829)的颁布,拥有财产的天主教徒获得了投票选举权并担任公共职位的权利。

体制上的这些变动,使爱尔兰的抗争与英国的政治机遇结构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英国的政治机遇结构则随着19世纪的向前推移而古怪地日益处于开放状态。独立的权力中心在不断增加,政府则日益变得多少更易于为新的行动者攻击,政治联盟变得有些更不稳定,有影响的盟友与支持者也变得更易于为有组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们获取,而联合王国政府整体上的压制性也已减少。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以及不列颠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区别,却依然保持着其大部分的政治力度。

在整个19世纪里,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而双方一再公开展示其实力则导致在北爱尔兰地区发生街头暴力对抗(Tilly 2003: 111—27)。一场要求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运动使此前作为官方教会的“爱尔兰教会”于1869年被废除。不过,尽管得到首相威廉·格拉斯顿始终如一的支持,但《自治法案》本身却最终未能在联合王国议会中通过。而爱尔兰的新教徒们,则在“自治即罗马统治”<sup>①</sup>这一老套主题的基础上聚集起来以反对采取此类做法(McCracken 2001: 262)。与《英国第三次议会改革法案》同时出台的1884《选举权法案》,给予大多数爱尔兰成年男性以选举权,由此而令农村的天主教选民人数大大增加。不过,到这一时期,各主要政党都已将自己与某一宗教派别紧密联系起来。以天主教

<sup>①</sup> 罗马统治意指罗马天主教会尤其是教皇的统治。——译者

为基础的一些政党,就已决定性地使自己献身于爱尔兰自治和独立事业。

一场结合着内战、致命性种族冲突以及革命的风暴正处于形成之中。在经历了过去60年间多次反英起义之后,至“一战”期间,围绕爱尔兰人在“一战”中须为联合王国服兵役的问题,在爱尔兰引起了深刻分裂。爱尔兰人最初采取了与英国的战争努力保持合作的态度,而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们自然又比爱尔兰其余人口更为积极地与英方保持合作。一个成立于1913年以反对爱尔兰自治为宗旨的新教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就全体参加到英国军队中了。与此同时,英国方面则在爱尔兰的其他地区维持了两万人的军队和警察力量,以制约自1914年开始形成的爱尔兰天主教民兵组织。

当时的爱尔兰共有5支不同的军事力量,不仅有英军和“阿尔斯特志愿军”,还包括他们的反对派,“爱尔兰志愿军”、“公民军”以及“爱尔兰共和兄弟会”(the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近乎两年之时,爱尔兰人才真正开始了其反对英国所从事事业的行动。1916年“复活节起义”归于流产——这次起义的部分组织工作在纽约进行,起义得到了德国方面的支持,德军曾通过发动对英国沿海地区的轰炸而为起义提供实际援助,但起义最终还是被英军残酷镇压下去——令爱尔兰独立事业暂时放慢了脚步。然而,1917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则又开始了其重新组织的努力。

在1918年的议会选举中,“新芬党”这个被普遍视为代表着“复活节起义”以及共和事业的政党获得了成功。当联合王国政府于1918年4月向爱尔兰颁布征兵令时,英国议会中的所有爱尔兰议员——除北部的新教徒议员外,选择了集体从联合王国议会中退出。退出议会回到爱尔兰的议员们随即组织反对派返回爱尔兰。在随后于1918年12月举行的一次议会选举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轻松赢得了爱尔兰南部选民的选票——在成功当选的69名候选人当中,有34人仍被关押在英国监狱中。这些新当选的议员们决定组成属于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议会,而

不是加入到联合王国议会中。在 1919 年 1 月召开的会议上,议员们推举纽约出生的伊蒙·瓦勤拉 (Eamon De Valera)——当时仍在狱中——为议会主席。不久,瓦勤拉从狱中逃出,但在爱尔兰进行了 4 个月的活动后,却离开爱尔兰前往美国。

英国政府不久便开始了积极镇压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的行动。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动员起来以抵抗英国的镇压并发动了对英国政府当局代表的攻击行动。到 1919 年底,爱尔兰已几乎处于内战状态。如同彼得·哈特(Peter Hart 1998)在总结科克郡(County Cork)的情形时

149 所言:

“新芬党人”用尽可能最少的街头战斗与枪战行动,赢得了一些新的政治地盘并护卫着这些新得到的政治地盘。不过,在这次革命的实际进程中,那种已为人们所熟悉的政党竞争的热闹场面,却变成了一场以前所未有、令人无法想象的规模进行的屠杀行动。政治竞技场于是变成了一个由无名杀手和受害者组成的梦魇般的世界,一个充满着失踪、集体屠杀、夜半行刑、背后冷枪、尸体横陈于荒野与沟渠的可怕的恐怖世界。逾 700 人在 1917 年至 1923 年科克郡发生的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枪战或爆炸袭击中丧生,其中有 400 人死于不久即更名为“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志愿军”之手。(50)

英国方面在煞费苦心地确立起对爱尔兰的军事控制的同时,也开始与爱尔兰的有关代表进行谈判。经过两年时间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北爱尔兰[由阿尔斯特地区的一些小郡卡文(Cavan)、多尼戈尔郡(Donegal)、莫纳亨郡(Monaghan)组成]与爱尔兰其他地区分开,给予北爱以外的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以类似于加拿大和南非的自治领地位。尽管持强硬立场的“爱尔兰共和军”拒绝接受这一解决方案,并



于 1922 年举行起义,但这一政治安排还是以大致同样的形式持续存在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在北爱尔兰境内,一些反英势力却从未放弃斗争。尽管占该地区人口总数 1/3 的天主教徒,较之居住在该地区的新教徒们,仍然以农业人口居多,各自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且更多地集中居住于该地区的南部一带,但他们还是形成了一支可怕的力量。全新一轮的冲突始于 1968 年发生的天主教徒公民权游行示威活动,在冲突中,示威者们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对抗,与新教徒发动的反示威活动参加者们发生了争斗,冲突还包括了双方针对对方的人员和财产而发动的零散的攻击行动。1972 年,北爱公民权协会组织了一次穿越德里郡(Derry)的非武装但同时也是非法的游行活动,一些试图前去驱散这次游行活动的英国伞兵向示威者们开火,打死 13 名示威者。由“流血的星期日”而引起的骚动,导致英国政府收回了对该地区的直接统治。

在 1994 年达成的一项双边停火协议宣布之后,双方的袭击活动与对抗行动(其中包括一些发生在爱尔兰境外的袭击与对抗行动)事实上仍在加速进行。1998 年进一步达成的一项条约(即所谓《耶稣受难节协议》),使各主要政党之间开始了严肃的对话并使得双方间大多数公开抗衡终止了,但该协议却并未结束由各种准军事力量发动的游击行动或使得这些军事组织完全解除武装。尽管在爱尔兰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之间形成了大致的协议,但就在谈判进行的同时,双方的一些准军事派别却一再使和平局面遭到破坏。受充分武装起来、以独立的爱尔兰自由邦为基地且得到海外爱尔兰人广泛拥护的“爱尔兰共和军”支持的天主教好战分子们,无疑成为使冲突得以持续的重要因素。不过,阿尔斯特本地的一些好战的天主教徒也屡屡向同样好战的阿尔斯特新教徒发动挑战。欧洲历史上历时最长之一的一轮大规模群体间暴力冲突由此而得以持续地进行。

冲突双方伤亡惨重。1968 年至 1982 年间,发生在北爱的集体性暴



力行动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些记录：2268 人被杀，其中包括 491 名军事战斗人员、187 名警察以及 1590 名平民；25120 人受伤；29035 起枪击事件；7533 起爆炸事件；4250 起恶意纵火事件；9871 起武装抢劫事件；153 起将受害者浑身涂满柏油并粘上羽毛以示惩罚的事件，以及 1006 起枪击受害人膝盖以致其残废的暴行(Palmer 1988: 2)。这些数字显示出政治行动者双方的相互残杀。尽管暴力活动的强度，往往会随着北爱地区群体斗争更具总体性的节律而增减起落，但双方间的攻击却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连 1998 年达成的尝试性解决办法也未曾令其终止：

在达成《受难节协议》的 1998 年当年，共有 55 人死于北爱的暴力活动。这年的 7 月 12 日，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年龄在 8 到 12 岁之间的兄弟三人，他们家位于巴里莫尼(Ballymoney)的一个主要为新教徒的聚居区，在亲英的新教好战分子利用玻璃瓶制造的汽油弹发动对他们家的袭击中丧生。当年的 8 月 15 日，一个传统的天主教节日，又有 28 人在奥玛(Omagh)的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中遇难。这次事件中另有一人则在几天后死去。从“爱尔兰共和军”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小团体“真正爱尔兰共和军”(IRA)，则选择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六，将一枚重达 500 磅的炸弹安放在一辆停在繁华商业街的小汽车上，制造了一系列冲突中最为恶劣的暴行之一。(Keogh 2001: 332—33)

然而，在二战后北爱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当中，选举依然在继续进行，属于新教的“奥兰治党”的支持者们则时有举行游行活动，受害者家庭则常常举行示威抗议，而政治对话也一直是某些形式在持续进行。即便是在暴力活动的高峰期，英国政府的代表也还在与“爱尔兰共和军”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谈。到《受难节协议》形成之际，各政党则正在缓

慢地宣称其对于各准军事盟友的领导权。“爱尔兰共和军”于2005年正式宣布其愿意放弃集体性暴力行为，或许标志着这一轮致命性冲突的结束，但对此我们尚不能完全确定。

爱尔兰的流血经历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我们在本章开头所强调的大规模致命冲突的若干突出特征：提出要求的高风险与维持武装力量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爱尔兰人与英国人以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暴力争斗都是围绕着由谁来统治爱尔兰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其间，每一方都试图建立起充足的军事力量以支持其具有高风险的提出 151  
要求行动并摧毁另一方试图建立军事力量的努力。在这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一直维持着在爱尔兰的优势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它利用了较为广泛的军事资源，部分地则是通过与新教精英之间建立同盟的缘故。不过，当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成为“爱尔兰自由邦”而获取独立后，英国对于爱尔兰的新教居民们所承担的义务就成了减轻阿尔斯特地区暴力活动程度的一个严重障碍了。那支曾经为爱尔兰独立而奋战的令人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自此变成了致力于将英国人从其余下的藏身据点中赶出去的组织。

不过，英国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互动也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一个对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抗争政治甚为关键的故事。英国民众、爱尔兰民众以及英爱冲突的一些旁观者们，常常把爱尔兰海两侧的关系描述为因种种古老的、强烈而不可调和的仇恨而导致的结果。然而，英爱之间长期冲突的真实历史却表明，这些显然是由来已久的旧恨仍然是可以通过谈判而得以化解的。一旦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独立，种族与宗教冲突的程度也便随之而下降，而暴力活动的发生地亦因此而仅仅集中于北爱地区一处。甚至连北爱地区的斗争也日益受到局限，变得更少暴力色彩，并且，2000年以降，当“爱尔兰共和军”开始解除武装，其领导人成为国际公认的谈判桌上的代表，甚而连北爱地区的新教领导人也在寻求达成一种长期解决方案的路径时，这一地区冲突则更

是显示出最终得以解决的迹象。

此外,导致英爱关系发生变化的种种政治过程,也并非源自于一个仅仅为英爱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恨以及存在于英爱之间的种族与宗教冲突所独有的特殊领域。相反,有关爱尔兰的这一段故事,却为我们展示出那些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政治机遇结构、动员、两极化、居间联络。简言之,总体上属于抗争政治的后果。而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另一个乍看起来与之迥然不同的现象:内战。

## 内 战

内战发生于两个或更多的军事组织——其中至少有一方隶属于先前即已存在着的政府——为着控制同一政权内部的主要统治手段而彼此开战之时(Collier 2000a, 2000b; Fearon 和 Laitin 2003; Ghobarah, Huth 和 Russett 2003; Henderson 1999; Hironaka 2005; Kaldor 1999; Licklider 1993; Sambanis 2004; Walter 和 Snyder 1999)。在哥伦比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尼泊尔、秘鲁、乌干达、危地马拉以及最近在苏丹,有许多内战的实例。作为尝试分析和形成有关冲突的和平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学者已经专门就世界各地发生的暴力冲突进行了整理分类。其中的一个研究小组按年列出了主要冲突的发生数,并将那些发生在政府与其他行动者之间且至少造成 25 人在当年冲突中死亡的武装冲突当作内战来看待。

仅 2003 年一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职业冲突监测者,就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车臣、哥伦比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利比里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苏丹、土耳其/库尔德斯坦以及乌干达等国家或地区,发现了一批超出其所定的死亡 25 人最低标准的内战实例(Eriksson 和 Wallersteen 2004: 632—35)。这些内战案例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从一些政权的各主要政党为



争取获得单一的全国政府控制而相互争战(如尼泊尔),到另一些政权中的至少一个主要政党寻求完全摆脱中央政府的统治而导致冲突(如菲律宾),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间,世界各地发生的包括内战在内的各种武装冲突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迄至“二战”结束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大多数大规模的致命冲突都是发生在相互争斗的独立国家之间,殖民征服与反殖民抵抗运动则是这一规则的主要例外。但在紧随“二战”结束而来的那一个时期中,欧洲的殖民权力却面临着许多殖民地的反抗和起义。反殖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汹涌澎湃,迅速掀起高潮,直至70年代才趋于衰退。在冷战盛行的60年代至80年代,一些大国尤其是美国、苏联以及一些前殖民宗主国,常常插手诸如1975年至2003年的安哥拉毁灭性内战之类后殖民国家的内战(Dunér 1985)。但随后则是那些没有第三方介入的内战,越来越多地成为大规模致命冲突的主要形式(Kaldor 1999; Tilly 2003: 第三章)。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这些武装冲突问题研究专家们,将二战以来的武装冲突分为如下这样一些类别:

·体系外的武装冲突,这类冲突发生在一个国家与位于其版图外的某一非国家团体之间,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战争。

·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即发生在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冲突。

·一国内部的武装冲突,即发生在某一国家的政府与其内部反对派团体之间且没有其他国家干预的冲突。

·国际化的国内武装冲突,指发生在一国政府与其内部反对派团体之间,同时又有其他国家军事干预的冲突(Strand, Wilhelmsen 和 Gleditsch 2004: 11)。



一国内部的武装冲突包括了各种形式最纯粹的内战实例。图 7.2 (据埃里克森和沃勒斯坦 2004 年所撰有关著作而制成, 并利用了两位作者所提供的数据) 显示出 4 种不同类型的冲突自 1946 年至 2004 年的发展趋势。

如该图所示, 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战争呈日益下降的趋势, 自 1975 年之后则趋于消失。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虽时有起伏涨落却从未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而国际化的内战则在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顶峰, 自 2000 年以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就纯粹的冲突发生频率而言, 最突出者莫过于没有外来干预的内战了。在图中, 这些国内武装冲突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呈现出不规则但同时也是颇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 只是自 90 年代中期, 其发生频率才出现重大下降。而它在 90 年代初期出现的一次高涨, 则是由苏联及南斯拉夫的解体促成的 (Beissinger 1998, 2001; Kaldor 1999)。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尽管有像车臣和科索沃之类的冲突发生地, 但大多数后殖民政权则已经确立起更为稳定、更少暴力形式的统治。而一些先前处于内部分裂的政权部分实现民主化——南非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也有助于使内战发生的频率自 1994 年开始出现下降 (Piano 和 Puddington 2004)。虽有内战持续不断地发生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车臣、哥伦比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利比里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苏丹、土耳其/库尔德斯坦以及乌干达这些国家或地区, 但范围则一直在缩小。

自“二战”以来的这一较长时期里, 内战主要集中于两种政权体制当中: (1) 具有较强能力的政权。无论其属于民主政体还是不民主的政体, 这些政权内部都存在着某些脱离中央政府控制的重要地区 (这方面最近的例子有以色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秘鲁、车臣、菲律宾、土耳其以及哥伦比亚); (2) 弱能力且不民主的政权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余下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这两类政权当中, 中央政府的武装反对派涉及到

从某些地区性势力范围的捍卫者到寻求推翻中央政府统治的激进分子,以及从军阀与屡受侵扰的农民到十足的分离主义者或革命者之类。不过,他们全都面临着高风险与维持武装力量的双重问题。

(冲突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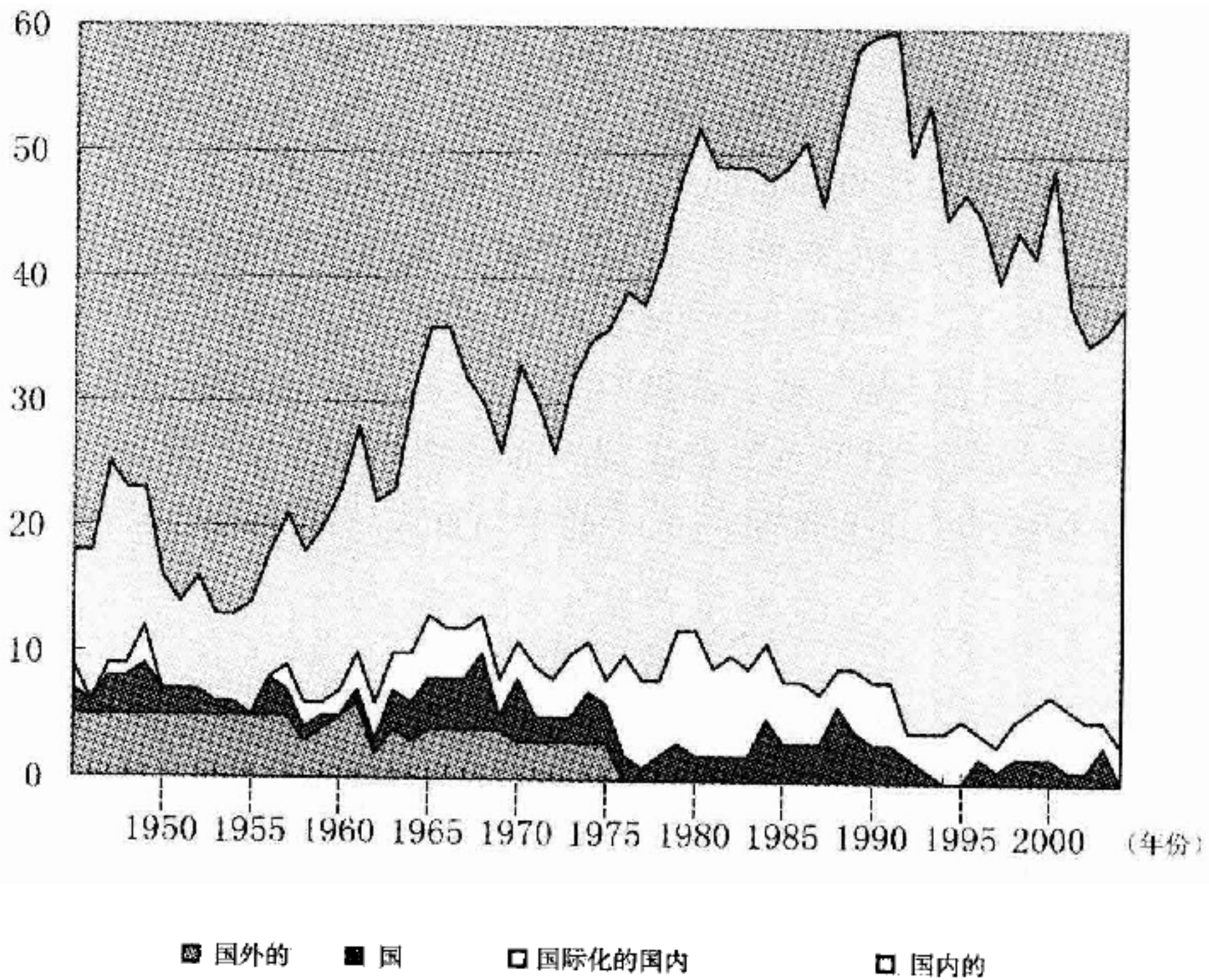


图 7.2 不同类型武装冲突的发生数,1946—2004

154

资料来源:凯尔·埃里克森和彼得·沃勒斯坦。

此外,在这两类政权中,军阀和革命者同样拥有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划定由他们自己所掌控之地的动机和手段。在由特别是美国及前苏联集团作为提供商的世界范围的地下交易市场上,各种武器普遍地很易于到手(Boutwell, Klare 和 Reed 1995)。获得外部支持(例

155

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在车臣，又如以刚果为基地的民兵组织之于布隆迪)以及易于弄到一些价值很高的违禁品(如利比里亚的钻石和阿富汗的海洛因)，也使得政府反对派用各种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更为容易。

内战由此而生动地说明了，某一特定形式的政权是如何导致一种政治机遇结构——这一政治机遇结构反过来又与既有的提出要求剧目产生互动以形成抗争政治的特征——的形成。当然，在像苏丹这样的一些政权中，抗争政治也以其他形式而不是内战的方式进行。在一些地区，当地居民还就土地、两性关系以及宗教方面的权利而展开争斗。尽管遭到严厉镇压，苏丹的大学生们也还是偶尔会设法提出一项和平性质的、集体性的表示异议或不满的声明。不过，苏丹政府的弱能力且不民主的特征，还是让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全国规模的抗争政治，更多地类似于车臣和哥伦比亚的各种斗争，而较少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斗争相似。

## 革 命

如我们很快将要看到的那样，革命具有某些与内战相同的特性。但它们也各自具有自身的独特动态结构。让我们把一场革命定义为国家权力的一次强制性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不同政治集团的竞争者，各自提出了互不相容的控制国家权力的要求；并且，该国国民中的某些重要部分则分别对每一政治集团所提要求表示默许。

一场完整的革命是那种兼具革命形势与革命后果的革命。一种革命形势包括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发生的明显分裂，与之相伴的每一政党都分别控制着该国某些重要地区和/或某些统治工具。显然，这里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从不存在任何分裂的情形到造成某一特定政权完全分裂之情形。而革命后果则与之不同：它指的是政府控制权的大范围转移，以至于此前掌握着政府权力的那些人，在权力实现转移



后则几乎不再握有权力了。这里,我们再次涉及到一个程度问题——一个从不存在任何权力转移到权力实现完全转移的程度变化问题。图 7.1 通过将一些重大的革命事件置于其右上侧而强调:随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发生广泛分裂而来的,是该政权内部权力发生大转移。

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些洞见,对诸多革命形势与革命后果作更为切近的考察。以下是构成革命形势的若干要素:

- 提出掌控国家或国家一部分的排他性要求的竞争者或竞争者联盟。此一要素由动员而来,而动员则反过来又常常涉及居间联络和界限激活;它构建起一个革命联盟。 156
- 相当数量的国民愿意为这些要求献身。我们再次见到动员在其中发挥作用,而经常与之相伴的则是传播、界限激活以及来自外界的合法性确认。
- 统治者不能或不愿意镇压竞争者联盟和/或献身于各种要求的行为。该要素涉及统治者与其臣民之间的互动,常常伴随着挑战者与现政权先前的成员之间形成的同盟。

倘若这三个要素一起出现,则意味着一种意义重大的分裂已经出现在此前作为整体的某一政权内部了。

革命后果具有以下四种构成要素:

- 政府成员的背叛:尽管有时候一些政府成员只是为了逃避自身遭受毁灭的威胁,但他们也常常与各种革命联盟达成新的联合。
- 革命联盟获得武装力量:此类联盟可以通过外部支持、此前各自独立的持异议团体的合并、购买武器或将已处于联盟成员掌握之中的武器装备动员起来而出现。
- 政府武装力量的中立化或背叛:有时,当普通士兵们看到一种优

势力量出现,而其领导人之间又发生分裂时,他们就会逐渐散去。但更为经常出现的则是,一些军事领导人自己将他们所统帅的部队引入中立或反对派立场上。

·**国家机构被革命联盟的成员所掌控**:如若缺少革命者与受到威胁的现政权的某些忠诚代表间的合作,哪怕是暂时的合作,则国家机构被革命联盟所掌控的情形便鲜有发生。

倘若这四个因素一起出现,则意味着一场重大的权力转移已令现政权彻底改换门庭了。

历史上,已出现过的革命形势——令整个政权完全处于分裂状态的政治分裂——远比已产生的革命后果多。不过,一些革命后果却继续出现在当代世界。例如,杰夫·古德温(2001: 4)在仅就他认为适于作为二战后主要社会革命的案例进行研究时,就曾提到越南、中国、玻利维亚、古巴、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南越、伊朗、尼加拉瓜以及格林纳达。在这些案例当中,大事年表 7.2 为我们提供

157 了有关尼加拉瓜革命及其后果的一个时间线索。

### 大事年表 7.2 有关尼加拉瓜革命及其后果的简要年表

1961年7月	“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形成,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分散游击活动开始。
1972年12月	尼加拉瓜发生地震,地震将首都马那瓜夷为平地。
1973年	索摩查的“国民卫队”盗用了大部分由各国提供给尼加拉瓜用于抗震救灾的国际援助;索摩查政权内部产生普遍的不满情绪。
1977年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使美国的援助成为以改善人权环境为条件的有条件援助;索摩查宣布结束戒严。

- 1978年1月 一家反索摩查政府的报纸主编佩德罗·查莫罗(Pedro Chamorro)遇刺;总罢工、城市暴动、农村袭击政府机构的行动开始。
- 1978—1979 “国民卫队”发动反攻,包括对一些城市实施空中轰炸,但渐渐瓦解。
- 1979年1月 由“美洲国家组织”领导的调解努力归于失败。
- 1979年2月 桑迪诺游击队组建范围广泛的“民族爱国阵线”(NPF);大量武器分别从委内瑞拉、巴拿马及古巴流入尼加拉瓜。
- 1979年5月 “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重大攻势。
- 1979年6月 政府反对派以哥斯达黎加为基地组建流亡政府,并开始得到国际承认;“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了马那瓜以外的尼加拉瓜大部分地区。
- 1979年7月 索摩查退位并逃离尼加拉瓜,“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进入马那瓜两天后,组建“民族重建执政府”,一个由革命者和改革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
- 1980年 执政联盟当中开始出现分裂;索摩查在巴拉圭遭谋杀。
- 1981年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为索摩查“国民卫队”中部分残余分子等反革命武装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并对尼加拉瓜实施贸易禁运,破坏尼加拉瓜航运。
- 1981—1989 反革命分子发动战争,“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反对派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
- 1982年 受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美国国务院宣布反政府活动为恐怖主义行动。
- 1984年 全国大选,“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以压倒优势当选;美国指责选举是存在欺诈的伪选举。
- 1989年 受外部力量严密监视而陷入僵局的战争终于告一段



- 158 1990年 落,尼加拉瓜也因这场战争而沦为废墟。  
签署和平协议,瓦奥莱特·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非“民族爱国阵线”成员)当选为尼加拉瓜总统。

1961年至1990年尼加拉瓜所发生的种种,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深度发展的革命形势、一种革命后果的形成、一场双方所得到的外部支持不均衡且迁延很久的内战,以及一种使革命初期实现的权力转移相当大部分被逆转的最终解决办法。而我们是否依照古德温的说法把尼加拉瓜的这一段历史经历当成是一场“重大的革命”,因此也就取决于我们要考察是哪些时间点了。无疑,1979年至1980年的变化使此前泛滥于索摩查政权中的腐败情形大多得以清除,并使尼加拉瓜迈出了走向国民经济社会化的重要步伐。在其最盛时,“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成了为整个拉丁美洲地区革命者所仿效的榜样。但由美国所支持的反对力量的出现、美国针对尼加拉瓜所实施的贸易禁运以及美国对尼加拉瓜航运业的打击,不久便开始使革命潮流发生逆转。

让我们将两份有关革命要素的清单应用于尼加拉瓜。针对革命形势而提出的核对清单大致如此:

- 竞争者提出具有排他性的控制国家政权的要求:“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形成(1961)确认了这一要素的存在;该要素的产生则源于两极化、居间联络以及动员。
- 相当数量的国民愿意为竞争者所提的这些要求而献身:在民众对索摩查政府处措马那瓜地震(1972)不当做出反应与查莫罗遇刺(1978)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此一过程明显处于不断取得进展之中。更突出的两极化则使这一过程得以加速发展,与此同时,传播、居间联络、相似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规模转变则强有力地推进了这一过程。

·**统治者不能或不愿意镇压竞争者联盟和 / 或献身于各种要求的行**为：吉米·卡特于 1977 年撤销对索摩查政权的合法性确认，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对此前给予索摩查积极支持的做法设立限制；而“国民卫队”随后因未能压服日益增长的反政府行动而瓦解，其影响则更是超出了撤销合法性确认。镇压行动的失败、政府更趋于软弱无力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传播，都促进了这第三种要素的形成。

尽管革命形势的这三种要素在其形成后会趋于彼此加强，但其中每一种要素的形成却是由一系列多少有些不同的机制与过程决定的。

那么，当我们把 1979 年至 1980 年的尼加拉瓜形势视为权力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最大程度的转移时，革命结果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对此，我们的看法如下：

159

·**政府成员的背叛**：尽管早在 1977 年，一个由尼加拉瓜著名人士组成的“12 人小组”就宣布断绝与索摩查政权的关系，并在查莫罗于 1978 年遇刺之后很快逃离尼加拉瓜而流亡国外，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大量背叛索摩查政权的行为（尽管是不太情愿的）发生在索摩查先前的合作者之中，也有许多人转而积极地与“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联盟。而当“国民卫队”徒然地试图借助大规模武力行动恢复对国内局势的控制时，背叛行为更是加快了节奏。在这方面，两极化与镇压行动的失败在导致革命结果要素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联盟获得武装力量**：当“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准备于 1967 年发动一次山区起义的企图遭到彻底挫败后，他们便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到创建一支全国性的秘密军事组织上来。在获取武器方面，他们或通过国际支持者的帮助而从国外获得武器装备；或从

索摩查的“国民卫队”那里购买或偷取一些武器；再便是从一些拥有武器的私人手里收集武器；不过，其大部分军事组织的创建，则是通过仿效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已广为人知的做法，从零做起、白手起家的。动员和协作是起作用的两种主要过程。

- 政府武装力量的中立化或背叛**：当一度令人生畏的“国民卫队”最终瓦解时，索摩查政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要素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镇压行动的失败与在国内失去合法性确认，在丧失有效武装力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国家机构被革命联盟的成员所掌控**：1979年，索摩查在其军队瓦解与前盟友背叛的情况下出逃，引发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合作者们迅速地进占主要权力中心；另一方面，现有的政府官员迅速改变立场，转而对因改革人士加入“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而进一步扩大的革命联盟表示忠诚。国内撤销对旧政权的合法性确认与国际社会给予新政权以合法性确认，固然加速了这一权力更替过程，但革命联盟内部自上而下的协作更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留意一下我们一直在从事的工作。就其定义而言，革命形势的三种要素以及革命后果的四种要素都是真实存在的。而当所有这些要素悉数实现时，它们不过是在告诉我们，革命形势已经让位于革命结果了。各种斗争已经导致了政府权力的重大转移，而出现在该政权内部的深刻裂痕也已然是由最初的增大到后来趋于弥合了。不过，就七种要素做出区分，还是令我们所从事的对革命加以解释的工作变得大为明晰了。它强调的是，尽管一种要素的出现影响着其他诸要素的出现，但每种要素却都源于一系列多少有些不同的原因——诸多的机制与过程。

这一区分也解释了革命形势远比革命结果更频繁地出现。就实际取代某个现有政权的情形而言，与其说此举有赖于在该政权内部打开



一道裂口,还不如说它更多地有赖于各种提出要求的活动。别的不说,那些掌握着政府权力的当权者们通常是会采取抵制行动以防大权旁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甚至连尼加拉瓜不幸的索摩查政权,也毕竟还是在“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后维持了18年,在1972年灾难性的马那瓜地震发生后撑持了7年。政府成员的背叛、武装力量的获取、政府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中立化以及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所有这些全都涉及到重大的组织性活动,并远远超越了那种以某地区为基地而建立政权的做法。

## 结 论

本章所详尽研究的种族及宗教冲突、内战以及革命,看似一些彼此完全孤立的现象,是一个与我们在第六章中曾经遇到的社会运动政治全然不同的领域。即便偶尔会发生军队向示威者开枪的情形,但大屠杀与示威活动之间还是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可言的。社会运动活动不成比例地发生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当中,或者发生在像20世纪80年代波兰这样的内部裂痕正在显现的较少开放色彩的政权当中。与之相反,本章所分析的一些大规模致命冲突,则不成比例地发生在那些并不以社会运动为特征的政权中,尤其不成比例地出现于那些弱能力且不民主的政权当中。不过,本章对于致命的种族—宗教冲突、内战以及革命所做的考察,还是揭示出这些不同形式的冲突之间存在的极其密切的关系,揭示出它们与那些较少暴力色彩的抗争间的重要关联。

这个秘密其实根本就不秘密:一旦我们将分析带入到机制与过程的层面,就会发现类似的原因和结果在抗争政治的整个范围——从邪恶的暴力抗争到质朴纯洁的和平抗争——内起作用。与第六章所探讨的几个主要话题——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与美国的新妇女运动——

161 颇为相似的是,英爱冲突中的“爱尔兰共和军”/新芬党以及尼加拉瓜的“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运动,也同样是通过结合利用对动员、居间联络、传播、合法性确认以及界限激活,而得以在他们各自的环境中扎下根来的。

当然,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有的,但这些区别却并非古怪特异抑或不可预测。在所有这些案例当中,现存的政治机遇结构总是与已有的抗争剧目产生互动,以决定何种类型与何种程度的抗争会在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发生。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某一特定政权的总体特征(尤其是其中央政府的能力及其民主程度),强烈影响到抗争的发生地点及抗争发生的可能性。

这实际是对迄今为止本书所传达的两个主要信息的概括:(1)相似的机制与过程在抗争政治所关涉的总体范围内起作用;以及(2)现存的政治机遇结构与已有的抗争剧目决定着抗争的种类与程度。在那些大体上属于民主制的政权中,抗争剧目倾向于产生和平形式的抗争,这种和平形式的抗争常常与代议制机构相互交叉并导致社会运动活动;而在那些大体上属于专制性质的政权当中,抗争剧目则倾向于导致致命冲突,且倾向于产生宗教和种族斗争、内战及革命。

162 此外,以下因素让我们已经描绘出的图画变得有些复杂。首先,并非所有的政权都正好适合于我们就各种政权布局所绘制的那些简单方框;其次,发生在民族国家中的抗争如今已非在一个密封箱中进行了——如果说它曾经是在密封箱中进行的。全球化与国际化已经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很自然地,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这些相互依赖将如何影响抗争。第八章将不仅转向探讨社会运动与致命冲突间出现的交叉现象,同时也将转向考察当今抗争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全球性与地方性间的联系。

## 第八章

# 混合政权中的抗争

本章将要探讨的是两类我们称之为混合政权中的抗争政治。在混合政权中,不同的统治体制决定着其治下不同民众所采用的抗争剧目。我们曾在北爱尔兰见过如此类型的混合政权:甚至就在英国军队占领阿尔斯特,而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正在展开暴力对抗之际,一种为民主国家所特有的有限抗争形式,还是令北爱地区至少仍留有一丝公民政治的气息。在本章中,我们将再次看到以如下两种形式出现的混合政权:

- **横向(呈水平方向)分裂的政权**,比如像北爱尔兰的政权,在这类政权中,致命冲突政治与社会运动政治往往同时发生;
- **新出现的跨国混合政权**,在这类政权中,抗争越出了国境并涉及到超国家、国家以及地方这些不同政治层次的行动者。

在本章中,我们先是把目光投向一度曾归属巴勒斯坦而如今却由以色列统治的一些地区。那儿,自20世纪40年代以降,争夺控制权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以及社会运动政治,就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2006



年,我们发现,一场宗教/种族冲突与另一场持续进行的准内战相互交织着在这一地区展开。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一场由犹太定居者们动员起来以反对以色列政府的社会运动,同样也出现在这一地区。

2004年,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手策划了在阿拉伯人当中建立以色列居民点的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宣布,将7000至8000名左右的犹太定居者从位于加沙地带——这里也是13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家——的一些犹太人聚居地撤出。而这些以色列定居者则以我们称之为“社会运动剧目”的一系列抵制行动对沙龙此举做出了回应。他们

164 所采取的抵制行动与各种形式的致命冲突——这类毁灭性的政治形式是我们在上一章曾探讨过的独裁与半独裁政权所特有的抗争形式——互有交叉。以色列/巴勒斯坦属于那种处于分裂状态的混合政权。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位于西方的西班牙。在那里,20世纪90年代末,聚集着一大批来自智利的政治流亡者,而那儿的一位名叫加森(Balthazar Garzón)的地方法官,当时正着手调查令他们被逐出其祖国的人权方面的违法行为。在智利民主制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26年后,生活在西班牙的流亡者中的一些告诉加森,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正在伦敦访问。后者则立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项引渡要求,要求英国官方就皮诺切特在其担任智利总统的那些年里所犯下的针对西班牙公民实施刑讯及其他人权方面的罪行进行讯问。

加森此举令世界各地的人权支持者们倍感兴奋(Davis 2003; Roht-Arriaza 2005)。随之而来的便是在英国、西班牙和智利这三个不同的国家,分别引发了一场将地方性斗争与跨国斗争异乎寻常地结合起来,以及将司法行动、议会政治、外交活动与街头政治异乎寻常地结合起来的广泛行动。由此导致的是国内法与国际法传统之间的相互冲突。一些古老的机构诸如英国的议会上院,同诸如大赦国际之类新型的跨国团体——后者强烈要求引渡皮诺切特——形成了互动。尽管英国政府的最终做法是将皮诺切特遣送回国,但该案却引发了一连串针对拉丁美

洲地区若干前独裁政权中的刑讯人员及独裁者的审判（Lutz 和 Sikkink 2001）。

以上这两段情况简介涉及到不同的行动者，发生在不同的大陆，其中还结合着不同形式的抗争，而所涉范围则包括了从非常具有地方性的事件到全球性事件的不同变化。第一个案例涉及的是两个不同民族争夺对中东一隅的控制权；而第二个案例则主要围绕着有关人权、国际主义以及法律方面的基本问题而展开。不过，它们却都是通过类似的机制与过程而发生、发展的，并且都同样提出了混合政权如何影响抗争政治及其如何被抗争政治影响的问题。混合政权与孕育其中的不同形式的抗争令其治下的民众分化为臣属与公民，但两种形式的抗争却是相互交叉与互相影响的。

### 加沙地区的无家可归者

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们采取了“将犹太人安插到”占人口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当中这一策略性做法，而犹太人定居点作为对此的延伸，出现于 1967 年之后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但在推行此举的背后，也还有些个人动机发挥了一定作用：那些无力负担以色列境内高昂生活费用的家庭，以及一些对于生活在以色列这个已基本世俗化的社会感到不满的复国主义犹太教徒，都非常急切地希望得到由以色列政府主动提供的用于在这些地区定居的慷慨经济补助。受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所迫，同时也由于面临着维持这些孤立的定居点所需的巨额财政与军事开支的困境，沙龙总理于 2004 年决定撤出在加沙地带的近 8000 名犹太人定居者。大事年表 8.1 对这些定居点的历史以及定居者从该地区撤出的方式做了概述，时间截止于巴勒斯坦政府当局匆促进驻加沙地带的 2005 年 9 月。

尽管以色列国家的创建是由那种适于称作社会运动的“移居”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但加沙地区却有其不同寻常之处:该地区系以色列人通过 1967 年的中东战争而从埃及手中夺得的。以色列主要采取将一些属于犹太民族、信仰犹太教的家庭——这些人不仅受期望得到由政府提供补助建立住房的刺激,也因为受由此而能够为自己及家人带来救赎的愿望所驱使——安置在这一地区的做法,以实施对该地区的控制。定居者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从从事农业的农场主,他们通过雇用巴勒斯坦劳工来为地中海沿岸的城镇市场生产水果和蔬菜。以色列当局用带有倒刺的铁丝网将这些繁荣的聚居地圈围起来,并派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以保护这些为阿拉伯人所包围着的定居者们。间或有一些巴勒斯坦人的暴力组织——既有世俗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诸如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这样的团体——制造炸弹爆炸事件或针对这些以色列聚居地实施炮击,而这则会导致以色列国防军(IDF)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好战分子们还利用加沙地区的南部边界从埃及将武器弹药运抵加沙。

迄至世纪之交,加沙地区的这些定居点已成为以色列统治者心目中,以及以色列、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关系当中一个持续存在的痛处。尽管沙龙政府对定居者们的境况抱有同情,但政府方面还是发现自身愈益受到维持这些聚居地所需费用的重压,受到军队无法阻止来自巴勒斯坦方面攻击的重压,并愈益受到希望对西方的压力做出先发制人的回应之类的社会压力。当以色列政府与软弱且处于分裂状态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间的关系出现障碍,双方达成一种总体性解决办法的前景陷于无望时,将一小部分犹太人家庭从加沙地区群情激愤的贫民区中疏散出来,就似乎是向巴勒斯坦民众展示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关系取得进展,同时缓解以色列及其盟友之间紧张关系的明智之举了。

从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撤出的做法,为这个混合政权打下了深刻的印记。来听一听一位名叫尤里·阿夫内里(Uri Avneri)——长期批



评以色列占领行动——的左翼批评家对以色列政府此举都说了些什么：

目前的斗争不管是一种内战，即便它又一次奇迹般地不会引发任何流血事件。“耶沙人”(the Yesha people,如定居者运动)是一场革命运动。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推翻以色列的民主制而把拉比们的统治加之于以色列人头上。任何研究过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军队的作用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只要军队坚定地与现政权站在一起，革命就注定会失败。唯有军队瓦解或加入到反叛者阵营当中，革命才能得胜。(http://zope.gush-shalom.org/home/en/channels/avnery/1123967824)

166

### 大事年表 8.1 从加沙地带撤出的简要年表

- |        |   |
|--------|---|
| 1947 年 | 联合国投票赞成建立两个国家，一为阿拉伯人组成的国家；一为犹太人组成的国家，但后者并未包括加沙地带在内。                         |
| 1948 年 | 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以色列与埃及双方军队在以色列南部爆发战斗。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逃至加沙地带定居。该地区的人口增加了 3 倍多。            |
| 1949 年 | 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加沙地区被置于埃及军事统治之下。埃及宣称为巴勒斯坦人托管加沙。加沙居民未被赋予埃及公民身份。                    |
| 1967 年 | 以色列在 1976 年的“六日战争”期间夺取加沙地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42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从战争中占领的地区撤出，以此换取结束阿以冲突。 |

- 1970年 “卡发旅”(Kfar Darom)——一个于1948年从加沙地区撤出的犹太社区——被重建为一个准军事性的以色列“屯田”部队(Nahal)的前哨。
- 1987年 加沙城爆发首次巴勒斯坦人暴动(intifada)。哈马斯在加沙成立。
- 1993年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达成《奥斯陆协定》。巴勒斯坦人暴动结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立。
- 1994年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开始自杀式炸弹袭击。依照《加沙—杰里科协议》，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和杰里科撤出并将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国防军撤离了加沙地带大部分由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以色列继续维持对一些定居点、边界及其他战略要点的控制。
- 1995年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周围建起安全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签署有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临时协议》。总理拉宾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
- 2000年 戴维营高峰会议失败；第二次起义爆发，加沙的以色列人定居点持续遭到攻击。以色列国防军以重新夺取加沙地带部分地区作为对巴勒斯坦人攻击行动的回应。
- 2004年 总理沙龙提出一项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撤离的计划。
- 2005年 7月：定居者及其盟友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对撤离运动。以色列议会(the Knesset)批准了撤离计划。政府宣布8月15日为撤离行动开始启动的日子。8月初：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Netanyahu)辞去内阁职务。来自约旦河西岸的一些好战的定居者们开始秘密潜入定居

点。8月15日：非武装的以色列国防军和警察将撤离通知分发给定居者，大部分定居者和平离开了定居点。少数拒绝主动撤离的定居者被以色列国防军友善地带离定居点，其中一些人悲痛地哭昏过去。在两个定居点中，抵制撤离的定居者们占据一座犹太教堂的屋顶，将水、油和酸性物质泼向下面的以色列部队。8月22日：所有定居者及好战分子悉数撤出，定居点被推土机推平。9月12日：所有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撤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武装部队进驻加沙，哈马斯支持者欢庆他们的“胜利”。

167

内战、革命运动、军队？阿夫内里就以色列定居者这场运动所做的预言，听上去就好像以色列已开始变得类似于独裁制的苏丹、分裂的北爱尔兰抑或革命的尼加拉瓜。不过，依据“自由之家”的等级评定，以色列在政治权利方面的排位处于最高档，而在公民权方面则排在第3等次。当然，这些等级排定是将被占领土排除在外的，而被占领地区的等级评定的情况是，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均排在较低的第6等。这种脱节状况提醒我们，某些政权可能会在民主程度方面存在内在差异。而这种内在差别则导致这些政权中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抗争政治间出现差异和重叠。在加沙地带定居者们发起的运动中，我们就发现了一场社会运动活动与一场内战相互重叠的情形。

让我们根据前几章所给出的有关解释来提出我们对此做出的分析。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政治机遇结构，在以色列公民与巴勒斯坦臣民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别。（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则位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而加沙地区的定居者们所占据的则是两种政治形式——常常在以色列人当中导致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活动的公民政治，与在以色列



内部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导致致命冲突的非公民政治——之间的一片不安分的过渡带。如果说这并非阿夫内里所预言的那种革命形势的话,那么,它的确也引发了一场混合类型的抗争政治,作为对沙龙政府计划在2004年至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退的回应。

168 就具体细节而言,由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定居者们所发起的这场运动,其在行动者、斗争方式以及斗争目标方面,与我们在第六章中曾加以探讨的社会运动可谓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同时却还是体现出我们在其他地方已见过的社会运动政治的诸多特性。定居者们采用了一些源自于传统抗争剧目的非暴力做法,不过他们也对这些做法进行了创新。比方说,有一些定居者,尤其是那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便采取了身着饰有黄色大卫之星的服装、迈着整齐步伐离开他们所在定居点的做法。他们所表现出的这一姿态,因暗示着一直伴随在侧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就好像当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卫军,而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愤慨不已。

以色列定居者们佩戴大卫之星并不仅只是用来装饰而已。他们其实是在利用以色列人善于制造神话的能力,借助神话来激活存在于支持沙龙此举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与反对这一举动的少数派之间的界限。如同我们在第五章曾加以研讨的那些事件一样,定居者们的这场运动同样依循的是一条动员与遣散的发展轨迹:它先是通过从加沙地区以外获得支持以组织起抵制行动,继而则随着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政府通过采取两种措施而归于消解,即一方面为撤离加沙的定居者们提供重新安置的便利,另一方面则对那些拒绝撤离者实施镇压的措施。

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见到的那些运动一样,以色列定居者们的行动也奠基于一种社会运动基础之上,那便是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社区组织以及那些生活在美国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教信徒们。定居者们当然不能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阻止沙龙政府的撤离计划,但他们却成功地促使执政党发生内部分裂。就在撤离定居点的过程当中,沙龙的

竞争对手、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做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举动。在得到大多数利库德集团成员支持的前提下，内塔尼亚胡辞去了其内阁职位并准备设法将利库德集团的控制权从沙龙手里夺过来。

由加沙定居者们所发起的这场运动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曾在波兰“团结工会”和美国的新妇女运动中看到其发挥作用的相同机制。当定居者及其盟友在以色列的“哭墙”边举行示威，并利用纳粹大屠杀的形象以表示对政府撤离定居点行动的抗议时，他们所做的其实正是在**创新抗争剧目**。而随着他们与总理沙龙之间的分歧加剧，他们又在宗教性的犹太复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激活出一道新的界限**来。他们还通过与边疆复国主义(frontier Zionism)的传统保持一致以及对纳粹大屠杀的恐惧表示同情，而寻求其事业的**合法性确认**。那些秘密潜入加沙地带的来自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好战分子们，则通过**居间联络**而使定居者们与以色列政界当中的那些右翼分子们建立起同盟关系。而当几千名以色列人聚集到“西墙”(the Western Wall)以抗议撤离行动时，定居者们的抵抗运动便**向上转变到以色列全国性政治的规模**上了。

## 在致命冲突之中

当然，没有任何社会运动是在真空中发生、发展的。当初，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创立，曾经导致大量的阿拉伯难民，而这些难民中的一部分就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难民营中。另有一部分阿拉伯难民则广泛散居于国外，并由此培育出一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8)称之为“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的东西来。最初，一些受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模式激励的世俗出身的阿拉伯领导人，因难民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异邦而承担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任务。不过，自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斯兰教团体则不仅在巴勒斯坦地区而且在那些散居国外的阿拉伯人当中都变得更具影响力

了。这场旨在解放巴勒斯坦的运动，也日益呈现出一种天启式的色调来。1981年，好战分子们开始在黎巴嫩采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行动方式。20世纪90年代期间，自杀式炸弹袭击则成为备受处于独裁环境中的宗教好战分子青睐的行动工具（Berman 和 Laitin 2005; Gambetta 2005; Pedahzur 2005）。从这时起，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们就开始让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成为他们所发动袭击的遇难者。从以色列人自加沙定居点撤离这件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与我们在第七章中探讨过的几种致命冲突之间的关联。

致命性政治在巴以两个民族中都有所滋生。长期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阿拉法特(Yassir Arafat)去世后，设在约旦河西岸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府便开始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和解。但以色列政府则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求双方从暴力对抗的立场后退，并进而推动和平进程向前发展。也恰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教激进组织哈马斯通过巴勒斯坦大选而于2006年开始上台执政。致命性暴力行为也一再发生于巴勒斯坦人内部，并在以色列人撤离加沙期间及之后在加沙地区发生的枪战中达到了顶峰(Usher 2005)。

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激进一翼绝没有垄断政治暴力。部分是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行动所做出的回应，但部分也是作为定居点建设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军事性质的衍生物，一批天启式的宗教复国主义犹太教徒不仅在犹太人定居点也在以色列本土出现了（Lustick 1998; Sprinzak 1991）。20世纪90年代期间，由犹太好战分子们发动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行动成倍增长。犹太好战分子与占以色列社会大多数的世俗成员之间的冲突加剧。此激进化过程，在总理拉宾于1995年出席特拉维夫和平集会时遭一位宗教狂热分子刺杀而达到了顶峰（Peleg 2002; Sprinzak 1999）。就在这同一时期，针对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农民的袭击行动也增加了。致命性政治由此从被占领土上转移到了以色列社会内部。



迄至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定居者之时，这一双重的激进化过程已然使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间的关系以及巴以双方内部各种关系变得僵化了。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已经对生活在内战状态中感到厌倦，但支持建立定居点的少数派却依然无可动摇地朝向一种我们在北爱尔兰见过的极端主义和孤立的立场前进。与此同时，尽管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情愿地接受了与以色列共存的必要性，但属于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宗教好战分子们却加强了对他们的攻击。如同我们在第三章中就曾预言过的，以色列政权的混合性质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抗争政治：一为我们在撤离加沙的行动中所看到的社会运动政治，另一则是在巴以双方内部及相互之间出现的致命性政治。 170

虽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内部以及以色列好战分子与巴勒斯坦好战分子之间都出现了裂痕，但在以色列从加沙撤退的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暴力冲突却是如此之少，这令人惊讶。当然，在撤离加沙的过程中，零星的冲突在巴以双方都时有发生。为阻止撤离进程，以色列的一些好战分子枪杀了8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4人死于以色列境内，另有4人被杀于约旦河西岸。在撤离行动期间，哈马斯好战分子针对犹太人聚居地发射了一些迫击炮弹，但此举并未引起预期的军事报复。一些不知名的激进分子曾经试图弄沉一艘位于约旦亚喀巴(Aqaba)港口的美国船只，但最终却只是令一名约旦士兵丧生而已。撤离行动结束后，一群神秘的突击队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兄弟。

如同在和平出现可能性时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治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在此时得以形成。一方面，正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准备控制加沙之际，哈马斯好战分子们也正因这次撤离行动的兑现而得到好评，并期待着控制这块“被解放了的”领土(Usher 2005)。这既可能意味着哈马斯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用于攻击以色列人定居点的基地，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哈马斯开始转变为一个政党——

一如它在黎巴嫩的一个兄弟组织“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一样。倘若出现的是前者,则以色列方面就会做出一场致命性的军事反应,而如若发生的是后者,那么加沙地区就会因此而变成巴勒斯坦社会运动政治的一个中心,这种社会运动政治充满活力且有时会表现出暴力性的一面,但它却是以选举竞争为中心的政治。就在本书即将付印的2006年年初,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治当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激进的重组现象,但以色列/巴勒斯坦至今还是被夹在我们第七章探讨过的社会运动政治与我们第八章曾加以探讨的致命性政治间难以动弹。

## 跨国抗争

171 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情形提醒我们,不能脱离更大的全国性政治背景来谈论社会运动政治。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在那些驱动着致命性政治与社会运动的机制和过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相互联系。但它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在如此集中于政治体制、政治斗争剧目以及政治机遇时,我们已然含蓄地做出了抗争政治的舞台是那种全国性的或地方性舞台的假定了。如果说这一假定一度是正确的,那如今的情形已不再如此了。在21世纪之初,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政治、民族国家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相互之间的重叠和交叉。

来看一下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以色列总理沙龙决定从加沙撤退,其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希望以此来安抚一直主张——尽管没有取得实际成效——以色列应当结束占领行为的国际社会。再看看以巴双方各自与跨国盟友之间的联系:犹太激进分子与阿拉伯好战分子全都深植于抗争的跨国之轴上。在加沙定居者发起的运动当中,无数外国定居者——主要是美国人——都曾将他们那些以色列境内的孩子交由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团体抚养。从当今世界大多数致命的跨国运动中获得同盟和资金支持的政治伊斯兰运动(political Islamism),鼓舞了那些不断

骚扰加沙犹太人定居者的阿拉伯好战分子们的士气。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混合政体与更广阔世界的抗争政治形成了重叠。

从事抗争政治研究的学人们，从一味聚焦于民族国家政治的偏好中重新调整其关注的焦点方面，一直进展较慢。将民族国家政治作为关注焦点，既有历史现实方面的缘故，也与教学上的方便有关。然而，在我们寻求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大规模的抗争却极少完全发生在民族国家境内。不妨回想一下，本书中出现的许多国内事件都与世界其他地方有联系——或则通过好战分子们的跨国纽带，或则经由他们所提要求的客观传播。当年，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就曾迅速传播到西欧和美洲各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则很快在前苏联集团的其他各地引起了一系列反对选举腐败的运动，并在中亚地区导致了模仿“橙色革命”的诸多运动。尽管“团结工会”运动是一场属于波兰一国的运动，但它也还是对整个东欧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了激励作用。甚至美国的大学生们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棚户城”的行动，也属于反对种族隔离主义的国际运动之一。

在当今的抗争政治中，跨国联系就其性质而言，已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来。有三大过程将其与过去时代的抗争区分开来，这三大过程分别是：跨国激进主义、跨国联盟的形成，以及快速的跨国传播。

在跨国激进主义当中，一个新的激进分子阶层在各种活动中，对其国境外的其他任何人提出的要求都予以支持（Keck 和 Sikkink 1998）。当克拉克森前往法国以说服法国的革命者相信奴隶制是对人权的一种侮辱时，他所做的努力在当时几乎算得上是前所未有、独一无二了。但今天的跨国激进分子们，却能够在数日之内就将给予起义者或镇压行动的受害者们的援助带到恰帕斯地区或者达尔富尔地区。对于这些“坚定不移的世界主义者”来说，待在一些国际机构的会议大厅里就如同待在他们自己国家里一样感觉舒适。

其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以及欧盟充当起“珊瑚



礁”的角色,围绕这些“珊瑚礁”,一些激进分子、(抗争)鼓吹者以及那些只为自身寻求进身之阶者,组成了诸多跨国联盟(O'Brien 等 2000)。诸如《刑讯条约》(*the Torture Convention*)之类的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刑事法庭”之类的国际审判机构,则为那些力图让侵犯人权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人权组织提供了聚焦点。一些国际性事件和冲突也会导致国内的抗争,就像世界各地几百万人抗议美国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时出现的那种情形。

最后,至于抗争快速地跨国传播,我们已经看到,地方性的抗争常常对其他国家的抗争政治具有深刻影响。当然,这一点在过去就已是如此——1848 年革命就像墨迹一样漫至整个欧洲。但当今世界之在通讯和交通方面的发展,以及不同民族和团体之间形成的跨国联系,则加快并强化了传播和规模转变。在这方面,互联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国际旅行的廉价、快捷以及相似的标准和文化符号在世界许多地方传播的廉价、快捷,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Boli 和 Thomas 1999)。

所有这三种过程——跨国激进主义、跨国联盟的形成以及抗争快速地跨国传播——都在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于 1998 年在英国的一家诊所接受治疗时,因遭到一位西班牙地方官指控这一事件而结合到一起了。

## 秃鹰行动

“皮诺切特将军实际上是想去旅行”,罗特—阿里尔扎(Naomi Roht-Arriaza 2005: 1)在她那本有关皮诺切特事件及其后果的权威性著作中写道。皮诺切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他和他的政府用残酷无情的手段统治智利的那些年,数千名智利人因担心性命不保或遭受刑讯而被迫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当皮诺切特 1998 年在英国被捕时,这些流落在外的智利人便形成了一个核心——一场要求以反人道罪对皮诺切特

进行审判的社会运动的核心。

如同一位智利流亡者所讲述的：

在独裁统治的那些年里，我们已经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一个包括艺术家、工会、政治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和团体在内的巨大的支持网络了。在智利时我们就已经是组织者，因此我们知道如何去进行组织……我们这些分布在整个欧洲的智利人彼此都认识，因为我们要么就曾经是被关在一起的狱友，要么便是认识曾经被关在狱中的某个人。故此，当我们在学习英语、找工作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中逐步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时，我们一直都保持着与分布在欧洲各地的其他智利人之间的联系。（摘自 Roht-Arriaza 2005: 38）

当皮诺切特于 1998 年 10 月前往英国伦敦接受手术治疗时，这些联系被证明是很关键的。早在皮诺切特抵达之前，一些属于智利海外流亡者网络的成员便已经采用化名，登记入住在皮诺切特计划前往的诊所。他们将皮诺切特到达伦敦的消息传达给全欧洲的本国同胞，并将这一信息透露给正在调查智利和阿根廷两国独裁时期刑讯犯罪的西班牙地方法官们，他们还在伦敦的一些法院听证会场外举行静坐和示威，对案件审理的细节进行记录并将这些记录发往世界各地（Roht-Arriaza 2005: 39）。就我们在本书中采用的机制意义而言，这些流亡者发挥的便是一种典型的居间联络功能。他们帮助智利的人权律师与英国的公民权律师建立相互联系，并且构成了“法律和人权团体联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该联盟最终成立起来以要求紧急引渡皮诺切特”（38）。

与寄居在西欧的这些智利人迥然不同的是，加森这位西班牙地方法官可绝算不上是世界主义者了。这位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在指控西班牙巴斯克恐怖主义者的地方法官，根本就不会讲英语。当听说皮诺切特在伦敦的消息时，加森当时实际上正在着手调查阿根廷的人

权犯罪情况。令加森把智利与阿根廷联系起来的是一份这两个国家与另外4个拉丁美洲独裁政权之间达成的秘密军事情报公约。由这一跨政府的阴谋而形成的公约名为“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 El Condor No Pasa)——因安第斯山脉的一种巨大的猛禽而得名。该公约允许将来自任何公约参与国的被俘反政府分子“引渡”(rendition)至被俘人员的母国,而那儿,这些被引渡者当中的许多人随后便会遭到刑讯或被杀。加森指控皮诺切特,正是基于这位前独裁者与“秃鹰行动”签约国之间的协作关系(Roht-Arriaza 2005: 29—31)。正是这项由皮诺切特打头的跨政府阴谋,为加森寻求将皮诺切特从英国引渡至西班牙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手段。

“秃鹰行动”仅仅是国际政治影响皮诺切特案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在寻求引渡这位前独裁者的过程中,加森还援引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理论——普世司法权(universal jurisdiction)。传统上,国际法仅在针对诸如海盗行为之类被普遍视为国际犯罪的情形出现时发挥作用。传统的国际法只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他或她自己所在的国家,而不涉及将该犯罪嫌疑人引渡至第三国。但在诸如比利时和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的许多地方法官们,却越来越多地将普世司法权理论应用于这样一些当事人,如犯有实施种族屠杀,或侵犯人权罪,又或战争罪等各种犯罪行为之人的审判上。加森便是将其着手的皮诺切特案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上:皮诺切特针对西班牙公民及其他受害人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国际犯罪的层次上了。国际法于是正日益成为能够让一位西班牙的地方法官,力图将一位智利前国家首脑从联合王国引渡到西班牙的机遇结构之一部分。

皮诺切特案及其后果具有意义深远的传播效应。它导致了一波针对实施刑讯的犯罪嫌疑人,针对那些发出刑讯指令的人而展开的审判与调查活动。尽管英国的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最终同意让皮诺切特返回本国,但发生在马德里和伦敦的这些事件,却还是引发了



埃伦·卢茨(Ellen Lutz)和凯瑟琳·希金克(Kathryn Sikkink 2001)称之为“一股正义之流”(a justice cascade)的一系列司法行动。在阿根廷,臭名昭著的刑讯实施者卡洛斯·梅森(Carlos Guillermo Suarez Mason),因绑架阿根廷失踪者们的孩子而被捕(Lutz 和 Sikkink 2001: 20—21)。在墨西哥,当局趁米格尔·卡瓦罗(Miguel Cavallo)旅行乘坐的飞机在坎昆(Cancun)停留时,逮捕了这位退休的阿根廷前海军舰长。在意大利,一些地方法官促使一桩搁置多年的刑事案件取得了进展——该案针对7名阿根廷军官对8名意大利裔阿根廷人实施谋杀的犯罪行为提出指控。意大利的罗马还是另一位阿根廷前军官,奥利维拉(Jorge Olivera)落入法网的地方,2000年8月,这位阿根廷前军官在举行结婚周年庆祝礼时被意大利警方逮捕。当2004年皮诺切特在智利被指控的同时,一个政府委员会又提出给予那些经历皮诺切特的恐怖统治而幸免于难的幸存者以补偿,这股正义之流便完满了。

### 全球化、国际化以及跨国抗争

从皮诺切特案中,我们看到了本章开头以假设形式提出的三个跨国过程。首先,一群跨国行动者们引发了我们刚刚予以概述的一系列事件。其次,一个跨国联盟围绕一个特定的问题而形成。第三,抗争行动越出民族国家界限而快速传播。(甚至还略有一丝规模转变的迹象——就像促使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时出现的那种情形。)就在我们写作本书之  
际,皮诺切特已经以侵犯人权(human rights abuses)和国际洗钱罪而在智利国内被起诉,不过案子还需要极其缓慢地在智利各级法院获得通过。但皮诺切特案还是为我们清楚地描述了迈向由一些国家、国际机构和非国家的行动者组成的混合性全球体制的步伐,虽然是部分的、有些模糊的却坚定不移。两个重要的过程——全球化与国际化,则成为推动这些进展的动力。

全球化指的是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以及使不同国家的行动者联系起来的力量之日益增长的流动量与流动速度 (Keohane 2002: 194)。包括杰基·史密斯(Jackie Smith)和汉克·约翰斯顿(Hank Johnston 2003)在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全球化为跨国抗争创造了条件。其他一些学者则从(全球化)这一过程中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某种叫做“全球社会运动”的东西正在形成(Evans 2005; McMichael 2005)。这些著述从聚集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与印度孟买(Mumbai)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成千上万年轻的激进分子们那里,找到了其经验性的对应物。除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年轻人外,另有数千人参加了在西欧、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召开的地方性论坛(Pianta 2001, 2002; Pianta 和 Silva 2003),或参与到声援墨西哥恰帕斯地区发生的萨帕塔起义当中(Olesen 2005)。

全球化以许多种形式展开,而这些不同的形式则影响到抗争政治的发生和转变。以下就是一些全球化影响抗争的例子:

- 南方与北方经济日益增多的联系,使南方的工人在那些受北方生产者、投资者以及消费者控制的市场力量面前深感无能为力。
- 同样的趋势在北方产生了相反的后果:工人因他们所在的公司迁往劳动力廉价而工会又受到压制的国家而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 旅行和通讯方面的改进,令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激进分子们前往那些抗争发生地,同那些与他们自己一样的激进分子们举行会晤,组成跨国联盟成为可能。一种特殊的聚集手段则是互联网,它起到了当初报纸和电视所起的作用(Bennett 2005)。
- 文化与制度的标准化,使得激进分子们更易于以相似的方式去建构各种问题,它同时也使得典型形式的抗争更易于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理解和采用(Boli 和 Thomas 1999)。

是的,全球化正在对抗争政治产生重大影响(Tarrow 2005: 第二章; Tilly 1995)。然而,作为用以理解跨国激进主义的一个导向性概念,全球化本身可谓是既表明了太多又传达了太少的东西。说全球化这一概念本身向我们揭示出的东西太少,是因为它忽略了导致人们致力于从事抗争政治的诸机制与过程。如果说,前几章已经向我们阐明了任何东西的话,那么,它们所表明的是:那种着眼于探索机制与过程而不是仅仅将那些大的变化彼此关联起来的办法所具有的价值。但全球化本身又可谓是向我们传达出太多的东西:我们在当今世界上看到的许多跨国激进主义并非都直接导源于全球化。

来考虑一下那些伊斯兰好战分子,那些向以色列定居点发射炮弹,在以色列公共汽车上放置炸弹,以及那些偶尔在以色列的咖啡馆或餐馆里引爆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们。尽管他们肯定是未来巴勒斯坦国预期的行动者,并且成为受1979年伊朗革命的激励而形成的诸多暴力性质的伊斯兰跨国组织之一,但他们与全球化又有什么关系呢?尽管他们属于一个重要的跨国运动——政治伊斯兰主义,但只是借由一种宽泛的想象抑或松散的定义,才得以与全球化产生联系。全球化确乎是一种威胁,一种激发许多跨国激进分子尤其是那些针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而提出要求的跨国激进分子们采取行动的威胁;然而,就其作为一种解释跨国抗争的“主过程”(master process)而言,则全球化尚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

国际化这一术语更好地概括了那些令国内政治行动者与跨国抗争政治联系起来之诸机制。从国际化当中,你将会发现一种与我们所使用的政治机遇结构概念相类似的对应物。政治机遇结构我们在第三章中已有介绍,并且已经以地方、地区以及全国性的不同层次而出现于本书中。国际化经由两种成分而对机遇结构产生影响,这两种成分分别是:(1)国家、政府官员以及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横向联系日益增多;(2)国



家、政府官员以及非国家行动者与国际机构及国际组织之间的纵向联系日益增加(Tarrow 2005: 第二章)。

这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国家、非国家行动者以及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间日益增加的相互联系是发生在安妮—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 2004)称之为“一种新世界秩序”的框架之内的。不妨回想一下导致西班牙法官提出将皮诺切特将军从英国引渡至西班牙这一要求的若干因素:一场“南锥体”(Southern Cone)各独裁政权军方向形成的跨国阴谋,英国和西班牙律师及地方法官间的跨政府合作,以及普世司法权  
177 这种国际法新理论,这些因素让加森法官努力去引渡皮诺切特。

如同皮诺切特案所表明的,合法化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当国际上达成的协定变得越来越复杂且关涉到更大量的行为者时,则它们便需要一个合法的体系,而这一合法体系又反过来要求建立一些国际性的专门小组或国际机构(Goldstein 等 2001)。国际化在这方面的进展,反过来又造成一些导致跨国团体形成与相互合作的焦点、动机及威胁。当后者彼此发现对方的存在并发现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时,跨国联盟及跨国运动也便继之而来了。像那些构成了民族国家内部政治机遇结构的机构一样,国际化就像是一个各国政府、公司以及一些非国家的行动者都围绕它而转动的珊瑚礁。

国际化引发了一整个系列的机制与过程:

- 国际争端内在化从国内抗争中暴露出来。
- 一场国内争端广泛传播至其他国家的政治中。
- 由跨国代理人实施的跨国同盟居间联络。
- 从国内向国际层面发展的抗争的界限激活与规模转变。
- 动员采取了诸如戏剧性的“西雅图之战”——环境保护主义激进分子与劳工激进分子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之类跨国抗议

事件的形式。

- 最富戏剧性却也是最难以完成的创新之举,则是由国内激进分子组成的一些**联盟**,造就出持久的跨国社会运动。
- 就跨国运动取代国内抗争的程度而言(我们要赶快补充说明的是,尚未有很多此类发展的迹象出现),它们将**钝化**国家间的**界限**,并在更大范围的国家格局中**激活**新的**界限**。

跨国范围内的非国家行动者包括了非政府组织、职业与服务团体、国际抗议事件的偶尔的参与者,以及真实发生的社会运动。许多这类行为者感觉到他们受到来自全球化及其对世界贫困地区造成的冲击的威胁。但他们还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国际机遇结构内动员起来。像国内出现的机遇结构一样,国际机遇结构同样是各种机遇与威胁的结合。它在制度性与非制度性政治的缝隙间发挥作用,为挑战者们提供临时的盟友,并且随较大范围的政治变动而兴衰起落。

178

三个因素使得这一新的国际机遇结构对激进分子们尤其具有吸引力:

- 首先,其机构性集中地点与全球化的威胁密切关联。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对南方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起到了促进作用。
- 其次,国际机遇结构为那些机敏的激进主义分子从产生共鸣的地点中“寻求集中地点”,提供了许多国内与国际地点,而这些产生共鸣的地点与人相得益彰。显然,对于那些试图对皮诺切特提出指控的,包括从伦敦到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与流亡者团体来说,情形就是如此。
- 第三,这些激进主义分子可以从事跨国激进主义活动而无须放弃他们在国内的活动。相反,他们却由于受其在国外的种种经历的激励而常常回归于他们在国内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常常带着他们

从国外经历中学会的激进主义新模式,并保持着与他们在这些事件中所遇到的那些人的密切联系而回归到他们在国内所扮演的角色(Wood 2004)。

全球化的威胁与国际化的机遇已经令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分子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关注其国内政权转移到了关注国际体系,从关注国内的对手转向关注一些国际公司。与此同时,如果说一些国际机构在贸易控制、货币事务以及发展问题上其作用日益增长,那么,一些数量不断增加的支持者团体与激进主义团体,则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聚焦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机构身上了。

那么,这种跨国抗争又是如何被称为一种混合体制呢?这里,答案就在于,国际层面的抗争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以各种不同方式发生的一国之内的抗争。

首先,尽管并非所有的一国之内的抗争都直接针对政府,但政府却形塑着抗争、对抗争做出回应、镇压那些超出其许可范围的行动者,并为那些愿意与各种机构进行互动的行动者提供潜在的盟友。尽管跨国行动者在个别政府、国际机构或跨国公司中找到其焦点所在,但世界政治中,则根本不存在像某个国家的政府那样——抗争可以围绕它而得以被组织起来——的稳定焦点。

其次,为跨国社会运动建立基础,较之在国内政治中完成同样的任务,难度就更是非常大了。这里,不妨回想一下我们曾提及的社会运动基础概念好了:想要在国内政治中建立和动员起社会运动基础已是如此艰难,而要在跨国政治中做到这一点就更是艰难了。其结果便是,跨国社会运动活动通常都是短暂而不确定的,常常以悲剧性的失败告终。

第三——这一点因第二个因素而来——那些试图建立跨国社会运动基础的激进主义分子,主要是在他们所采取的让一小部分处于国际层次的世界主义者组成的核心成员与居于不同国家内部的各种组织团



体建立联盟的策略上,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一策略面临着许多机遇和威胁,而他们的要求也可能仅部分地与那些试图协调其集体行动的跨国激进主义分子的做法相一致。

跨国抗争的吸引力及困难,都可以从当今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混合体制——欧盟——中看出来(Hooghe 和 Marks 2002; Imig 和 Tarrow 2001)。那里,抗争行动聚焦于布鲁塞尔,那儿集中了一大批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同时上演过许多跨国抗议事件。但一些国内的激进主义分子,包括法国的农民、比利时的工人、意大利的补助金领取者、英国的环保主义者,则一再针对诸如减少农业补贴、关闭工厂、削减年金计划以及进口转基因种子之类的国内政策问题,而在各自国内举行抗议活动。一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有时会在协调欧盟内不同国家的集体行动方面获得一些成功,但欧盟各机构之间的差别,以及激进主义分子在(迄至目前)欧盟所拥有的 25 个不同国家内所面临的种种机遇和威胁,却使得协调工作成为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 结 论

以色列定居者反对撤离加沙的运动与皮诺切特案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呢?当然,两者都令社会运动政治与致命冲突相结合,也都将制度性的精英分子与普通民众卷入其中。不仅如此,在二者当中,一些我们在本著中始终加以强调的机制——传播、界限激活、居间联络——都结合于一些关键的过程:动员、规模转变以及形成联盟中。混合体制中的抗争,以不同的方式及不同的形式,而呈现出我们在“更为纯粹”形式的政权中所看到的类似机制与过程。

180

然而,就像我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研讨过的社会运动政治和致命冲突,通过与一些背景性因素的结合而产生出殊为不同的结果一样,我们在本章中探讨的两种类型的混合政权也各自有其独特的动态结

构。例如,像以色列/巴勒斯坦这样处于分裂状态的政权,便以极端的形式展示出我们在此前见过的一种机制——两极化。在那里,两极化涉及到在一度统一的运动组织的左右两翼之间产生日益加大的意识形态距离,以及运动领导人与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恐怖主义间的分歧。我们在意大利的抗争(第五章)与苏丹的斗争(第七章)中就曾见过两极化现象。

两极化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产生了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原因就在于由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发起的运动与巴勒斯坦人的运动,都因两极化而使得各自运动中的温和派与一些激进的小宗派之间彻底分裂。而这两场运动向有限度的抗争发展的步伐也由此受阻。尽管以色列的一些政府机构及其国际盟友都对温和派予以鼓励和支持,但当每一次温和派似乎即将会聚之际,以色列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中就会有一方或双方同时出现一些激进分子,他们会立即抓住机遇而使形势重新归于两极化。同样出现的一连串的部分会聚、致命性暴行以及重新两极化现象,曾经阻碍了北爱尔兰在1998年《复活节协定》签订后朝向公民政治回归的前进步伐。两极化出现于各种不同的场景中,但处于分裂状态的政权所独有的特征则是:导致双方分裂的那堵高墙,在其两侧同时培育出激进化的趋势来。

跨国政治所遭受的则是一种不同的对抗性结构之害。尽管有些人已经看出国际政治正在从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世界向全球公民社会发展,但我们的看法却是,国家将是世界政治中的恒在之物。这一信念意味着,尽管国家正日益被拉入国际协定、联盟以及机构当中,但其盟友及冲突基本上还是由它们对于认同和利益的界定来决定的。例如,尽管英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反对种族屠杀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与《反刑讯公约》(Torture Convention),但它却从未真正执行过这两个公约中的任何一个。当形势十分紧要,而支持引渡皮诺切特的联盟也在大力推进其要求时,便要维护每个国家享有审判其境内犯罪分子的主权,这

时布莱尔首相的人道主义本能以及他所领导的工党与智利左翼之间的那种密切联系，就远不如英国的国家利益在维护每个国家都享有审判其境内的犯罪分子的主权时来得那么强有力了。

皮诺切特案与当前其他国际政治事件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当遭受 2001 年“911”事件毁灭性打击的美国发起了一场针对恐怖活动的“反恐战争”时，这场战争本身却内含着一场毫无限制的实施逮捕、绑架以及对那些被怀疑为参与恐怖主义的人进行审讯的系列活动。美国所采取的这一战略导致了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建造非法监狱，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及其他地方虐待囚犯，以及将一些犯罪嫌疑人“引渡”至那些经常对囚犯实行刑讯的国家。当布什总统继续宣称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推进民主时，一个新版的“秃鹰行动”则以我们迄今还仅能对其加以想象的结果而处于秘密运作之中。

181

让皮诺切特政权的罪行得以公之于众并交由智利法院审理，前后耗时达 20 余年。其所以出现这种延误，部分是因为皮诺切特政府对其公民刻意隐瞒了所犯的罪行，同时也部分地源于它们是发生在一个较之今天的全球体制更少全球化也更少国际化的世界的缘故。2004 年，有关伊拉克监狱虐囚事件的数字照片，很快就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传到了美国，一些国际人权组织随即展开了对事件的调查，调查结果引起了对所谓伊拉克“解放者”的谴责。2005 年，美国将一些囚犯引渡至某些不为人知的目的地，因运送这些囚犯的飞机的飞行日志曝光使这一消息广为人知。到当年年底时，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名声已降至一个新低点，而美国参议院也就虐囚行为做出了谴责。在一个部分整合的全球体制当中，国内抗争与国际抗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观察结果告诉我们，全球化与国际化具有混合性的后果。那些使美国得以在东欧和阿富汗建立秘密拘禁中心的过程，同样也使美国的这些违法行为暴露于全球舆论的面前。类似地，那些促成了诸如“大赦国际”与“人权观察”之类“好的”非政府组织形成的过程，却也为 2001



年“911”事件的凶手形成(组织)与流动性提供了便利。正如没有任何单一的轨迹适用于所有的抗争政治，跨国政治也不存在任何确定性的后果。最后一章我们将重点强调那些重要的结论。

## 第九章

# 抗争的现在与未来

我们以一桩发生在 200 年前的小事，即后来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托马斯·克拉克森在他赶往伦敦的路上停下来坐在路边，开始了我们有关抗争政治的研究。这一显然无关紧要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终结奴隶制的运动，这场运动从英国开始，继而传播到西欧并越过大西洋，最终导致美国发生内战。这里，我们将以一桩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同样具有地方性的事件，来作为本书的结尾。该事件属于 20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系列抗争行动——民权运动——的一个环节，在本章中，我们将利用这一运动，来扼要重述本书所提出的一些教益，并利用该运动作为平台，回顾我们已提出的许多问题中的某一些，以及某些我们只是有所暗示的问题。

### 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抗议

当 4 名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位于格林斯博罗仅供白人就餐的快餐馆里就坐时，静坐行动已经在美国南部的一些地方开始了。不过，发生在南方的这些静坐行动多半都是由一些民权组织事先计划好了的，而

这4名衣着讲究的黑人大学生(大学一年级)却是事先未经宣布,而突然出现在一座南方城市中心的一家仅供白人就餐的快餐馆里。就在格林斯博罗的静坐行动即将结束时,它又引发了道格·麦克亚当和威廉·休厄尔(2001)将称为“一桩具有变革能力的事件”(另参见 Andrews 和 Biggs 即将出版的著作; McAdam 1999: 138—40)。这群大学生们上演了一幕具有强烈逾越界限意味的抗争表演行动,但他们却是以极为文雅而有节制的方式进行的。他们发动了一场由黑人大学生及其同盟者参与的社会运动。

如我们已研讨过的许多事件一样,偶然性与能动作用在格林斯博罗的静坐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位名叫富兰克林·麦凯恩(Franklin McCain)的大学生后来回忆道:

行动策划过程开始于星期天的夜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想大概是约瑟夫·麦克尼尔(Joseph McNeil)说:“现在,是我们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已经聚到了一起,而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我们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谈及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说了许多,但事实上却做得很少。”在选定了斗争方法后,我们就说:“让我们去到一家店里,要它为我们提供服务好了。”当时肯定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作“静坐”或“就座”(Raines 1977: 76)。

以民权运动在当时的状态,它并未预示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抗议会在那个时候发生。因1954年高等法院做出“布朗”判决而引起一阵骚动过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抗议活动已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Andrews 和 Biggs 即将出版的著作)。根据麦克亚当(1999)通过《纽约时报》而对民权运动绘出的形态图,克雷格·詹金斯及其合作者绘制出有关1947年至1997年间民权运动中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图表(Jenkins, Jacobs, 和 Agnone 2003)。如他们在图9.1中所提供的数据所表明的,紧随“布朗”



判决之后,各种抗议活动与整个民权运动事件在数量上都出现了下降;1960年的静坐抗议则彻底扭转了这两种下降趋势。

继格林斯博罗静坐抗议发生后,静坐抗议迅速蔓延至整个南部地区。肯尼斯·安德鲁斯(Kenneth Andrews)和迈克尔·比格斯(Michael Biggs)(即将出版的著作)评述道:“抗议活动在随后的一些天里一再重现,参加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一星期后,静坐抗议开始扩散至其他城市。这典型地意味着学生们在闹市区廉价商店的快餐馆里占座,是为了表明他们对于公开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抵制以及对正常商业运作的破坏。”(1—2)

(事件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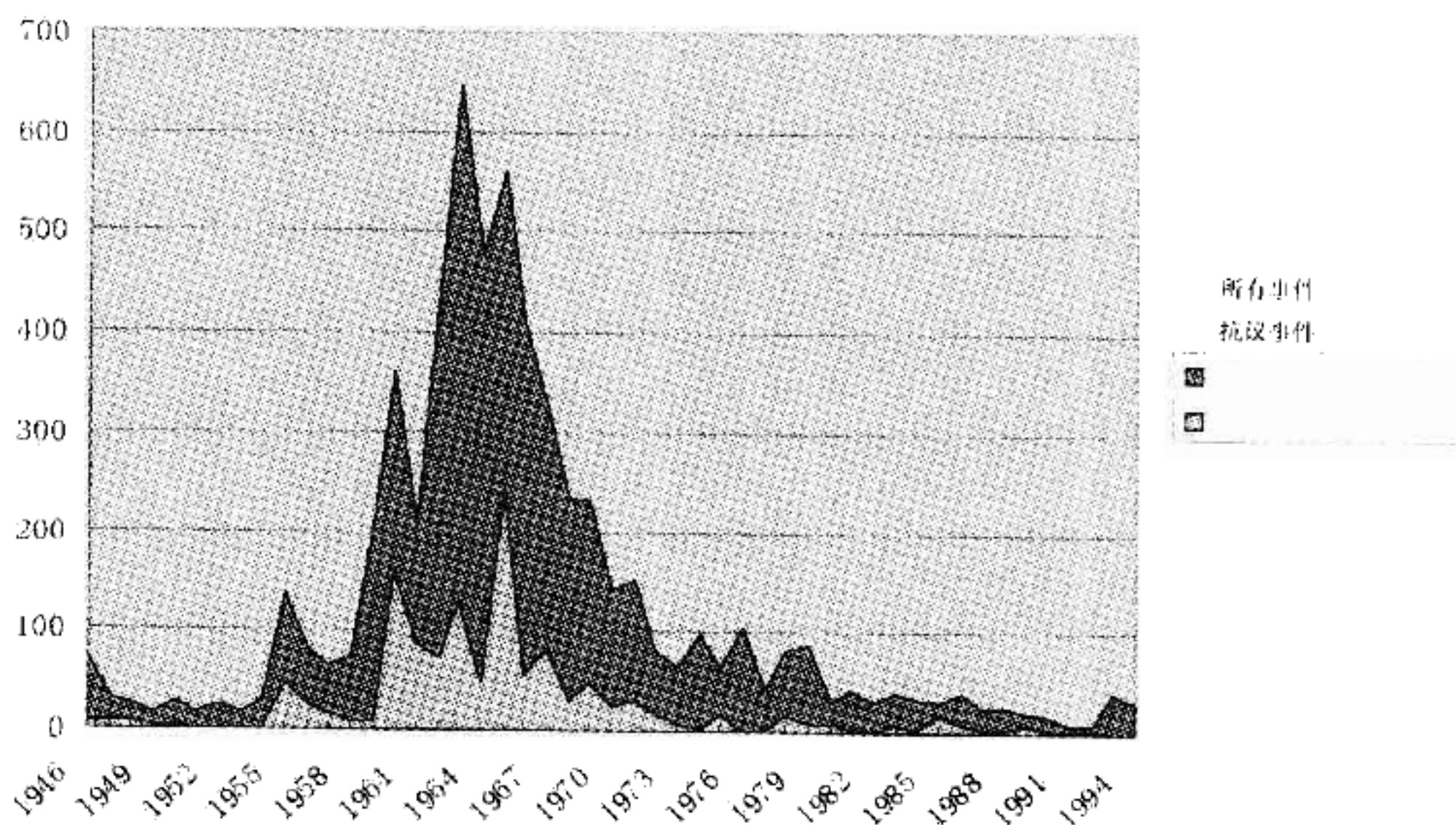


图 9.1 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及抗议事件总数

资料来源:承蒙克雷格·詹金斯允许采用其所制图表

学者们在有关学生静坐的计划性与自发性，关于媒体与民权组织在静坐抗议行动的传播方面所起作用上存在着不同看法（Andrews 和 Biggs 即将出版的著作；Killian 1984；McAdam 1983, 1999；Morris 1984；Oberschall 1989；Polletta 1998）。但他们都一致认为，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抗议行动提供了一个让南方各地可以轻易掌握并迅速传播到整个南方的典型（模式）。在最初的抗议行动发生一个星期之后，类似的静坐抗议活动也出现在其他城市，先是出现在邻近格林斯博罗的一些城市，最终则遍及南方各个城市（Oberschall 1989，注释 4）。到 1960 年 4 月，发生静坐运动的城市已达到 70 多个（Andrews 和 Biggs 即将出版的著作）。我们可以从图 9.2 所示的安德鲁斯和比格斯绘制的学生静坐地点图中看出，这场静坐运动究竟传播得有多远。

民权运动与我们在第六章中以诸多不同方式加以评述的社会运动活动颇为相似。其中所述及的所有 3 个事件都利用了各不相同的政权体制所提供的政治机遇，并经由一系列大致相似的机制与过程而取得进展。所有 3 个事件都建立在各自的社会运动基础之上：波兰的天主教会、美国新妇女运动中潜在的女权传统以及黑人教会和 20 世纪 50 年代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动的合法运动。所有这些都具有意义深远的后果。

倘若本著的标题是《社会运动》的话，那么，读者在读完第六章之后便大可以休息放松了。不过，与许多聚焦于社会运动的精彩文本不同的是，我们所针对的目标范围较之更大一些。通过将第六章的两个案例与我们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所探讨的若干案例相比较，你便可以看出，社会运动只不过是抗争政治之一系列不同形式中的一种而已。尽管我们已探究的所有抗争事件，都针对政府当局提出要求，在提出要求时都采用了公开的抗争表演，都利用了集体行动的传统抗争剧目，都与各自政权体制内有影响的成员形成了同盟，且都在创造出新机遇的同时利用了现存政权中的诸多机遇，但就其在利用各种制度性程序以提出要求时



图 9.2 美国南方的静坐抗议活动,1960 年 2 月 1 日—4 月 14 日  
资料来源:安德鲁斯和比格斯即将出版的著作。

所达到的程度而言,这些事件之间却有着很大区别。

大学生的静坐抗议及其他类似的行动,并非非裔美国人抗议活动的最高点。如图 9.1 所示,抗议活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不过,静坐抗议却导致了南方所推行的种族隔离主义政策实践出现裂痕,并为其他的抗议行动提供了一个范本。其他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挑战行为都追随着快餐馆静坐抗议的榜样,并以针对公共汽车终点站、电影院以及乘坐公共汽车时的种族隔离主义政策而达到顶峰。由于静坐运动在抗争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及其所得到的如此充分的研究,则美国大学生的静坐运动便有助于回顾我们在本著中的主要阐释。

### 我们都了解到什么?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好了。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为你们提供了描述与分析我们概述过的那些故事的基本导向。格林斯博罗的 4 名学生在伍尔沃斯发动了一场静坐运动,而该运动实际上针对的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所制定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如此行事之时,学生们将他们自己构建为政治行动者,并且采用了那些不愿意接受被加诸其种族成员身上的从属地位之人的政治认同。而当他们在一家快餐馆中坐定时,其行动则成了一种政治表演,一种来自于抗争剧目却又像爵士乐乐手即兴演奏般有所创新的斗争方式。当他们如此行动之际,他们又与一些公共机构,新闻界、警察以及最终与市政府展开了交锋。他们还卷入到一场存在于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不断产生的更大的冲突之中。他们发动的是一场典型的社会运动之实际行动。

借由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提出的若干概念,我们便能对抗争开始之地(例如,伍尔沃斯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各种相关条件加以描述。继而,



我们还能够确认并描述发生在那些抗争地点的抗争事件及抗争片段（学生们在快餐馆里和平占座，警察、公共权力当局及第三方对此做出反应；联邦政府和法院之最终介入）。不仅如此，借由这些概念，我们还可以就这一系列抗争行动与公共政策方面的变化——公共政策朝向平等而无种族界限地利用公共设施的方向发展——之间的联系，从总体上加以描述。

但我们不能就此便从运动积极分子们的行动直接转向政策后果。我们首先需要从片段中探寻那些导致重要变化的各种机制与过程，尤其是传播这一关键机制。当然，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传播几乎不会独立地发挥作用。静坐抗议运动是通过对整个南方各大学学生的行动进行协调这一居间联络机制而得以广泛传播的；它同时也是通过合法性确认，如学生们在寻求得到立法者、法官以及接受其所提要求的各种机构承认其为合法行动者，以及通过界限激活，如他们在行动中坚决主张黑人拥有和白人一样在快餐馆同一侧就坐的权利，而得以广泛传播的。

第三章为我们带来的是超出学生静坐事件本身的一些教益。如同我们在第三章中加以详尽研讨的那些案例一样，静坐抗议行动针对政权、抗争剧目以及机遇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反应。还记得抗争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同不稳定的委内瑞拉政治史上的政治权力变化密切相关的吗？这些关系在像美国这样稳定的民主国家当中也一样发挥作用。与独裁政权——抗争剧目在其中常常是僵化而缺少创新的——截然不同是，美国的政治总是会给抗争剧目的创新带来开放而不受限制的种种机遇。这一点在急速政治变动时期表现得尤为真切。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史上，静坐行动标志着挑战者在其所利用的抗争剧目上的重大变化，对此，政治精英们得慢慢适应（McAdam 1983）。等到警察与公共权力当局学会如何去反应时，一系列新的抗争剧目又开始出现，而各种新的抗争表演也得以产生，从而令他们依然无法有所作为。

第三章还就政权体制的特点与抗争剧目的变化之间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做出了解释。不仅某个政权的特征决定着抗争,而且抗争变化反过来也会导致政权体制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波大范围的抗争浪潮,首先便是导致了許多此前被视为不合法的抗争形式得以“正常化”(Piven 和 Cloward 1992)。它同时也使得抗争政治扩散到一些新的人群当中,如妇女、具有拉美或西班牙血统的美国公民或居民以及男女同性恋者(Meyer 和 Tarrow 1998)。它还促成了自一战后赋予妇女选举权以来美国政治之最重要的民主化进展。在“自由之家”有关世界政治所做的等级评定中,美国在政治权利的范围与公民权的保护方面均位居榜首(图 3.3),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非洲裔美国人针对种族隔离主义所展开的斗争。

变化不会随便发生。如同出现在我们已仔细研究过的许多事件中的情形一样,学生们利用了一种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政治机遇结构。第三章指出,我们可以通过政治行动者对六个方面的机遇做出的反应,而对任何政权体制中的政治变化加以描述。这六个方面的机遇是:(1)该政权内部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2)该政权对于新行动者之开放性,(3)现行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4)挑战者获得有影响的盟友或支持者的有效性,(5)该政权镇压或推进集体性提出要求的程度,(6)第 1 至第 5 条所列各项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民权运动中的抗议者们利用了所有这六个不同维度的机遇。

尽管美国政治体制中存在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并未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起到什么促进作用,但还是对学生运动颇为有利。1960年,黑人大学学生的日益集中使其成为一支可资利用的支持力量(Andrews 和 Biggs 即将出版的著作)。在像格林斯博罗这样一些黑人中产阶级正处于形成中的地方,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们在当地的黑人社区或教会当中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同盟者。而联邦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介入种族关系问题,也对抗争政治起到了激励作用。

此外,由于处于众目睽睽之下,警察和地方政府当局在对一群衣着考究的大学生以和平方式举行示威采取镇压时——尤其是当一些白人也卷入其中时——显得有些犹豫和迟疑;而静坐抗议行动又正好适宜于电视这一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媒体形式,二者配合得很好(Andrews 和 Biggs 即将出版的著作)。就这样,静坐运动得以在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美国政治机遇结构的狭窄缝隙中发展起来。它促进了美国政治互动特点的改变,并且改变了存在于美国政治中的公认的界限。静坐运动是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活动。 190

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某一事件所导致的计划或政策而对该事件的后果做出评价(Giugni 等 1998, 1999; Meyer 等 2005)。第四章对挑战者从认同、地位及计划三个大的方面提出其要求进行了解释。认同要求宣告了一位行动者的存在,这些要求回答了“我是谁?”以及“我怎样与你有所关联?”的问题。地位要求表明,这位行动者属于特定政权内部的一个合法类别,故而应当享有此类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和尊重;因此,地位要求常常暗示对进一步的问题“我想要这种关系如何发生变化呢?”做出回答。计划要求则是针对要求的对象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而提出的要求:做什么、停止做什么、让其他人去做什么,等等。

尽管民权运动的确为美国的各级政府、商人以及公民在其行为方面的根本改变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计划,但它所寻求的却不仅仅是这些计划性的变化。静坐示威及其他抗争表演也对传统的界限提出了挑战,这些界限允许美国黑人从快餐馆买到汉堡包,却拒绝给予他们在餐馆内就坐的权利。从根本上说,美国黑人的这一要求与认同密切相关,而认同问题则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黑人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权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促进了认同重估的过程(Burns 1997: 244)。

非洲裔美国人还要求对他们作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地位予以承认。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挑战界限的行动,从各级法庭、立法机关以及一些委员会和组织那里得到合法性确认。他们还通过我们在第四章中研



究过的界限激活机制，以寻求改变他们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关系。然而，界限改变则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一些非洲裔美国人接受教育、横向的地域流动以及职业变换，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新的界限也就在那些脱离了北方城市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与那些仍旧留在聚居区里的其他人之间出现了。

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与一些大的政治过程关联在一起的。还记得我们在第五章里介绍过的一个重要过程——规模转变吗？该过程是一个将传播、相似性属性、居间联络以及仿效包含在内的综合过程。同情性示威将运动带到了北方。而当学生们于4月中旬在北卡罗来纳的萧尔大学举行集会时，相互协作则从局限于当地的协作发展到了地区性协作的层次。这次集会最终导致“学生非暴力协作委员会”(SNCC)的成立，该委员会随后扮演了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角色(Andrews和Biggs即将出版的著作)。学生们的静坐示威活动不仅得以横向传播，同时也引发了从美国政治的地方性向全国性层次的向上规模转变。

第五章介绍了本书所考察的两个最大的过程：动员与遣散。我们在占领里昂的圣伊泽尔教堂以及意大利的系列抗争中目睹了它们一前一后起作用。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就会意识到，我们曾在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委内瑞拉的斗争、萨帕塔起义以及前苏联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见识过这些过程。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那些我们将其视为与动员一致的互动性机制，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传播、居间联络、合法性确认以及界限激活。通过这些机制，意大利因教育改革问题而引发的冲突，从北部的一些大学和工厂，传播到中学、城市中心以及整个经济当中。同样，格林斯博罗的快餐馆静坐活动，也开启了一个将美国民权运动推向新的更具战斗精神阶段的动员过程。

然而，动员却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所有的系列抗争最终都会走向衰退，有趣的是它们的结果却各不相同。在第五章中我们看到，许多机制结合在一起导致意大利和前苏联抗争的遣散。其结果却殊为不同：在



意大利,一部分在 1968 年涌现出来的反对派团体以恐怖主义的“红色旅”而告终,与此同时,更大部分的反对派组织却进入了政党系统或者政治机构当中。俄罗斯的情况则相反,在那里,当种族冲突压倒了民主运动时,一场导致脱离苏联的民主运动则随之瓦解,遣散也因此而表现得更为强烈。同一些机制则将美国民权运动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兴起引向了 60 年代末及其后的渐趋衰落。而如果我们让叙述的范围超越 60 年代中期的静坐示威与选民登记运动这一时期,那么,我们就可能越来越多地看到如下这些机制:

- 运动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竞争**。当一些较为温和的组织力争与较为激进的对应组织保持一致时,竞争最初是健康有益的。但是不久,较为激进的“种族平等大会”(CORE)以及新成立的“学生非暴力协作委员会”,却开始对较为温和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SCLC)提出批评,批评它们与华盛顿 192 站在一起。
- 镇压(压制)**,既有直接的镇压,像种族隔离主义者针对学校校园里废除种族隔离而逐步形成的一场广泛的反向运动(Andrews 2005);也有间接的抑制,像 60 年代末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将政府关注的焦点,从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转向发动一场导致政治分裂的打击犯罪的战争(Button 1978)。
- 背叛与幻灭**,当非洲裔美国人看到运动中提出的那些计划性要求未能得以满足,许多人放弃斗争时,背叛与幻灭出现了。
- 制度化**,当《投票权法案》将抗争地点从草根阶层转到选举和常规性政治活动上时,制度化发生了。

## 社会运动基础与社会运动活动

第六章首先对那些未能形成持续性运动的集体行动事件(例如,波兰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做的反应),与那些发展成持续性运动的集体行动事件(例如,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进行了区分。通过对比1956年波兰发生的短命的罢工浪潮与历时较长的“团结工会”运动,在更具一般性的意义上凸显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一区别与波兰政治体制变化和苏联集团内部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章还介绍社会运动基础与社会运动活动之间的根本区别。

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及其他地区大多数有关社会运动的著作,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常常将某一社会运动的基础与该运动活动结合在一起。然而,社会运动基础系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所组成;而社会运动活动则是一种以当权者治下民众的名义发动的、针对当权者持续性的公开和集体挑战。

193 本书对此一区分相当重视。通过利用美国新妇女运动作为重要实例,第六章向人们表明的是,一些社会运动的基础有可能具有广泛的范围且浸润于传统之中(Rupp 和 Taylor 1987),但由于缺少一个动员的过程,缺少与其他重要因素的互动,它对于政治变化的影响则仍然是无足轻重的。在许多年里,一些妇女运动的基础对于该运动参与者的个人生活影响甚大,但对美国的公共政治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妇女们通过与立法者展开互动、偶尔举行抗议活动、组成利益集团以及构建其自身的新形象,由此则构成了这场社会运动活动。

计划性要求的失败再次出现,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即是不幸的“平等权修正案”运动(Mansbridge 1986)。然而,诸如“全国妇女组织”之类的公众利益团体,“全国妇女政治讨论会”(NWPC)之类的院外游说团体,以及“国防部现役女兵问题咨询委员会”(DACOWTTS)之类的职业团

体，却作为推动妇女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一种新认同和一种新地位社会运动基础而产生出来。

第七章有关致命冲突的若干教益也与美国民权运动的斗争轨迹有关联。如我们在其中所看到的，在独裁与半独裁的政权中，提出要求者更可能运用致命的手段或遭遇致命的手段报复，由此而不断引发越来越具有暴力性的互动、激进化和镇压行动。统治者的无情抵抗常常迫使那些旨在谨慎地采用社会运动剧目的人，转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1950年的俄国革命，其实就开始于一位牧师引着一群饥饿的市民，试图和平抗议以争取食物。当哥萨克骑兵将其荡平，抗争便转向了暴力，革命也随之而来。

第八章同样也为理解格林斯博罗的静坐行动提供了一些教益。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南方的政治体制属于一种混合政体。虽然当时南方的各级政府并未采取如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与处于戒严法之下的阿尔斯特那般明显的镇压措施，但在代议制政治的外表之下，南方各级政府的统治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压制性。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看到的，当时南方的情形是，社会运动政治与致命性冲突相互交织、互相转化。而就局部地区来说，格林斯博罗的抗议者们所面对的则是：诸多歧视黑人的法律和习俗、黑白人种的相互隔离、意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选举法以及一种随时可能引发暴力争斗的敌意气氛。

像俄罗斯的抗议者一样，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也通过调整其所采用的抗争剧目以应对种种形式的镇压措施，在这一点上，他们所采取的方式较之俄罗斯抗议者们甚至表现得更有节制些。在他那篇富有启发性的文章“策略创新与反叛行动的进展速度”中，麦克亚当(1983)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当局的压制性策略与民权运动组织用以回应这些策略的诸抗争形式间的互动性动力上。每当一种新形式的镇压措施作为对抗议者行动的方式而出现时，民权运动组织者们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并且相应地重新设计出一种新的斗争方法。在那些提出要求者们所面



对的是暴徒们的棍棒与警察的灭火水龙带的地方，策略上的创新性显得格外重要。

更为复杂的是，民权运动引发了一场反向运动，这一反向运动兼具致命与非致命的特点(Andrews 2002, 2004)。一方面，当黑人学生在联邦政府的保护下得以进入公立学校时，那儿的白人学生便会退出这些公立学校，转而进入那些由清一色白人在其中就读，且常常得到一些州政府支持的学校。另一方面，三K党及其他种族主义团体则使得那些参与民权运动的工人以及敢于行使自身权利的非洲裔美国人，时有生命危险。混合政体中的社会运动政治常常成为一桩危险的事业。

随着系列运动的渐趋衰落，一些黑人好战分子们转而选择了一条从事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之路，这一做法与意大利抗争结束之际的“红色旅”的做法颇为相似。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好战分子都选择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如我们在第六章的讨论中所预言的，尽管好战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忙于使他们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抗争逐步升级，但同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转入到制度性政治之中，另一些人则利用他们的声名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还有一些人则退入宗教性的小团体或者民族主义的分裂团体之中。部分是回应反对种族平等的反向运动所造成的威胁，部分也是由于极端依循其好战的逻辑，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团体将白人排除在外，热衷于使用具有暴力性的言辞并且在城市地区与当局及反对派发生冲突。这些激进团体终于招致美国政府动用武装力量对其实行打击，由此促进了这段对抗时期趋于结束(Button 1978)。

但南方的致命政治是在一个同样也鼓励社会运动政治的全国性法律和政治背景中展开的。民权运动中的抗议者常常遭到攻击和谩骂，有时甚至遭到谋杀，但此类反应却发生在一个全国政府为民众提供保护性协商的联邦体制之中的。这一混合情形需要超乎寻常的克制、需要利用诸如黑人教堂之类得到合法性确认的机构、需要有创造力的领导阶层以及在华盛顿和北方拥有自己的盟友。这些因素最终导致美国在民



权和投票权方面做出重大改革，同时也导致一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政治阶级形成。

## 国内 / 跨国互动

迄今为止，像大多数美国的观察者们所做的那样，我们一直是在一种严格局限于国内的意义上来谈论美国民权运动的。然而，尽管格林斯博罗的抗议者们也许从未把自己看成是跨国激进主义分子，但民权运动本身却是深受国际政治影响的。1960年，当时的美国正致力于和苏联的“冷”对抗，这无疑是具有潜在致命性的对抗。美苏双方都在谋求得到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民众的支持。而亚非拉的大多数地区此时则正在使自身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摆脱出来获得解放。当超过20%的美国人受种族主义政策影响而生活在隔离地区，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学校并且没有权利在公共快餐馆叫一份汉堡时，美国又何以能声称自己要去领导一场发生在美国之外的自由运动呢？美国所从事的国际性“冷战”给国内政策造成了种种压力，而这又为美国黑人创造了新的机遇（McAdam 1998）。与此同时，同样的一些压力也推动着美国政府彻底改变其实行了40年之久的具有种族歧视性质的移民法（Ngai 2004）。 195

并非所有激励民权运动的跨国动因都来自华盛顿。从杜鲁门到肯尼迪时期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曾以支持国内公民权来满足其外交政策需要，而黑人激进分子们则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挣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开始之际，就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予以密切关注了。像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一些人就是直接从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中汲取灵感的（Chabot 2003）。而一些黑人民族主义者则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所需的灵感。当格林斯博罗的一群衣着整洁的学生在伍尔沃斯的快餐馆落座之际，其他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美

国的机遇结构不仅受到其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亚洲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影响。这种跨国影响具有双重性：正如小马丁·路德·金把自己视为甘地的信徒，在继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一些年里，像生活在英国的牙买加黑人、法国的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者以及西班牙的犹太移民这样一些各不相同的人，都将各自所从事的斗争行动等同于“黑人力量”（“black power”）。

格林斯博罗的抗议者们并非唯一一群受到国际事件影响的美国人。还记得第二章所提及的康奈尔大学的那些棚户区建立者吗？受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黑人的榜样力量所激励，来自康奈尔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抗议者们，将具有象征意味的南非棚屋与众所周知的静坐行动结合起来。就在他们针对其所在大学校方的投资政策举行抗议之际，他们便成为旨在孤立南非政府的国际联盟组成部分了。在那场论争中，政府与参与该运动的积极分子们还在诸如联合国以及英联邦（the British Commonwealth）之类的国际机构中实现了合作。我们曾在皮诺切特案件中加以考察的跨国抗争的三个方面——跨国激进主义、国际联盟的建构以及跨国传播——在这场反对种族隔离主义的斗争中结合在一起了。

196

## 结 论

我们以比较 18 世纪 80 年代发生在英国的反奴隶制动员与 2004 年发生的一场反对腐败选举的民众抗议运动而开始本书的叙述，而以针对各种不同问题的抗争政治国际化最终结束本书的讨论。其间，我们则对那些发生在欧洲、非洲、中东以及美洲的大量民众抗争进行详尽研究。但仍有更多的工作有待完成：

- 我们始终忽视了亚洲,那是因为我们更喜欢论及那些我们已经对其做过研究或我们懂得其语言的地区。
- 我们几乎没有提及互联网那日益增长的(同时也是受到质疑的)作用以及新兴电子媒体在从事抗争政治时的作用(Bennett 2005; Samuel 2004; Tilly 2004b)。
- 我们几乎没有谈及抗争的社会心理学,在这一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中,许多专家比我们懂得多得多(Klanderman 1997)。
- 很大程度上,我们忽视了各种形式的抗争向新人群的扩散,以及这一情形是否令一度逾越界限且遭到禁止的抗争手段转变为有节制的与得到许可的抗争手段(Meyer 和 Tarrow 1998)。
- 我们也没有打算对所有我们解释过的事件逐一进行系统的经验性说明。要那样做的话,可能就需要另写一部著作,或者就只能是让本书的篇幅极度增加。

至此,你可以对本书所展示的各种工具,及抗争政治的总体动态,下自己的结论。不过,作为一种提醒,我们在此还是提出一些总体性的结论以及一些实际的结论。

现概括如下:

- 尽管它们通常发生在各种不同的政权体制当中,但革命、内战、致命性种族冲突、社会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抗争政治,都由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不同的发生次序以及不同的初始条件而呈现的相似原因所导致。
- 我们可以有效地将这些原因分解成一些一再重现的机制与过程。对抗争加以解释就意味着辨明这些隐于抗争背后的机制和过程。
- 在所有各种类型的政权体制中,从弱能力到强能力的政权,从不民主到民主的政权,政府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日常互动产生了政

治机遇结构,而该结构则大大地限制了各潜在的提出要求者实际能够发动起来的抗争的形式。

- 与此同时,政府行为与民众抗争相互作用而形成抗争剧目——一组有限的、为人所知的、可行的提出集体性要求的方式,抗争常用手法也对抗争在任何政权中可能采取的形式构成限制。
- 不过,抗争中的所有各方都始终不断地在创新与谈判协商,彼此之间常常试图说服、阻止、挫败、惩罚对方或实现合作。此一连续不断的互动使得抗争政治成为一场动态的戏剧,而不是毫无目的地重演老剧本。

抗争的这些总体性特征直接导出了一些有关抗争的实际结论,而这些实际结论对于那些从事抗争政治研究的学人们堪称实用。

·在你试着去确定某些抗争事件究竟是属于一场革命、一场社会运动抑或是其他什么之前,请仔细描述一下该事件及其背景。附录部分对本书所给出的有关描述抗争事件及其背景的建议进行了总结。

·在开始此一过程之初,按本书教给你的方法将你的描述划分为这样一些要素:政府、政治行动者、政治认同、抗争表演、机构等等。找出每一要素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在你弄清楚了何者是你必须加以解释的东西后,此时你就应该转向本书所提出的那些解释性概念了,这些概念不仅包括一开始就曾提及的政权、政治机遇结构、抗争剧目、机制以及过程,还包括抗争地点、条件、抗争之流、抗争事件、抗争片段以及结果。在这一点上,书末的附录可以帮助确立起你自己的解释。

·不要试图对一次抗争事件的所有一切做出解释,而要对该事件中那些最为惊人、最有趣或最重要的特征做重点考察:例如,静坐行动是如何使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关系及其公众形象发生改变的;或如,那



些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以色列定居者们，又是如何在一场反对撤离其定居地的社会运动中，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以色列政府的。

·利用比较法——包括与本书所研究的一些事件进行比较——以将你所研究的事件与其他事件(二者属于同一个大的类别)之间的相似性及不同之处区分开来。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一些比较可能会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在英国反奴隶制运动与乌克兰“橙色革命”之间进行的比较，就是如此。 198

·在有了许多机制和过程作为你的必要“装备”之后，你也就不担心一些大范围的比较了，不过，较近距离的比较同样也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萨拉·索尔在那些产生了棚户区抗议行动与那些未曾出现这种抗议行动的美国校园之间所做的比较，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即便你自己并不从事一些重要研究，你仍然可以利用本书所提供的一些教益，以便更好地学会对那些每天“轰炸”你的有关政治抗争的新闻做出评价。几乎每份日报和电视新闻播报都有关于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抗争政治方面的报道。迄至现在，当播音员告诉你法国人在举行示威、非洲正遭受内战的破坏、伊拉克的反叛者们在美国的“悍马”车下引爆炸弹时，你应该能够对他们所谈论的这些报道有一种较为清晰的想法了。以下是用于评判播音员们所说内容的三点经验：

首先，要留意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习惯性地用来描述抗争的那些极为笼统的术语。并非所有有暴力表现的行为都是“暴乱”，也不是所有的致命性冲突都由动乱制造者引发。事实上，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在民主国家与半民主制国家，尽管大多数破坏财产行为出自普通人之手，但针对人身的最大暴力行为之源却是警察。在确定某特殊的行为属于暴乱行为之前，要先自问一下讲故事者究竟是谁，是一名参与者还是一位旁观者抑或是一位提出要求者的反对者。

其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新闻做出评价。如果有位电视播音员信誓旦旦地告诉你,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入侵行动的开始,大批伊拉克市民推倒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塑像,这时你就应该问一问自己,当时在场的究竟是谁。你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其实,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是美国军队,而在场的为数不多的伊拉克人则是在美军的授意和支持下才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请把这一画面与1989年东欧各地的民众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的情况下推倒苏联领导人塑像时的兴高采烈比较一下吧。

第三,不要停止对实际发生的抗争进行分析。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主要的推理小说之一名为“不叫的狗”。2003年,美国官方欺骗性地向它的民众保证说,他们的孩子被派往伊拉克是为了找出并摧毁萨达姆·侯赛因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有消息透露说,这些武器根本就不存在,为这场入侵行动提供正当理由的情报则属于假情报时,何以只有如此之少的人对此加以抗议呢?当那些因遭受“卡利亚那飓风”袭击而失去家园的新奥尔良居民,在未能得到政府援助的情况下自己对付着度过了几天或者几周,他们又为何不向统治者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呢?

如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有关理论以及有关的叙述所告诫人们的,现代政治内含着一再重现的抗争之流,但它同时也包含着惊人的冷漠。现在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何以那些处于独裁政权中的民众通常都表现得很顺服,而只有在机遇之窗大开的时候才会起而反抗了。然而,民主政权中的公民在他们有权进行抵抗时,为何也如此经常地袖手旁观呢?而民主制又在何时依赖于其公民的积极参与呢?这很可能就把抗争政治研究带到了它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欢迎你加入其中。

## 附录A

# 概念与方法

清单 A.1 辨明了本书所使用的主要描述性概念：政府、政治行动者、政治认同、抗争剧目等等，这些概念成为我们用以描述各种不同抗争的主要术语。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就英国反奴隶制运动与乌克兰“橙色革命”所做的比较清楚地表明，政治行动者、政治认同、抗争表演以及其他诸方面在不同的时间及地点存在着极大差异。这些概念明确了我们必须加以解释的是何种差异和变化。

例如，如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表明的，社会运动与致命的族群—宗教冲突、内战以及革命在发生的环境方面区别很大。由此为我们带来了一些需要予以解释的问题：何种环境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发生而不利于大规模致命冲突的发生，它是如何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发生而不利于大规模致命冲突的发生，又何以如此？使抗争事件与抗争发生的场景联系起来的原因何在？为就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们必须从描述性概念走向解释性概念。

清单 A.2 辨明了本书所使用的一些主要的解释性概念：抗争地点、抗争条件、抗争之流、抗争事件以及抗争片段等等。我们运用这些术语以求从那些描述性因素中找出其发生原因，比方说，通过表明是何种机

制将政治行动者引入社会运动的。第六章和第七章通过对社会运动与大规模致命冲突加以区别对待，展示了殊为不同的政权及政治机遇结构是如何构成这两大类抗争基础的。下面就让我们逐一回顾一下我们所提出的那些主要的解释性概念。

抗争地点包括所有的人为环境，服务于集体要求的发起者(originators)、对象和/或场所。抗争地点可能是个人，但同时也包括那些非正式的网络、组织、邻里关系、职业、行业以及其他社会生活背景。每一类抗争地点都有属于它自身的特性。邻里不会像个人那样行事，而工厂和农业社区的行为方式也会不同于邻里组织的行为方式。

### 清单 A.1 抗争政治研究中主要的描述性概念

- **政府**：位于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某一组织，控制了主要的集中化强制手段并且在某些方面行使着超越所有其他组织的优先权。在 1785 年的英国，政府包括国王、大臣、文职官员、议会以及由那些在全英各地担任官职的代理人组成的网络。
- **政治行动者**：那些从事于政府直接或间接介入其中的集体行动、提出和/或接受抗争要求且可以清晰辨认出其所属群体的人。在乌克兰，即将离职的库奇马总统的支持者、总统候选人尤先科的支持者、内务部的军队以及双方的支持者，全都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行动者角色。
- **政治认同**：当该术语应用于政治行动者身上时，它有效地解答了有关“你们是谁？”“他们是谁？”以及“我们是谁？”这样一些问题。在 18 世纪末的英国，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包括废奴主义者、奴隶主和议会在内。
- **抗争政治**：它指的是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为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导向协同努力的要求；政府



则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提出者抑或第三方面介入其中。

- 抗争表演**：指的是一些相对为人们所熟悉的、标准化的方式，经由这些方式，一群政治行动者向另一群政治行动者提出集体性要求。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参与者们进行了众多表演，其中群众示威最为显眼而有效。
- 抗争剧目**：是指为某些政治行动者所普遍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英格兰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们帮助发明了示威这一政治表演，但他们也吸收利用了请愿、游说、撰写新闻稿、举行公众集会以及其他许多表演。
- 制度 / 机构**：是指存在于某一特定政权内部某些合法确立的、有组织的且得到广泛认可的常规、联系以及各种形式的组织，这些常规、联系以及各种形式的组织一再被用于引发集体行动。18世纪英国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们能够利用诸如宗教团体、议会听证会以及新闻媒体之类的机构为其斗争服务。
- 社会运动**：运用不断重复的行动以宣传其要求，且以维系这些活动的组织、网络、传统以及团结一致为基础的持续性提出要求的运动。

这类提出要求之持续性运动又分为：

- 社会运动活动**：是以当权者治下民众的名义，借助共同公开展示其价值所在、其团结一致、其人数及其献身于抗争的决心而展开的针对当权者的持续性的挑战。
- 社会运动基础**：指的是抗争及集体行动赖以进行的社会背景、组织资源及文化框架。

## 清单 A.2 抗争政治中主要的解释性概念

- 抗争地点**：作为抗争政治的发起者、对象和/或场所的人为环境。例如，军队就常常在抗争中扮演所有这三个角色。
- 条件**：指的是抗争地点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各抗争地点间的关系，它们决定着在这些地点之中、之外所发生的抗争。初始条件则指的是某些过程或事件开始时的相关抗争地点占优势的那些条件。例如，在 1966 年的意大利，一些政治组织及相互间既有的关系，即为随后 7 年间发生的系列抗争提供了背景。
- 抗争之流**：被挑选出来加以解释的、出现在抗争地点或超出该地点的一系列集体要求。例如，发生在某一特定行业中的工人针对公司的一系列罢工行动。
- 后果**：那些与我们所研究的抗争貌似有关的抗争地点或超出该地点的条件方面的变化，包括政治行动者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改变。例如，在一系列罢工行动发生期间及之后，管理方采取解雇工人、改变工作规则和/或提高工资的做法。
- 政体**：政府、合法的政治行动者、挑战者以及包括其他政府在内的外部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正常关系，18 世纪的英国与 21 世纪的乌克兰在政体方面明显不同。
- 政治机遇结构**：各种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集体行动的政权及制度/机构特征（例如，统治阶层的分裂）；在 2004 年至 2005 年的乌克兰，一种处于分歧状态的国际环境就为该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以民主之名呼吁国外支持者支持的机遇。
- 机制**：在诸多环境中产生相同的直接后果的事件。例如，一些策略从某抗争地点向另一抗争地点的传播常常发生在重要的动员期间，由此导致行动在起源及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发生改变，同

时也为在相关抗争地点间建立协作关系提供了便利。

- 过程**:产生某些特定后果的机制组合及其发生序列。例如,一些大的动员通常会以一定的发生序列和组合方式将居间联络和传播与其他机制结合在一起,由此而对动员引发的集体行动产生强烈影响。
- 片段**:有一定界域连续性的抗争互动,它通常是由于某位调查者为对抗争做出系统的观察、比较和解释,而将较长的抗争之流人为地分割成片断而产生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对1785年之后20年间英国反奴隶制积极分子们发动的一系列请愿(把每一次这样的请愿行动看成是一个片段)进行比较,看出某次请愿行动的参与者是如何从此前的请愿行动中学习到一些经验的,也可以由此对这整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做出评述。

204

不过,本书也从机制、过程及片段起作用的方式中辨明了各种不同的抗争地点所表现出的诸多相似之处。例如,我们已了解到,抗争剧目既可能属于一些组织,也可能属于一些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或者个人。

**条件**指的是抗争地点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各抗争地点之间的关系,它们决定着在这些地点之中及之外所发生的抗争。比方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某个国家有两个团体,其中一个团体属于那种组织完善且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行动者,而另一个团体则是那种受到国家安全部队袭扰、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政府反对派;由此,则这两个团体的存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便形成了一种影响该政权内部抗争政治的条件。

当我们对机制、过程及抗争片段进行考察时,我们常常会提请人们关注那些**初始条件**——它们影响着机制互动、过程发展及其后果。初始条件在抗争之流——我们即将予以集中关注——开始之际影响较大,诸如提出要求之可资利用的抗争剧目抑或有关国家政府的组织之类的初始条件,都影响到抗争实际上如何发生。随着斗争本身令抗争剧目、

政治行动者间的关系以及抗争地点的其他方面发生改变，抗争条件也会在抗争期间及抗争之后发生变化。

抗争之流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提出集体要求的场合对比，观察者们还挑选出来加以阐释。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假定在 1785 年至 1835 年整个这段时期，其早期的动员及所产生的结果相应决定着后来的动员，从而将英国 1785 年至 1835 年的整个反奴隶制运动当作单一的抗争之流来看待。但我们也可以只聚焦于伦敦一地的反奴隶制斗争抑或只集中关注这段时期中斗争较为激烈的一个时期。一段抗争之流可能会因为其参与者或其他分析人士已经将它视为连续的斗争行动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一如导致英国议会在 1807 年禁止奴隶贸易的那场动员行动；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对民主化之类的某一般过程颇为关注而令我们对它产生兴趣。分析家常常把一系列最终导致民主制或未曾导致民主制的类似事件列示出来，以此阐明他们就民主化所做的总体解释。

结果包括了一系列貌似与我们研究的抗争有关的抗争地点或超出该地点的条件方面的变化组成，包括政治行动者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改变。在从独裁政体向民主政权过渡时，此前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宗派、组织或家族总是会失去他们所掌握的一些权力。倘若我们问起民主化进  
205 程以前的统治者情况如何，则此时我们所提出的即是有关结果的问题了。有可能会出现的—种情况是，我们挑选的结果并非源自我们当初所考察的抗争之流，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新的解释了。要确定有关的一些结果实际上是由什么引起的存在一定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机制与过程切近考察。

政体包括了政府、合法的政治行动者、挑战者以及其他政府等外部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一系列正常关系。为确认某政权，我们的典型做法是首先对政府进行定位，所谓政府，意指位于某特定的广泛地域内的某一组织，该组织控制着该地域内最大量集中的强制手段，如军队、监狱、羞辱民众的手段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的则是与该政府的代理人及其



代理机构经常互动的那些置身于该政府外部的政治行动者。我们把那些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具有稳定而可靠地位的政治行动者称为**成员**，把那些作为集体而出现却缺乏稳定而可靠地位的政治行动者称为**挑战者**，而对那些依托政府所控领土之外的基地开展活动的政治行动者，我们则称为**外部行动者**。

**政治机遇机构**一再出现于本书就抗争所做的解释中。政治机遇结构包括某一政权所具有的六个方面的属性：

1. 该政权内部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2. 该政权对于新行动者的开放性
3. 现行的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
4. 挑战者获得有影响的盟友或支持者的有效性
5. 该政权压制或推进集体性提出要求的程度
6. 第 1 至第 5 条所列各项属性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从完整的政权角度看，现行的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与挑战者获得有影响的盟友或支持者的有效性（第 3 和 4 两项）实际上是一回事。而稳定的结盟关系通常意味着许多政治行动者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实际当权的潜在盟友。不过，依照如此界说，政治机遇结构对于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来说多少会表现得有所不同，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一个行动者可以得到许多盟友，而另一个行动者则几乎没有盟友。无论如何，对于所有的行动者来说，威胁和机遇都会随权力的分割与集中、政权对于新行动者的开放性、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盟友的有效性而发生变化。

**机制**指的是那些在诸多环境中产生相同的直接后果的事件。例如，我们称为**居间联络的机制**，就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居间联络机制将两个此前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地点联

结起来,由此而降低了两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协作的成本。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常常利用居间联络机制,将一些此前没有联系的团体和社会网络引入相同的运动中。而当那些原先认为他们各自分属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并且意识到他们已经形成一种诸如工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非洲裔美国人或者世界公民之类统一的——即便是暂时的——认同时,抗争政治还常常涉及认同改变机制。

过程是以不同的发生序列及不同的组合方式将诸机制集中起来,产生相较于任何单一的机制所产生的规模更大的后果。本书曾一再论及动员这一过程,在此一过程中,某一政治行动者用以提出要求的可用资源得以增加。以下相关资源的应用会有助于要求,包括了精力、观念和<sup>1</sup>实践以及一些物质性对象。事实上,居间联络就常常在动员中发挥一定作用,而当围绕同一问题而得以动员起来的人们意识到他们自身及其盟友之间的相似性时,认同改变也同样在动员过程中发挥作用。

动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过程:遣散,即用于集体性提出要求的可用资源减少。在公开的抗争行动之外,政治组织者将大量精力花在动员以及阻止遣散上。而政府也会相当关注对其支持者所进行的动员予以帮助,同时尽力遣散其敌对者。危地马拉政府军对手无寸铁的潘佐斯农民实施大屠杀,并非完全为了针对那些当地的抗议者,同时旨在使一场不断上升的农民运动得以遣散。

片段:有一定界域的连续性抗争互动。将抗争之流分解为片段有助于从中找出机制与过程。本附录展示了如何将复杂的抗争之流划分为片段,如何对这些片段加以描述,如何将这些片段分解成不同的原因;如何再将这些原因重新集合起来,以此对这些片段做出原因方面的说明,对这些片段所属的更大的抗争之流做出解释,并说明那些反复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抗争政治中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成功运用从描述到分解再到集合的这一研究流程,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新流程;改进了对单一抗争事件、一系列的抗争事件以及某一种类的抗争所做的解释,则为我

们就其他相似类型的抗争加以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这一做法称为解释抗争政治的机制—过程方法。清单 A.3 对我们采用机制—过程方法以解释抗争政治时所采取的步骤进行了总结。

207

### 清单 A.3 解释抗争之机制—过程方法的若干步骤

1. 运用清单 A.1 给出的主要描述性概念(政治行动者、政治认同、机构等等),明确说明你正在对其加以研究的抗争(诸)地点。
2. 运用同一些描述性概念描述你所研究的抗争在开始之际,诸抗争地点的有关条件。
3. 从你想要加以解释的抗争地点或诸抗争地点中确认相关的抗争之流并对其进行描述。
4. 详尽说明抗争之流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与你所研究的抗争之间的关系正是你想要加以确定的。
5. 将抗争之流分解为一些连贯的片段。
6. 从这些抗争片段中去探寻那些导致产生重要变化和/或重大区别的机制。
7. 通过将诸机制组合为整体而再现诸过程。
8. 通过与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过程进行类比或比较,糅合有关条件、机制和过程以对特定的结果加以解释。

以上有关解释抗争的八个步骤,结合了清单 A.1 中的诸描述性概念与清单 A.2 中的诸解释性概念。如我们在本书的叙述中已表明的,某些研究需要以不同的先后次序来完成以上这些步骤。比方说,如果你想要就某一过程是如何起作用的抑或就某一特定的初始条件是如何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的做出说明,那你就会以关于该过程的一种理论作为研究的起始点,接下来再去确认那有助于证实或证伪这一理论的抗争

之流。(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我们就常常将这一解释次序颠倒。)不过,通常来说,你迟早还是要经历所有这八个步骤,由此而得出一种新的、证伪了的、修正了的或者被更好地证实了的解释。机制、过程以及初始条件之间的互动将构成你关于抗争的解释。

我们可以区分出机制—过程解释方法的四种变化形式,这四种变体我们不妨将其称作普通过程、特定过程、过程概括以及地点比较。

208 普通过程解释法的做法是,辨明那些相互类似的抗争之流,并探询某一特定的过程一再出现是否有助于对各种抗争之流的相似性做出解释。

特定过程解释法则将分析家们已在其他场景中确认其起作用的过程,应用于某些特殊场合,常常是将一个以上论证材料充分的过程结合在一起以求做出更为完整的解释。

过程概括解释法集中关注过程本身,从总体上询问该过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该过程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了何种后果。

地点比较解释法试图确认出现在不同抗争地点的某些过程在发生频率、起源抑或后果方面存在着的重要差别。

依照这四种模式之一,你就可以针对抗争事件采取一种更为系统的处理办法,而不只是通过浏览互联网新闻网页来了解当天的事件了。比如,你可以采取以下这些研究计划当中的任何一种计划:

- 挑选某一特定形式的抗争政治或者抗争政治的某一特定问题(例如,自杀式炸弹袭击或者那些针对当地官员而发动的袭击)以对其做出描述和解释,这项活动以明确哪些地方是这些事件最经常发生的地点作为起点,进而去了解类似的过程是否出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同时了解这些地方各自具有的特点是否影响到这种类型



的抗争政治如何发生以及何时发生。在如此行事之际,就像伯曼和莱廷在研究自杀式炸弹袭击时一样,你可能就是在做一项辨识发生在不同抗争地点的抗争行动相似性的普通过程研究工作

- 依照抗争政治中某种过程已确立的模式(例如,本书第二章所涉及的有关传播和居间联络的简单模式),找出这一过程出现的地方所发生的一系列抗争事件,并就该过程的发生是否与已有模式相一致进行研究。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在进行一项特定过程分析。
- 更具雄心的做法则是,逐步形成你自己有关动员和遣散之类抗争过程的研究模式,再通过各种相关的抗争事件对这一模式加以检验。如此,则你可能——不,请大胆宣布!——就是在进行自己的过程概括。
- 仿效克里斯及其合作者的做法,你可以通过对少数国家(比如,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进行比较,以确定这些国家所具有的特征——诸如它们的政治机构、土著人所处的地位或参与贩毒之类——是否有助于解释它们在抗争政治方面的相似性及不同之处。这时,你可能就是在从事一项地点比较研究。

在从事这些研究计划当中的任何一项时,你可能都需要掌握比你从每天的网络新闻报道中所获取的内容更多的有关抗争在政治、社会背景方面的信息。而要获取这些有关抗争政治、社会背景方面的信息,你可能又会求助于地图、百科全书、美国政府所发布的一些关于某些国家的报告、政治年鉴或者这些国家自己的网站报道之类标准的参考文献。你也许还想得到更多有关某些单一抗争事件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集中关注你感兴趣的那些国家的期刊杂志,而这些期刊杂志常常从网上就可以看到。无论你采取何种方式收集资料,也不管你从哪里收集这些资料,你可能都遵循的是清单 A.3 中所给出的那些基本

的研究步骤：描述你正在着手研究的抗争地点，描述这些抗争地点所具有的各种条件等等，直到最终完成机制—过程方法所要求的基本程序。你可能要做的是，确认重要的抗争之流，将它们分解为抗争片段，再从这些抗争片段中搜求那些一再重现的过程，并从这些过程当中去发现那些关键的机制：居间联络、传播、仿效及其他。

而为了要达到其他的分析研究目标，你也可以将贝辛格、布罗克特、克里斯及其合作者、鲁赫特、索尔、塔罗以及其他人的有关著作中所提供的规模极其不同的抗争事件列表，集中起来加以考察分析。通过利用来自北美地区的一些报章，你可以就某一特殊问题或某一特定形式的行动——例如，你可以对这些地区大学校园里举行的有关言论自由或服兵役问题的公开集会——做切近考察。经由把一些大学、城市、州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比较与有关它们背景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你就能够开始对这些公开集会的特点及其发生频率进行解释了。你还可以比较那些发生在各种不同政权当中、跨越很长时段的更大规模的抗争事件，包括革命、军事政变、内战或罢工浪潮，在这一点上，清单 A.3 仍然会为你的研究提供你所需的指导。

清单 A.3 所给出的研究程序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屡次被应用，实例之一出现在本书的第三章当中。在那一章里，我们对发生在 1980 年至 21 世纪初期的委内瑞拉抗争进行了细致考察。利用委内瑞拉研究人员的出色研究成果，我们完成了以下这些研究步骤：

1. 利用第一章所提出的那些主要的描述性概念（政治行动者、政治认同、抗争表演等等），对我们正在着手研究的抗争地点做了详尽描述。洛佩兹·梅耶及其合作者将注意力分别放在三种不同的抗争地点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大城区的居民，以及他们特别予以研究的五个参与者群体。
2. 利用同一些描述性概念，对我们正在着手研究的抗争地点在抗

争开始时所具有的相关条件做了简要描述。通过利用其他历史资料以补充洛佩兹·梅耶的叙述，我们对1980年以来的委内瑞拉抗争的背景做了概述。

210

3. 继而，对出现在我们想要解释的那些抗争地点的抗争之流进行了确认和描述。委内瑞拉的研究者们确认了两股抗争之流：一为1983年至1999年席卷整个委内瑞拉的历时较长且有所起伏的抗争浪潮，另一则是发生在1999年的加拉加斯民众的集体抗议行动。
4. 接着，我们试图详尽说明抗争之流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些结果与我们着手研究的抗争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想要确定的。我们密切关注着两类不同的结果：委内瑞拉公民与委内瑞拉政权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由民众抗争而导致的委内瑞拉政权本身的变化。
5. 仿照委内瑞拉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成员们的做法，我们将抗争之流分解为一些相连贯的片段，将他们所确认的两股抗争之流分解成一些特定的片段，它们被委内瑞拉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称作“抗议”。
6. 然后，我们再从这些抗争片段中去寻求那些导致重大变化和/或区别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直未曾表明），委内瑞拉学者们强调的是那些认知性的机制尤其是建构机制的作用——经由这些机制，民众在理解主要政治行动者的所作所为上有所改变。与之不同，我们的做法则是从他们的有关叙述中去找出居间联络和传播机制起作用的证据。
7. 我们又更进一步地通过将机制组合为整体而再现过程。我们提请人们关注新协作这一简单过程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委内瑞拉抗争还包括了其他几个重要的过程：两极化、民主化、去民主化、动员以及遣散。对1983年至1999年委内瑞拉抗争的全面分析将

会让所有这些关键过程结合起来。

8. 仿照洛佩兹·梅耶及其合作者的做法,我们主要是按照特定过程解释模式来提出我们对委内瑞拉抗争的分析的:依循已有的抗争政治过程解释模式,在发生这些过程的同一地点之内去发现一系列的抗争片段,然后再去研究这些过程的发生是否与已有的解释模式相一致。无疑,我们就委内瑞拉抗争政治所做的简要论述还缺乏确定性检验,但它还是有可能提出一些有力证据关涉现有的过程分析模式的有效性。



## 附录B

# 抗争之流、抗争片段、机制及过程

本附录辨明了那些出现在本书不同章节中的主要抗争之流、一系列的抗争片段、作为原因的机制以及作为原因的过程。但附录中只涉及那些在本书描述和解释抗争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抗争之流、抗争片段以及那些作为原因的机制和过程。

### 抗争之流

如附录 A 所指出的，抗争之流包括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提出集体要求的场合，观察者们将其挑选出来进行了解释。从发生在你和你的邻居之间的一场持续争端到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抗争之流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大。本书所提供的分析方法让你可以对抗争之流所涉范围的任何一端，即最大或最小的抗争之流，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抗争之流进行分析。你自己去选择好了。不过，本书中大多数分析，针对的是政府明显以提出要求者、对象抑或第三方面出现的那些历时较长、规模较大的抗争之流。以下便是本书所述及的主要抗争之流：

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第一章、第二章):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英国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及其盟友先是要求大不列颠王国终止参与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活动,继而则要求在整个不列颠王国及其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再后来便是要求在整个大西洋地区结束奴隶贸易与奴隶制。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第一章、第二章):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反对由政府操纵的腐败选举的民众动员。

美国在抗争剧目方面的变化,1955—2005年(第一章):出现在美国的有关谁在提出要求以及他们如何提出其要求的总体变化。

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的抗争,1955—1991年(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如布罗克特所分析的农民激进主义、政府镇压以及反政府的起义。

反对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独裁政权的斗争,2000—2003(第二章):由学生及其他人员参与的针对选举欺诈而举行的抗议行动的组织及传播。

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1820—1860年(第二章):自1820年直至内战爆发,在奴隶制的支持者及反对者之间不断展开的种种斗争。

苏联以及苏维埃集团的解体,1956—1991年(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瓦解以及以苏联为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

委内瑞拉的政治斗争,1980—2005年(第三章):由精英和民众参与其中的针对国家权力的连续性斗争。

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动员,1994—2005年(第四章):墨西哥南部贫困地区的土著人组织者提出的让墨西哥中央政府做出政策调整及给予土著人自治的要求,这一斗争很快便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泛支持。

法国里昂的妓女们为争取得到承认和保护而展开的运动(第五章):通过采取占领一座教堂等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行动,妓女们要求改

善其政治处境及工作条件的斗争部分地得以成功。

**意大利的系列政治抗议, 1968—1973 年(第五章):**由工人、学生以及其他政治行动者发起的一系列针对政府的挑战, 最终却走向了衰落。

**波兰的反政府动员, 1956—1957 年及 1980—1989 年(第六章):**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在波兰的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反对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政权行动, 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最终推翻当时的波兰政权的斗争形成鲜明对比。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的美国妇女运动(第六章):**妇女运动的实际行动在组织基础、联盟关系、针对的问题及后果方面的重要变化。

**1989—2005 年的苏丹政权(第七章):**一再发生的反对独裁政权的地方叛乱与内战。

**爱尔兰的新教—天主教斗争, 1952—1989 年(第七章):**范围包括从消极抵抗到内战的抗争。

**尼加拉瓜的革命形势与结果, 1961—1990 年(第七章):**发生在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中的革命兴衰起伏。

**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 2004—2005 年(第八章):**尽管有好战的以色列人举行抗议, 以色列政府还是从加沙地带定居点撤出了定居者。

**指控皮诺切特的国际运动, 1998—2005 年(第八章):**一场由智利流亡者发动的使该国前独裁者受到法律制裁的成功努力。

**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静坐行动, 1960 年以降(第九章):**一场由非洲裔美国人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成效明显的新形式运动。

213

## 一系列抗争片段

片段指的是有一定界域的系列斗争互动。本书述及了不少单个抗争片段, 不过, 在此, 我们仅只列出了某些可比较的单元分析人士已将其从抗争之流中截取出来以进行描述和解释。出现在下文中的抗争片

段有些上文已列示过，因本书对这些抗争片段之外的情形另有更全面的分析。

**德国的抗议行动, 1950—1997 年(第一章):**鲁赫特所列示的发生在西德(1950—1988)及统一后的德国(1989—1997)的各种公众抗议事件。

**法国的罢工行动, 1830—1968 年(第二章):**由爱德华·肖特、查尔斯·蒂利及其合作者自法国官方的统计资料、报纸以及历史档案中收集材料,并列示出有关法国所发生的罢工和抗争集会目录。

**意大利的抗议事件, 1966—1973 年(第二章、第五章):**有关罢工及其他抗争事件的目录,主要由西德尼·塔罗及其合作者根据意大利的报纸编制而成。

**发生在法国、德国、荷兰以及瑞士的新社会运动, 1975—1989 年(第二章):**由汉斯彼得·克里斯及其研究小组编制的有关这些国家抗争事件的列表。

**美国大学校园内的棚屋抗议行动, 1985—1990 年(第二章):**萨拉·索尔根据 NEXIS 所提供的资料而集中起来的有关美国大学校园中的一些抗议事件。

**发生在苏联及其解体后的各国中的示威及暴力冲突, 1978—1992 年(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由马克·贝辛格与一个大型的研究团队所做的各国有关示威及暴力冲突的一览表。

**委内瑞拉的抗议事件, 1983—1999 年(第三章):**由洛佩兹·梅耶及其合作者根据该国报纸收集的有关抗争事件。

**发生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两国的冲突, 1970—1991 年(第五章):**由查尔斯·布罗克特所编制的有关这两个国家的罢工、占地盘、示威及诸多“抗争活动”的多个列表。

**美国妇女运动中的活动及其结果, 1950—1985 年(第六章):**安·科



斯坦所统计的有关影响妇女权利的立法活动以及新闻报道中所提及的有组织的妇女活动。

**世界各地的内战, 1946—2004 年(第七章):**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的一些分析家所编制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一览表。

**非洲裔美国人的抗议活动以及民权运动, 1947—1997 年(第九章):**克雷格·金肯斯及其合作者们对于全美所发生的较明显的抗争事件的统计。

**静坐行动的分布, 1960 年(第九章):**由肯尼斯·安德鲁斯和迈克尔·比格斯所做的有关静坐行动在美国南部各地分布的图示。

## 机 制

机制指的是那些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产生出同样的直接后果的事件。过程则是一些机制通过组合方式及发生序列而集合到一起,由此产生相较于某特殊机制本身所能产生的更大规模的后果。不过,在机制与过程之间所做的这种区分,取决于我们的考察层次。我们总是能够对任何特殊机制做内部考察,并且总是能够找出一些正在发挥作用的较小规模的机制。例如,通过就近考察,我们得以了解那种你本人与其他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平行意识——我们称之为相似性归属机制——取决于那些出现在不同时机、不同个人那里较小规模的认知性事件。我们也可以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整个世界历史的层面而言,我们称之为革命的那些复杂过程(第七章对此有详尽描述)可能就只是作为一些机制而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了——当然,与之相伴的还有每次革命所导致的政权更替。简言之,一组作为原因的要素集合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机制或过程,实则取决于我们的观察层次。

本书所确认的那些都是在一种中间层次上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过程。在大多数场合,我们采取的是有见识的观察者所取的立场,按不同 215

的星期、月份或年份而对某一政权在政治方面的变化进行考察。在这种中间层次上,我们选取了那些促使抗争在其发生地点、所具有的特点或者后果方面产生重大变化的机制,然后再将这些机制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与发生序列——正是机制的这种组合与发生序列导致了我们要解释的重要后果——整合起来。以下便是在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主要机制:

**相似性归属:**将另一政治行动者视为与自己同属一个类别。

**界限激活/钝化:**将两个政治行动者彼此分开的“我们—他们之别”明显增加/减少。

**界限形成:**两个政治行动者之间造成“我们—他们”。

**界限改变:**发生在现有界限之一侧或另一侧的人员或认同方面的改变。

**居间联络:**使此前没有任何联系或联系不够紧密的诸地点间形成新联系。

**合法性确认:**某个外部权力当局发出信号,表示打算承认并支持某一政治行动者存在及其所提要求。(撤销合法性确认:某个外部权力当局发出信号,表明其将要取消对某一政治行动者的承认及支持。)

**增选成员(co-optation):**将此前被排除在外的某一政治行动者纳入某些权力中心。

**背叛:**某一政治行动者自此前某个有效的联盟和/或协同行动中退出。

**传播:**抗争表演、抗争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有关的解释性框架从一个地点向另一地点扩散。

**仿效:**在某一特定场景内有意识地重演发生在另一场景的某一抗争表演方式。

**镇压:**某些权力当局采取行动,增加某政治行动者提出要求的成本。

## 过 程

我们在本书中所确认的诸多机制与过程，显示出我们为未来的抗争政治研究者和理论家们留下了大量需要他们进一步付出努力的后续工作。这些工作任务不仅包括(1)精确地阐明以上所列示的机制究竟是如何加速推动各种后果产生的，也包括(2)阐明进入抗争复杂过程的都有哪些机制，它们是如何进行组合的，又是如何产生出一些大规模后果的。以下是本书所讨论过的主要过程： 216

**行动者构建：**出现一个新的政治行动者或态度发生改变的政治行动者，即那些从事集体行动、提出和/或接受抗争要求且可以清晰辨认出其所属群体的人。

**联盟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此前各不相同的政治行动者之间就其所提要求达成新的、明显可见的直接协作关系。

**集体行动：**为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协同做出的所有努力

**商业化：**某一组织转向在更大范围中销售其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克里斯的分析)。

**竞争：**以彼此对立的方式去追求某些奖赏或结果。

**抗争：**提出一些对其他人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

**协作行动：**两个或更多的政治行动者针对同一对象而共同发出信号或共同提出要求。

**民主化/去民主化：**在有关政府资源的分配、人事任用以及各种政策方面，某一政权朝向/背离与其治下的属民进行较为广泛、平等的保护性协商的运动。

**幻灭：**参与抗争的一些个人或政治行动者对其先前的信仰所作承

诺方面的逐渐消退。

**逐步升级：**更为极端的目标和策略取代那些原本温和的目标和策略(通常应用于政治行动者的互动中)。

**建构：**接受并广泛传播就抗争所针对的某一问题或某种表演而做出的共同界说。

**全球化：**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以及那些将分属不同国家的行动者联系起来的力量在流动量及流动速度方面不断增加。

**认同改变：**在“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些问题上，出现了新的集体答案。

**制度化：**将各种抗争表演及政治行动者纳入有组织的政治常规中。

**国际化：**国际化结合着以下两个方面，分别是(1)诸多国家、政府官员以及非国家的政治行动者之间横向联系的密度日益增加，(2)上述几者217 者与各种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在纵向联系上日益增多。

**内卷：**社会运动组织转向日益强调为其支持者提供服务(克里斯的分析)。

**动员 / 遣散：**政治行动者用以提出集体性要求的可用资源增加/减少。

**新协作关系：**通过居间联络与传播的结合而形成的相互协作。

**两极化：**出现在政治行动者或联盟之间的日益加大的意识形态距离。

**激进化：**社会运动组织转向更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克里斯的分析)。

**规模转变：**在政治行动者的数量和/或协同提出要求的范围方面增加或减少。

**自我表现：**某一政治行动者或政治联盟公开展示其价值、统一、人数及献身精神。

**社会利用：**使此前即已存在的非政治团体及网络转变为政治行动者或将其纳入政治行动者阵营。



## 参考文献

- Alberoni, Francesco. 1977. *Movimento e istituzione: Teoria generale*. Bologna: Il Mulino.
- Alexander, Jeffrey C. 2004. "From the Depths of Despair: Performance, Counterperformance, and 'September 11.'" *Sociological Theory* 22: 88—105.
- Alter, Karen, and Jeannette Vargas. 2000.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European Litigation Strategies: EC Law and UK Gender Equality Poli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452—82.
- Anderson, Benedict.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 Andrews, Kenneth. 2002. "Movement—Countermovement Dynam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White Flight' Schools in Mississippi." *Social Forces* 80:911—36.
- .2004.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The Mississippi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Its Leg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rews, Kenneth T., and Michael Biggs. Forthcoming. "The Dynamics of

- Protest Diffusion: Formal Organ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News Media in the 1960s Sit-I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Annual Register. 1989. "Venezuela." *Annual Register* 231:75.
- Banaszak, Lee Ann. 1996. *Why Movements Succeed or Fail: Opportunity, Culture, and the Struggle for Woman Suffr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naszak, Lee Ann, Karen Beckwith, and Dieter Rucht, eds. 2003. *Women's Movements Facing the Reconfigured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skin, Gershon. 2005. "This Week in Israel: Behind the News with Gershon Baskin." *Jerusalem Times*, August 19.
- Beckwith, Karen. 2003. "The Gendering Ways of States: Women's Representation and State Reconfiguration in France,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Women's Movements Facing the Reconfigured State*, ed. Lee Ann Banaszak, Karen Beckwith, and Dieter Ruc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issinger, Mark R. 2002.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ance. 2005.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Borders: Understanding Two Era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ed.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Sidney Tarrow.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Berman, Eli, and David Laitin. 2005. "Rational Martyrs vs. Hard Targets: Evidence on the Tactical Use of Suicide Attacks." Unpublished paper,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ttp://dss.ucsd.edu/~elib/RatMartyrs.pdf>.
- Bernhard, Michael H. 1993. *The Origins of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 Workers,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 1976—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li, John, and George M. Thomas, eds. 1999.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twell, Jeffrey, Michael T. Klare, and Laura W. Reed. 1995. *Lethal Commerce: The Global Trade in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Cambridge, Mass.: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 Brockett, Charles D. 2005.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Violence 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ns, Stewart, ed. 1997. *Daybreak of Freedo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urstein, Paul, and April Linton. 2002.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terest Group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on Public Policy." *Social Forces* 81:380—408.
- Burstein, Paul, and Sarah Sausner. 2005. "The Incidence and Impact of Policy Oriented Collective Action: Competing Views." *Sociological Forum* 20: 403—19.
- Button, James W. 1978. *Black Violenc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1960's Rio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poraso, James A., and Joseph Jupille. 2001.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y and Domestic Structural Change." In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d. Maria Green Cowles, James A.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1—43.
- Chabot, Sean. 2003.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The Gandhian Repertoire's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to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 Unpublishe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 Chivers, C. J. 2005. "Back Channels: A Crackdown Averte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
- Collier, Paul. 2000a.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Paper prepared for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Global Policy Forum, [www.igc.org/globalpolicy/security/issues/diamond/wb.htm](http://www.igc.org/globalpolicy/security/issues/diamond/wb.htm).
- . 2000b. "Rebellion as a Quasi—Criminal Activ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839—53.
- Collins, Randall. 2004. "Rituals of Solidarity and Security in the Wake of Terrorist Attack." *Sociological Theory* 22:53—87.
- Conant, Lisa J. 2002. *Justice Contained: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stain, Anne. 1992.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A Political Proce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allaire, Roméo. 2003. *J'ai serré la main du diable; La faillite de l'humanité au Rwanda*. Outremont, Québec: Libre Expression.
- Davis, Madeleine, ed. 2003. *The Pinochet Case: Origins,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Institute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Olivier Filleule, and Herbert Reiter. 1998. "Policing Protest in France and Italy; From Intimidation to Cooperation?" 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ed. Davids.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chap.5.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Sidney Tarrow. 1986. "Unwanted Childre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Cycle of Protest in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4:607—32.
- Des Forges, Alison, et al. 1999.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 Diani, Mario. 1995. *Green Network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Diani, Mario, and Doug McAdam, eds. 2003.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escher, Seymour. 1991. "British Way, French Way: Opinion Building and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French Slave Emancip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709—34.
- Dunér, Bertil. 1985.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The 1970s*. Aldershot: Gower.
- Eriksson, Mikael and peter Wallenstein. 2004. "Armed Conflict, 1989—2003."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1:625—36.
- Evans, Peter. 2005.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ed. Thomas Janoski, Alexander Hicks, and Mildred Schwar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55—70.
- Evans, Sara M. 1979. *Personal Politics: The Root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ew Left*. New York: Knopf.
- Evans, Sara M., and Harry C. Boyte. 1992. *Free Spaces: The Sources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ayre, Pierre. 1990. *La Manifestation*.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Fearon, James D., and David D. Laitin.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75—90.
- Fillieule, Olivier. 1997. *Stratégies de la rue: Les manifestations en Franc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Fish, M. Steven. 1995. *Democracy from Scratch: Opposition and Regime in the New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anzosi, Roberto. 1995. *The Puzzle of Strikes: Clas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Postwar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edom House. 2000. "FH Country Ratings." [www.freedomhouse.org/ratings/index](http://www.freedomhouse.org/ratings/index).
- Freeman, Jo. 1975.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Longman.
- Frikel, Scott, and Neil Gross. 2005. "A General Theory of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204—32.
- Gambetta, Diego, ed. 2005. *Making Sense of Suicide Miss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rcelon, Marc. 2001. "Colonizing the Subject: The Genealogy and Legacy of the Soviet Internal Passport." In *Documenting Individual Identity. State Practices in the Modern world*, ed. Jane Caplan and John Torpe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vrilis, George. 2004. "Sharon's Endgame for the West Bank Barrier." *Washington Quarterly* 27: 7—20.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novese, Eugene D. 1969. *The World the Slaveholders Made: Two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Pantheon.

- Ghobarah, Hazem Adam, Paul Huth, and Bruce Russett. 2003. "Civil Wars Kill and Maim People—Long after the Shooting Stop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189—202.
- Ginsborg, Paul. 1990.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taly: Society and Politics, 1943—1988*. New York: Penguin.
- Ginsburg, Faye D. 1989. *Contested Lives. The Abortion Debate in an American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ugni, Marco,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eds. 1998. *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 eds. 1999.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ldstein, Judith, Miles Kahler, Robert O. Keohane,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2001.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oldstone, Jack A., and Charles Tilly. 2001. "Threat (and Opportunity): Popular Action and State Response in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us Action".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 Ronald R. Aminzade e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win, Jeff. 2001.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uld, Roger.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imsted, David. 1998. *American Mobbing, 1828—1861: Toward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t, Peter. 1998. *The I.R.A. & Its Enemies. Violence and Community in*

- Cork, 1916—1923*. Oxford: Clarendon.
- Hellman, Judy. 1999. "Real and Virtual Chiapas: Magic Realism and the Left." In *Socialist Register 2000: Necessary and Unnecessary Utopias*, ed.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London: Merlin.
- Henderson, Errol A. 1999. "Civil Wars." In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ed. Lester Kurtz.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vol. 1 pp. 279—87.
- Hironaka, Ann. 2005. *Neverending War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ak Stat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Civil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 Eric. 1990. "Sacrifice for the Cause: Group Processes, Recruitment, and Commitment in a Student Social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243—54.
- Hochschild, Adam. 2005. *Bury the Chains: Prophets and Rebels in the Fight to Free an Empire's Slav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Hooghe, Liesbet, and Gary Marks. 2002.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European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Imig, Doug, and Sidney Tarrow, eds. 2001. *Contentious Europeans: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an Emerging Pol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Jenkins, J. Craig. 1986.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cy: The Farm Worker Movement in the 196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J. Craig, David Jacobs, and Jon Agnone. 2003.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African-American Protest, 1948—1997".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277—303.
- Jenness, Valerie. 1993. *Making It Work: The Prostitute's Rights Movement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Jones, Bruce. 1995. "Intervention without Bord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 in Rwanda, 1990—1994.”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4:225—49.
- Kaiser, Robert J. 1994.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ldor, Mary. 1999. *New &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 Karatnycky, Adrian, ed. 2000.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 Katzenstein, Mary F. 1998. *Faithful and Fearless: Moving Feminist Protest inside the Church and Milita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Re-Dividing Citizens-Divided Feminisms: The Reconfigured US State and Women’s Citizenship.” In *Women’s Movements Facing the Reconfigured State*, ed. Lee Ann Banaszak, Karen Beckwith, and Dieter Ruc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Mary F., and Carol M. Mueller. 1987.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Public Poli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Trans. National Activist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ogh, Dermot. 2001. “Ire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1994—2001.” In *The Course of Irish History*, ed. T. W. Moody and F. X. Martin, 4th ed. Lanham, Md.: Roberts Rinehart.
- Keohane, Robert O. 2002.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Kertzer, David I.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hazanov, Anatoly M. 1995.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Killian, Lewis M. 1984. "Organization, Rationality and Spontaneity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770—83.
- Kinealy, Christine. 2003. "Les Marches orangistes en Irlande du Nord: Histoire D'un droit " *Le Mouvement Social* 2002 165—82.
- Klandermans, Bert. 1988. "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173—96.
- 1997.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Oxford: Blackwell's.
- , ed. 1991. *Peace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Greenwich, Conn.: JAI.
- Koopmans, Ruud. 2004. "Protest in Time and Space: The Evolution of Waves of Contention."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Malden, Mass.: Blackwell, chap. 2.
- Kriesi, Hanspeter. 1996.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a Political Contex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 Doug McAdam, John McCarthy, and Mayer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et al.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ubik, Jan. 1994. *The Power of Symbols against the Symbols of Power: The Rise of Solidarity and the Fall of State Socialism in Polan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uzio, Taras. 2005. "The Opposition's Road to Success." *Journal of*

- Democracy* 36:117—30.
- Labá, Roman. 1991.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 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cey, Mark. 2005. "Riot Toll Mounts in Sudan after Rebel Leader's Death."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 Laitin, David D. 1998.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Ethnically Mixed States: Nationality Re—formation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In *State/Culture. State 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ed. George Steinmetz.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evi, Margaret, and Gillian Murphy. Forthcoming. "Coalitions of Contention: The Case of the WTO Protests in Seattle." *Political Studies*.
- Licklider, Roy, ed. 1993. *Stopping the Killing: How Civil Wars En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inebaugh, Peter, and Marcus Rediker. 1990.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and the Atlantic Working Cla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225—52.
- López Maya, Margarita. 2002. "Venezuela after the Caracozo: Forms of Protest in a Deinstitutionalized Context."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21: 199—218.
- López Maya, Margarita, David Smilde, and Keta Stephany. 2002. *Protesta y Cultura en Venezuela: Los Marcos de Acción Colectiva en 1999*. Caracas: FACES—UCV, CENDES, FONACIT.
- Lowi, Theodore. 1971. *The Politics of Disorder*. New York: Free Press.
- Lustick, Ian. 1998. *For the Land and the Lord: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 Israel*.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Lutz, Ellen, and Kathryn Sikkink. 2001. "The Justice Crusade: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Foreign Human Rights Trials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 134.
- Mamdani, Mahmood.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sbridge, Jane. 1986. *Why We Lost the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nsbridge, Jane, and Katherine Flaster. 2005. "Male Chauvinist, Feminist, Sexist, and Sexual Harassment: Different Trajectories in Feminist Linguistic Innovation." *American Speech* 80:256—79.
- Margadant, Ted. 1979.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The Insurrection of 185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thieu, Lilian. 2001. "An Unlikely Mobilization: The Occupation of Saint—Nizier Church by the Prostitutes of Lyo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42:107—31 (annual English—language ed.).
- McAdam, Doug. 1983.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735—54.
- . 1988.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On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Domestic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d. Anne N. Costain and Andrew S. McFarland. Boulder, Colo.: Rowman & Littlefield, pp. 251—67.



- .1999.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3. “Beyond Structural Analysis: Toward a More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ed.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1—98.
- McAdam, Doug, and William H. Sewell, Jr. 2001. “It’s about Time: Temporality in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 Ron Aminzade, Jack Goldstone, Doug McAdam, Elizabeth Perry, William H. Sewell Jr.,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9—125.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1987. “Pro—Life and Pro—Choice Mo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Deficits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 John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pp. 49—66.
- McCarthy, John D, Clark McPhail, and Jackie Smith. 1996. “Images of Protest: Dimensions of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478—99.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8.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41.
- McCracken, J.L.2001. “Northern Ireland: 1921—66”. In *The Course of Irish History*, ed. T. W. Moody and F. X. Martin, 4th ed. Lanham, Md.: Roberts

Rinehart.

- McMichael, Philip. 2005. "Globalization".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ed. Thomas Janoski, Robert Alford, Alexander Hicks and Mildred Schwar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87—606.
- Mendelson, Sarah, and Theodore P. Gerber. 2005. "Local Activist Culture and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Marketing among Human Rights Groups in Russia." *Unpublished Paper*.
- Meyer, David S. 1990. *A Winter of Discontent: The Nuclear Freeze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 Meyer, David S., Valerie Jenness, and Helen Ingram, eds. 2005. *Routing the Opposition: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Policy, and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eyer, David S., and Suzanne Staggenborg. 1996. "Movements, Countermove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628—60.
- Meyer, David S., and Sidney Tarrow, eds. 1998.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Meyer, David S., and Nancy Whittier. 1994. "Social Movement Spillover." *Social Problems* 41:277—98.
- Michels, Robert. 1962.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Morris, Aldon D.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eller, Carol M. 1999. "Claim Radicalization: The 1989 Protest Cycle in the GDR." *Social Problems* 46:528—47.
- Muir, Edward, 1997.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gai, Mae M. 2004.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ippa.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erschall, Anthony. 1989. "The 1960 Sit—Ins: Protest Diffusion and Movement Take—off."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11: 31–53.
- O'Brien, Robert, Anne Marie Goetz, Jan Aart Scholte, and Marc Williams. 2000.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laus. 1990. "Reflections on the Institutional Self—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Politics: A Tentative Stage Model."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ed. Russell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50.
- Olcott, Martha Brill. 2002. *Kazakhstan. Unfulfilled Promis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Olesen, Thomas. 2005. *International Zapatismo: The Construction of Solidar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Zed.
- Oliver, Pamela E. 1989. "Bringing the Crowd Back In: The Nonorganizational Element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11: 1—30.
- Olson, Mancur. 1968.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lzak, Susan. 1992.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ppenheimer, Martin. 1963. "The Genesis of the Southern Negro Student Sit—In Movement." Unpublished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Osa, Maryjane. 2003a. "Networks in Opposition: Linking Organizations

- through Activists in the Polish People's Republic."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ed.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7—104.
- . 2003b. *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Networks of Polish Oppos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Ost, David. 1990.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Opposition and Reform in Poland since 1968*.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Palmer, Stanley H. 1988. *Police and Protest in England and Ireland 178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pe, Robert A. 2004.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Parthasarathy, Shobita. 2003. "A Global Genome?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netic Testing for Breast Can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Unpublished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 Pedahzur, Ami, and Arie Perliger.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uicide Attacks,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84.
- Peleg, Samuel. 2002. *Zealotry and Vengeance: Quest of a Religious Identity Group: A Sociopolitical Account of the Rabin Assassina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Perrow, Charles. 1979. "The Sixties Observed."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ed.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p. 192—211.
- Perry, Elizabeth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ano, Aili, and Arch Puddington. 2004.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4: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 Freedom House
- Pianta, Mario. 2001. "Parallel Summits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9—94.
- . 2002. "Parallel Summits Update."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71—78.
- Pianta, Mario, and Federico Silva. 2003. "Parallel Summits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An Update."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genet, Michel, and Danielle Tartakowsky. 2003. "Les Marches." *Le Mouvement Social* 2002 (January—March), entire issue.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 1992. "Normalizing Collective Protest." In *Frontiers of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ed.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 Meull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301—25.
- Pizzorno, Alessandro. 1978. "Political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Industrial Conflict." In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ed. Colin Crouch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London: Macmillan, pp. 277—98.
- Polletta, Francesca. 1998. "'It Was Like a Fever. . .': Narrative and Identity in Social Protest." *Social Problems* 45: 137—59.
- Prunier, Gérard. 1995.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Genoc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Genocide in Rwanda." In *Ethnopolitical Warfar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ed. Daniel Chirot and Martin E. P. Seligman.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Raines, Howell. 1977. *My Soul Is Rested*. New York: Penguin.
- Rao, Hayagreeva. 1998. "Caveat Emptor: The Construction of Nonprofit Consumer Watchdog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912—61.
- Rochon, Thomas R. 1998. *Culture Moves: Ideas, Activism, and Changing Valu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chon, Thomas R., and David S. Meyer, eds. 1997. *Coalition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Boulder, Colo.: Rienner.
- Roht-Arriaza, Naomi. 2005. *The Pinochet Effect: Transnation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Human Righ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Roth, Benita. 2004. *Separate Roads to Feminism: Black, Chicana, and White Feminist Movements in America's Second Wa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cht, Dieter. 200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d. Richard Sakwa and Anne Stephens.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 Rupp, Leila J., and Verta Taylor. 1987. *Survival in the Doldrums: The American Women's Rights Movement, 1945 to the 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geman, Marc. 2004.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ambanis, Nicholas. 2004. "What Is Civil War?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omplexities of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 814—58.
- Sambanis, Nicholas, and Annalisa Zinn. 2003. "The Escal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s: From Protest to Viole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Samuel, Alexandra W. 2004. "Hactivism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Unpublished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 Sawyer, R. Keith. 2001. *Creating Conversations. Improvisation in Everyday Discourse*. Cresskill, N.J.: Hampton.
- Schlozman, Kay. 1990. "Representing Women in Washington: Sisterhood and Pressure Politics." In *Women, Politics and Change*, ed. Louise Tilly and Patricia Guri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339—82.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orter, Edward, and Charles Tilly.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aughter, Anne -Marie. 2004. *The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Jackie, and Hank Johnstopo, eds. 2003.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 Muell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oule, Sarah A. 1995. "The Student Anti-Apartheid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iffusion of Tactics and Policy Reform." Unpublished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 .1997. "The student Divestmen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ctical Diffusion: The Shantytown Protest." *Social Forces* 75: 855—83.
- .1999. "The Diffusion of an Unsuccessful Innov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6:121—31.
- .2001. "Situational Effects on Political Altruism: The Student Divestment

-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olitical Altruism? Solidarity Mo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 Marco Giugni and Florence Pass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p. 161—76.
- Spilerman, Seymour. 1970. “The Causes of Racial Disturbances: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627—49.
- Sprinzak, Ehud. 1991. *Ascendance of Israel’s Radical 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Brother against Brother: Violence and Extremism in Israeli Politics from Altalena to the Rabin Assassin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Strand, Havard, Lars Wilhelmsen,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2004. *Armed Conflict Dataset Codebook*.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rrow, Sidney. 1989.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Oxford: Clarendon.
- . 1995.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Between Moments of Madness and the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In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ed. Mark Traugot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Power in Movement.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rrow, Sidney, and Doug McAdam. 2005. “Scale Shift in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In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ed.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Sidney Tarrow.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p.



- 121—50.
- Tartakowsky, Danielle. 1997. *Les Manifestations de rue en France, 1918—1968*.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 . 2004. *La Manif en éclats*. Paris: La Dispute.
- . 2005. *La Part du rêve: Histoire du 1 Mai en France*. Paris: Hachette.
- Taylor, Christopher C. 1999. *Sacrifice as Terror: The Rwandan Genocide of 1994*. Oxford: Berg.
- Taylor, Verta, and Nella Van Dyke. 2004. “‘Get Up, Stand Up’: Tactical Repertoire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speter Kriesi. Oxford: Blackwell.
- Taylor, Verta, and Marieke Van Willigen. 1996. “Women’s Self-Help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The Postpartum Support and Breast Cancer Movements.” *Mobilization 1*: 123—43.
- Thompson, Dorothy. 1984. *The Chartists: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 Tilly, Charles.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5. “Globalization Threatens Labor’s Right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47*:1—23.
- .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3.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4a.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4b.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lo.: Paradigm.
- . 2005a.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43*. 2d ed.

- Boulder: Paradigm.
- .2005b. *Trust and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shkov, Valery. 1997.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The Mind Aflame*. London: Sage.
- .1999. “Ethnic Conflicts in the Former USSR: The Use and Misuse of Typologies and Dat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571—91.
- .2004. *Chechnya: Life in a War-Tor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Usher, Graham.2005. “The New Hamas: Between Resistance and Participation.” [www.meronline.org](http://www.meronline.org), August 21.
- Vasi, Ion Bogdan. 2004.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al Actions Against Climate Change.” Unpublished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 Verhulst, Joris, and Stefaan Walgrave. 2003. “Worldwide Anti-war in Iraq Protest: A Preliminary Test of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s Thesi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econd ECP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rburg.
- Waismel -Manor, Israel S. 2005. “Striking Differences: Hunger Strike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4: 281—300.
- Walter, Barbara F., and Jack Snyder, eds. 1999.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on, John, and David Seddon, eds. 1994. *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 Oxford: Blackwell.
- Weingast, Barry. 1998.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ivil War: Institutions, Commitment,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alytic Narratives*, ed. Robert Bates, et 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tier, Nancy. 1995. *Feminist Generation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Radical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Kim M. 2006. *Mark One or More: Civil Rights in Multiracial Americ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omack, John. 1971.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 Wood, Lesley Ann. 2004. "The Diffusion of Direct Action Tactics: From Seattle to Toronto and New York." Unpublished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Young, Michael P. 2006. *Bearing Witness against Sin: The Evangelical Birth of the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hao, Dinxin.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 1493—1529.
- Zolberg, Aristide. 1972. "Moments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2: 183—207.

##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Abbas 阿巴斯, 169—70
- abolitionism 废奴运动, 35
- actor constitution 行动者构建, 72—74, 216
- Afghanistan 阿富汗人, 145
- African 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 18, 121, 212; 非裔美国人的合法性确认, 190; 与国内及国际的互动, 194—95; 抗议运动, 183—87; 静坐, 18, 19—20, 182, 183—87
- al-Bashir, Omar Hassan 贝希尔, 奥马尔·哈桑, 141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 144
-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 169
- Andrews, Kenneth 安德鲁斯, 肯尼斯, 184
- Angola 安哥拉, 152
- Annual Register, British* 《年度纪事》, 英国, 46
- anocracies 个人独裁, 135
- antielection fraud campaigns 反选举舞弊运动, 32—33
- antislavery movements 反奴隶制运动, 6, 7, 9; 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 121, 212; 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 1—2, 8, 11—12, 32, 43, 58, 61, 95, 115, 126, 171, 191, 196, 211; 克拉克森在反奴隶制运动中的作用, 1—2, 12; 反奴隶制运动中出现的机制, 34—35; 用于反奴隶制运动中的请愿行动, 12
- antiwar protests 反战抗议, 19, 20
- appeals 吁请, 14—16
- Arafat, Yassir 阿拉法特, 亚西尔, 169, 170
- armed conflicts 武装冲突的类型, 153—55
- armed forces 武装力量, 136, 144, 150—51; 武装力量的背叛, 156,



- 159, 160;爱尔兰的武装部队,148;  
尼加拉瓜的武装力量,156, 159,  
160;政府对武装力量做出的反应,  
153;与革命的关系,167;资源需  
求,137, 150—51
- attribution of similarity 相似性的归因,  
95, 96f5.1, 158, 190, 214, 215
- authoritarian regimes 独裁政权,66,  
113
- Avneri, Uri 尤里,165, 167
- Beissinger, Mark 贝辛格, 马克,38,  
41—42, 59, 76, 105—6
- Benford, Robert 本福德, 罗伯特,102
- Biggs, Michael 比格斯, 迈克尔, 184
- bin Laden, Osama 本·拉登, 奥萨玛,68
- Blair Tony 布莱尔, 托尼,180
- Bookstores 书店,131
- boundary activation 界限激活, 78,  
138, 177, 188, 191, 215; 定义,34;  
以色列,168, 179; 与致命冲突,  
143, 156, 161; 作为提出要求的参  
照点,80; 使恐怖主义者与爱国者  
分开,80; 苏丹,143
- boundary deactivation 界限钝化, 78,  
80, 143, 177, 215
- boundary formation 界限形成,78, 215
- boycotts 杯葛 / 联合抵制行动, 1
- breast cancer coalition 乳腺癌患者联盟,  
131
- Bringing Down a Dictator (film) “推翻  
独裁者”(电影),33
- British-Irish conflicts 英爱冲突,145—  
52
- Brockett, Charles 布罗克特, 查尔斯,  
28, 102, 139—41; 有关抗争的数  
据,103—4
- Brokerage 居间联络,11, 35, 188, 190,  
191; 与对抗争之分析,30, 31—  
33,34 与民众团体,118; 与委内瑞  
拉的抗争,46; 定义,215; 智利流  
亡者们所起的作用,173; 与致命冲  
突,137, 138, 143, 151, 156, 158,  
161; 与新协作关系的建立,74; 总  
的看法,205—6, 与国际化的关系,  
177; 与规模转变,95, 96f5.1; 在塞  
尔维亚反对选举舞弊运动中,32—  
33; 与苏丹的斗争,143; 与乌克兰  
的抗争,77; 与萨帕塔主义者,75
-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布朗诉  
教育委员会”案,18, 184
- Burstein, Paul 伯斯坦, 保罗,128
- Bush, George W., 布什, 乔治·W., 20,  
82, 129
- Canada, Comparison of political system  
with United states 加拿大, 与美国  
政治制度的比较,54—55
- Capacity 能力,55—57, 62—66, 67
- Carter, Jimmy 卡特, 吉米,54, 158
- Castro Fidel 卡斯特罗, 菲德尔,47
- Catalogs, collecting for analysis of  
episodes 编制目录, 用于对抗争片  
段的分析,42—43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120; 波兰,  
118; 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

## 抗争政治

145—52, 212; 与工人的权利, 115  
Cavallo, Miguel 卡瓦罗, 米格尔, 174  
certification 合法性确认, 11, 75, 81, 118, 188, 191; 非裔美国人得到合法性确认, 35, 190; 通过与天主教信仰的联合, 115, 120; 抗争原因得到合法性确认, 168; 与各种要求, 85, 86; 定义, 34, 75, 215; 与致命冲突, 138, 156, 158, 159, 161; 工会获得合法性确认, 121  
Chavez, Hugo 查韦斯, 雨果, 44, 46—47, 53—54, 65  
Chiapas, Mexico 恰帕斯, 墨西哥, 恰帕斯的行动者构建, 72—74  
Chile 智利, 164, 172—74  
Chivers, C. J. 奇弗斯, 3  
Churches: occupation of 占领教堂, 89—92, 212  
Civic Party, Guyana 公民党, 圭亚那, 144  
civil liberties 公民自由, 62—66  
Civil Rights March on Washington 华盛顿的公民权进军, 18, 19  
civil rights movements 公民权运动, 102; 公民权运动图示, 184; 有关概念, 187—92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194—95; 美国, 18, 59, 85—86 运动中所采用的暴力方法, 20—21。  
civil wars 内战, 151—55, 214; 美国内战, 2, 35; 爱尔兰, 148—49; 苏丹, 136, 141  
claimant-object pairs 提出要求者—对象配对, 16—17

claim making 提出要求, 6, 80, 90, 115, 136; 与累积的经验, 22, 23; 所产生的后果, 85—87; 与尼加拉瓜革命, 158; 作为斗争方法, 12—16, 妓女提出要求, 90—92; 与抗争的关系, 4—5; 与日常社会组织的关系, 22, 23; 与抗争剧目, 16—67; 体制和机构在提出要求中的作用, 60—61, 83; 与抗争剧目变化的根源, 21—23; 苏联, 105; 委内瑞拉, 51, 53  
Clarkson, Thomas: as antislavery organizer 克拉克森, 托马斯, 作为反奴隶制运动组织者, 1—2, 12; 与政权体制和抗争之间的关系, 22—23; 与规模转变, 95; 作为跨国激进主义者, 171—72; 抗争剧目的运用, 16  
Clinton, Hillary Rodham 克林顿, 希拉里·罗德姆, 129  
Cloward, Richard A. 克洛沃德, 理查德·A., 128  
coalition formation 联盟形成, 75, 108, 177, 216; 反奴隶制, 35; 智利, 173; 意大利, 92—94; 与致命冲突, 144, 156, 159; 与国际化的关系, 177; 苏联, 104—7  
coalitions 联盟, 9, 124, 177; 与致命性冲突, 144, 155—56, 157b7.2, 158, 159; 与政治行动者, 76; 革命联盟, 156, 159; 跨国联盟, 172, 173, 174, 175, 177, 195; 女性健康联盟, 131  
coercion 高压政治, 138—39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勒律治, 塞缪尔·泰勒, 2
- 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 1, 6, 9, 23, 100, 108, 114; 非裔美国人的集体行动, 18; 作为抗争政治组成部分的集体行动, 7—8, 27; 集体行动的协作, 175; 定义, 5, 216; 与幻灭, 98; 集体行动的形式, 4—5, 10, 22; 与各种机构, 48, 49; 巴黎, 70; 与政治行动者, 74; 与政治机遇结构, 75, 84; 集体行动中的一些问题, 90; 社会网络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 116—18; 与规模转变, 94, 95; 与社会运动, 120, 124, 128; 苏联, 17; 与暴力, 37
- collective claims 集体要求, 9—10, 75, 76, 81—82
- colonial wars 殖民战争, 152
- Columbia University, shanty town protests 哥伦比亚大学, “棚屋抗议”行动, 38—39
- commercialization 商业化, 130—31
- competition 竞争, 97, 100, 131, 191—92, 216; 选举竞争, 170; 种族竞争, 10; 与致命冲突, 145, 149; 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竞争, 35; 委内瑞拉, 45; 与暴力行动, 42, 142
- composite regimes 混合政权, 55, 61, 135, 163—64, 179, 193; 与能力, 67; 与抗争, 163—81; 以色列, 170; 混合政权的等级排定, 64; 与社会运动, 194; 跨国性的混合政权, 163
- Conan, Arthur 柯南道尔, 198
- conditions 条件, 203bA.2, 204
- conscience constituents 良心选民, 91
- constitution-making 制定宪法, 47, 58, 80
- consumer advocacy 得到消费者支持, 130
- contention 抗争, 6, 9—10, 27—43, 46, 89, 197; 美国的抗争, 17, 18—21; 抗争之基础, 11—12; 抗争及其界限, 80; 作为抗争政治的组成部分, 7—8; 概念, 87; 有关抗争研究的若干结论, 197—98; 有节制的抗争对逾越界限的抗争, 60—61; 系列抗争, 21, 92, 99—104, 191, 194; 定义, 4—5, 216; d 抗争的动态, 28, 30; 抗争的未来, 23—24; 与全球化, 22; 抗争在危地马拉, 28; 与机构, 83—85; 抗争在意大利劳工中, 92—94, 99, 101; 各种形式的抗争标准化, 189; 与政治行动者, 74, 76, 78; 与政治机遇结构, 57, 58; 与妓女, 91; 各种政权与抗争, 48—50, 56, 60—61, 163—81, 189; 与宗教象征, 118, 145, 147; 与镇压, 140; 与规模转变, 94—97, 98, 108—9; 抗争发生地点, 87, 192, 201, 203bA.2; 与社会运动, 113—15, 120, 124, 128—29, 132; 机制—过程方法的步骤, 206—7; 跨国抗争, 170—74, 174—79, 195; 抗争各种类型, 103—4; 委内瑞拉的抗争 (1983—1999), 50—54, 65; 抗争中的暴力行动, 14, 59, 139, 193
- contentious interactions 抗争互动,

## 抗争政治

- 2,10—11,24,74,81—83,84;与界限,85;与认同改变,86;与动员,92;巴黎人的抗争互动,69—72;与妇女运动,122
- contentious performances 抗争表演方法,202bA.1
- contentious politics 抗争政治,4—11;抗争政治的组成部分,7—8;定义,4;描述对解释10;抗争政治研究中的描述性概念,201,202bA.1;抗争政治中的解释性概念,201,202bA.2;有关抗争政治的概述,196—97;与全球化,22,171,175,176;抗争政治的互动研究方法,11;抗争政治中的机制与过程,29—31,42—43;互联网在抗争政治中的作用,13,20;抗争政治扩散,189;抗争政治研究,61,67;与威胁,58;抗争政治在委内瑞拉,45—48
-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抗争剧目,202bA.1
- contraband, and creation of armed forces 走私,与武装力量的创建,155
- conventional events 传统型事件,98—100
- co-optation 共同选择,215
- coordinated action 协同行动,30,31—32,35,74,216;定义,31;与认同,34;与公众的不满(委内瑞拉),46;与规模转变,96f5.1
-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39,195
- Corriere della Sera*(newspaper)《晚邮报》,99
- Corruption, by French police officers 腐败,法国警官的腐败,90
- Costain, Anne 科斯坦,安,126—27,128
- countermovements 反向运动,21,133,194
- coup attempts, Venezuela 政变企图,委内瑞拉,49,51,53
- Dean, Howard 迪安,霍华德,20
- decertification 撤销合法性确认,75,158,159
- dedemocratization 去民主化,24,49—50,61—66,67,216
- defections 背叛,90,98,101,192;武装部队的背叛,156,159;定义,215;与遣散,108;政府成员的背叛,156,159,160
- della Porta, Donatella 德拉·波特,多纳特拉,53,100
- demobilization 遣散,11,35—36,87,89,191;定义,217;意大利的遣散,98—99;遣散的机制,97—102;对遣散的总体看法,206;遣散在波兰,113;与政治行动者,74;妓女们之遣散,91;遣散在苏丹,143
- democracy 民主政治,55—57
-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30,49—50,61—66;与抗争政治,66—67;与内战发生频率的下降,153;定义,216;委内瑞拉,46
- demonstrations 示威,12—16,84;与抗



- 争互动,70;示威在巴黎,69;民众力量的展示,17;互联网之在示威中的作用,13;示威之在苏联,42,76—77,105,107f5.4;示威的典型行动者,70,71f4.1
- diffusion 传播,30,31—32,75,132,190,191;跨越国界的传播,171,172,174,177,195;与委内瑞拉的抗争,46;定义,31,215;直接传播,95;传播之在地理上的各种类型,40,41;语言、象征物以及实际行动之传播,75;与致命性冲突,156,158,161;大众媒体的传播,13,33;与革命,156;与规模转变,95,96f5.1;在塞尔维亚反对选举舞弊运动中,32—33;静坐行动之传播,184;团结工会运动,116,118;与南非,39,41;与苏丹的斗争,143;利用邮政系统传播,118
- disillusionment 幻灭,91,97,98,101,192,216
- divestment campaigns 要求校方从南非撤资运动,39,40—41
- domestic interactions 国内的互动,194—95
- downward scale shift 向下的规模转变,94
- elections: Georgia 选举:格鲁吉亚,33;爱尔兰,149—49,150;巴勒斯坦,169;波兰,121;塞尔维亚,32—33;苏丹,141;乌克兰,2—4
- El Nacional* (newspaper) 《民族报》,50
-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212,214
- emulation 仿效,95,96f5.1,190,215
- episodes 抗争片段,27,36—38,70,87,188,203bA.2;反奴隶制抗争片段,9;各种类型的抗争片段,50—51,52f3.1;苏联解体中的诸抗争片段,42;为研究而进行的集中编目,42—43;占领圣伊泽尔教堂事件,89—92;对抗争片段的总体看法,206;波兰团结工会罢工事件,115—16;与机遇结构的关系,58—59;一系列抗争片段,213—14;委内瑞拉,50—51,52f3.1
- ERA campaign “平等权修正案”运动,123,133,193
- escalation 逐步升级,100,101,102,108,131
- ethnic conflicts 种族冲突,80,144—45
- European Union 欧盟,179
- evacuation of settlers in Gaza Strip 加沙地带定居者撤离,82,163,164—70,197
- evangelical revivals 福音派宗教复兴,121
- events 重大事件,27,36—38
- external actors 外部行动者,3—4,141,143
- externalization 外化,184,185f9.1
- external support, Nicaragua 外部支持,尼加拉瓜,158
- extradition 引渡,173—74,176
- extrasystemic conflicts 体制外的冲突,152,154f5.2

## 抗争政治

- Favre, Pierre 费弗尔, 皮埃尔, 70,71f4.1
- Fearon, James 费伦, 詹姆斯, 135
- feminist movements, France 妇女运动, 法国, 89—92
- Fillieule, Olivier 费里尔, 奥利弗, 69
- filling of available niches in a regime 在某一政权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102—3
-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171
- framing of an issue 问题的建构, 216
- France 法国, 14, 89—92, 213
-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47, 61—66, 144, 189
- Freedom Summer “自由夏季”, 18—19, 102
- Fugitive Slave Act 《逃亡奴隶法案》, 35
- Gandhi, Mohandas 甘地, 莫汉达斯, 195
- Garang, John 加兰, 约翰, 141—42, 143
- Garzón, Balthazar 加森, 巴尔萨扎, 164, 173—74, 176
- Gaza Strip, evacuation of settlers 加沙地带, 定居者撤离, 163, 164—70, 213
- Gdansk, Poland 格但斯克, 波兰, 110, 115
- genocide 种族大屠杀, 137, 141
- Georgia 格鲁吉亚, 33, 212
- Germany 德国, 14—16, 213, 15f1.2
- Gladstone, William 格拉斯顿, 威廉, 147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 22, 73, 161, 175—79, 178; 反全球化, 73; 定义, 216; 全球化的各种形式, 175
-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全球社会运动, 175
- goal displacement 目标置换, 130
- Gomulka, Wladislaw 哥穆尔卡, 112
- Goodwin, Jeff 古德温, 杰夫, 156
- Gorbachev, Mikhail 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 59, 77, 105
- governments 政府, 187, 202bA.1; 与集体要求, 9—10; 介入种族关系, 189; 与抗争的关系, 5—6
- Great Britain: protestant catholic 大不列颠, 新教—天主教冲突, 145—52, 212
-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格林斯博罗, 北卡罗来纳, 182, 183—87, 189, 191
- Guatemala 危地马拉, 28, 102—4, 139—41, 212, 214
- Guyana 圭亚那, 144—45
- hacktivism 黑客行动, 13
- Hamas 哈马斯, 166—67b8.1, 169—70
- Hart, Peter 哈特, 彼得, 148—49
- Hezbollah 黎巴嫩真主党, 170
- home rule (爱尔兰) 自治法案, 147, 148
- human rights abuses 违反人权的种种行径, 164, 175, 180—81
- Hungary 匈牙利, 88

- identities 认同, 23, 79; 认同的构成要素, 79; 对认同的描述, 81; 认同之动员, 74; 模式化的认同, 40; 社会认同, 78; 萨帕塔主义者的认同, 73—74
- identity claims 认同要求, 81—82, 190; 认同要求的有效性, 85—86; 与机构的关系, 83—85
- identity reassessment 认同重估, 190
- identity shift 认同改变, 34, 35, 81, 86, 206, 216
- immigrants, skinhead attacks on 外来移民, 光头党对移民的攻击, 16
- indigenous populations 土著人口, 73, 75
- Indo-Guyanese 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印度裔圭亚那人的“人民进步党”, 144
- industrial conflicts 劳资冲突, 93
- innovations: in performances 在抗争表演上的创新, 30; 在抗争剧目上的创新, 16, 21—22, 188; 建立棚屋, 40
- 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化, 61, 97, 108, 129—30, 192, 216; 与系列抗争, 102; 与遣散, 98, 101; 与暴力行动, 100
- institutions 机构, 10, 49, 188, 202bA.1; 与抗争, 83—85; 定义, 48; 与社会运动活动及社会运动基础的交织, 124, 125—26; 以色列, 180; 与政权, 60—61; 与社会运动, 124—27, 133; 术语用法, 124
- internal conflicts 内部冲突, 152, 153, 154f5.2
- internalization 内部化, 177, 185f9.1
- internationalization 国际化, 161, 176—79, 196, 216
-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173—74, 176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46, 176, 178
-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国际运动, 171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 180, 194—95
- Internet, role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互联网, 在抗争政治中的作用, 13, 20, 208—9
- interstate conflicts 州际冲突, 152, 154f5.2
-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Costain) 《招致妇女们的造反》(科斯坦), 126—27
- involution 卷入, 130, 131, 217
- Iraq 伊拉克, 145
- Irel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isions in 爱尔兰的种族与宗教分裂, 145—52, 212
- Irish Republican Army 爱尔兰共和军, 150, 151
- Islamic Jihad 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170
- Islamism 伊斯兰运动, 176
- Islamist movements 伊斯兰运动, 21
- Israel 以色列, 180; 处于致命冲突中的以色列, 168—70; 作为分裂的混合政权, 163—64

## 抗争政治

Italy 意大利, 212, 213;

学生和工人之遣散, 98—99; 劳资冲突, 92—94

Jackson, Jesse 杰克逊, 杰西, 38—39

Jenkins, Craig 金肯斯, 克雷格, 36

Jewish settlements in Gaza Strip 加沙地带犹太人定居点, 162, 163, 164—68, 213

John Paul II 约翰·保罗二世 115

Johnston, Hank 约翰斯顿, 汉克, 175

Karabakh 卡拉巴赫, 79, 81

Kazakh Republic 哈萨克共和国, 79, 81, 104—5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 约翰·F., 126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晓夫, 尼基塔, 111—13

King, Martin Luther, Jr. 金, 小马丁·路德, 34, 85—86, 195

Kmara “科马拉”, 33

Kriesi, Hanspeter 克里斯, 汉斯彼得, 59, 129—31

Kuchma, Leonid 库奇马, 列昂尼德, 2—3

labor force: martyred workers 劳动力, “殉难工人”, 120; 意大利工人抗争, 92—94; 工作条件, 112—13

Laitin, Davi 莱廷, 达维, 135

*La Manifestation* (Favre) 《示威》(费弗尔), 70

Le Nid 勒尼德 91

lethal conflicts 致命冲突, 9, 193; 内战, 35, 151—55; 种族与宗教冲突, 145—52; 致命冲突的形式及特征, 136—41; 在从加沙地带撤离行动中, 168—70; 有关普遍法则的谬见, 137—38; 圭亚那的致命性冲突, 144—45; 有关动机的谬见, 137; 革命, 155—60; 苏丹的致命性冲突, 135—36

lethal politics 毁灭性政治, 194

Lincoln, Abraham 林肯, 亚伯拉罕, 35

Lowi, Theodore 洛维, 西奥多, 130

Lutz, Ellen 卢茨, 埃伦, 174

Lyons, France 法国里昂占领教堂的行动, 89—92, 212

marches 游行, 18—19, 90, 149, 174

Mason, Carlos Guillermo Suarez, 梅森, 174

massacres 大屠杀, 28

Mathieu, Lilian 马蒂厄, L., 90

Maya, Lopez 梅耶, 洛佩兹, 53

May Day 五一节, 17

McAdam, Doug 麦克亚当, 道格, 11, 36, 102, 183, 184, 193

McCain, Franklin 麦凯恩, 富兰克林, 184

McCarthy, John 麦卡锡, 约翰, 91

mechanism-process approach 机制—过程研究方法, 206—8

mechanisms 机制, 10—11, 27, 188, 203bA.2, 214—15; 定义, 29; 与动员, 92—94; 总体看法, 205—6



- media: attention to marches and sit-ins 媒体对游行及静坐的关注, 19; 大众传媒, 13; 报纸, 37—39, 50—54, 99—100; 在静坐行动的作用, 184; 互联网新闻, 208—9
- Merabishvili, Ivane 马拉比什维利, I., 33
- Mexico 墨西哥, 72—75, 82, 212
- Michels, Robert 米歇尔斯, 罗伯特, 130
- migration 移民, 18, 59, 80
- militarized groups 军事化团体, 100
- military organizations 军事组织, 137, 144, 150—51; 与内战, 151—55; 匈牙利的军事组织, 88; 苏丹的军事组织, 102, 141—43。参见武装力量
- Milošević, Slobodan 米洛舍维奇, 32
- 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密西西比州的自由夏季运动, 18—19, 102
- mobilization 动员, 30, 35—36, 87, 90—91, 177, 191; 一种认同的动员, 74; 共识动员, 125; 定义, 217; 与传播, 95; 动员的各种形式, 20, 22; 与土著居民, 55; 爱尔兰的动员, 146b7.1, 151; 动员的机制, 92—94; 与运动基础, 192; 波兰的动员, 115—18, 121—22, 212; 政治行动者的动员, 74; 重新恢复生机的动员, 130f6.4, 131; 与政治机遇结构的关系, 75; 对动员的抵制, 17; 动员的逆转, 97—102; 与革命, 156, 158, 159; 互联网在动员中的作用, 13; 在苏联动员, 104—5; 与政府的镇压, 140; 在苏丹动员, 143; 社会运动动态的基本布局, 129—31; 在乌克兰动员, 2; 在委内瑞拉动员, 54; 妇女运动, 131, 192; 萨帕塔主义者的动员, 73—74
- modular identity 标准的认同, 40
- modular performances 标准的抗争表演, 12—13
- Museveni, Yoweri 穆萨维尼, Y., 142
- Muslims 穆斯林, 135—36, 142, 143
- National Abortion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Action League 全国流产与生育权行动联盟, 131, 132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96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1, 30, 138; 远距离民族主义, 169; 苏联的民族主义, 42, 104—6, 108, 109, 191; 暴力民族主义, 137
-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 全国妇女组织, 123, 126—27, 131, 132
- Netanyahu, Benjamin 内塔尼亚胡, 本杰明, 166b8.1, 168
- the Netherlands 荷兰, 37, 59, 63, 213
- network of organizations 组织网络, 113
- new coordination 新协作, 31, 32f2.1, 108; 与委内瑞拉的抗争, 46; 定义,

## 抗争政治

- 217; 与规模转变, 94, 95; 在塞尔维亚反对选举欺诈运动中, 32—33; 新协作的地点, 32—33; 新协作在苏丹, 143; 萨帕塔主义者的新协作, 74—75
- newspapers, as data source 作为数据来源的报纸, 37—39, 50—54, 99—100
- new world order 世界新秩序, 176
-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3, 184
- Nicaraguan revolution 尼加拉瓜革命, 156—58, 213
- nongovernmental actors 非政府行动者, 6
- nonstate actors 非国家行动者, 177—78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73
- North Carolina A&T College 北卡罗来纳 A&T 学院, 182
-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 145—52, 163, 180, 212
- Oil industry,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 45, 48—50, 53
- Olivera, Jorge 奥利维拉, J., 174
- Olzak, Susan 奥尔扎克, 苏珊, 37
- Operation Condor “秃鹰行动”, 172—74, 181
- oppositional networks, Poland 波兰的反对派网络, 116—18
- organizational forms 组织形式, 23
-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States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48
- Osa, Maryjane, 奥萨, M., 112, 116
- Otpor, 抵抗运动(塞尔维亚) 32—33
- outcomes, 后果, 87, 203bA.2, 204—5; 与系列抗争, 102—4; 革命的后果, 155, 156, 158—60; 与政府镇压, 140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163—64, 168—70
- Palestinian Authority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165, 169
- Panzós massacres 潘佐斯大屠杀, 28
- Paris, France 巴黎, 法国, 17, 69—72
- 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PNC), Guyana “全国人民大会”, 圭亚那, 144
- Pérez, Carlos Andrew 佩雷斯, 卡洛斯·安德鲁斯, 46, 47, 64—65
- performances 抗争表演, 12, 188, 202bA.1; 与民权运动, 18; 与提出要求, 12—16; 创新, 30; 与政治行动者, 11; 潘佐斯的居民, 28; “仪式性的政治表演”, 17
- Perrow, Charles 佩鲁, 查尔斯, 36
- petitions 请愿, 12
- Pinochet, Augusto 皮诺切特, 95, 164, 172—74, 180, 181, 195, 213
- Piven, Frances F., 皮文, F. F., 128
- Planned Parenthood “计划性父母身份”, 131
- pluralism 多元主义, 113
- Poland 波兰, 111—13, 212
- polarization 极化, 97, 101, 151, 180; 定

- 义,217; 与尼加拉瓜革命,158,159; 两极化在苏丹 143
- police departments, France 法国的警务部门,89—90
- Polish Communist Party 波兰共产党,112
- political actors 政治行动者,9,21,187,202bA.1; 政治行动者的活动,76; 恰帕斯的政治行动者,72—74; 与提出要求,82—83; 作为概念的政治行动者,10—11; 定义,74; 政治行动者的形成、变化及消失,74—78; 各种形式的政治行动者,138; 危地马拉的政治行动者,28; 政治行动者的确认,76; 非国家的政治行动者,177—78; 巴黎示威中的政治行动者,70,71f4.1
- political identities 政治认同,9,10—11,78—81,187,202bA.1
- political institutions 政治机构,124—25
-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政治机遇结构,10,45,84,189—90,203bA.2; 政治机遇结构内部的行动,94; 与激进主义团体,75—76; 英爱冲突,147; 与民权运动,187; 抗争政治,22; 定义,49; 作为要求之决定性因素的政治机遇结构,83; 国际政治机遇结构,177—78;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民,167; 与致命性冲突,138; 总体看法,57—59,205; 各种政权与政治机遇结构,66,161,197; 与内战的关系,155; 与国际化的关系,176; 苏丹的政治机遇结构,142—43; 委内瑞拉的政治机遇结构,49—50
- political rights 政治权利,62—66
- politics 政治,90; 政治变化,21—22; 作为抗争政治组成要素的政治,7—8; 与政府代理人的关系,5; 苏丹政治,143
- Poznan, Poland 波兹南,波兰,112,113
- prisons and prisoners 监狱与囚犯,180—81
- privacy 个人隐私,67
- procedural protests “程序性抗议”,14—16
- processes 过程,10—11,27,188,203bA.2,214,215—17; 定义,29; 总体看法,206; 过程的解释步骤,27
- program claims 计划性要求,82,83—85,86,190
- prostitutes 妓女,89—90,212
- Protestant-Catholic conflict 新教—天主教冲突,145—52
- protests: election fraud 针对选举欺诈的抗议,2—4; 德国的抗议行动,14—16; 搭建棚屋抗议行动,19—20,26,38—41; 委内瑞拉的抗议活动,50—51,52f3.1
- public dissent, in Venezuela 公众的不满,委内瑞拉,46
- public interest groups 公众利益集团 131
- public self-representation 公开的自我表达,81,119—20,121,123,217

Putin, Vladimir 普金, 弗拉基米尔, 3—4

Quakers 贵格会教徒, 115

Rabin, Yitzhak 拉宾, Y., 166b8.1, 169

racial discrimination 种族歧视, 55

radicalization 激进化, 61, 130f6.4, 131, 180; 定义, 217; 以巴冲突, 169; 与致命冲突, 193; 与动员, 114; 激进化过程中的暴力, 100

Randolph, A. Philip 伦道夫, A. Philip, 18

Reagan, Ronald 里根, 罗纳德, 124

Red Brigades 红色旅, 100

Reform Party, Guyana 改革党, 圭亚那, 144

regimes 政权, 32, 203bA.2, 205.212; 与内战, 153—55; 与提出要求, 83—85; 苏联的解体, 41—42; 与抗争, 48—50, 66—67; 定义, 45; 对政权的民主监督, 61—66; 政权内部的种族和宗教冲突, 144—52; 填补政权当中的合适位置, 102—3; 政权的统治能力, 62—64; 与各种机构, 60—61; 各种政权的政治机遇结构, 57—59; 政府分裂与权力转移, 139, 140f7.1; 与抗争剧目的关系, 10, 22, 23, 54—57, 189; 与革命, 155—60; 分裂的政权, 163, 164, 180; 政权的类型, 55—57, 144; 不民主的政权, 141—43; 政权内部的各种威胁, 59; 委内瑞拉的抗争(1983—1999), 50—54

religious conflicts, Ireland 爱尔兰的宗教冲突, 145—52

reorganization of work 工作的重组, 80

repertoires 抗争剧目, 4, 30, 67, 75, 188, 202bA.1; 各种协会所采用的抗争剧目与政治行动中采用的抗争剧目, 120—22, 123; 抗争剧目的在美国的变化(1955—2005), 18—21; 与提出要求, 16—17, 84, 142, 155; 与抗争互动, 84; 定义, 49; 抗争剧目之区别, 10; 抗争剧目的创新, 21, 21—22, 188; 意大利的抗争剧目, 93; 巴黎人的抗争剧目, 69, 91; 与各种政权的关系, 189; 机遇和威胁之在抗争剧目选择中的作用, 58; 与社会运动, 120—21, 123, 130, 145, 193; 抗争剧目变化的根源, 21—23; 抗争剧目在各国的变化, 54—57; 委内瑞拉的抗争剧目, 49, 53, 54

repression 镇压, 18, 98, 101, 102, 168, 192; 与撤销合法性确认, 75; 定义, 215; 镇压的合理理由, 21; 与致命冲突, 143, 158, 159; 与动员, 140; 在波兰镇压, 111, 112—13, 115, 116; 警察的镇压行动, 94; 与政治结盟, 83; 对妓女的镇压, 90; 政权内部的镇压, 49, 56, 58, 193; 宗教压制措施, 105; 与社会运动, 120—21; 在乌克兰的镇压, 3; 与暴力, 42, 100

reproduction, as interactive mechanism-dependent process 作为依赖于互动机制之繁殖, 29



- resistance 抵抗, 17
- Revolutionary Bolivarian movement  
“革命的玻利瓦尔运动”, 46—47
- revolutions 革命, 104, 155—60; 尼加拉瓜革命, 156—58, 213; 与政治行动者, 21; 与武装力量的关系, 165, 167; 社会革命, 156—58
- rituals 仪式, 17
- Roe v. Wade “罗诉韦德”, 129
- Roht-Arriaza, Naomi 罗特—阿里尔扎, 172
- round table negotiations “圆桌”谈判, 121
- Rucht, Dieter 鲁赫特, 迪特尔, 14, 36—37, 50
- Rwanda 卢旺达, 137
- Saakashvili, Mikhail 萨卡什维利, 33
- Saint-Nizier Church, occupation of 对圣伊泽尔教堂的占领, 89—92
-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 158
- scale shift 规模转变, 11, 89, 94—97, 132, 190; 定义, 217; 向下的规模转变, 94; 与尼加拉瓜革命, 158; 规模转变在苏联, 108—9; 规模转变的跨国属性, 172, 177; 向上的规模转变, 31, 95—97, 108—9, 112, 118, 191
- segmentation 分裂, 36, 55; 分裂的政权, 163, 164, 180; 政权分裂在巴勒斯坦, 163—64
- segregation 种族隔离, 187, 189
- self-help groups 自助团体, 130, 131, 132
- Serbia 塞尔维亚, 32—33, 212
- set-piece demonstrations 按照事先精心部署的计划展开示威行动, 18—19
- settlement: Ireland 爱尔兰问题的解决, 146b7.1, 151; 尼加拉瓜的解决方案, 158; 和平方案, 141, 143, 149, 150
- Sewell, William 休厄尔, 威廉, 183
- sex workers 性交易行当从业者, 90—92
- shantytown protests 棚屋抗议运动, 19—20, 26, 38—41, 59, 213
- Sharon, Ariel 沙龙, 163, 165, 166b8.1, 171
- Shaw University 萧尔大学, 191
- Shevardnadze, Eduard 谢瓦尔德纳泽, 33
- Shorter, Edward 肖特, 爱德华, 36
- Sikkink, Kathryn 希金克, 凯瑟琳, 174
- simple streams of contention 简单的抗争之流, 188, 203bA.2, 204, 211—13
- Sinn Féin 新芬党, 148—49
- sit-ins 静坐, 18, 19—20, 213, 214;  
格林斯博罗的静坐, 183—87, 191;  
与静坐有关的社会运动概念, 188—92; 北卡罗来纳 A&T 学院, 182
- skinhead attacks 光头党人发动的攻击, 16
- Slaughter, Anne-Marie 斯劳特, 安妮—

- 玛丽, 176
- slavery 奴隶制, 6, 34—35
-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2
- Smith, Jackie 史密斯, 杰基, 175
- Snow, David 斯诺, 戴维, 102
- social actors 社会行动者, 90
- social appropriation 社会利用, 34, 118, 119, 217
- social bases, of Zapatista identity 社会基础, 萨帕塔主义认同的社会基础, 73—74
- social incentives 社会动机, 130
- socialist regimes 社会主义政权, 64, 66
- social life 社会生活, 23, 60, 80
- social movement bases 社会运动基础, 10, 11, 113—15, 187, 202bA.1; 定义, 8; 与社会运动活动及机构的交织, 124, 125—26; 总体看法, 192—94; 与团结工会, 115—18; 与跨国社会运动, 179
- social movements campaigns 社会运动活动, 113—15, 192—94, 202bA.1; 对社会运动活动的描述, 119; 与社会运动基础及各种机构的交织, 124, 125—26; 社会运动之实际行动在波兰的形成, 118; 与公开的自我表现, 119—20, 121
- 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s (SMOs) 社会运动组织, 20, 128
-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9, 66, 202bA.1; 反奴隶制运动, 1—2; 在波兰引起的变革, 121—22; 定义, 8, 111, 114—15; 影响, 128—29; 与各种机构, 124—27, 133; 作为与抗争及集体行动的交叉重叠部分, 8—9; 社会运动政治, 167—68; 动员之后的社会运动, 129—32; 与抗争剧目, 16—17, 120—22; 跨国社会运动, 2, 179
-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187
- social network, Poland 社会网络, 波兰, 116—18
- solidarity, building of 团结一致的的形成, 91
- Solidarity, Poland 团结工会, 波兰, 110, 111, 115—18, 133; 由团结工会所带来的变化, 121—22; 总体看法, 132
- Soule, Sarah 索尔, 萨拉, 38—41
- South Africa, shanty town protests 南非, 搭建棚屋举行抗议, 19—20, 26, 38—41, 59, 213
- Soviet Union 苏联, 59, 88, 214; 解体, 41—42, 76—78, 212; 动员与遣散在苏联, 104—7; 弱形式的抗争剧目, 17
- Spain 西班牙, 164
- Spilerman, Seymour 斯皮勒曼, 西摩, 36
- Stalin, Josef 斯大林, 约瑟夫, 111—12
- standing claims 地位要求, 82, 83—85, 86, 190
- Straw, Jack 斯特劳, 杰克, 174
- streams of contention 抗争之流, 27, 87, 188, 211—13; 定义, 203bA.2; 分解, 36; 对抗争之流的研究, 37, 41

- strikes: as example of scale shift 罢工:  
作为规模转变的实例,95;法国的  
罢工,213;波兰团结工会,  
110,115—16;苏联的罢工,42;学  
生非暴力行动协作委员会  
(SNCC),191
- student protests 学生们的抗议行动,  
14,17;与工人斗争的联系,94;与  
规模转变,95;与搭建“棚户城”行  
动,19—20,26,38—41,59,213
-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支持民主党学生协会”,  
102
- Sudan 苏丹,134,135—36,141—43,155,  
212
-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PLA)“苏丹人民解放军”,134,  
141—42
- suicide bombings 自杀式炸弹袭击,  
84,95,166b8.1,169
- Switzerland 瑞士,37,213
- Tarrow, Sidney 塔罗,西德尼,  
37,50,53,98—99,100—101
- television, attention to marches and  
sit-ins 电视,对游行和静坐行动的  
关注,19
- terrorism 恐怖主义,37,180—81
- threats 威胁,58,59
- Tilly, Charles 蒂利,查尔斯,36
- time frames, for campaigns 选定一个  
时间段以发起运动,18—19
- transfers of power 权力转移,  
139,140f7.1,156,160
- transformation 转变,29,102,104,131;  
从废奴运动向内战的转变,35;黎  
巴嫩真主党的转变,170;尼加拉瓜  
的转变,158;波兰的转变,121;转  
变的过程,129—30;妇女生活的转  
变,6
- transformative events 有变革能力的事  
件,183,184
- transgovernmental conspiracies 跨政府  
的密谋,173
-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and activism 跨  
国激进分子与激进主义,171—  
72,176
-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跨国传播,  
171,172,174,177,195
- 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 跨国互动,  
194—95
-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列昂,104
- Ukraine 乌克兰,2—4,11,21,59,61,212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143
- United States 美国:内战,2,35;民权运  
动,85—86;与加拿大政治体制的  
比较,54—55;国会对妇女运动的  
反应,127;系列抗争,102;美国的  
政治权利与公民权,63,64;种族与  
族群分裂,145;抗争剧目的变化  
(1955—2005),18—21,212;反恐战  
争,180—81;妇女运动,122—  
24,212,214
- universal jurisdiction 普世司法权,174,  
176

抗争政治

- upward scale shift 向上的规模转变, 31,95—97,108—9,118
- Venezuela 委内瑞拉,44, 59, 209—10, 214; 委内瑞拉的抗争,48—54; 委内瑞拉的抗争政治 45—48,212; 作为民主政权的委内瑞拉,62—63,64—66; 委内瑞拉的规模转变, 95
- venue shopping “寻求事件发生地”, 178
- violence 暴力(行动),14,99,100; 与民权运动,20—21; 逐步升级,131; 危地马拉的暴力行动,28; 与制度化, 97; 光头党对移民的袭击,16; 有关暴力的数据来源,37; 苏联的暴力行动,105,106,107f5.4; 委内瑞拉的暴力行动,46—48,51,52f3.1
- weak repertoires 弱形式的抗争剧目, 17
- Weather Underground “地下气象”, 102
- Web newswires 互联网新闻专线, 208—9
- West Bank 约旦河西岸,164
- Western Wall “西墙”,168
- Whittier, Nancy 惠蒂尔,南希 128—29
- Wilberforce, William 威尔伯福斯,威廉,2
- women's health 妇女健康,131
- 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WITCH) “地狱来的妇女国际恐怖主义阴谋”, 123
- women's movement 妇女运动,192—93; 国会对妇女运动的反应,127; 妇女运动在法国,89—92; 参加妇女运动的影响,128—29; 与各种机构,126—27; 与克里斯的基本布局分析,131; 美国的妇女运动,122—24,132,212,214
- women's rights 女权,122
- workers' rights 工人的权利,17,115—18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133,144,172, 176,178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世界贸易组织,31,176,177,178
- Yeltsin, Boris 叶利钦,鲍里斯,77,105
- Yushchenko, Victor 尤先科,维克多, 2—3
- Zald, Mayer 扎德,迈耶,91
- Zapata, Emiliano 萨帕塔,E.,74
-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72,73,75
- Zapatistas 萨帕塔主义运动,72—75,82,212



## 译后记

与“人文与社会译丛”再度结缘,首先要感谢的是译丛主编刘东先生,正是刘老师所给予的热情鼓励与高度信任,让我在事务缠身且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时,仍然义无反顾地接下了本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的过程是一次真正的学习过程,感谢他为我提供了又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一些同事和朋友直接或间接地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施以援手,整个翻译工作便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此外,还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黄颖女士,感谢她在审校、编辑该书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吴艺红和女儿小昭,正是她们多年来的倾心奉献和大力支持,才使我有热情也有信心去完成那些原本棘手的任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忙于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所在的人文与社会学院人文教育专业继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之后,其教学团队又荣获国家级教学团队称号,作为我们专业及团队建设项目的骨干成员,我为此而由衷高兴。同时,也希望本书以及前此已出版的《斗争的动力》一书能在特色专业建设及团队建设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李义中

2009年3月于安庆师范学院



# 人文与社会译丛

## 第一批书目

- 1.《政治自由主义》,[美]J. 罗尔斯著,万俊人译 28.80 元
- 2.《文化的解释》,[美]C. 格尔茨著,韩莉译 24.50 元
- 3.《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法]B. 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16.60 元
- 4.《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A.G. 弗兰克著,高铨等译 13.60 元
- 5.《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波]F. 兹纳涅茨基、  
[美]W.I. 托马斯著,张友云译 9.20 元
- 6.《现代性的后果》,[英]A. 吉登斯著,田禾译 10.00 元
- 7.《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美]M. 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 14.20 元
- 8.《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英]E.P. 汤普森著,  
钱乘旦等译 54.50 元
- 9.《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波]F. 兹纳涅茨基著,郝斌祥译 11.50 元

## 第二批书目

- 10.《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美]D. 克兰著,赵国新译 13.00 元
- 11.《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M. 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 15.20 元
- 12.《后形而上学思想》,[德]J.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15.00 元
- 13.《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美]M. 桑德尔著,万俊人等译 15.00 元

- |                                  |         |
|----------------------------------|---------|
| 14.《临床医学的诞生》,[法]M.福柯著,刘北成译       | 12.20 元 |
| 1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英]J.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  | 15.80 元 |
| 16.《俄国思想家》,[英]I.伯林著,彭淮栋译         | 18.50 元 |
| 17.《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C.泰勒著,韩震等译 | 34.50 元 |
| 18.《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 11.80 元 |
| 19.《现代性与大屠杀》,[英]Z.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 17.00 元 |

### 第三批书目

- |   |         |
|---|---------|
| 20.《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英]J.亚历山大著,彭牧等译             | 15.80 元 |
| 21.《自由史论》,[英]J.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                 | 27.00 元 |
| 22.《伯林谈话录》,[英]I.伯林等著,杨慎钦译                 | 13.50 元 |
| 23.《阶级斗争》,[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                  | 13.50 元 |
| 24.《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M.沃尔泽著,<br>褚松燕等译 | 24.80 元 |
| 25.《大萧条的孩子们》,[美]G.埃尔德著,田禾等译               | 27.30 元 |
| 26.《黑格尔》,[加]C.泰勒著,张国清等译                   | 43.00 元 |
| 27.《反潮流》,[英]I.伯林著,冯克利译                    | 26.60 元 |
| 28.《统治阶级》,[意]G.莫斯卡著,贾鹤鹏译                  | 30.80 元 |
| 29.《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 24.60 元 |

### 第四批书目

- |                                   |         |
|-----------------------------------|---------|
| 30.《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英]I.伯林著,胡传胜译 | 23.20 元 |
| 31.《保守主义》,[德]K.曼海姆著,李朝晖、牟建君译      | 16.00 元 |
| 32.《科学的反革命》,[英]L.哈耶克著,冯克利译        | 15.20 元 |



- |                                |        |
|--------------------------------|--------|
| 33.《实践感》,[法]P.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 22.60元 |
| 34.《风险社会》,[德]U.贝克著,何博闻译        | 17.70元 |
| 35.《社会行动的结构》,[美]T.帕森斯著,彭刚等译    | 43.50元 |
| 36.《个体的社会》,[德]N.埃里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 15.30元 |
| 37.《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著,顾杭、庞冠群译 | 21.20元 |
| 38.《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 25.00元 |
| 39.《追寻美德》,[美]A.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      | 18.90元 |

### 第五批书目

- |                                 |        |
|---------------------------------|--------|
| 40.《现实感》,[英]I.伯林著,潘荣荣、林茂译       | 18.00元 |
| 41.《启蒙的时代》,[英]I.伯林著,孙尚扬、杨深译     | 17.00元 |
| 42.《元史学》,[美]H.怀特著,陈新译           | 33.50元 |
| 43.《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英]J.B.汤普森著,高铨等译 | 24.50元 |
| 4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加]J.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 29.50元 |
| 45.《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美]R.K.默顿著,唐少杰等译 | 48.00元 |
| 46.《黑皮肤,白面具》,[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4.00元 |
| 47.《德国的历史观》,[美]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   | 29.50元 |
| 48.《全世界受苦的人》,[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7.80元 |
| 49.《知识分子的鸦片》,[法]R.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   | 20.50元 |

### 第六批书目

- |                              |        |
|------------------------------|--------|
| 50.《驯化君主》,[美]H.C.曼斯菲尔德著,冯克利译 | 28.00元 |
| 51.《黑格尔导读》,[法]A.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 45.00元 |
| 52.《象征交换与死亡》,[法]J.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 22.50元 |
| 53.《自由及其背叛》,[英]I.伯林著,赵国新译    | 15.00元 |

- 54.《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英]I.伯林著,马寅卯译(即出)
- 55.《运动中的力量》,[美]S.塔罗著,吴庆宏译 23.50 元
- 56.《斗争的动力》,[美]D.麦克亚当,S.塔罗,C.蒂利著,李义中等译  
31.50 元
- 57.《善的脆弱性》,[美]M.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 55.00 元
- 58.《弱者的武器》,[美]J.C.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 29.50 元
- 59.《图绘》,[美]S.弗里德曼著,赵国新译(即出)

### 第七批书目

- 60.《现代悲剧》,[英]R.威廉斯著,丁尔苏译 18.00 元
- 61.《论革命》,[美]H.阿伦特著,陈周旺译 19.50 元
- 62.《美国精神的封闭》,[美]A.布卢姆著,战旭英译,冯克利校  
28.00 元
- 63.《浪漫主义的根源》,[英]I.伯林著,吕梁等译 18.00 元
- 64.《扭曲的人性之材》,[英]I.伯林著,岳秀坤译 22.00 元
- 65.《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美]P.查特吉著,范慕尤、杨曦译  
18.00 元
- 66.《现代性社会学》,[法]D.马图切利著,姜志辉译 32.00 元
- 67.《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英]R.伯恩斯坦著,黄瑞祺译 25.00 元
- 68.《以色列与启示》,[德]E.沃格林著,霍伟岸、叶颖译 48.00 元
- 69.《城邦的世界》,[德]E.沃格林著,陈周旺译 36.00 元
- 70.《历史主义的兴起》,[德]F.梅尼克著,陆月宏译(即出)

### 第八批书目

- 71.《环境与历史》,[英]W.贝纳特,P.科茨著,包茂红译 20.00 元

- 72.《人类与自然世界》,[英]K.托马斯著,宋丽丽译 35.00元
- 73.《卢梭问题》,[德]E.卡西勒著,王春华译 15.00元
- 74.《男性气概》,[美]H.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 28.00元
- 75.《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美]R.塔克著,罗炯等译 25.00元
- 76.《谁统治美国?》,[美]W.多姆霍夫著,吕鹏、闻翔译 35.00元
- 77.《健康与社会》,[法]M.德吕勒著,王鲲译 35.00元
- 78.《读柏拉图》,[德]T.A.斯勒扎克著,程炜译 28.00元
- 79.《苏联的心灵》,[英]I.伯林著,潘勇强译(即出)
- 80.《个人印象》,[英]I.伯林著,林振义译(即出)

## 第九批书目

- 81.《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法]B.斯蒂格勒著,赵和平、印螺译 25.00元
- 82.《抗争政治》,[英]C.蒂利著,李义中译 28.00元
- 83.《亚当·斯密的政治学》,[英]D.温奇著,褚平译(即出)
- 84.《怀旧的未来》,[美]S.波伊姆著,杨德友译(即出)
- 85.《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美]E.博瑟拉普著,陈慧平译(即出)
- 86.《风景与认同》,[英]W.J.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即出)
- 87.《政治革新与概念变化》,[美]T.鲍尔、J.法尔、R.L.汉森编,朱进东译(即出)
- 88.《大西洋的跨越》,[美]D.T.罗杰斯著,吴万伟译(即出)
- 89.《过去与未来之间》,[美]H.阿伦特著,王寅丽、张立立译(即出)
- 90.《语言的未来》,[法]P.朱代·德拉孔布、H.维斯曼著,梁爽译(即出)

有关“人文与社会译丛”及本社其他资讯,欢迎点击 [www.yilin.com](http://www.yilin.com) 浏览,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 [renwen@yilin.com](mailto:renwen@yilin.com).